



李松樟

我跟刘方到今天都还没有见过面。两年前，北京的一位朋友将这部订成厚厚五大册的书稿推荐给我，花了几个晚上读完后，心情相当复杂。一时间，我忘了自己出版者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一个成年人，感到如芒刺背般的惭愧、不安，还有不知背负了多少责问和质疑似的沉重！

由于原稿较少分段，几乎是一气呵成，读起来相当吃力。重复和过于说论的文字也很多。在征得刘方同意后，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经三次修改，将原来近50万字的作品删到30余万字，并且重新分段、梳理，将它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相信没有伤害到这部天才的作品。仿佛，对面是一位敏感而又忧郁的少年，我要纠正他的一些错误，但又不能让他感到丝毫的难堪，尤其是那些充满才情，但发表后可能会对他不利的文字，删起来真的于心不忍。他是一个具有写作天赋的少年，他出色的感受能力和熟练驾驭题材、把握文字的能力，使人忘记他的真实年龄。作为一个少年，他可能还有待成熟，但作为一个作家，他已经无愧地站在了优秀者的行列，如同一个少年刀客现身于江湖，他出神入化的技艺和天赋必将引起天下刀客的关注，并让他们清楚地感到来自后辈的威胁。

对于这部作品的评价还有待时日，那是更多读者和评论家们的事情，但我相信，它不会被有判断力和公正的评论良知的人们错过，也一定会被时间留住。这不仅因为作品从一个高三班级准确地反映了整个学校、整个中国的教育现状和问题，深刻揭示了当前各种思潮对学生身心的影响，精确地把握住了生活的真相和时代脉搏的律动，而且从文学本身，就一部精致的小说而言，它带给我们的冲击和震撼是从来没有的。你一定会感叹：写作，真的是神圣的，是有天分的人才可以做的，真正的文学来自血液，而不是装扮和虚妄。

我在这里只想说，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为人父母者也好，为人师表者也好，甚至是有能力有资格对中国的教育现状动嘴动手的人们也好，我们知道孩子们在想些什么吗？我们可曾抚慰过他们烂漫的年龄里不应该有的凄风苦雨？可曾平等、友善、耐心地倾听过他们内心的隐痛，抚去他们幼小身心承受的成长的苦恼？他们为什么会与成人顶撞，甚至成为自以为是的我们的敌人？他们衣食无忧、所有愿望都能够得到满足，但为什么却不快乐？为什么在某些场合会对成年人表现出不恭，甚至蔑视？为什么——在美国，一个孩子会端起枪，把子弹射向他们的老师和同学……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啊！

当然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身份和责任早已经丧失，因为我们走过了童年、少年时代，却忘记了那时所经历的一切。

如果这个世界是荒诞的，扭曲的，是挥霍着少年的青春和生命的，这一切又都是成年人设计的，那么，我们有责任发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改变？我们怀着神圣的目的，以可疑的权威和标准，建造了一座又一座青春的集中营，让残酷的竞争，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这健康吗？这正常吗？

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一个许多人正在思考的问题。
这本书会告诉你这一切一切的秘密。

我担心的是，刘方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太高的标尺，今后他的创作能够超越这部作品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不同，我循规蹈矩地从小学念到高中，然后经历了一场足以让一个人失去他的灵魂的考试，进了一所大学。目前我正在大学里混日子，并且继续体验着刻板的考试制度带给我的紧张和惶恐不安。我曾经当过一些不大不小的班干部，也有一些所谓的兴趣和特长，有一些朋友，有过苦涩而没有结局的初恋。我还算得上比较尊敬师长，虽然偶尔也会在某些观点上和长辈顶牛——一句话，我是一个和你没什么不同的人，这本日记体小说不一定能为你指明一条新的生活道路，至多只能让你看清一部分群体的真实处境。这并非是作者故作谦逊，作为一名新手，我的写作水平还有待继续磨砺，我不能自命为“当代中学生的代言人”。我只不过把我，或者说把一个高三学生的感受、想法和痛苦的生存状态，用我力所能及的精确和真实的笔触表达出来而已。

根据伊萨克·辛格（ISSAC SINGER）的观点，阅读似乎是为了获得快乐，但是我想应当有另一种解释：文学并不应当是有闲人士的消遣，它应当为解除或者减轻人的痛苦提供机会，指明可能的道路和作出努力。我认为这种解释才是真正地承认并自觉地运用了文学的力量。因此，一本好书阅读起来，往往会让人心情沉重，感到几乎有些难以为继呢。事实上，像这样一本专事描写一个高中生的苦闷和空虚感，并试图挖出它们的根源的书，从主题上说确实相当严肃。在令读

者获得娱乐和对真实的如实表达两者之中，我更多地顾及后者，因为我相信文学的力量并不仅仅体现在它能娱乐大众上，它蕴藏在文字如实地反映现实和作者用他锐利的目光对世界荒诞本质的挖掘之中。这一切都决定了本书将带有一种纯净的目的，那就是尽最大努力让人们看清作为一个高三学生，他的最为原本的生存状态，在他的生活中包含着的千奇百怪的不为人知的极度荒诞，他作为一个人的被极度扭曲了的感受，他在这种教育情形之下变了形的心灵和正在被挥霍着的生命。我希望这部书能够真正地引起人们对上述一切最为深切的关注和探讨。

关于目前这种漏洞百出的教育体制以及它每时每刻体现出来的严重弊端，已经有许多明智之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各种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被社会舆论发布；但是，最为本质、重要和关键的东西，也就是作为在这种体制下挣扎的学生，他们细微的内心感受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作为一部日记体小说，本书在捕捉一个高三学生面对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伤害所作出的种种反应方面进行了全新尝试。我们对于人自身在这个社会中的感受的研究是如此乏力、如此浅尝辄止，这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苦痛，说到底，人绝不能忽视他自己。人必须时时地关心自我的感受，因为这是他活着的最基本的证明。让人痛心的是，人对自己漠不关心，却又对身外之物投以如此不必要的精力，从这一点上说，人们正在乐此不疲地为自己建造一座越发精致和富于美感的物质地狱。一个人从小学到高中，他和周围人的关系是怎样随着分数评价标准的日益重要而急剧恶化，因为他在这种竞争体制下潜在地意识到了分数竞争事实上就是在进入社会之前和以“同学”名义共处一室的敌人进行血淋淋的金钱争夺的预演，他不得不拼命地在学校里就把这种厮杀的本领早早学会，以求生存了。

想必读者们会对我和这本日记的写作有些兴趣。和众多高中生写高中生的小说不同，我是一个休学一年，以高三时

的日记为小说素材来写作的大一学生。在写作本书的2001年，我二十岁，一个曾经年轻过、同时也算不上很老的年龄。我从十六岁起，就一直带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不停地告诫自己：我不能再这样在学校里白白地把生命耽误下去，一定要做一件让自己心里踏实的事情，而上学读书并不能让我踏实，当然不能，因为我连这么多年学的到底是什么玩艺儿都不清楚。我一直在为能做一件实事寻找机会，在高中里那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一直等到上了大学。在我作出休学写作的决定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疯了”。虽然如此，他们最后还是愿意尝试理解，并为我这个疯子的决定提供方便。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地讨论“疯狂”，我只想就事论事，说一说我坚持要把这本书书写出来的两个重要原因。首先，虽然我上了大学，在大学里学的是一门人人称美的所谓“热门专业”，但是我在大学里磕磕绊绊地又消耗了一年，到了大一结束的时候，我猛然发现已经面临着一个给自己下决断的年龄了。我无法任由自己这样在学校里荒废下去，我必须做点儿事情，让自己感到还在真实而踏实地活着。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考试无法证明我什么。于是我决定休学一年，尝试一下我所熟悉的可以让我感到坦然、并且让我以一种真正关心人和人的存在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写作。我何尝不知道，在目前全民皆商的社会环境下，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想通过写作来关心人，来达到减轻这个世界的种种荒诞的目的，那么他在大多数人眼里几乎就是个疯子。已经有人告诉过我：“你这样固执地相信文字，实际上就是一种迷信。”是的，我之所以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那是因为我固执地相信文字是行动手段，虽然它不会像打你一拳你就能马上感到疼痛那么奏效，但是无疑地，它是潜藏着巨大力量的。当我试图向某些人解释我的这个观点时，他们说：“这种说法未免太不切实际，太天真了。”当然是天真了点儿，但可怕的是，和有些民族比起来，我们现在这个崇尚实用主义的民族极度缺乏的恰恰就是理想主义的天真，而这正是人们可能获得拯

救的宝贵品质！

“我学这些东西，可是它们根本就不能让我体会到生活是多么美好，反倒让我开始憎恶生活了！”高中时的一个朋友曾经恼火又无可奈何地抱怨。这种教育制度的确非常奇怪：一方面，人们必须通过它才能获得生存的资格；另一方面，人们在经历它的时候却会无可救药地厌倦生活本身。

我坚持要把这本日记进行一些艺术加工后整理出版的一个原因是，我相信如果不是由我把它写出来，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不会产生另一部比它更为真实地反映一个高三学生的生存状况的小说。我发现自己无法不加追究地把那段噩梦般的日子简简单单地忘掉，我不能仅仅认为我考上了大学就摆脱了它，于情于理这都是说不过去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经受着它的折磨，我无法把关切的目光从这些苦难的人的身上移开，我必须控诉这一切，我必须写作。对我来说，只有通过关切他人、帮助他人才能让我获得内心平静。我从来不把人当成物、当成战略资源，我只把人看成是人，一个一个的有生命、有感受、需要被关心的个体。我关心着和我一样活在这世上的小人物，并尽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好。

生活正如一张白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就它本身而言，是无所谓“意义”的，但这并不代表人生的无意义。人正是在一生中不断地反抗让他的生命无意义的各种外来强力，才使自己的生活在丰富的斗争中获得意义，并逐渐摆脱空虚和恐惧，进而充实起来的。

关于教育制度改革的争论还在继续着，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不把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或其它放在人之上，那么任何关于教育的讨论和改革都将是失败的。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如果我想更深刻地批判这种教育制度，那么我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大、更为严重的全新主题：反经济化。

经过一番努力，本书终于在一些明智而富有人道精神的

文化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和关注下得以出版发行，作为作者本人，我得到了来自家庭、朋友和工作伙伴以及所有关心我、爱我的人的赞扬，请允许我向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支持我做出这项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尤其感谢我的家人，我爱你们所有的人。

一并致谢我最深爱着的人。

其其

2002 年 1 月 1 日

8月31日

一大片蓝墨色的云，在灰暗的苍穹下，像烟雾一样，带着令人怀疑的暧昧的力量，在天空中目空一切地蔓延开来。室内光线很暗，我把一件长袖衫从衣柜里取出来，关上窗户，出了门。猛烈而严肃的西风呼呼地刮着，凉爽得叫人想起就要到来的秋天。我抬起头，环顾空旷的院落：西边的一大块天空，出人意料地一片空白，风刮个不停，它疾扫着在暴雨将至的巨大威慑下惊恐地脱离枝干的黄绿色的树叶，空无一物的院落，像是经过了一场劫掠。这是夏天暴雨前，使人觉得马上就会发生什么事情来把这种巨大的空洞感填补的景象。

我裹着衣服，站在楼道口的台阶上。风冲势十足，我满腹心事地紧握着冰凉的栏杆。这个钢铁管状物的冰冷让我的头脑清醒异常。我对假期从来都不抱有什么指望，它们看上去很长，实际上总是很短，你还没有来得及认认真真地看完两本书，暑假就结束了。它就像这场暴雨，看上去好像刚刚开始，可是转眼之间就会结束，甚至不留下一点痕迹。我曾经盼着暑假快快到来，现在，暑假还没有结束，我总不能就这么盼着快快放寒假吧。明天，9月1号又要开学了。开学，上学，又是一年，它使一个人的生命像恶梦一样地轮回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跳出这个怪圈。

生活，对我而言，到底还是有一些想头的。可是，生活

并不是你认为它重要，它就能真正变得重要起来的啊。作为一个中学生，其实是不能把握自己的生活的：开学了，我就得去上学，就像战争爆发，每个士兵都得硬着头皮上战场一样。我所过的生活，虽然从名义上说，是“我的生活”，其实我在这种生活里，做出的一切举动，都只不过是对外来的种种干预力量的默许。我只能忍气吞声，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呆立在楼道口，楼前的大树上，茂密的树叶像一只只饱含渴求的小手，在风中急切地召唤着大雨快些到来；远处的河沿上，柳枝自由自在地飘荡着。风刮得更加强烈了，我的心中突然涌起一阵空洞的巨大恐惧感。对于将要迈开的下一步，这中学的最后一年，我真的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强风的挟裹下，大树的叶子结束了它们的欢迎仪式，不得已顺从地倒向了一边。秋天，它就这么专横地来了。我也将要面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认真面对的一年。

我今年十七岁，我正在开始努力使自己相信，人是具有韧性的。就算这个谈不上是什么好品行，可是，这也是一条许许多多的人都正在相信的生存之道啊。我没有做好迎接这一年的准备，那有什么关系。有些事情，只有身处其中，你才能想到一一应对的策略。高三，它有多么可怕，也许只是一种传言，到时候就会见分晓了。人，创造了一种制度，这就意味着需要把另一些人放进去体验，说得严重一点，我们谁又不是生活的实验品呢？让我相信一阵风吧，它就这么迎面刮过来，并让我有所感觉。我将重新提起笔，记我的日记，我会把我的高三整整一年的感受记下来，这将是我用来自对付困境的惟一勇气所在，也是体现我个人力量的惟一行动方式。

有人把一种名为竞争的东西引到了学校中来，把金钱和利益巧妙地转化成了考试和分数，这就好像进了赌场赌博，你得把钞票换成数字筹码一样。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规矩，可是，社会赖以运行的最终的大规矩还是那一条。高三就横在我的面前，赌博大战将要开始，我正是在用分数替代金钱，在学校里做最后的博弈的最后一轮练习。然后，我就会真正地获准参与到这个人生的大赌场中去。我本不想这么做，可是，我实在想真正地为自己生活一次，这样我就不得不在这种既定的体系下，遵循着既定的秩序，强迫自己赌一把。只有这样，他们才肯发一张现实赌场的入场券给我。我需要得到这张入场券，因为我希望靠着它尝一尝生活的真正味道——于是在最后一年里，我需要拼命地挣分数，像挣钱一样，以一种机器般的忘我态度发狂地挣，我确实应当这么做。我已经熬了好多年，现在，最后一年已经来啦。

中午我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把握，到了高三我还能不能看小说，也许对考试没什么大碍。只要老师和父母不在意，我就不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妥，可是，只要我感觉到他们对我表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我就会为我自己所做的事情自责起来，我总是这样。我好像生来就生活在别人的眼光底下。不管什么事情，首先，他们不表示反对，然后我才能觉得自己做起来心安理得，否则我就会很担心。于是，哪怕仅仅为了不让他们这么说我，我也情愿努力做到让自己的举止符合他们的要求，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让父母老师感到满意，做个“三好孩子”。其实我也想过：只要能让自己不觉得那么累，就是走上歪门邪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我根本不敢

真的这么做。

躺在床上看一会儿课外书，大概还不算多么堕落吧。我把枕头从脑袋下面抽出来，午后的天气很闷，我的后脑勺能清楚地感觉到床板的木质格栅，这让我在大热的中午也保持着清醒。这本书看得我相当累，不过这并不是刚才说的那种生活上的累，这里说的是另一种累：你不会在这种劳累中觉得愧疚，也不会觉得对不起谁，更不会觉得自己负有多么重大的现实责任。我就这么手举着书，看着看着睡熟了。

我这样过活，大概就叫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它给我带来厌倦，而且我的感觉远不止于此：不仅仅是厌倦，还有恐慌和不安。每次开学前我总是这样，说不清是为什么。有一种丢了东西的感觉，失魂落魄，还不止是这样。也许还有一种担心，从高二升到高三（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准确，这里面有“上升”的意味吗？），我就像一个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的人。我闭着眼睛走啊走，走了那么多年，现在，终于走到了尽头。也许在这一年里，我将要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我真的想不到，现在，在高三快要开学的时候，我会有这么深刻的沮丧感，这和我曾经预想过的“终于吐了一口气”的兴奋感一点儿都不同，很奇怪。

我从前一直把上高三看成是脱离这种一成不变、而且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生活的机会，我盼着它快点到来，我把它看成是一个跳板，我从来都没有设想过我会一不小心从这个跳板上摔下来。这个假设是多么可怕，以至于在我的脑子里稍稍闪过都会让我出一身冷汗。但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噩梦：我一不小心从一块光溜溜的木板上滑了下

来，就这么落啊、落啊，然后心头一紧，我就睁开了眼睛。现在，这个跳板真的就到了我的面前，它在我的面前延伸着，轻微地抖动着，我的心也在胸腔里不安地抖动着。不，我不再把它看作跳板，它更像一座高山，我想要翻越它，但是现在，我站在它的脚下，却只能感到压顶的窒闷，它让我透不过气来。周围是悬崖峭壁，我不能稍有闪失，我没有退路。我闭着眼睛，走了这么些年，真的到了最后的关头啦。

我换好衣服，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池塘边的草丛里有一件银色的东西，很晃眼，我看清了，那是包装食品的锡箔纸，明晃晃的叫我恶心。我走下楼去。我的胳膊潮湿，脖子上到处都是汗水，我得去报名，我可不能还没出门，就让汗水把衣服弄得湿透了。

上午在电话里说好了的，下午和DD一块儿去报名。我打电话给她的那会儿，她刚从学校里回来。上午她已经报了名，但是她说下午还要再去一趟。两点钟她会在家门口的楼下等着我，这让我方便不少。我不大情愿在找女生的时候见着她们家长的面，在家长眼里好像我真的那么心怀鬼胎要把她们拐跑似的。DD在等着我，我把自行车放在她家的楼道里，我们就这么走着去学校。DD让我满意的一点就是，她会很穿衣服。和这样一个女生在一起，走在大街上都会令你觉得身价倍增。我问DD有关我们报名的顺序。高三报名大概和其他年级有所不同，同样是交钱，可是方法不对，学校还不一定肯收。我最怕在报名的时候自己像个没头苍蝇似的问来问去，跟着一帮人在校园里到处乱撞。DD简要地向我说明了报名先到哪儿后到哪儿，最后到哪儿。“班主任没换，还是原来的那一个。”她有些失望地说。然后她把我手里的书要过去，翻看了一会儿。这本书是我从家里带过来的。也许报

名前需要等很长时间，所以我就想到要带一本书。我随口说：“你别看，这书没意思。”

“没意思你为什么看？”

“我是说对你来说恐怕没意思。”

“那可不一定。”

她别别扭扭地瞟了我一眼。DD不是很爱看书的人，这我知道。我有一种感觉，也许讲起来很反动：要是是一个女生不读书，总不如一个不读书的男生叫人觉得那么难以容忍。可是我不会把这句话讲给DD听。女权主义，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说：“这本书不是消遣用的，你看了既不会引起共鸣，也不会觉得是娱乐，还是不要看的好。”

DD撇撇嘴，把书塞给我。

校园里没有人，也许已经来了几个人，大概都被炽热的太阳赶到花园里什么地方躲着乘凉去了。报名顺序DD已经告诉了我。她下午来是想看一看分班情况。四个文科班现在合并成了三个，因此其中一个班要被拆分，也许不是我所在的这个班。DD正和她的朋友们一块儿到后面找班主任问这件事。我扶着栏杆，上了办公楼，只觉得喉咙一阵发紧，双腿发软。收款处在二楼，门大开着。我往里面看了看，有不少人，我这才稍稍平静了下来，走了进去。有个穿着白色圆领衫的老头儿坐在办公桌旁，手里捏着一副老花镜，给围着办公桌等着交报名费的学生开收据。他开收据的时候把眼镜戴上，开完了一张收据就把它摘下来捏在手里。我向来不爱在人堆里挤来挤去，于是就倚靠在旁边的一张办公桌边上，等着报名的人少了才上前去。我看了看手表，这个时候人只可能越来越多，但是我就这么固执，不愿意过去挤在人堆里。把

这里的场面说成是“人堆”一点点都不过分，就是人堆。只要是本来应该排队的地方，你总是看不到有谁在排队，全都是一窝蜂，挤呀挤，推呀推。我远远地站在人堆外面，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这帮因为争抢报名的先后位置而紧张地战斗着的人。他们个个脸涨得血红，喘着粗气，把攥着一叠钱的手向前伸得笔直，一晃眼看去，那么多胳膊好像到处都是林立的棍子在眼前摆动。人人都希望把手伸到收款的眼皮底下引起他的注意，于是场面越来越乱，老头儿就得不时地停下手里的工作，维持一下秩序，这样又要耽误一些时间。不知道他们这么你死我活地争抢到底是图个啥？是想凑个热闹呢，还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等着他们去尽快办理，好像个个都真的那么忙似的。收款的老头儿慢条斯理地数钱验钞写着收据，脑门上汗津津的。我注意到在他旁边的窗户上贴着一张“报名注意事项”，里面有一句：在分班问题上谢绝老师说情。这就提示了我，是不是分班又要把班级分成好中差三等？

这时三班的班主任进来了，有一半的人从人堆里连滚带爬地挤了出来，围过去要看看他手里的分班名单。一分钟之内，三班班主任已经成了新的焦点。我趁着人少了点儿的机会，上前去把学费给交了。那个老头儿在开收据的时候，给人一种孩子般做事一丝不苟的感觉。我耐心地等着他开好收据，一边仔细看着窗户上的报名注意事项。它不是打印出来的，是用毛笔写的小楷，后面还衬了一块硬纸板。因为是贴在窗户的玻璃上，由于有一块硬纸板在后面衬着，所以上面的字迹就不会看不清楚了。

我接过他递来的收据。“到一楼盖个章。”他说。

我刚才注意到有些进来报名的人带着暑假作业。暑假作

业我早就做完了，上午打电话给DD的时候，她说报名不用带上暑假作业。我在拿着收据下楼盖章的时候，碰上了几个班里的同学，想顺便问一下这事，可终究没有问。我总觉得没带上暑假作业心里很别扭。如果班主任要检查的话，我可以明天带给他，不过就怕这样一来不能蒙混过关。在许多人一块儿交作业的时候，他不大会仔细地检查，要是明天只有我一个人交作业，我担心他会翻看我的数学作业，那里面的题目我东拉西扯了一半还不止，我担心的正是这个。我开始暗暗地骂自己为什么没脑子，不把作业带来。不过刚刚碰到的几个同班同学看上去也没带作业，这就让我安心不少。

暑假补了一个月的课，这件事我还没有提到吧。说是补课，其实就是上高三的课，赶着上课，这样高考前的复习时间也许就能多一些。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报名只不过是收一收报名费的形式，从上课的内容上来说我真没感觉到在高二和高三中间有多么明显的分界线。现在高三新学期就要正式开始了，其实就是把暑假时已经上了一部分的高三的课接着上下去。我也应该把借来的高三旧课本还了，而且宜早不宜迟，因为借高三课本给我的人有些是这次高考没考上的，他们要拿着这些课本复读，书虽然是破破烂烂的，但还用得上。我对高三的第一印象就是那几本借来的破教科书，皱巴巴、脏不拉叽的，让人提不起精神，内容更加乏味。看着这些书，还会有一种发涩的东西钻进你的头脑里，让你的思考、感受变得迟钝和生硬，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晚上吃饭的时候，爸爸妈妈一直没有说话。天气很热，我想他们肯定会说些什么的，也许都已经想好了要拿我上高三说事儿，这件事他们不可能不重视。我没有猜错。当我把筷子放下，打算回里屋看书的时候，爸爸开口了：“回来回

来，咱们谈谈。”

我本来就看出来他们有话要说，他们只是在等着我把饭吃完。

“现在你已经高三了，有什么学习计划没有？”

我早就想到应该说一点表示决心的话，让他们高兴高兴。这算不上欺骗，只是，你应该明白，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儿有时候比做实际的事情还能叫人高兴。我为了让父母高兴，总是装得很乖巧。就算不是为了让他们高兴，只是为了让自己心情舒服，我也不能让父母成天摆脸色给我看。我说：“学习计划我正要到屋里写，早已想好了。以后不能再看电视和小说。”我尽量把话说得井井有条，这样不至于让爸爸觉得我在讲一些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兑现的空头许诺。我说：“这会儿我要回我的房间了，不要打扰我，我要做学习计划。”我很清楚，父母等到我屋子的门“砰”地关上后，就会把我的事情好好地讨论一番。反正对我不会有什么害处，我不想偷听，毕竟是家，我不想让自己在家里也得时时动着脑筋，随便他们说去吧。

9月2日

昨天下午我去学校看分班情况，见到了班主任，我问他这件事，他说他也不清楚，叫我今天早上再来看看。根据班里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的说法，班其实已经分好了，可是有些家长不满意，于是学校就要按照他们的意思再调整调整，这个我用不着讲得太露骨，能因为分班而多放一天假，我还求之不得呢。突然间暑假又多出了一天，这种感觉就像是即将被执行枪决的死刑犯突然闻讯被减了刑一样。多了一天假

期，虽然谈不上有多么大快人心，不过上了高三以后要想舒舒坦坦地多喘一天新鲜空气，大概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了。

今天报名处已经撤了，人来的挺齐，可是一直等到九点多钟学校也没有把分班情况公布出来。天气不算很热，仍然有不少在校园里东游西荡的人还穿着放假时在家里穿的衣服：裤衩汗衫加拖鞋。这也许是一种全国性的风气，可是面前人人都是这么一副拖泥带水的样子，看了总不会叫你多么高兴。既然大家都这么穿，也许我的眼光犯不着这么挑剔。我在花园边上站了一会儿，一直等到太阳变得强烈起来。一大群女生挤占在花园另一头的树荫底下，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废话。男生呢，一个个都像散兵游勇似的，趿拉着拖鞋，唯唯诺诺缩在一块一块的阴影里，再不然就像未老先衰的小老头儿，蹲在花园边的水泥台子上瞎侃。

我昨天至少已经从班主任那里了解到，我所在的这个班不被拆分，可能是四班的人要被分成三个部分，插到前三个班去。这对我来说肯定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一点儿都不想让自己被分到一个我不熟悉的新班里去，这样一来费功夫和陌生人搞关系是免不了的，对我来说这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事儿。我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我在来学校之前把眼镜戴上了，高二那会儿我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才戴眼镜，现在必须时时戴上它才行，为了不让自己近视得太快，还没等到高考就双目失明，也是为了不要在大街上或者校园里遇到熟人朋友同学的时候，因为没有看清他们而没打招呼，被他们认为是怠慢之举，因为这个得罪了人真是不值得。我在这里空等着分班很不自在，但是又没有什么好去处。想找个人说说话，又实在不想和那帮笨蛋闲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或者讲黄色笑

话。校园里到处都是太阳，没有太阳的地方则被一群又一群鸡也似的人占据着，整个学校就是个大养鸡场。

其实分班这事儿看上去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重：班肯定已经分好了，像我这样的无名鼠辈，迟一点儿知道结果和早一点儿知道结果也没什么不同，反正这个是由不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学校是一个大棋盘，学生呢，就是一粒一粒的棋子儿，棋子儿当然都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东西，只要学校认为怎么样能够对全局有利，那么随便挪一挪几粒棋子儿在他们看来又有什么不妥呢？

出了校门，迎面碰上GR，我的老同桌。他问我暑假为什么不去他家玩，我还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家到底在哪儿。可是看他那副热情认真的劲儿我又不好给他泼冷水，告诉他我不知道。确实，如果你要是班里比较活跃的人，你应该知道GR家在哪里，看来他也把这个当作人所共知的常识，所以我不能如实对他说：“我不知道你家在哪儿。”我说：“我倒是打了电话给你，可是你不在家，你妈说你大概打篮球去了吧。”

“差不多，你是不是下午五点钟左右打电话给我的？”

“对。”老天，我就爱为了让人高兴而撒谎。

“那就是去打篮球了。你下次要是来玩，就不用打电话过来，直接来就行了，二十分钟公交车。”他很诚恳，而我也因不必继续撒谎而松了口气。

“那只好等到明年放暑假了。”

“什么时候来都行。”他说他还没去报名，于是我们在校门口道了别。

我在外面只转了一小会儿就回到了学校。心里还是担心分班的事儿，好像我这么一走学校方面就会密谋把我开除了

似的。刚才我在运动场旁边的一个冰吧里喝了一杯水，本来我去那儿是想随便碰上个老朋友聊聊，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讲话的人。就在我绝望地咀嚼着杯子里的最后一块冰的时候，才清醒地意识到我最想碰上的人到底是谁：DD。我今天还想给她再补上一课，这个想法我一直没能丢下来。DD是个很好的倾听者。我看着远处的运动场，那边有一千人马在做训练，看他们身上歪歪扭扭的军装就知道是从各个单位拉来的民兵。这儿每年10月1号都要搞规模不等的检阅式。过了一小会儿，一声短促的哨响之后，那支队伍大乱，短暂休息。他们跑到这边来，脱着上衣，歪歪懒懒地喝着饮料，看上去就跟一帮散兵游勇差不多。我把目光收回来，右边桌子上这会儿坐着两个人，一对目光呆滞的中年人，面前摆着两杯豆沙汤。这里真无聊，没有我的熟人，已经放完暑假了，他们谁都不会来，我不应该到这边来。

我现在已经再一次站到了校园里，我可以去西边报栏那里看看报，凶巴巴的太阳光已经放过了可怜的报栏。我贴着一座座建筑物的墙根走到那里。高考结束之后，高三考生填报志愿之前，不少大学都印了很多宣传材料散发给各地高中张贴出来。我在两个月前还是高二，我们暑假放假要比高三早一个月，虽然我暑假补课，但是一直没有冒着毒日头过来看这些大学的招生简章和学校介绍。不过按照我的眼光，这些花花绿绿的招生简章，其实跟商业广告没什么区别，有些招生简章更加露骨，一点也不耻于谈钱，其中一个赫赫有名的理工大学的招生广告上写着：凡入校成绩全省前十名的考生，一律重奖五万元。光是往这上面想一想就让你心跳不止：瞧瞧，人家刚进大学校门，就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真是天底下最为肉麻又庸俗的比喻！）还有一所全国非

常非常有名的文科大学，打出的广告语更是表明了一流大学对分数的独特见解：高分考生就是本校的上帝。（请对比一下“顾客就是上帝”。）更可怕的是，你要是只看着他们在招生广告上写的这些美妙的广告语，等到你高考考完了，并且觉得考分应该不错，兴冲冲地把这些学校报为第一志愿，等到通知书下来之后，你才发现他们把脸皮对你一沉，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告诉你生源已满，你不能被录取，你到时候就只有傻眼的份儿了。

换了座位的感觉真是奇怪，就好像是你历尽千辛万苦摸回原来的老巢，可是却发现里面被人洗劫一空了似的。班主任说，不用搬桌子凳子了，你们现在按照黑板上写好的姓名顺序就坐，坐在什么地方，那套桌凳就是你今后的桌凳，毕业之后就搬回家去。有些人不高兴了，大概是因为对自己不幸分到了缺胳膊断腿的桌椅板凳而恼怒，我倒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家里有两套桌凳：一套是小学毕业时的，一套是初中毕业时的，就是方方正正的那种东西，丢了觉得可惜，不丢又显得可笑。我尽量平心静气地坐到了现在安排的位置上，虽然任何人在刚刚回到新座位的时候都免不了紧张一番。

我注意到，周围有两张生面孔，就是四班分拆分到我们班的。我右边的这位就是，他一直没跟我说话。左边这个是班里的老同学，高二分科后我们一直在一个班，不过我和他没怎么说过话，因为我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他刚一坐下，就缓缓地动了动嘴唇，我有那么一会儿还以为他要主动找我说话，可是我马上就明白过来，他只不过是吃口香糖。整个一下午他都在吃那块永远也没法吃完的口香

糖，他用牙尖咬，用舌头抵，用嘴唇舔，当他舔到非常卖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下颚就像一块被风吹得鼓来鼓去的薄布那样，更像一只青蛙，只不过没有呱呱地叫出声来。他好像很自负，自从坐下就一直没有往我这儿看一眼，我倒不是特别想把脸凑过去，可是刚坐到一块儿，你总得寒暄几句表示友好，也好为将来相处打开局面才是。我转过头去寻找上学期的同桌GR，他现在坐的地方离我十万八千里，我们只好远远地看着对方笑一笑。他大大咧咧的态度让我一直很喜欢，比如他买了一张报纸，你看完了，有其他人想从你这里借，你问GR愿不愿意给他看，GR会说：“给，都给。”这样一来还显得你征求他的意见是有些小气了呢。左边的陌生同桌不和我说一句，并且胳膊老往我的课桌上搁，在这大热天里，这种行为确实不很受欢迎。他那汗淋淋的湿不拉叽的胳膊碰着我，他好像毫无感觉，而我被他这么一碰一触弄得肌肉紧张，全身不能放松。我把带来当扇子用的这块高二会考时用过的大塑料垫板放在桌角以示不满，心想这样一来他该把胳膊缩回去了吧，可他反而以为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他觉得更舒服，心安理得地用胳膊占据了大半扇垫板，这真叫我挠头。我极不自然地坐在了我的新座位上。

开始上课了，又是一阵忙乱，每个人都要把几个星期前暑假补课时用过的书本和讲义从原先的座位里拿出来，慌慌张张的气氛让教室里的空气愈发干燥起来。这学期的语文老师换了人，我对他还很熟悉，他就是我高一时的语文老师，不过这并不像久别重逢那么激动人心。该老师讲起课来有点儿坠，老是固执地要把每一个字的读音、字形这类无聊的东西考证半天才肯罢休，你可以说他是“治学严谨”，不过我想在大多数明白人看来，他更像是一个明清时期的刻板老学

究。他在高一那会儿还是我们班的班主任，现在不是了，所以谁都不再怕他。虽然是刚刚上课，但是并不像我预想的那样，刚一开学课堂里肯定会很安静，也许每个人都没有完全意识到高三的严重性，危机感还有待以后慢慢培养，反正教室离锅炉就差一步了。

语文老师也因为天气炎热而感到绝望，他有气无力地拿着课本在面前扇了那么几下，整个儿面孔都快垮掉了，看上去简直像要哭了起来，他又坚强地挺了一会儿，在黑板上写了下课前的最后一个词：“艾草”，然后他自我折磨般地喋喋不休地解释了起来。我不用他解释就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植物。艾草，这植物和端午节有关，端午节，就是今年的5月份。现在已经是9月，太阳在做着最后的挣扎。5月，今年的上半年，太阳在那会儿才刚刚苏醒过来，我还在上高二，在端午节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弄一把艾草，挂在门前，如果住的是大院，就把艾草插在大门的门楣上。艾草的气味十分浓烈，让人想到那些古老而衰败的逝去的朝代，长长的历史，就像一片瑰丽的古色古香的木雕一样，令人忧伤地浮现在你的眼前。这个记忆，在你的情感中也许是第一次被唤醒，可是好像在你的脑海中有意识地已经被封存了几千年，只等着有朝一日被打开，淳香扑鼻而来。这正是历史的美丽之处。你可以凭着一种古老植物的气味，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在你的心中复苏，这古老的记忆，并不需要后天培养，就像刚出生的鸽子能准确地辨识方向一样，我在毫无主见的情况下，仅仅看着黑板上的“艾草”两个字，就能回想到年代久远的千年历史，这可比拿起历史课本背那些干巴巴的史料要好上一万倍。一个人该记下来的东西，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封存在他的头脑之中，只需等着日后唤醒，也许这就是文化

的积淀。

有些气味能够让人感到美，比如艾草；有些则不是，我左边的同桌，他还在不停地咀嚼着口香糖，不时地吐出一口气来，那种气味，夹杂着薄荷味、痰腥味、香烟味和大蒜味，他对食物的爱好倒挺广泛。他大概以为嚼嚼口香糖就能掩盖住满口的大蒜味和烟味。这里的空气因为他这么一呼一吸，变得越来越污浊。我被逼得简直没法顺畅呼吸下去，刚开学我就得在这个要命的混帐公共场所忍受半天，唉！

放学路上遇到了JN，她是我初中的同学。她有些拘谨又不失热情地说：“我们俩现在又在一个班里了。”我一时没明白，不过这个弯子很快就转过来了：她本来是四班的，如今分到了我们班。她坐在教室后面，我没注意到她。她很高兴，也不再拘束，不一会儿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历史政治怎样才能考高分呢？”我没有谦虚，心想她也许刚才向本班的人打听了我的情况，不过向一个女生说明这个问题是相当困难的。是这么一回事：女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女生，你要是想让她们在试卷上大言不惭地写出“经济范畴”、“政治模式”、“人格承担者”诸如此类的专业术语，那是相当困难的。我喜欢女生的一条，就是她们不像愚蠢的自欺欺人的男生那么热衷于使用这些唬人的词汇，我甚至喜欢她们根本就弄不懂一句复杂的政治判断句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种品格。你不能指望这样一种天生就没有破坏欲望的性别站在所谓的“战略高度”看问题，这大概就是她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个适者生存的险恶社会里成为主流的原因。不过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我对这个社会的规则已经烦透了。

我对JN说：“主要就是背，背熟了就行了。”这个答案不那么令人满意，可是已经足够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好好

地记记背背，你就能把高三这一年给顺利打发掉了。

“晚上还有晚自习，不要忘了。”外语老师现在还是班主任，他在上午放学前说道。怎么会忘呢，不仅不会忘掉这个晚上，而且我还不准备把这一年给忘了，我已经开始写日记。今年，也许是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我将成为一个完全的、系统的、有主见的人，当然我也会有所感受，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感受。而且，这很好，我已经能够把我的感受如实地记录下来。无论这一年是怎样的一年，我都是不可能把它忘掉的。

9月5日

夏末秋初的季节真是很奇怪，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开始害怕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了。今天的天气又变得凉了一点儿，昨天晚上上晚自习，我在做习题的一小会儿，偷空往窗外看了几眼：教室里的日光灯散散地照到后花园旁的一片小树林边上，光线虽然很弱，可我仍然看得清一片树枝起劲地扇动了那么几下。在这么多人的教室里，你是没法仅凭着看见树枝动一动就觉察到秋天的到来的，在学校里，你什么都感觉不到，教室里只有一种事不关己的干涩和冷淡。在自己家里感觉就不同啦。

昨晚我放学回家后，进了厨房找东西吃，没有打开电灯。有一只蝈蝈，在黑暗中卖力地鸣叫着。你可以想象它因为秋山萧瑟、力气用尽而全身微微颤动个不停的可怜模样。它像是要放开嗓门，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把困扰着它的那种在秋天里四处蔓延着的孤独驱走似的。可是，它唱得越是卖力，我就越觉得它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这只小蝈蝈的歌声不

但没有让我的心情好一些，反倒把我也带进了无尽的忧伤之中。它的嗓音是那么细嫩，让我不由得想四下里找一找，亲眼看一看这个秋夜的小歌者的样子。我打开灯，这个小歌手大概受到了惊吓，马上收敛了嗓门，我屏住呼吸，不敢挪动半步。它终于犹犹豫豫地又开始唱着单调而凄凉的歌儿了。原来它是在外面唱呢，就在厨房外面的花园草丛里。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半掩着门。一只小小的蛐蛐，也能放开喉咙，为自己那卑微的生命歌唱呢。我，我的生命，比起一只小蛐蛐来，可长多啦，可是我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用心为自己唱一支歌儿呢？我又蹑手蹑脚地回到厨房，打开窗户，它的叫声已经停止，月亮出来了。微风，轻轻地摇动着黑暗的树木，轻轻地摇动着我的心；月亮，温和的光芒把平静填满了我的周围。窗帘被微风温柔地挑开，唉，我已经到了极度容易被这样的季节轻易地触动的年龄啦。一只小蛐蛐的歌唱，就能让我情不自禁地面对月光，孤独地品尝着在这个季节里，万物分泌着的对时间流逝和一事无成的生命的淡淡哀叹。

上午放学后，我在学校门口的一家文具商店里买了一些本子。学校发的那些练习本，质量差得要命，连马马虎虎都谈不上，草纸似的，哪怕你在上面不小心划了一笔，它都会马上洇透下面三层纸，在上面写作业，那真是折磨自己，反正没有什么东西不折磨人——这大概就是我对学校的基本感受。学校在新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按照惯例会给每个人发二十个作业本，我的新同桌们拿到了一沓子同样封面的作业本，一声都没吭，就把它塞进了抽屉，继续做习题，这让我觉得奇怪，按照我的习惯，发了一摞新作业本我就会找前

后左右交换，为的是换到一些封面图案不一样的本子。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不大清楚，只是我觉得这样才好玩，不至于在整整一个学期里因为用着相同封面的作业本而感到乏味。当我注意到我的新同桌们把封面完全相同的二十来个作业本一古脑儿放到抽屉里，冷冷地开始做习题的时候，我感到恐惧。高二下半学期开学的那会儿，大家还兴致勃勃地叫着嚷着要和周围的人换一换作业本，现在，整个班级就这么突然沉闷了下来，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在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里，人人都在做着习题，我突然间就感到自己落后了。

我不想和他人有所不同。我断然打消了和别人换几个练习本的念头，和他们一样，我也开始做题。但是我打定主意，要在放学后去买一些作业本。我清楚这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区别，作业本最终只不过是用来写作业，可是我就是不能让自己老是看着一模一样的面孔：相同封面的作业本——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我的老是在原地打着转儿的生活。我憎恨重复。

我在买作业本的时候，看到了橱窗里摆着的一个很精美的本子，而且还是软皮封面，写起字来不会像在硬壳本儿上写字那么别扭。它不像大多数笔记本：又厚又肿，而且重得离谱，看上去就叫人泄气。我想到要把它买下来，可是，用来干什么呢？我可以在上面抄诗，我打定了主意。我的业余时间实在不多，但是我可以在不上晚学的星期六晚上，借抄一抄诗来减轻因为不去上学而引起的负疚感，抄诗至少比看电视更能让我心情平静一些。我想很多像我一样的高三学生都会有这种奇怪的体会，我说的这种负疚感，很多人都能体会得到。

出了文具用品店，这时很多人正在从学校大门里出来。开学不久，看上去所有的人都认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学校生活还有盼头，他们有说有笑地涌出了校门。我看了一眼手里的新本子，这本稍微厚点儿的软皮本，我用来抄诗；那些薄的，用来写数学作业；学校发的作业本，我就用来打草稿。不过，我真的应该把星期六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用来抄诗吗？我已经高三了，我怀疑这么打算是不是错了——又来了！我总是不能让自己踏踏实实地干一件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难道这就是上了高三的我得到的最大收获吗？

今天晚上倒是有一件事儿让我吃了一惊。第三节课，我正在数学习题的海洋里苦苦挣扎着（因为我在题海中游泳的技术向来不高，最多只能做到不被马上淹死），右边的新同桌突然把手里的钢笔“咚”地一下撂到一边。我的眼睛好奇地瞟了他一下，我想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他抱着头，好像在想着一些事关重大的严肃问题。突然，他抬起头来，转向我，推心置腹地问了我一句：“我是不是很叫人讨厌？”要不是我早就对他的奇怪举动观察了很长时间，他这句问话准能把我吓个半死。我哑然失笑，因为这句话听上去就像一个小女生在问她的男朋友她怎样怎样。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失恋这类事情他才这么神经质，我认为是，可是我哪儿来那么多闲心去管他的小小情愫！我冷淡地摇了摇头，表示不知所云。他像个醉汉，捡起笔，摇摇晃晃地继续写他的习题，看上去实在可怜。我有另一个念头：也许是因为我这几天没有和他讲几句话，才导致他这样沮丧？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开学的这几天里，好像他也没有和周围的其他人讲过什么话，但是我也一样啊，我怎么没有

觉得多么严重？刚开学总是如此，大家都不是很熟，再说他又是刚从四班分流分过来的——明白了，我想他也许是因为感到在这个班里，自己是一个新生才觉得压抑。我一开始也试着和他讲过几句话，但是很有保留。

我就是这样一种人，刚开始我不会很主动，可是一旦混熟了我就无法无天得叫人无法容忍。我向来给自己裹上一层安全罩，别人把我当成朋友，我自己也许不把他当成朋友。在一起玩一玩，说说话，帮你做你做不到、非得动用某种手段才能做得到的事情——人们把有这种关系的人叫做朋友，我倒认为朋友要是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的话，那么交不交问题不大。我看着这个垂头丧气的同桌，他在我的眼里很值得怜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多找他谈谈话。

我在写着习题，其实心里正在把引起这个同桌提出的奇怪的问题的各种可能性猜了个遍，同时也把自己好好地琢磨了一番。捣鼓来捣鼓去，最后烦得要命。下课铃声一响，就猝不及防地站起来，就像突然进入一级战备的自行火炮似的，周围的人被我的突然起立吓得不轻。老师抬起头来，他没说什么，铃声正在响着呢。我实在不愿意想得太多，只想收拾书包赶快回家。

9月7日

我推着自行车，目不斜视地快步往存车处走去。花园里蹿出一个学生，初中生，个头丁点儿大，左手拎着铁皮簸箕，右手攥着秃了一半的扫帚把儿，用扫帚紧紧地按着撑得满满的簸箕口，往垃圾车那边一溜小跑。怎么在大清早就扫

地呢？我往花园里看去，里面还有一个男生，像小老头拄拐杖似的，把下颚搭在斜放着的大扫帚把儿上，歇着气。那大扫把连我这样个头的人用起来都有些费劲，何况这个小男生还不一定有扫把的个儿高。这么大的花园就派两个人来扫，我估计他们是被罚扫地的。学校把校园分成大小好几十块，当然不是缺钱想卖地皮，他们把每一块地叫做“×班环境区”，分配给各个班级。这么一来，好像大到每个班、小到每个人都得对学校担负一项重大责任似的。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看着这两个半大不小的初中生一大早就被罚扫地，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劲。真不知他们的班主任是怎么想的。

下了第二节课，班里的人拖泥带水、勉强地离开教室，到操场上做操。整个操场上的人，做起操来都是一个样儿，拖拖拉拉、懒洋洋的，看了让人心生绝望、精神崩溃。不过每个班里确实有那么三两个人，在这样一大片乌合之众当中，做操的动作一笔一划的，堪称模范，就像他们对学习的态度一样用功。这就是一些意志坚定、对自己的身体、亲爱的学校、美好的未来都充满着热烈希望的积极进取的模范学生。我没去做操，我躲在二楼阳台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看着操场。

刚开学，做操出勤率不会很低，我不用担心学校到教学楼里来检查。说实话，看着下面跟着广播做着同样的电胳膊电腿动作的一大群人，让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成就感，好像我是一个越狱成功的重犯，有一种脱离众人、得道成仙般的飘飘然。可是我还没有昏到那一步，我明白我现在还在学校里，广播操一完，我还得在铃声响起的那一刻，随着汹涌的人流往教室里面挤。

在相当乏味的开学最初几天过去之后，今天终于有了一个好的消息，不过和通常一样，消息的前面得加上“据说”两个字：据说学校要在十月一号国庆节放七天假。这个消息传得快，昨天我还拿这个自己一时胡编乱造的消息和前面的人开玩笑，今天上午我后面的两个人就来了一场谈话，其中一个不乏严肃地对另一个说，十月一号放长假，另一个就睁大了眼睛，信以为真：真的？！看看日历牌儿，现在才几号，就算国庆放假也得苦熬一个月。关于放假，学生总是比学校知道得还早，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儿。虽然周围很多人都认定这不过只是传言，可是一听说放假，哪怕你是死人都坐不住，要两眼放光。毕竟，这些放假的小道消息还是相当令人神往的，就像望梅止渴一样，更何况我这样一个老是受不了放假诱惑的人呢。

放长假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只要放假，校方就免不了又一次动歪脑筋，见缝插针，把因为放假而落下来的课给补上去。在放假前后利用星期天补课已经成了学校惯用的可恶伎俩。好像要是不把耽误的课给缝缝补补填上去，学校方面就会觉得自己的裤裆绽了线，蒙受了奇耻大辱似的。我明白作为一个高三学生，其实没有理由在放假补课这些事情上抱怨学校，虽然任何一个班、任何一个学生都不能抱怨学校干的事情有什么不妥，高三尤其没有抱怨的资格。我们应该做到的是：不管学校宣布放不放假、放几天假、又要在什么时候补课，都得恭恭敬敬地去照办无误，这才是一个高三学生应有的态度。现在是高三啊，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想着放假！尤其是我，更荒唐，造谣生事，简直就是罪该万死！

补习班里里外外人头攒动，今年高考没有考上的，或者说是老天成心要让他完蛋的倒霉蛋都纷纷回到学校里来报名

了。根据统计，本校高考升学率全市最高，所以原来在其它中学上高三的“落榜”（这又是一个民族性特别鲜明的词汇！）的学生都蜂拥而至，他们削尖了脑袋要在校补习班里拼到一个坐着听课的资格。升学率高——这个词儿在我眼里相当可笑，就好像有人说“我这两亩地的水稻产出率高”似的。在学校里，人就好比是一茬一茬有望提高产出率的水稻，就是这么回事儿。

洗了一把脸，又睡了十分钟。我最害怕在中午睡了一小会儿之后醒来，坐在床头的那种心中被空洞充满了的可怕感觉，那是一种长久以来积蓄的极度沮丧感，让我没有丝毫兴趣往下活命了。可是，我总得活下去。

下午放学后，风也歇息得够久了，它开始刮了起来，太阳已经被强大的风势吓得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卡车在公路上来来往往，这就把强风搅得越发愤怒了，尘土慵懒地扬起来，遮住了天空。今年的气候和往常不同。在我们这里，秋天总是被一场寒似一场的雨带来的，在最后一场为秋天的上演揭幕的大雨过后，你凭着干燥而孤寂的感觉就能体会到它已经悄然而至了。今年的秋天，却是被干燥而狂怒的风挟裹着逼迫而来的，这就使秋天蒙上了一层保守的郁郁不乐的外壳。

我回到家里，愣着眼睛，看着外面高大的树木。自从开学起，晚上我就睡不好觉了：一个晚上醒来两三次是常有的事儿，好像担心会发生什么严重事件似的，我一次又一次地抓起桌子上的钟，对着亮儿看了又看，要是实在看不清楚就打开台灯，一定要明确当时几点了才能稍微安心一点儿，再一次带着失望和没有完全消除的警觉和紧张，把被子重又拽

到身上。唉，能在大白天发一会儿呆，真是我的福分。我真想就这么睁着眼睛睡一会儿觉，就这么站着呆死也乐意。高三刚一开学，我就又累又紧张，整天忙得屁滚尿流，万一落得个暴死在课堂上的好下场，那才真叫狼狈。

今天不用洗澡了。在塞满了这么多人的教室里，一天下来竟然没流一滴汗，真是奇迹。我拿梳子刮一刮头，这就去上晚学。我的那把梳子不知道掉到哪儿去了，好像屋里有一只老鼠，专门伺机拖我的东西，把我原来的梳子拖进它的老巢当竖琴玩儿了似的，现在我只好用这把旧梳子。这是一把平梳，刮起头发来十分生硬，就像猫用锋利的爪子毫不收敛地抓你的头皮似的。大街上灰蒙蒙的，公路上，汽车扬起来的尘雾和排放的使空气变得干燥而温热的废气，让我愁眉不展。前面堵车，每一辆汽车都在后面汽车的昏光中挪行着，缓缓地向前。一座垂死的城市，我想。我把自行车搬上人行道，想就这么推着走一程。人行道上灰乎乎的，看不清什么，不过我还是认出了前面走着的一个我初中的同学，他和我同过桌。我拿不准他现在干什么。我，上高三，而他呢，没背书包，走得也很慢，好像已经不上学了。从背影我很容易认出他来，他看上去没有变，比我个头矮得多，人很胖，走路来总是叫人想起用蹒跚走路的海豹。我不知道要不要上前向他打个招呼，但是又担心引起尴尬。这么些年，不知道他变了没有，我呢，肯定是有些变化。招呼他一下，也许就会让我的大脑突然卡壳，还是算了吧。我又把自行车推下人行道，骑了起来。

晚上是政治课，刚放学我就跑出了教室。存车处取自行车的人还很少，我抱紧双臂，往存车处那边跑去。天已经很凉了，明天就不能再穿短袖衫了。当我骑着车在空荡荡的大

街上一路前行的时候，稀疏的树叶在人行道两旁沙沙地响着，风在我的耳边不停地尖叫着，如果是夏天的风，那是不会有这样尖利的几乎显得刻薄的嗓门的。风在城市的建筑中局促不安，它回旋着，乱撞一气，像一只被困在牢笼里的野兽。我上了宽阔的公路，强劲的北风执拗地要和我角斗一番。我双手紧紧地握着车把，这是一种年青的力量，无处释放的力量，让人突然振奋、过后又会万分悲伤的东西。我能拿年青赋予我的力量干点儿什么事情呢？我迎着北风，用尽力气骑着车。这就不错了，我还能指望自己干点儿什么呢？我叹了口气，直起上身。前方一片黑暗，大树和房屋的沉沉的阴影，在风中若隐若现。黑暗中，我仍然感觉得到天空中密布着阴云。既然刮起了北风，那它就是在告诉我，又一个秋天已经到了。

9月8日

把两节语文课耐着性子熬过来，对我来说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平时我在语文课上所做的不外乎就是看看课外书，写写日记，再不然就做做数学题，背背政治历史。刚一开学那会儿我也不是没下过决心：语文课一定要专心听讲，跟着老师做讲义。可是，最后我还是不得不死心塌地承认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事实：语文考试能考多少分，和你语文课专不专心听讲基本上无关。这个事实一点也不难证明：你看班里的那个老是考第一的语文课代表，他自从开学以来，语文课堂上没有一分钟不在看武侠小说、言情小说。语文这个东西，其实它一旦被引进学校的大门，就被技术化了。进了课堂，它必然要由一门艺术变成一门课程，而一门课程的评估

又是以分数为标准的，所以这就意味着语文的数字化，也就是文学的终结。我很高兴地看到，当卖卫生纸的都在高叫着要让自己的商品数字化的今天，语文已经当仁不让地提前进入数字化时代，而且并不是为了商业机会玩弄噱头。

我在语文课上，一直对着摆在面前的试卷上的ABCD四个选项抓耳挠腮头痛不止，我不明白涉及到人的感觉和情感的东西，怎么能用索然无味的序号和数字来衡量。有一些人不是正致力于让文理科合并成为可能吗？一瓶自来水和一瓶黑墨水混在一起，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当然对于这个以前习惯于背诵四书五经的民族来说，严格讲起来在当代高中是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文科的，除非你相信文科就意味着一种强制性的记忆和被迫接受，而这已经证明是能够被数字化的。背惯了四书五经的头脑里如果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潜力，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好像也只能将力气用在把整个人类加以数字化上了。搞搞科学，这的确是一项不但不会受到管制，反而会获得鼓励的好事业。不就是高中文理科合并吗？并了也好，并了也好。

我数学差，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在语文课上补数学。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样一件我根本不信仰的东西上去，这和被迫相信某种宗教本质上没有区别。我试图在四十五分钟里把三道数学题给应付掉，这样我在下面的数学课上，当老师提问到我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自己太现眼了。我本来把一些诗带到语文课上，准备抄在新买的本子里，但是面前还摆着没做完的数学讲义，我怎么说也不能安下心来干学习以外的事情。

教室在我面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促：局促的人头，局促的课桌，局促的讲台，局促的老师，还有局促的空气——

老师正在黑板上写着一些叫我越发感到局促不安的东西。他要布置写一篇作文，材料作文，议论文，臭名昭著的语文中最臭名昭著的那一类题型。这一下我就不能做数学讲义了，我收起讲义，狠狠地诅咒着。我拿不准这个开学刚换的新语文老师到底是什么脾气。原来的那个老师，我要是烦得太厉害，不写作文，他也不管，对于现在刚换的新老师，我都不敢铤而走险这么做了，我需要了解一个时期。

我匆匆扫了一眼黑板，大概知道了作文题目，这就开始动笔刷刷地侃。毕竟积累了十几年编造作文的功力，而且今天要写的还是不值一提的议论文。我写作文累倒是不累，我就担心语文老师在改我的格式化作文时看着乏味，可是那帮编题目的老鲤鱼们就是喜欢出这种题目，你有什么办法？像我的这种作文，要是有一天不幸被语文老师当做范文在班上当众朗读，我将会非常害臊。我的左右两位同桌都在打着作文草稿，我很看不起写作文还要打草稿的人：难道放个屁还要打草稿吗？我写到刚好够了六百字就收手，然后哇哇哇一通总结，合上作文本。我还是搞不明白：一篇文章，六百字或者一千字，他们想凭着这个来考察学生什么东西？这寥寥几笔，正好能让一个狡猾的人给自己打造一个假面具，刚好不至于把他的愚蠢、低劣、下流和盲从暴露出来，搞不准那帮改高考试卷的傻瓜蛋们还会认为他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

这几天坐在窗户边上的女生们总是坚持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好像风一吹进来就会把她们那宝贵的童贞带走似的。我看得出来，班里的一大半人对开不开窗户毫不在乎，可是我在乎，而且非常在乎，可惜的是这里是教室，不是我家，我不能想开窗户就开窗户。语文老师今天也许觉得有必要把

窗户打开，他从木然状态中缓过神来，然后一声令下，坐在窗边的女生们好像经了名师指点，这才恍悟身边竟然有几扇窗户，就讨好似的争着抢着把窗户吱吱呀呀地打开。先是一阵臭烘烘的人肉味儿被风卷了过来，然后，凉爽的风才扑面而来，它让我又捕捉到还在真实地活着的感觉了。

中午睡了一小会儿，午休的时间卡得紧紧的，刚好不至于让我在下午的课堂上活活困死。我把杯子里的水一口喝完，在刚睡醒之后喝一些水，你就不会觉得神情太恍惚，生活太艰难了。我拉过椅子，坐在写字台前，我在等着午休后惯常的那种恶心综合症涌上来。今天还好一些，只是有一点点隐隐想呕吐的感觉。我疑心重重地拉开窗帘，阴天把它那可憎的眼光投进室内，一切都变得阴郁、颤抖起来。这该死的天气，晴也不是，雨也不是，真让我心神不宁，我恨透了这样的秋天。有一只狗在叫，它已经叫了很长时间，叫声嘶哑，最后弄得好像在打嗝儿。我不能忍受的并不是它老是在叫唤，而是我能听得见它在叫唤，却无法明确弄清它到底在什么鬼地方叫唤。我把注意力投向那棵我已经关注了好久的小树，它像中了魔法似的，在池塘边摇来摇去，可是远处的树木都一动不动，这真是不祥之兆。

晚上上学的时候天气转好了，天边的云像是被一扇利斧果断而迅猛地劈开，露出蓝得骇人的新鲜的伤口。还有一些云，很美，像是有人在云端撑着竹篙行船一样，长长的竹篙划在云里，留下一道道云波，我呢，就是在水下仰望着的一尾小鱼。这个美妙的念头让我暂时忽略了秋天换季带来的干燥和紧张。月亮早就出来了，嗯，还不如说它整个下午就挂在天边，焦急地等着接太阳的班呢。它挂在天的一边，看上

去平平淡淡，它不给予，也无所求。我可不是，至少，我是有所求的，但那又是什么呢？我看着天边的月亮，这个坏蛋，它在嘲笑我。

今晚还是语文，上午因为写作文没能抄诗，我就准备在晚上抄，可是语文老师在上午第二节课下课前说了一番话，差点儿没把我气死：“今天晚上的语文课不讲课，自习。”这样一来我还能抄什么诗？要是上着语文课，我抄一抄诗还稍稍心安理得，可是一旦全班进入自习状态，所有的人都在你追我赶地背书做题，我怎么能安下心来抄诗？

教室里人不多，我的那个同桌现在正趴在课桌上睡觉。搞不明白他怎么一睡就是一两个小时，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安。他感觉到了动静，抬起头来，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把拳头一直伸到我的鼻子底下。我克制着不要就这么神经发作，不卑不亢地把他的胳膊推开，他这才反应过来，缩了回去。“这是什么？”好像我这本刚刚借来的书是他的一份宵夜似的，他那饥饿的两眼闪闪发亮。我一句话没说，就把书往抽屉里搁，他拦住了我，想从我手里把书夺过去。他抢书的劲头真是大，就是把书撕坏了也在所不惜，我吓得赶快松手。他耷拉着眼皮，把书翻了起来。要说他脑子里装的东西可真不少，不过全都是类似于“珠穆朗玛峰多高”的那种常识，就是那种你不看不知道，一看就知道的东西，可他还非要在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拖着我要给我详细解释为什么汽车有四个轮子人两条腿，我对这些鸡鸡鸟鸟的事儿真是烦透了，简直就是在扰乱我宝贵的注意力。像这些小常识，知道的太多了，会使一个人大大高估自己，让他虚假得叫人不堪忍受。我的这个同桌总是以为自己多么有水平，聪明得举世无双，时时记着要在我面前卖弄一番。大概前些天他之所以

觉得不受欢迎，就是因为自己的知识太多，曲高和寡，找不到与之对话的人。我是那种特别给人面子的人，只要一个人的缺点还不是非常下流非常无耻，我就会尽量让他从我这里得到满足。我洗耳恭听，不过对他的科普教育我也有厌倦的时候，当我向他表示我手头正有事，请他等一会儿再说，他就捏我的胳膊，戳我的肋部，让我不得不放下手里的作业，好像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似的让他大开说戒。上课了，趁着他东张西望，我把书拿了过来。他反应倒是挺快，马上要抢，我敏捷地把书塞进了抽屉：“上课我要看。”

他轻慢地看了我一眼：“你这人是怎么搞的？”

看来有必要向他说明这本书到底归谁所有，我把他的话毫不客气地踢了回去：“你又是怎么搞的？”看他板着脸，我补上一句：“第三节课给你看，行了吧。”

“我第三节课还要写数学，现在给我看。”他冷冷地说道。

“你没睡醒还是怎么的？我借的是别人的书，刚拿到手，麻烦你醒一醒好不好？最后一节课给你看。”

“那我还能看个屁啊。”

“反正我不愿意自己两节课干瞪眼。”他不高兴，惹得我也不爽快。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学校里所有的人都要看对方不顺眼，甚至相互憎恨。他还在一旁哼唧着。我想起了今天晚上是自习，于是把那本书抽了出来，扔在他面前。他两眼一亮，连谢都不谢我一下。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从来不关心他人有什么想法，那样子就像一只见了母驴的发情公驴，犟得没法拉回头。我要是今天不把书给他看，我以后怎么向他解释都是白费劲。这回他终于让我安静了。

他整整一堂课都在抄那本书上的词汇，都是一些科技词

汇，对我而言生瓜蛋子似的没有一点趣味，他看了却如获至宝。看来他明天又要把这些东西当作资本在我面前乱喷了。我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难缠的家伙甩开。我突然心血来潮想调理他一下。我友好地碰了碰他的胳膊，他中断了正在抄写的计算机词汇，扔过来一个怪眼色：“干什么你？”

“知道吗，你真是个知书达理的好人。”我非常诚恳地对他说。本来我是想看看他听了这句言过其实的褒奖之后会有什么惊奇的反应，可是，下面是他让我大吃一惊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他比我还要诚恳，露出一副无功不受禄的谦虚样儿，瞪着眼睛瞧着我。这是自从我和他坐到一块儿，他第一次正眼看我。

9月12日

我被日期弄糊涂了。原来以为今天是10号，看了一下日历，已经到了12号。我向来记得清楚的是哪天是星期几，而不是多少号，因为我没事儿就爱掰着手指头算着还要过上几天就到周日。一个星期就那么区区七天，可是我还要把其中的六天用来思念那惟一的一天，好像整个世界除了星期天之外，就再也没什么东西值得我去牵挂了似的。从我的日记上看不出来我是从哪一天开始弄混了日期的，我大概少记了一两篇日记，不过我好像把该记下来的事情都记下来了啊。有点儿不对劲的地方，也许有人把我的生命中的几天给偷走啦。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就是几天嘛，我恨不得把我的每个白天都拱手相让，留下晚上独自睡大觉。这几天我因为睡眠

不足，再加上天气老是阴着它的老脸，于是我情绪低落得要命。更要命的是班里的人，他们个个显得阴郁不安，看着他们你就不由自主地露出一副心怀怨恨的神情，我的样子当然也好不了多少。高三学生，你不能指望他们多么可爱多么朝气蓬勃，他们基本上都是面目可憎的怪物，就像牢房里的在押犯似的。这怪不着学生。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环境里，谁要妄想学生之间还能团结友爱，那他就是天底下最大的梦想家。

我一方面敏感得厉害，同桌丢过来一个冷冰冰的怪眼色就能叫我马上崩溃；另一方面又迟钝得像头老牛，面对着这张刚发下来的数学练习讲义，瞪着眼睛看了十分钟才知道应当干些什么，于是提起笔把名字写上去。我就这么雷打不动地坐在课桌前捱着时间，一直等到数学老师开始讲解这大自然的奇妙语言，这是一种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弄懂过的叽哩哇啦的奇怪语言。我是一个凡事非要先得把它的基于人的意义弄个明明白白才愿意去做的人。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相当钻牛角尖，可是只有当我弄明白了一件事物的意义，做的时候我才不会让自己感到盲从的痛苦和空洞的不安。而这门课程，从我小学一直到高三，没有谁告诉我，学它究竟是要干什么，是实现天下大同还是其它的什么美好理想吗？好了，这我不说了，还是看看数学老师是怎样给我们讲解的吧。他正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起重机，一个是灯塔，这两样东西在我看来还有那么一点儿现实的影子，不至于让我太糊涂。他在黑板上画了草图，写了一些式子，“然后，”他总结道：“下面我们把这两个例子中总结出来的式子提出来，不要管它们有什么具体意义，于是就得到一个新的定理， $\times \times \times$ 定理。”这让我摸不着头脑，好像整个儿人都浮在半空中

似的，不过我真的把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怎么能如此精通数学，也不用去考虑一个定理的出现，它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又能够做些什么，就这么信心十足地向我们讲解开来。

我由于弄不大懂，就不安地看了看周围的人，他们好像都比我认真得多。他们大概和我一样，对数学的终极意义也是懵懵懂懂的，不过他们不像我这样死心眼儿，因为他们可以把意义这些东西忽略不计，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像我这样考虑得那么多。我做着和自己的生活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是在顺应谁的意图呢？

下午上课前半个小时学校有一个开学典礼，是专门给初一和高一新生准备的开学典礼，我们不用参加。那些新生，马上就要第一次领略学校的办事风格：所有的活动都尽量挪到上课时间以外举行。所以你要是聪明，今后就不要指望学校搞个活动能给你放一会儿假。新生们下午都得提前半个小时来学校，接受新生入学教育。他们会被学校明确告知，在这三年里校方要求他们和禁止他们做的一切行为。然后散会，上课时间延迟一个小时，放学时间跟着顺延一个小时。有些新生会说：“开一场会，还不如就这么直接上课呢，今后我再也不盼着学校开大会了。”我所在的这个教室和开会的操场就隔着一堵墙，操场上喇叭里传来连续不断的发言，那种领导式的自负和愚蠢彻底暴露无遗。班里的大多数人，与其说是在上历史课，不如说正在操场上传来的开会声中回味着过去的高中三年，当然不是在做自我检讨，是这么一回事：每当有个学校大人物在喇叭里试图用各种规章制度吓唬新生，我们这个分会场里就会爆出一阵过来人才有的狂笑，

这就像是回忆小时候家长吓唬我们“要是再不睡觉，猫头鹰就要把你叼去了”是多么可笑似的。历史老师眼看着课上不下去了，就让下面的人自习。后面一排的两个人正在把活动圆珠笔帽儿摁的格格直响，好像在比试着谁坚持的时间长似的，这简直就是在考验这儿一片所有人的神经。我右面的同桌不知道在找什么，他弯下腰来，又直起身子，手里多了一支葫芦样儿的圆珠笔，样子难看透了。他也开始故意啪嗒啪嗒地摁了起来。前面有个人转过头，投过来责怪的眼光，可是这几个人还不见收敛，于是他也找到一支笔，恶狠狠地摁开了。操场上喇叭吵，教室里面啪嗒啪嗒响，好像人人都在抽风，我的心像被猫抓似的痒个不停，真是折磨人，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把自行车停好，进了书店。里面都是本校学生，学校刚放学。据说这家新开张的书店里高考辅导材料相当齐全。“你要是把里面关于数学的高考辅导书都买回去，一辈子都做不完。”我开口问那个店主有没有数学方面的辅导书，他就这么自豪地回答我，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情。托高考的洪福，各门课辅导材料的出版发行简直成了一项工业，一项中国特色的工业，大概对拉动经济增长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今天到书店里就是想买一本数学方面的辅导书。那本数学课本，我看了就烦，实在是看不下去，我想也许买一本其它封面的数学资料能提起我的学习兴趣来。书店里人多，我在人群后面站着，有一种尴尬的味道：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给高考捧场的笨蛋。你说这高考，它犯得着那么多人为之奋不顾身吗？我想到了80年代的那一代人，他们穿着中山装，带着瓶底眼镜，在图书馆里高高的书架旁，手捧着资料，一副虔

诚的模样。那样子虽然很好笑，但是肯定不至于让你觉得可恨，因为他们的动机很纯净。可是眼前，你看看书店里到底还有几个人是态度端正地买书看书的？他们在书店里，挑着拣着，只不过是搞到一本什么“名师辅导”、“三段教育法”、“用火箭把你送往北大清华”之类的狗屁玩意儿，闹哄哄的像个菜市场，真叫我看了恶心。我站在这里，活生生地感到一种奇耻大辱。前后不过五分钟，我连一本书也没碰，就从书店里钻了出来。我看了看身后的书店，里面还是那么喧闹，炸了锅似的，真让人后怕。我打了个寒颤，推起自行车，心有余悸地上了公路。

9月16日

下午上学，刚进校门我就看见很多人都围在报栏那里，看着刚刚张贴的通知。我在进班前绕过花园，过去看了一下，是关于二次高考的消息，怪不得那些人看上去都是复读生的模样。二次高考只招复读生，应届生不要。当班主任前些天在班里宣布这个消息时，所有的人都忿忿不平，不过班主任并不是为了引起我们忿忿不平才宣布这个消息的，他的意思是要我们不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不能安心学习。“作为应届班学生，应该好好学习，扎扎实实打好基础，明年参加正式高考。”根据他的话，这个二次高考就像是上面专门派来的一班破车，为夏天那会儿没赶上趟，或者是从高考的大车上被挤下来的倒霉蛋们特地准备的。他这么一说全班人的心理都平衡了不少，好像只有我们这帮应届班的学生精英才配参加明年夏天的正式高考似的。不过，谁都得承认，二次高

考预示着明年的春天将是复读生的春天，而不会是我们这些人的，我们还要等上很长时间。至于为什么要搞个二次高考，我还真想不出这项英明决断的理由。可能今年夏天高校招生的那会儿，有几个学校玩得不顺手，现在扛着改革大旗来再抓一把，也算是提前预支，把本来该夏天收取的学费挪到春天收。要是让我现在就去考，我虽然嘴上乐意，心里倒不一定敢去，何况我现在还拿不定主意该往哪所大学考。大学让我无从可想，我从电视里得到的关于大学的印象就是：一帮笨蛋，一窝鸡似的聚集在校园里，手里握着什么晚会主办者提供的荧光棒啊这些个蠢东西，在某位没头没脑的歌手唱着一支没心没肺的流行歌曲时，把手里的小棒棒晃呀晃，晃呀晃，甚至有的学生像在戏园子里看戏似的叫好，这一切都让我对大学无比失望。

我的右边同桌又开始他那伟大的科学研究了。他竟然没有学理科，简直就是屈才。上着政治课，他突然脸皮一沉，眼珠一动不动，几秒钟后从兜里摸索着掏出一个小本子，向我要了一支黑圆珠笔，在上面画了几个歪歪扭扭的正方形。我小声问道：“怎么，又有了重大发现？是不是要发生地震？”他看都不看我，表情肃穆地摆了摆手，叫我不要打搅他，看上去极富伟人风范。倒霉的我估计牛顿被苹果砸的那会儿也不会比他更加严肃。谁知道他现在又在念什么歪经，最好不要一下课就再一次把我拖住，并把他刚刚研究的科学成果向我大侃一通。我的前后左右一看见他拉着我的胳膊就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觉得好笑。我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了替死鬼。同桌目不转睛地盯着刚刚画好的图，一边摘下手表。顺便说一句，他这块手表跟我的这块差不多一样，只是有一个按键被弹飞了。他的手表后盖大概被他上课时撬开

了八次不止，这还是我亲眼看见的次数。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爱捣鼓这些东西，把手表啊什么的拆得七零八落，再费吃奶的力气去安上，这么一来他等于什么也没干，我不相信这么一拆一安他能学到什么。

第二节数学课复习的是定义域和值域，我仗着手里买了一本十六开五百多页的参考书，根本就不在乎老师讲了些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看我自己的参考书。但是，当他讲到“使 x 的范围为多少时，这个式子有意义”，我马上停下手里的事情，警觉起来。看着他那副认真劲儿，我觉得好笑：怎么光凭着嘴巴说一个式子啊什么的“有意义”，它就真的那么“有意义”起来了呢？要说人啊，真不知天高地厚，凭着大脑就能给一事物定下存在的理由。我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不也是时时刻刻想着要给自己的生活加上意义才能踏踏实实地活下去吗？我不应该疑心太重，到处扔下我的疑问，可是怀疑已经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成了我的习惯，这叫我很累，不过，它也让我不至于成为一个人云亦云的笨蛋。

这节历史课还算比较有学术气氛。老师郑重提醒大家，刘邦的修养生息政策在具体内容上有一点需要注意：只有因饥饿卖身为奴的人才可以重获自由，其它原因，比如因负债卖身为奴的，就不能算。“在考试做选择题的时候要注意。”他强调道。可我总觉得那些负债的人就是因为饿得晕头转向才会去借钱，然后成了奴隶，说到底他们还是因为饥饿。我想了又想，这种细得像蚊子脚似的东西真让人头大。我把我的观点讲给右边的同桌听，他也应该给我一个讲话的机会了。我忍不住要讲，这就是我的不对，他还没等我说完，就马上提出反对。他反对别人的意见好像从来不用经过大脑考虑，就像做膝盖反射试验一样，快得让你来不及躲开

就被一脚踢上了天。他说：“不对，你不用说了，负债就是负债，饥饿就是饥饿。”我恼火地打断他：“难道饥饿的人借钱是因为他们需要吃钱不成？何况当时是铜钱，不是纸钞，吃了也坠的慌。”他又要张口，我没等他开口，就竖起一根食指，表情厌烦地向他晃了晃，意思是不想让他接着抬杠抬下去。他哪里愿意放过这个长篇大论的好机会，他经常为一些屁大点事儿搅得翻江倒海。他说：“你不许我讲话，你就是侵犯了我的人权。”我哑然失笑，没想到这小子把日内瓦人权公约都搬出来了。我说：“我又没拿胶布裹住你嘴巴，你想说就说。”我绝望地闭上眼睛，等着他开口。还好，这一次，他没有拽我的胳膊要我当他的听众，他没有讲什么。我打心眼儿里喜欢他这个转变。这时历史老师问了一个什么问题，于是坐在下面的人开始像一群低三下四的谋臣似的叽叽咕咕起来。

9月18日

雨开始下了，我没带雨衣，只好把车骑得飞快。也好，这样我就会在无意之中忽略上学路上的房子啊、人啊、还有污浊的空气这些叫我厌倦的东西了。我经常在上学的路上没有一点精神，我慢吞吞地骑车，越慢就越觉得沮丧，越沮丧就越是慢吞吞，这样一来，刚一看到学校大门我就感到又要彻底完蛋之前的痛苦。我在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找不到方向。我强烈地感受到有些东西正在被无谓地浪费着，可是由于我在上学放学之外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完全不同的事物，所以我不可能说清楚我到底正在丢失、正在浪费着什么。至

少，我的时间，正在被白白地扔掉，它们被消耗在种种一成不变的行为之中，这是我能说清的最直接的浪费。我觉得自己就像这样一个人：明明别人告诉他前面没有路，是一个悬崖，可他还是不管不顾地往前冲。我现在就是这么盲目，一点也不错，我只要马上考上大学，以后的事情，就是死去我都不在乎。这种高三的濒死状态让我倍受折磨，我急于摆脱它，于是我只好不加考虑地冒险。高考说到底就是一项冒险，高三的学生，根本就是一群被逼上绝路的冒险主义者，笼罩着我们的，是一种怎样的恐惧啊——

坐在我前面的两个女生正在头挨着头，一起看一本中学生杂志。班里订的杂志大概有四五本之多，我从来没有看过，虽然我可以看，向其他人要一下就行。这真是有意思：为什么班里订的杂志，我却不看看呢？因为这些杂志里面不外乎是一些教你怎样把分数考得高一点儿的東西，或者教育你当一个听话的好学生的东西。这些我统统受不了。我恨死了目前的这个集体，因为它是盲从的，不关心个人感受的，最要命的是，一个高三学生组成的集体相当迟钝，每个人都在像蛆虫似的自顾自地往上爬，你要是不小心掉了下来，那就只有等死的份儿。在这样一个集体里面，你也别指望有什么不同意见，谁又能在一个集体里发表不同意见呢？我晃着手里的铅笔，无意之中瞥见了前面两个女生正在看的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怎样写出迎合高考判卷老师口味的作文》。那标题印刷得花里胡哨，轻飘飘得吓人。突然间，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普通人，好像一个把自己的孩子剥了做成人肉羹，去巴结统治者口味的卑鄙厨子差不多，这叫我感到一阵恶心，真该死。这篇文章的题目实在是露骨得可以，真是奇

怪，奇怪极了。为了高考，每年都会出现成批成批的人间怪事，大概世界就是因此而千奇百怪的吧。我通过高考来认识这个世界，大概也不会把它的档次降低到哪儿去。比这篇文章的题目更奇怪的东西多了去了，我只是没有遇上，不过，看来也快啦，今年我已经十七岁了，要是一切顺利，可怕的生活会等着我呢。

我呆坐了一会儿，想起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就在这个月21号。DD已经去了杭州，她要在那边学上几个月的画儿。她的画儿我看过，我不精通绘画，可是看得出来她水平并不如我想象得那样好，只是对颜色的感觉还比较敏锐。像绘画这些东西你总是不能去刻意地学的，大概和写作差不多。像DD这样学绘画的高三学生，其实是在给自己找一条捷径，一个能够避开高考利刃的锋芒的捷径。我早就该给她打一个电话了，她去杭州很长时间了，但是临走没有告诉我。我在她走了不久之后马上就发现她已经不在教室里了。我去问她的朋友们，她们见我打听DD，全都两眼放光。她们把我当成了她的男朋友，我没有说什么，我最好不要解释。在打电话前我思量着在电话里应该跟DD说点儿什么，我很怕在电话里冷场，这样还不如写信来得热烈。我掏出记事本，把想给她说的的事儿一一记下来，这样打电话就方便多了。我经常在电话挂上了之后才想起有些事情还没有说，甚至有时打电话给一个人，我会突然忘了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他，这些都让我恼火不已，这次我做好了预防准备。我看了一下要说的话，提醒自己不要在电话这头照着记事本一个劲儿问她，像审讯犯人似的。不过今天最好不要打，我要在中秋节那天给她打。我觉得奇怪，DD怎么到现在也没有给我来信，也许是来了，寄到了学校，现在正躺在班主任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

办公室里有一个放饮水机的破桌子，兼放各类信件，当然都是学生的信件。要是老师不给你送信，你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有人写信给你，那么你的信就会在这张桌子上被饮水机里滴下来的水给沤烂。我现在的这个班主任至少还是很尊重学生的，他每周一次把信件拿到班里来分发，虽然表情不是那么高兴，可毕竟他能把信件发到你手里。我上高一那会儿，当时的班主任在班会上勒令学生禁止写信，后来还开了一个家长会，和家长联手打击爱写信的学生。反正你要是认为一个人当了老师他就那么高尚，这种推断不免太可笑。就连写信也要受到管制，大概在战争年代也没有这么严厉的规定。下午放学我想到办公室里看一下，万一班主任漏掉了DD给我的来信也说不定。我在下午放学后过了将近二十分钟去了一趟办公室，我料到办公室里不会有几个老师，他们总是比谁都来得迟，走得早。桌子上信可真不少，我甚至看到一封邮戳是两年前的信，但是我没有找到DD的来信，她没有写给我，就连她的电话号码我也是从她的朋友那里打听出来的。我非常失望。

9月21日

下午放半天假，因为今天是中秋节。本来这不算是放假的理由，因为中秋节不是法定节假日，不过其他学校都放，于是我所在的这个学校也放了半天。平心而论，学校有时候也是很以慈悲为怀的。班主任在上午最后一堂课下课后进班通知放假，班里没有谁过于激动。每个人都很清楚，这半天假一晃眼就过去，可明天仍然要来上课，这个通知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也许我可以趁着半天假把上午发的数学讲

义做完。班主任说，晚上你们也不用来上课了，在家里赏月。不知道班上有几个人有这样的雅兴，反正我是不会放过这个早早上床睡觉的机会，跑到院子里赏什么月的。

吃完午饭，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DD那头没人接。我挂上电话，找了两张纸，给她写信，写完了还要去邮电局给她寄。本来我是可以在明天上学路上顺便寄过去的，可我熬不住，我是那种手里面哪怕有屁大点儿事情积压着都不能安生的人。我把我的屋门锁好，出去寄信。大街上空无一人，现在才两点钟，大概不会都在家里赏月吧。风哀叹地扫着地上的鞭炮碎屑，偶而有一辆卡车，在公路上开得飞快，橡胶轮胎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我很后悔在这个时候出来，空荡荡的大街，连鬼都没有一个，寄完了信，我恐怕连一份报纸都买不到。我来到邮局门口把信封又看了一遍，把它倏地弹进了邮箱，还伸进邮筒口摸了一下看看它到底被放进去没有。好了，一件事情办完了。我瞟了一眼邮电局前面的报栏，新闻，对了，今天晚上睡觉前我最好能把时事政治看一看，明天晚上有一个政治测验，至于究竟想测验你什么，是你把书上的原理背得比别人熟呢，还是比别人更老练地套用书上的原理，反正不外乎就是这两样，没有其他的。我就这么晃晃悠悠地回家去。

9月26日

掐着手指头算，今天DD应该给我来信了。下了第二节课，我和ZY一块儿到办公室里去找信，我一个人不敢去，办公室里老师肯定很多，高中老师我有一半都认识。恰好ZY也想去看看有没有他的信，他可没什么好害怕的，他成绩在班

里是倒数前五名，要说怕，是老师怕他这样的学生。反正你学习成绩越是靠后，你就越是不知道害怕，这是真理。他也在等DD的信，他要DD从杭州捎一样东西，保密，他不愿意告诉我。ZY从办公室里出来，摇摇头：“没有，桌子上的信都被收拾掉了。”

“也许班主任已经把信拿到手了，下午会发。”我说。

ZY还有其它事情，他总是有很多事情，可我就不知道在学校里除了学习之外怎么还会有其它事情。我跳到办公大楼后面的白色走廊里，这走廊不伦不类的把校园搞得跟精神病院似的。走廊里有一些我认识的其他班的人，那边就有一个，RK，和我们家以前是邻居，后来搬走了。他今年夏天高考考了514分，差三分够本科线。三分啊，就能决定他是上大学呢还是进补习班，现在，正如我所见，他正在补习班里耗着老命呢。就是三分，也许就是一道选择题的失误或者问答题里的一小段话一时没有想起来，就这么丢了。三分之差，你可不要小看：它能把一个人送上天堂，也能把一个人打入地狱，它的确能让一个人的一生变成完完全全不同的两个模样，真是铁面无私的公正。一个人就是为着区区三分，他就得付出生命中的整整一年作为代价，也许还不止是一年。三分，不知道究竟能衡量什么，可是我们就任由着分数这东西每年每年制造出数都数不完的超乎人类的想象力的怪事。少考三分，你就得拿出一年来，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不过，你竟然能被允许接着再考一次，那已经是相当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了。我本想上前和RK讲讲话，但是我不想让他不自在。我跳下走廊，进了教学楼。

我取出一个石榴，找来一把水果刀，把它切开。这东西

我不喜欢吃，不过听奶奶说，石榴可以帮助消化，所以吃一个也行。我更喜欢切石榴：先在石榴的顶上划一个十字，然后用手一掰，这样就不会把石榴籽儿弄烂了。这个方法虽然简单得很，不过要是没有人告诉你，你不见得就想到，这还是奶奶教我的呢。我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当我长大了，她就不愿意住在这儿了，她坚持要回农村，和大伯他们住在一块儿。奶奶偶尔也回来住上一段时间，不过近两年身体不好，没有来，她年纪很大了。我掰着石榴籽儿，想着也许在几十年后，我也会教我的孩子这么把石榴打开，就像奶奶当初教我的一样。今年高考考完了，我要回去看看她，我已经一年多没见着她了。我每一次回去，奶奶的左邻右舍都会过来看我，把我当成宝贝。他们夸奶奶把我带得好，长得又高又漂亮，要我好好学习，考大学，让奶奶快点儿抱曾孙子。他们的热情和谦逊让我感到内疚，上大学在他们眼里的确意味着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在他们眼里，上大学应该是一种荣耀，一种没有任何杂念的淳朴的希望，就像希望明年的粮食收成好一样，可是对我来说就不同了，但是我不能扫他们的兴，只是以微笑作答。我喜欢农民，我想不出来，在这样艰苦的生活中，他们是怎样保持着希望的。我做不到，我只有怀疑，要是生活不能达到我的要求，我就不切实际地想让它改变，而不是改变自己，以适应生活，我没有这种忍辱负重的品质。在回家的火车上，看着平原上的广袤土地和远处树林后面的村庄，我经常 would 动情，农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啊，我在老家呆上三天就嚷嚷着要回去，可是，奶奶不就这么这么过了一辈子吗？我想我以后会考上大学，并且有一个孩子，这些，不是我的愿望，只是一种生命的惯性，我有责任这么做，我应该这样，虽然我并不真的想这样。可

是，我的确不敢让一个无辜的孩子经历我现在这样的生活，其实这连生活都不能算——我的生活，已经被学校的混凝土浇筑定型，它已经把我变成了一块灰色的、不能回忆、不能品味、不能融化的可怕的东西。我可以为了上大学把自己背叛，可是，要一个孩子，我做不到。我怎么能这么冷酷，让他体验我现在正在经受着的生活呢。要是让他面对这样一种生活啊，生了他就等于是杀了他。我可以幻想着给孩子一点爱心，可是，一旦他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那么我只有可怜他的不幸了。又有谁愿意生来就是让别人怜悯的呢？我把手里一瓣瓣石榴的晶莹剔透的籽儿剥在一个瓷盘子里，小心不要弄碎一粒。我把瓷盘托起来，张开嘴巴，石榴籽儿哗的一下滑进了我的嘴里，喉咙里顿时凉爽了起来。我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泪水。

9月27日

两节历史课又长又无聊，不能不听老师讲课，但他实际上又讲不出什么名堂来。他现在更正的内容和高二那会儿的历史老师讲的差不多，大概他们用的是同一本教学参考书。我只要回去花一点时间找一找高二的旧历史笔记，以后上课就不用老是记笔记了。要说现在这个历史老师和原来的那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大概就是他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反正翻过来倒过去就是这几本书，哪个老师给你上还不一样是要背啊。我向后仰着身子，把历史课本拎起来，抖了抖，也许从里面能滑出来一张纸条啊什么的叫我有些兴趣的东西，可是什么都没有。我把书重新翻到正在复习的那一节。这本书我看的遍数太多了，就是看到抗日战争有多少多少中国人

惨死在小日本枪口之下那一页我都不再有什么感觉，我早已习惯于把这些东西当成考试要考的数据和史实，再也没有其它想法。就这么靠着背书背出来的人，你能指望他们还能义愤填膺，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我把课本往课桌中间推一推，风从窗外刮了进来，带来了干燥的灰尘，书页哗啦哗啦地扇动着。

真有意思，人创造了历史，可是创造了历史之后，它又反过来变成一门要考试的课来折磨人了。我不清楚究竟记下来的这些个东西，除了应付高考之外我还能拿它们有什么用。大概我这样就算得上是厌学了吧，这真是可怕，要知道，厌学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我的全部生活就是上学，上学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我不敢轻言厌学的原因就在于此：这样一来，我不仅是厌学，我根本上就是厌倦生活。所以不仅仅是我，任何一个高三学生，他都不敢站起来说：“我讨厌上学！”谁要是敢这么说，那简直就是自杀，全国也找不到几个胆敢说自己厌学的高三学生。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找一个去处，这话的确不假，这样长久下去，我终究有一天会被耗尽灯油。可是，我怎样才能给自己找一个去处呢，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在何处！

R街是刚刚铺好的水泥路面，沿着小街的新房子里，有人向外倒着污水，排水设施建设得还算凑合，所以路面没有什么积水。沿着河的一侧，摇摇欲坠地耸立着一些洗头房或者是饭馆的招牌，路面两边的建筑朝行人高耸着肩膀，中午的太阳照不到路面，这里很潮湿。偶尔有一两个人在路上闪过，虽然衣着光鲜，可是总叫人觉得不大干净。我骑着车在这条街上走着。前面有两个女人和两个男

人，男人们走在后面，带着淫猥的神情讲着什么话，突然爆笑起来；那两个女人，肩膀上松松垮垮地挂着样式小气冒充真皮的包，已经是9月底了，她们还穿着盛夏的衣服，其中一个穿着特别短、特别结实的黑色皮裙，皮裙紧崩着，另一个懒懒散散地拖着半高跟凉鞋，没有穿袜子，脚踝处的肌腱紧紧地绷着。她们带着满不在乎的样子说笑，其中一个转过头来，对着后面的两个男人刻薄地骂了一句，她的面孔上虽然抹了不少东西，可是看得出来皮肤是粗糙苍黄的，像晚上没睡好觉似的。我大概猜得出来她们是干什么的了，不过我对这个一点儿也不过敏，我不是那种把看到的任何事情都拿道德衡量的人。

今天晚上真叫人高兴，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因为停电。正在上着数学课，突然两眼一抹黑，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到二楼三楼高一高二的人狂叫声传下来之后，我才意识到停电了，班里的大多数人也和我一样迟钝。我想趁着这个机会跟着大叫几声，可是我们这间教室里相当安静，我刚张开嘴“啊”了一秒钟就傻了眼，幸亏没放开嗓子叫出来。大概上了高三，人都变乖了。西边初中部大楼里人声鼎沸，小同学们都蠢蠢欲动，有人在教室里晃手电筒，远远看上去整个大楼里像是在上演着多幕热闹的马戏，估计他们都要放学了，我们就没那么幸运，不过也不错，挺好玩的，点着蜡烛上课。教室里有人嚷嚷着点蜡烛点蜡烛，于是两分钟之后，第一支蜡烛点着了，然后以燎原之势亮了一片。继续讲课。有人在我后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支常备的蜡烛头，向后面借了个火。

教室里沉闷得厉害，不仅仅是空气沉闷，人也一样，好

像都在自发哀悼着什么人似的。我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蜡烛，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为自己感到悲哀。我直起身子，左右同桌的面孔被蜡烛晃得像幽灵，全都是一副刚死过一次的样子。教室里热得要命，窗户又不能打开，外面刮着风，蜡烛马上就被吹灭了。于是当一阵打开窗户的小小尝试过后，窗户又被慌乱地关上了，熄灭的一些蜡烛再一次被点燃。老师在讲台上耐心地等待着下面的小小骚动过去，他的面前也点着一支蜡烛，是第一排的两个女生殷勤地给他点着的。我感到后背有些热，转过头来看看，我可不想让哪支蜡烛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把我点着，后排的人都在低着头做题，没有一个人在乎蜡烛。数学老师拿起讲台上的讲义，抖了抖上面的粉尘——他的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高一那会儿的数学老师，他的习惯动作就是抖一抖手里的课本或者试卷，欲言又止，盯着下面的某个地方看；然后，全班的人都随着他的默不做声而一动不动，突然，他会抬起手来，向你或者我或者他，扔出一个粉笔头，命中率相当高，打在身上跟橡皮子弹一样疼；然后，你就脸红。虽然你也许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不过他自有他的道理：你走神了，写其它作业了，打盹儿了。他的水平还不止这一条：他骂人从不带一个脏字儿，据说所有被他骂过的人一辈子都会牢牢记住他。现在的这个数学老师还不错，他甚至愿意把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过程一字不差地写在黑板上。文科班里像我这样叫人头疼的数学笨蛋总有那么几个，他还记着有那么几个笨蛋，我真心感谢他。

“今天快要过去了，”我想。就在这时，在最后一堂课，来电了。大家把蜡烛吹灭，只有那么两三个不懂事的，还在捏着软软的蜡烛不专心听讲，其中一个就是我。我早已

把书包抽了出来，放在腿上等着放学，还有五分钟。我右边的同桌把手伸进我的抽屉，他说也没说一声就这么明目张胆地翻我的抽屉，让我吃惊不小。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的胳膊在我的抽屉里咚咚地翻。他有着非同寻常的好奇心：我的日记、信件、还有钱包，他都试图翻过。他从我这里要什么东西，没有要不到手的。我不希望别人感到我是个难以交往的人，我一般有求必应，现在我已经把他惯到了哪怕他想吃大便我也要给他当场拉出来的地步。他习惯对我提要求：把笔记本给我看看，圆珠笔给我用一下。这些还算好的，有时他连说都不说一声就从我手里抽走圆珠笔，而当时我正在写作业。我眼睁睁地看他老翻我的抽屉，看得不耐烦，问他，你想找什么？他说，草稿纸。我说，我没有，你这么翻我的抽屉事先应该跟我说一声才是。他撇了撇嘴巴，缩回手，怪腔怪调地说，不就是几张草稿纸吗？不借就拉倒，看你以后还借不借我的东西。我想笑，因为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借过他的什么好东西。我说，这不是纸不纸的问题，你不要转移话题，你这么说真叫我难受。他拉下脸来，他又要给我脸色看。我说，又来了是不是？我以后可不想迁就你，你不要以为我迁就你是怕你，我只是怕你脸色太难看影响到我的情绪！我说着这话，他还是冷着脸上下下把我打量个遍，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似的。下课铃传来了，我装作一点儿也不在乎的样子，洒脱地拎起书包，离开座位。在出教室门的时候，后面的四个家伙硬生生地挤上前来，把已经走到门口的几个女生挤得贴着教室的那扇铁皮门。我也被挤得向后翘起了一步，我踩到了一个人的脚，他飞快地把我往前操一下，骂骂咧咧的，我头也没回就出了教室。这是什么鬼地方，我真是受够了！

9月30日

数学课上了一半，老师就不得不说：“虽然明天国庆放假，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过于激动，该上的课还是要上，再激动也不能让你们早一点放假。”放假的事儿向来是由班主任通知，而不是由其他任课老师通知的，这一次数学老师忍不住开了口，他本来想劝劝班里的人安下心来上课，可是这么一来教室里反倒更加热闹，因为放假的消息终于得到了来自“官方”的证实。后面闹哄哄的，像一群就要飞临教室上空的轰炸机一样，所有的人都在心神不宁。“希望这半节课大家耐心坚持到底，就当给我捧个场吧。”数学老师的口气说得怪可怜的，于是教室里一阵笑声过后复归安静。明天放假，他这么明确地说出来让我很是振奋，本来大家都知道十有八九明天要放假，这会儿消息从老师嘴里说了出来，那就更有保证了。现在还有一个悬念：今天晚上是不是也放假。

我得寸进尺地想着，小声问了一下左边的同桌：“听说今天晚上也放假，你知不知道？”

他摇摇头。

“今天晚上不放假。”我的右边的同桌不知道什么时候抬起头来，懒懒地插话道。他从刚一上课就在睡觉，头勾得低低的，面前还有模有样地摆着讲义，老师从讲台上往下面看，总会以为他正在用功呢。他伪装技术高超，甚至低着头睡觉那会儿手里的圆珠笔还能一动一动的，从老师的角度看，他就像在用心做笔记似的。他突然插进来这句晦气的话我也没有很吃惊，他上课睡觉的时候耳朵总是竖着的。我很理解他对睡眠的渴求，因为我也一样。晚上十二点睡觉早上五点半起床，长久这么下去，班里总会出现睁着眼睛就能睡

大觉的好汉。

综合一个上午的小道消息，我在中午放学路上作出如下结论：首先，可以断定明天10月1号放假，也许放四天假，也许放三天假；最后一天的晚上，像往常一样，要上晚自习，今天晚上是否上课，不大清楚，好像不上课。我对这个结论已经比较满意了。我这么盼放假，好像我上学的目的就是等待着放假而不是为了高考似的，不知道班里还有几个人像我这样。他们肯定比我理智得多，做梦都在上课。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班主任的外语课，这样他就会在下午最后一堂课下课后，出现在教室门口，然后说出放假通知，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这样做本来是想让学生上课专心，不要老想着放假的事儿，可是恰恰适得其反：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心里捣鼓着什么时候放假以及放几天假，人人都在这么搜肠刮肚地想，于是心里就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课堂秩序因此而大乱。我骑着车，浑身轻飘飘的，几乎以为下午就要放假了，我还是给这几天做个计划吧。如果今天晚上不上课的话，我下午放学就去理发，明天上午去买政治时事手册，下午买衣服，然后就是重要事件了：数学，笔记和绿本子，政治和历史的三模四模，还有精讲，要背政治高一下册那本书，语文绿本子，数学还要把五张讲义给总结一下，我就是去死也要把最后几道题给憋出来。我心不在焉地骑着车，大街上人不多，我经过一个菜市场，里面干燥多尘，遍地都是被踩成黑色的一团团的烂菜叶，小贩和小市民尖着嘴巴讨价还价，还有守着一堆菜蹲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老实巴交的农民。

天空把它的阴沉的脸孔耷拉在我的面前，我就是想不在乎天气也难。还差五分钟放学。隔壁班老师上第二堂课已经通知了放假事宜，顺带着过来把本班也通知了一遍。放四天

假，今晚不上课。我不紧不慢地随着铃声走出教室，很多人都在校园里，大概等着什么人一块儿出去玩。WX就在花园那边，他看见我，招了招手，我指了指存车处，意思是先去取车，马上过来。他点了点头。我推着车子走过去：“在等谁啊？”

“没有，本来想等BB一起去上网，他恐怕第二节课就走了，现在跟你一起走。”

“有什么打算没有？”

“什么打算？哦，你是说这四天假啊。”

“对啊。”

“去补课。”

“是不是家里人要你去的？”

“你不去补课吗？”

“我用得着吗，我。”

“你怎么用不着？”

“我成绩班里前二十名，起码上一般本科没问题吧。”我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没什么把握。我一边说一边看着WX，他不以为然地说：“你不能靠名次来断定能考上什么学校，影响高考的因素非常复杂，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北半球就能掀起一阵狂风，你听说过没有？我要是说改你高考试卷的人眼睛里突然飞进了一粒沙子，你就能因此玩儿完，大概也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我点头称是，然后问他补的是哪门子课，“外语。”他说得飞快，好像在扔什么脏东西似的。

刚开学那会儿我爸也要让我去补课，因为他看见他那个单位有人给家里的孩子找家教，所以也和妈妈商量着要给我找家教老师。我刚好有一次数学考了五十来分，他问我，要

不要请家教？我虽然理亏，可还是壮着胆子说：“怎么你们一点也不体谅我，我每天就这么半死不活地赶赶赶，白天晚上倒腾着，玩儿命似的，哪儿还有时间补课。”他们还要劝我，我嘟囔着说开了：“家教！家教！要去你们自己去！”从那以后他们就没在我面前提这个事儿。有时候强硬态度是必要的。我问WX：“你补了多长时间的课？”他说：“大概有三个星期了，家教班里还碰到了我幼儿园的同学。”

“你的家教老师说你学外语有什么要改进的没有？”

WX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道：“他说我以前很不自信。”

“自信？”我叫了起来：“自信是什么东西？是不是用来厚着脸皮混饭吃的本事？你可不要呛我！”

“我知道我知道。”WX也笑了：“他这话说得挺好笑的。”

我打断他：“我不是说这话好笑，我只是不相信自信啊这些东西。”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看问题总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马上辩解：“我不是故意要让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才这么想的，我本来就觉得是这样。”

“我明白，我明白。”WX点头，可是他的样子并不诚恳。

我说：“我还要去理发，我得先走一步啦。”

WX说：“这么忙干吗？我知道一家理发店，理发师还是个女的，理得很好，像我这样。”他说着就把手放在柴禾堆似的头发上捋了一把，我吐了吐舌头，骑上车走了。

10月2日

我坐了起来，困，可是睡不安稳。心慌，想着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事情，好像我的肉身里面包裹着的是一颗别人的灵魂。我走到外面，想随便找些东西吃一吃，但是我想起来还要去买衣服，于是换上外套出门去。

我从来不和别人一块儿逛街买东西，我在嘴上说是害怕自己拖累别人，心里却担心别人拖累我，因为我逛街的目的非常明确，买了东西马上回家，从来不在大街上多逗留一分钟。今天大街上人不少，不过像我这样单独一个人溜达的没有几个。我就这么一个挨着一个服装店地找啊找，我要买的是一条裤子。一条看上去还行的裤子。我一直转悠到四点钟，腿都快要跑断了，不知道还用得着买裤子吗？我在累得有些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晕晕乎乎地进了一家冷冷清清的女装店。老板凑上来，没说话，我站定了那么几秒钟，头脑反应过来了，才知道应该退出去。我看见门口橱窗旁有个小男孩，大概不过三岁，长着一颗结实的大脑袋。他仰着头讨好地朝着橱窗里的塑料女模傻笑着，还在讲着话，只有他自己明白讲的是什。隔壁商店里出来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拎着牛皮纸购物包，她牵着小男孩的手就要走，小家伙失望地回过头来朝橱窗里看了一眼，好像在抱怨这个奇怪的阿姨为什么不和他说话。我终于在五点半之前买到了一条裤子，早知道凑合着随便买一条就行，我也用不着这么劳神，逛了一下午大街。

我怀疑有人刚刚从这里走过去，于是向前后看了看，这儿有一阵香水的气味，淡淡的清香，我突然想起来那一定是桂花开了。前面花园里有一棵桂花树，每到秋天都会开花。

我走过去，想跳进花园里，把鼻子贴近那棵亭亭玉立的桂花树好好闻一闻，但终究没有这么做。我发现，有一朵深色的牵牛花，它的藤绕着花园的栏杆，只开了一朵花。它把我弄糊涂了，现在到底是什么季节？管他是什么季节呢，花儿只是为看到它的人而开放的，就像生命是为得到它的人而存在的一样，不必深究为什么。我抬起头来，云老是要试图捉住想要逃跑的淡淡的月亮，月亮却要把那抹云彩远远地丢开。我在院子里小步走着，树荫在地上不停地变着身影，这个叫我常常感到呼吸困难的秋天，也有它温和的一面。我就这么走着，走着，像是一只被掏空了心儿的南瓜，空有其表，什么都不知道，要不是可以偶尔看一看花儿、云彩和月亮，这简直就是索然无味的生活啦。我仰望星空，看来，我不能给我的生活一个定义，只能旁敲侧击，给它一些无关痛痒的解释，我真是一个无能为力让自己站稳的人。算了，还是回家去吧。

吃完晚饭，爸爸妈妈就去舅舅家了。我一屁股歪在沙发上，拿过遥控器，就这么翻翻翻，我知道电视里永远也不会出现我认为好的节目，总是一群唧唧喳喳的主持人，唱着前言不搭后语的歌词的下三滥歌手，还有专演那些酸叽叽的肥皂剧的好像有那么一点儿名气的脸皮演员，或者就是一些不伦不类的国产动画片。我从来不看国产动画片，他们名义上是给孩子拍动画片，可是看了一半你就明白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又是要事儿事儿地向你说明一个道理。教育真是无孔不入，见缝插针，你随便坐哪儿吃顿饭，都会有人马上跑过来教育你，要坐有坐相啊粒粒皆辛苦之类的，本来我就活得累，有人在旁边这么聒噪个没完，还要不要我活下去了？

我换到一个动物节目片，还行，有点儿看头，我很喜欢

看的就是这些纯粹的动物片，没有一帮笨蛋突然插进来猜谜啊什么的片子。这一集是讲猴子的：一个小猴子，它在啃爪子里的植物果实的时候，总是露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我观察周围的人，往往喜欢用这种观察动物的眼光看他们，这样叫我感到很有意思。我从人身上确实看不到什么有趣味性的东西，你要是把他们当成动物来观察，那样你就不会觉得和他们相处起来太过于艰难了。我这么说肯定有人跳出来说我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可是我非常讨厌心理医生，他们都是一帮江湖骗子，他们把真正的心理学庸俗化了，他们只能给那些做生意破了产、评职称玩儿完的人做做思想工作，对我可不行。

10月4日

大雨撒泼似地下着，我想趁着上学前还有一点时间，把这张数学试卷写完，可是我写不下去，心里慌得要命，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去上课。大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天，原先一场雨很能让我镇定下来，或者一场雾，或者是一个晴朗的白天、一个夜色浓浓的夜晚，可是，今天，不管大雨怎样使劲地下，我还是感到坐立不安。放假总有个结束的时候，现在又要上学了，那么我就应该面对现实，也许上学并不像我想象得那样叫人厌烦，但是我想不出来怎样把自己的慌张情绪调整一下，在很多情况下，人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调整自己，才能换来苟且地活下去的可能。我站起身，在屋里走来走去，我迫切需要有一个人在我旁边，这样就能减轻一些这种上学前的焦虑。有一个人在旁边，哪怕不和我说一句，也能减轻我的这种突如其来的紧张感。我想去看看电视，可是这样

做只能在上学前增加我的内疚，我要的是头脑冷静，现在离上学时间还有十分钟，管他呢，我马上就走。

雨停了，深沉的云在天边逶迤着延展开来。一辆打着强烈车灯的卡车令人恼火地迎面直驶过来，害得我像瞎了似的骑了半分钟车，一直到它从我的身边飞驰而去，弄得我裤子上全是泥浆。路面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在这样的路面上骑车，我很容易产生挫败感。不止是挫败，我还害怕、焦虑、慌乱、惊恐、紧张、沮丧——马上就要月考了，这是我进入高三以来面对的最为严重的一次事件。我坦言我非常在乎这个东西，我不是太在乎分数，可我就是害怕考试，它总是带给我一种不确定的恐慌。谁都不知道考完了试，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每个人都不可能不在乎，尤其是高三的人，简直就是为了考试而生的，至少，是为了高考。考试，它就是这样连续不断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深坑，考试，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项求生的反应。面对它，我只是一只要求活命的动物，我失去了梦想的能力。

云迅速退却，月亮又上来了，天空的深蓝给人一种新生的感觉，剑麻的一簇簇白花在教学楼前显得很醒目，有个人拎着一一条红色的大鲤鱼往后面的教师家属区走去。那条鱼看上去有半米长，长了这么大还是被人捉住了，它真是倒霉。我把书包从肩膀上放下，走进了教室。

我没有把外语讲义带来，今天晚上要讲，外语讲义和数学还有语文的那两本讲义从外壳上看差不多，我拿错了。右边的同桌也没有带，他住校，等到上课他才发现自己没带，再回寝室里拿就迟了。我原本也不喜欢和别人同看一本书或者一本讲义啊之类的，那太别扭，于是我就写我的数学试卷。右边同桌没事可干，就睡觉。可是他睡觉也不让你安

生，他趴在桌子上，每过一小会儿就醒过来，左看右看，好像有人把他从梦中叫醒似的，然后确定没有人叫他，就接着睡。全班所有的人都气若游丝地在讲义上记着什么东西，目睹这一切，叫我感到无比难受。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永远也没法找到着陆点的鸟儿，就这么在空中飞啊飞，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会精疲力尽，就这么咕咚栽下来死掉。

10月5日

天气阴沉，它又在擅自给太阳举行葬礼了。我匆匆吃完了早饭，全身都感到非常不舒服地肿胀着，那大概是因为没有充足地休息和天气变坏的缘故。我在吃早饭的那会儿把窗户打开，有一只兔子沿着墙根跑，它像一只白色的大球，在黄绿色的还算茂密的草丛中向前滚动着。我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兔子，看来总不会是野兔。它跳过花园矮矮的栏杆，来到了池塘边。当它面对着一片水草的时候，我看清了它的侧面，它露出一副走神的样儿，粉红色的小鼻子一个劲儿地抽动着，好像很紧张不安似的。可是我不能老看着一只兔子啊，这很容易就会让我想起自己的处境。我关上窗户，收拾书包去上学。

我在出门前关了室内的台灯，就在关灯的那一刻想起一个问题：我这么拧着台灯的旋钮，是不是随着灯泡亮度的改变，电流也随着改变呢。只是想着玩玩。本来我还以为能想出个答案来，因为我初中那会儿的物理成绩还不错，一般都是八十分，可是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当时学的物理课的内容，我忘了，忘得一干二净，可能不仅仅是物理，我已经把

以前学过的所有理科课程忘了个精光。想一想实在好笑，当年我学这些课程时是多么用功，累死累活地学，可是到头来却把它们忘了，因为我根本就用不着它们，惟一用得着的地方就是考试，一旦考完就被忘掉，好像这些课程是专门为了你在将来某个时候彻底地遗忘它才去学似的，真好笑。

我开始胃疼，教室里闷得像个锅炉，头顶上悬着的日光灯还在半死不活地亮着，教室外面照进来的灰色光线和灯光交织在一起，这种混杂的颜色叫我越发感到浑身不舒服。这是一种强迫性的感觉，我没有要胃疼，可是它自己疼了起来，于是我不得不皱着眉头弯着腰。右边的同桌今天没有来，这让我感到一种空洞，好像他已经被拉出去枪毙了，下一个就要轮到我不幸的。我焦虑不安地紧握着笔，开始记笔记，我不知道已经漏了多少没记下来，记笔记已经成了我在课堂上的最后安慰。

窗户全都紧闭着，下课铃声一响，人就走光了。我坐在座位上，尽量保持一动不动，我知道只要稍微移动那么一点点，我就会开始厌恶自己。我的眼睛干涩，嘴唇起皮儿，脸上燥热，还老想着睡觉，可是，我不能就这么睡下去，这里是学校。趴在课桌上睡觉，首先，我不可能真正睡得着；另外，我害怕做恶梦，经常在课桌前迷迷糊糊的时候产生可怕的幻觉，所以我不愿意现在在教室里睡觉。我只想等着中午放学回家，不吃饭，就这么蒙头大睡一个中午。我知道等到中午真的放了学，回了家，也许我就睡意全无了。学校是我最好的催眠剂，因为我的睡眠正是被每天十个小时的上课时间挤占和剥夺的，所以只有在学校的时候才自然地感到要夺回我那被它吞噬了的睡眠，可我又怎么能要得回来呢？

还有一分钟上第三节课，右边那个两节课没来上课的同桌，突然从过道边冒了出来。他正在奋力往里面挤进来，但是后面的人连桌子都不给他挪一下，于是少不了拌几句嘴。我好心地问他：“又睡过头啦？”

他把手里卷成一团的书往课桌上一攒，没有搭理我，瓮声瓮气地问我班主任上两节课来没来，我说：“没有，不过数学老师上课问到了你。”

“你说什么了？”

“我没说，你不是睡过头了吗？我怎么说？”

“就说我今天有病，请假了。”

“那就等到你下次睡过头了再说吧。”我示意他让一下，因为他的胳膊压住了我的讲义。

前面两个女生又开始谈天，她们说的事儿就是这几天学校里传得很广的新闻：高三（4）班有个男生得了肺结核，校报新闻栏上写着：该班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学生和老师主动捐款为其救治，该生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一向认为肺结核是那些过度劳累的人才有可能得的疾病，没想到学生也能患上了。不过下面这个解释也许合理：（4）班是本校的高考试点班级，全校理科前五十名的都在那个班，所有的人都学得那么猛，每天晚上像大年三十守岁似的，不到零点不去睡觉，在这种情况下，有个把人得了肺结核啊肝硬化什么的也是意料中事。要是高考还这么持续下去，我们的下一辈、下下一辈人，肯定能进化到整天抱着书不用睡觉就在那儿一个劲儿学学学的程度，咱们就等着这样的学习超人出现吧。

“你们寝室晚上几点关灯？”我问右边的同桌。

“十一点半。”

“那你们怎么学呢？点蜡烛？”

“点蜡烛也行，我就在教室里看书，教室里灯不灭。”

前不久班里发生一件事：有个住校生，他晚上在教室里看书，看过头了，趴在桌子上睡了起来，他就这么在教室里不小心睡了整整一个晚上。这件事第二天被班主任知道了，他带着惋惜之情在班会上夸了他，大概就是说“精神值得学习，方法有待改进”。要说他这是献身科学吧，实在有点儿拔高，大家都知道我们天天学的到底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大不了就是记记背背做做的东西，与其说这种近乎残忍的学习是出于热爱科学，还不如说是为了想让自己在这次月考中成绩往上蹿蹿。我的同桌躊躇满志地提起笔，把我上一节课的笔记要去抄。

我正在看着刚记的笔记，既然他要了，我就停下来，把看到的那一页折了一小角，再把笔记本递给他。就在我折角儿做记号的一刹那，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折角儿的动作和我记忆中去年的某个场景有着似曾相识的惊人一致，两个动作重叠在我的大脑中，我愣住了：难道我这一年又是在原地打着转儿不成？我硬着头皮环顾四周，好像有一只不可见的黑手正在时时操控着我的生活，好像我忙活了一年，又回到了原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幻觉，或者生活的真面目就在这场景重叠的一刹那间露出了它的狐狸尾巴：它只不过是一种重复，它本身确实如此。这种生活的重复本来不带有任何危害，也不带有任何益处，只是人，人把这种重复涂上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其中肯定是危害性的居多。我高二那会儿也在某个环境下，就这样给笔记本里的某一页折了一个角儿；现在我还是这样，又一次折着笔记本里的一页；明年，肯定还会这样。我陷入了一个圈套，一个让生活变成无用之功的圈套，我需要及时抽身，否则——

我不间断地记了一会儿笔记，心里把自己想象成一台打印机什么的，这样记笔记就不至于那么烦了。既然我是一台机器，那么就应该能准确无误地把一切事情都干好，而且不会有一点儿怨言和不满。可我终究不是机器，圆珠笔没水了，我急得咚咚地翻抽屉，想把那支红圆珠笔找出来代用一下，最后，我的目光落在右边同桌的手里。我小声说：“哎，你手里的是不是我的笔？”

“你的？”他停下来：“我昨天在座位下面捡的。你的是不是？拿去。”他把笔扔过来，好像是我占了他的便宜似的。

我想了想，又把笔扔给他：“看错了，我那支笔不是红色的笔芯。”我宁可落个一身清静，也不想把事情搅得糊涂。

我终于从上午的泥淖之中跋涉过来了，没有被溺死在课堂上，真是幸运。在冰凉的空气中骑车，让我清醒了不少。中午无论如何我都要好好睡上一觉，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我路过C街，那儿有多家五金商店，我想起来应该给我的自行车换一个新车筐。我的书包一天比一天重，上次那个车筐才换了不到两个月，底儿就被书包撑漏了，这次换一个车筐，它要是再漏，我就考虑要不要在自行车前绑上个铁桶搁书包了。

下午到学校，我就这么坐在课桌前，书也没掏，六神无主，心慌得厉害。我既担心自己没有像别人一样，在上课前看看书，又担心看了书也是白看。我这样心慌也许是刚才骑车累的，我强迫自己把政治书拿出来。右边同桌拿走了我的书夹，不停地往他那张睡得鼓胀的肉脸上夹，我还不知道他

有这样的自虐情结呢。看着一个人把你的东西往他自己的器官上乱按乱戳，总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我说：“你别夹了，再夹我就要把这夹子送给你了。”他把夹子扔过来。他的举动把我气得发晕，他不论把什么东西还给我都是这样“咚”地扔过来的。很多人都不在乎自己的举动给别人造成的不良心情，可是我在乎，这真要命。下午第一节课讲政治讲义，这个同桌没有把讲义带来，我只好和他一起看我的这一份。事实上他下午什么都没带，不止是政治讲义，他连大脑都没带来，上面老师讲着题，他就开始昏昏欲睡，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和一个已经睡着的人看同一份讲义，这样实在可笑，而且眼皮底下有一个老是上课睡觉的人，对我来说在算不上是什么激励。我刚要把讲义抽回来，他就醒了，于是他把讲义往自己面前拽了拽，这样一来我只好把头伸得像只长颈鹿似的，免得看不到讲义上的题目。就这么着，我一直等到下课，铃一响我就跑出去喝水，回到教室看见班主任正在发信。他手里有一大沓信，我想起DD应该给我来信了，可是我尽量不往这上面想，有些事情你要是不去想它，它就会主动找上门来；你越是想它，它越是躲得远远的。班主任扔过来一封信，但是没有扔在我面前，左边的那个同桌把信拿起来，看了一眼，带着失望的表情把它递给我，是DD的来信。

我把DD的信又看了一遍，折好，放进抽屉，马上去上晚自习。有很大一会儿路上没什么车，突然身后一声长鸣，吓得我心惊肉跳，是一辆大卡车。它从我身边擦过去，我被灰尘裹得严严实实的，好不容易才狼狈地逃了出来，灰头土脸的。到了学校，锁车的时候才发现我的钥匙链上还有一把铜锁，就

是家里的那个专门放我的日记本和各种我不希望别人看的东西的抽屉上面的锁，抽屉里面还放着一些试卷。我爸以前翻过我的东西，只有一次，可是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他肯定看了我的一些东西，但我不能确定他看到了什么，他不动声色，我也没有说什么，希望今天我的抽屉他不会翻。

我上着数学课，老师讲着一道反函数题目，我一个劲儿地点着头，凡是在课堂上把头点得最欢的人，肯定都是根本就搞不懂的人，我就是个。我之所以点头，那是因为我需要通过连连点头让自己相信我懂。他往下讲着另一道题，我开始走神，接下来就犯愁了：下周月考，9号月考。我把数学书打开，上学之前我把DD随信寄来的书签夹在数学书里，这张书签正面是一副仿古山水画，背面配的却是一首现代诗，读起来很清浅，也还不错。我看了又看，最后越发感到爱不释手了。

10月6日

秋天里，没有比下雨更让人高兴的事儿了。昨天晚上一场大雨过后，花园里的植物紧紧地挨着，正要变黄的叶子因为获得了充足水分的鼓励，又变绿了，叶片又大又亮，看上去像夏天里的一样，只是夏天的天气没有这么冷。我穿上一件稍厚的外衣上学去。前些天因为天气干燥而显得生硬的空气，经过一场大雨的过滤之后，重又变得清新起来。野生植物的浓烈气味混杂在空气中，令人稍稍有些头晕。我的眼前闪过一道黑色的光，那是一只燕子，贴着地面迅疾地飞过，就像一把熟练的剪刀裁剪着湿湿的空气，可是现在是秋天

啊，燕子为什么没有飞走呢？

刚开始上课，右边的这位同桌就开始把头搭在胳膊上，看来他准备再睡一会儿。他这种半睡不醒奄奄一息的样子对我的情绪一直影响很大，我特别希望月考过后能调换座位，可是我又能调到哪儿去，怎么着也要坐在教室里，真叫人无法可想。我闷声不响地坐在教室里，在这个人人都硬化板结了的鬼地方，我可以刻骨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异类。打了个哈欠。这堂外语课安静极了，高三的课昨天已经全部上完，今天开始正式复习，从高一第一册开始。我带来了一个空笔记本，但是没有什么要记下来的，很简单的课文，可我老是觉得我应该做点儿什么才对，好像有一些事情，我本来应该做的，不幸的是我把它忘了，我知道应该去做却无从下手，于是我就这么想呀想，实在想不出来到底忘了要做什么事情，于是我就牵肠挂肚地坐着，上着课，但是心里因此而投下了一道不能抹去的阴影。事情是很多，政治要背，数学要做，可是肯定还有一些更加隐秘的事情让我这么坐立不安。我念念不忘，又想不起来，于是我一刻也放不下心来。我拿出拍纸簿，把我能想到的一切事情事无巨细地一一列上，我想这样也许能缓解我的不安，也可以借此理清一下我的思路，要不然我马上就会沮丧起来。我把事情罗列完了，对着它们一一分析，可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严重事件，到底是什么把我搅得脑子里乱蓬蓬的没法收拾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我悬着一颗心，又开始揣摩起来了：难道是月考？一定是它了。老实说我相当害怕月考，但是我并不是害怕月考本身，而是由它带来的那种恐惧。我是在猛然间才想到月考是造成我焦虑的原因的，这就让我越发感到紧张，就好像是追杀你的凶手突然出现在面前一样，这真是恐怖。我静止了，

我的呼吸开始滞缓，身边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样可不行。我渴望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碰一碰什么东西，这样至少能够让我被重新拉回到现实中来。我把右手费劲地抬起来，准备把它放到桌子上，碰一碰冰凉的文具盒，这样至少会让我恢复些许真实的感受。我正在做的，是要把我通常的焦虑和紧张重新找回来，就像一个固执的老头儿一样，宁可葬身火海，也不愿意离开他的破房子。这种经常性紧张的感觉已经成为我存在的基本感觉，我除了依赖它，不可能有其它替代物。就在我伸出的右手快要碰到文具盒的时候，同桌醒了，他睁开一只眼睛，观察着我，好像我在施行巫术似的，我费劲地朝他咧了咧嘴巴，表示友好。他摇了摇头，拽过我的外语书，说：“讲到哪儿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有时我还得感谢他一下。“我也不知道。”说着，我就把我的书从他手里拿了回来。

电话铃响了。是DD打给我的。“你现在人在哪儿？”我问她。

“在学校。”

“在什么学校？你学画的那个学校还是现在的学校？”

“当然是学画的学校了。”她懒洋洋地说着，像是在热带海滨的沙滩上给我打电话，她总是能让我的想象力马上丰富起来。

“10月1号那几天你怎么不回来啊？”

“我不能回去，有一个星期的写生课，这个学期我就要学完了，马上就回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11月？”

“不是，怎么可能那么早，大概是明年年初吧。”

“那你怎么能说‘我就要回来’，你怎么一点点时间概念都没有啊。”

“就是快要回去了嘛，不就还剩两个多月了吗？你现在怎么样？”

“就这样，你又不是不知道上高三是怎么回事儿，我要是告诉你我早上起来背书，上午听老师讲课，下午做数学题，晚上熬夜整理讲义，偶尔还会写写日记这些事情，你大概就没有耐心捧着听筒往下聊了吧。你呢，你学的怎么样？”

“就这样呗，说不好。”DD一直在挤牙膏似的说话。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什么说的我就挂电话了啊！”

“好哇，人家大老远的给你打一个电话，没说两句你就要挂电话，好啊你。”

“那我问你怎么样了你为什么 not 回答我，是不是在那边，嗯嗯……”

“什么啊，没有的事，我就是学画，其它没什么事，就这么一天一天混日子呗，我能有什么事情。”

“反正你现在无论怎么说也算是一条腿搁在大学里了，高考对你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你也一样，你是班里前二十名。”

“我和你还是不太一样，你是考艺术类专业的，把握比我大许多。马上我们要月考，9号月考，你要不要回来考一下试试？”

“还是省省吧，考试这玩意儿我可不稀罕。”

“还有，你下次给我写信，不要用学校的地址了，班主任现在不希望我们写信。”

“难道他还能没收学生信件？”

“你以为他不敢啊。”

“他敢！”

“你这两个月不在学校里上课，好像整个儿人都变得不知道高中到底是什么样子了似的，你倒是给我说说看，班主任他有什么不敢的。”

“那我以后怎么给你写信呢？”

“算了，你就不要写了，反正你两个月才给我写一次信，还是不要写的好，省得我天天往办公室里跑，还提心吊胆的。”

“你真不要我写？”

“你要是实在想写，我也不拦着你，你可以用我家里的地址，你知道吧？”

“不知道。”

“都写在刚给你寄去的那封信里呢，再好好看一遍，我不重复了。”

“那好吧，你也写给我。我不强求你什么时候写，你有时间就写。”

“行行，我想起来就写。”

“我要挂了，电话卡快没钱了。”

“你总是在电话卡快要没钱的时候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没有，哪儿的事，不就这一次吗？”

“好了，挂电话了。”

我仍然举着听筒，没挂电话。我有个习惯，等到对方先挂了电话我才挂。DD知道我这个习惯，我在等着她挂上电话，可是她那头没有动静，我听见有个女生在她旁边催她走，DD正在那头跟我较劲儿呢，也许她正在笑，真的，电话

里传来了笑声，就像你在深深的林莽之中跋涉，突然看见有个老朋友正在小路上等着你似的。我说：“哎，我可真的要挂了啊。”

“好吧，真的挂了，你也要打电话给我，再见。”电话里一阵咔哒的响动，她把电话挂了。

我握着听筒，觉得眼角处好像闪动着一个人，我转过脸，那是大衣柜的镜子里我自己的身影。我把听筒放好，凝视着镜子里的人影，屋里灯没开，没有光线，只有我的一双眼睛，它们正在镜子里闪闪发光。

刚才DD的这个电话给我一种奇怪的印象，好像我不是在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打电话，而是和一个已经上了大学的同学打电话，这个想法让我感到有些惶然，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可没有这种想法。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成了一个高三复读生，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寒心，我知道要是有了第一次复读，那么，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就这么一直复读下去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我实在不敢想象，一个人要是就这样永无止尽地上着同样内容的课程，就这么成年累月地补呀补，一直补到老师在讲台上讲完上一句话他就能把下一句对出个八九不离十的地步，那他还有什么好活的，生活对他来说已经了如指掌，所有的题目他都会做，所有的老师一张嘴他就知道要说些什么，那真是一种可怕的生活。不过，老师也许会一茬一茬地换，身边的同学也会一批一批地走，除了这么一个人，他的年龄差不多已经赶得上自己的老师了，可他还在补习、补习、补习，一副不考上大学誓不罢休的姿态——希望这个人不是我。我伸出手，狠狠地敲敲脑壳，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走向里屋。

10月7日

“这篇文章很好，写得很有文采，下面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堂语文课写作文。和往常一样，老师会把某个人上一次写得好的作文在班里当众朗读。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从来没有一个语文老师当着我们的面详细地分析一下，他认为一篇文章到底好在哪儿，不过就是那些老掉牙的评价：“很有文采”，“有才气”。我不是说他们词汇贫乏，要是词汇贫乏，恐怕连“文采”这种高度概括性的词儿他们都想不出来。有时候，使用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词汇恰好能掩盖一个人的无知，另一方面又能显示出他是多么专业，语文尤其如此。老师一开始用“很有文采”“才气横溢”这些词儿介绍这篇文章，我就十有八九猜出来那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文章，我对这些小情调小感慨的东西一点儿都没有兴趣，这些作文表面上看是精致，其实就是迟钝。要想真正严肃地写作，你就得和文明的禁忌作面对面的斗争，迫使它转变态度，迫使它更加注重人的感受，消除或者减轻生活中种种不合理的被动性，像那些迎合考试、迎合大众、迎合语文老师的“有文采”“有才气”的东西，写出来有个屁用！

我打开刚发下来的作文本，里面有语文老师写的很多评语，划横杠的地方，写着“思想偏激”；打括号的地方，“要把这一段划掉”；最后还有一个感叹号，后面接着来一句，“一定要点明中心，不能草草收尾。”我可怜的三页作文，被涂改得像个垃圾填埋场，看了就让我丧气。我不反对老师在我的作文上划呀划，可是我一直对别人说我“偏激”耿耿于怀，是这样的：你还来不及辩解，一棍子就落到你头上，把你打得晕头转向。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压再简单不

过了，而且他们自认为是道德和文明规范的捍卫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随时随地把你打一顿。我倒想领教一下所谓的“不偏激”又是什么好东西，我一直把那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前面加上“所谓的”三个字以示怀疑，像习惯、经验和道德等等。

右边的同桌改变了通常的睡眠方式，前些日子他上课睡觉，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乍然坐起来，瞪着眼睛问你“课上到哪儿了”，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突然倒头大睡起来。今天他改了习惯，他开始半闭着眼睛睡觉，眼睛就这么合上一半，侧着头，要是运气好你还能听到他打鼾的声音。我是突然注意到他这样半闭着眼睛趴在桌子上的，然后马上就明白了他仍然是在睡大觉。可我不能确定他在睡觉的同时是不是也在用半个眼珠子看着我，我扭动着身体，最后实在忍不住，捏着圆珠笔，在他眼前晃了晃，就像试验一个人是不是死绝了似的。他马上睁开眼：“你干吗，要不要我送你一刀？”我说：“你这样睡觉，我总觉得被什么东西盯上了，劳驾你还是像原来那样趴着睡好不好？”“我不睡了行不行？”他说着就撑着胳膊坐起来，又伸出双手，猛搓一把脸，看得我心惊肉跳，然后他把一只手插到后颈窝里，狠狠地抓了一通，接下来他就抽回手，开始从头顶往脖子里摸呀摸，也许摸到了一颗粉刺，停了下来，着手抠起来，抠完了还放在眼皮底下意犹未尽地仔细看看。我越来越觉得教室里面不能再呆下去，可是离下课还早。在学校里，你遇上的人不会比其它地方的更加文明，要说他们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因为学习紧张，抽不出身来杀人放火，于是只能做做这些小事情来使自己的低劣情趣得到满足。

今天轮到我值日。班主任要求班里两天扫一次地，一次四个人值日。下午放学后，我刚开始扫地就感觉到有一个人站在教室门口，大概是学校派来监督打扫卫生的检查员。我没有抬头仔细看，只是一个劲儿地扫，因为我想早回家，我就这样一直把灰尘垃圾废纸头扫到了前面，那个一直在巡视的人也不闪开，我抬起头，这才发现他原来就是和我同一个组的值日生，另外两个在后面一声也没说，大概是不想得罪他。这家伙可真有定力，看着其他人在下面扫地，自己连动都不动，他没有逃掉就算还有一点儿良心。我恼火地说，你去提一桶水来，洒一下水，行不行？他说，我不洒水，我倒垃圾。那好，我说，那就把这一堆给倒掉吧。我转过身来，挥了一下手里的扫帚，说，你们慢慢干，我先走一步了！两个在后面扫地的其中一个哼哼了两声，好像不满意我先走一步，可是我已经干完了，而且我不想被拖累。在这个时候我回家都有点儿迟了。我拿过书包，看了一下墙上的钟，五点四十五分。我不能回去，要不然晚上赶不上上课。我到操场旁的水龙头那儿简单地洗了一下，出校园找个饭馆吃东西。我可以去馅饼店里买几块馅饼，我想起开学那天DD和我一起到学校来报名，就在那家馅饼店外面，她问我要不要吃馅饼。出了学校大门，今天天气当然没有报名那天热，而且要干燥的多。早上下了一场大雾，可是散得太快了，雾气能让你在上学的路途中感到一切都无比亲切，秋天里缺乏的恰恰就是亲切感，所有的东西都干巴巴的没有灵气，所以我不喜欢秋天。我身边不时有一些骑车回家的初中生掠过，他们下午放学向来比我们迟，因为他们有时不上晚学，所以就拖堂，但是初三今年也开始上晚学了，想着也让我庆幸：我要是迟出生两三年，就会赶上在上初三的时候上晚学。

我进了馅饼店，里面热烘烘的，两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也跟着进来了，“我要两块甜馅饼，苹果馅的。”

“我也要，我也要。”他们俩一个劲儿往前挤，嚷个不停。我后退了两步，其中一个小学生伸手就往柜台上的托盘里摸，托盘上是刚刚烘好的热馅饼。他的手又脏又小，像乌龟爪子似的。他这么一摸，那些馅饼不是他的也该是他的了。他俩一直在尖着嗓子不停地叫，吵得炸人脑子。我转身出去，柜台后面的伙计连忙问我想要什么，我说，本来想吃点儿什么的，突然想起来我已经吃过了。他煞有介事地点点头，我只是随口开个玩笑，没想到他这么认真地思量，有些人不懂得开玩笑。我现在没有胃口吃东西，还是回班里坐着去吧。

我在做历史习题集的时候碰到这样一道选择题：阿房宫是在秦始皇生前建成还是在他死后建成的。课本上找不到答案，我不用翻开课本就敢肯定地说，因为我已经把课本背得烂熟。我不明白干吗要出这种题目，你要是乱戳戳对了，就能多得个三五分，要是瞎猜猜错了，就会被扣掉三五分，这是从分数上讲的，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一点点实际意义。历史课本，要背，我背了，而且背得滚熟，这还不够，因为他们还觉得这样不过瘾，他们还要叫你说一说阿房宫是在秦始皇死前还是死后完工的。秦始皇到底有没有住上那个宫殿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整个人类又有什么关系，可是你要是选错了，你就得被扣分。在分数面前，你有多大的本事也得服气。

我咚咚地快步下楼，不知道为什么，学校的楼道里总是有一种齷齪的气味，腥气和下水道的的气味，还不止是这些。有人在后面叫我等等，是WX，他说：“走这么快干吗。”放

学快跑是我的习惯。“有什么事情吗？”我下到最后一级楼梯，在楼道出口站定，转过头来问他。

“没事就不能叫你玩？”他赶了下来，站在我旁边，他明显有话要说。“下周我过生日，你来不来？”

“除了我还有谁？”

他说了几个人，我大都不认识，我说：“我要是这次月考考得好我就去，不好就不去。”

“怎么啦？不愿意来还是怎么的？”

“我没有说不愿意，我是说这要看情况。”

“那好，随便你，我通知了，来不来随便你。”

“那我先走了。”已经有好些人从楼梯口冲下来，从我身边跑过去。我往存车处走去。我确实是不想去，去年WX过生日也叫了我，我去了，前年也是，但是今年我不想去，我感到自己变了。有些事情我越来越不在乎，比如这些东西。我想我要是去了，很可能比不去还要扫兴。我已经和以前的老同学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我变化很大，我早就有变化了，只是这一年，我不但变化了，而且更加愿意把我的变化表现出来。

10月8日

昨天晚上满天的星星没有骗人，今天果然是一个大晴天，也许这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有一个通知也许应该当作大事记下来：明天的月考取消了。班主任在上外语课之前通知了一下，全班哗然。他眼看着局势失控，马上又来了一句：“我只是说暂时取消考试，并不是说不考。其他两个文科班

的课程进度比我们班慢，就得等着他们上完高三课程以后才能统一开考。”“什么时候考？”下面有人壮胆问道。“你们不要管什么时候考，好好复习，到了该考的时候就会考。”下面有人叽叽咕咕，考试的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迟又增加了几分，教室里的气氛显得慌乱异常。班主任又来了一句：“时间就是金钱，大家一定不要小看这次月考，要在剩下的几天里抓紧复习。”时间就是金钱，这话听上去怎么这么耳熟，可我又不是拿时间来做生意，为什么我非得要把时间看成金钱？时间就是金钱，嗯，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说法，看来就连老师也把教育当成一种经济活动了。

我等这场考试都等怕了，我被迫为考试的到来制定了计划，就连吃饭睡觉都围着考试转，现在上面一句话，“考试推迟，”于是它就推迟了。好像在有些人眼里考试只不过是考试罢了，可是对我来说，为了应付一场考试，我得打乱我的整个生活去迎合这个怪物，这真是恐怖。我还得等，不知道还要等到猴年马月我的生活才能重新复归平静。高三学生想要平静下来简直就是胡扯淡，接下来的考试肯定会越来越多，我就等着整天在考试的淤泥中打滚吧。

我出去买了一支圆珠笔，在上第二节课之前回到教室里。我进了班，就这么站在课桌前，不是我喜欢站着，而是因为我没法坐下：后面那个家伙把他那两条长腿直挺挺地伸进我的凳子下面，他双目呆滞，一脸木然。我带着请求的眼神转过头来看了他一下，意思是要他把腿抽开，免得在我坐下去的时候，我的凳子把它们压断，可是他无动于衷地盯着前面的什么东西，好像没有看到我，这就让我反省自己是不是在哪儿得罪了他。好像没有。像他这样不知道在乎别人的人我见得多了。我鼓足勇气说了一句：“你的腿！”他这才

像个被小厮吵醒的官老爷似的，以一种叫人相当恼火的姿态慢慢悠悠地撑直了上身，表情呆板地看了我一眼，终于把一双“玉腿”缓缓收回。

我坐了下来，眼球底部的神经不住地震颤着，就像我在早晨上学的路上那样，我的这种感觉说来就来。我上午来上学，在一条小街上克里克朗地骑着我的自行车，我是在无意之中把车骑上这条街的。平时我上学，都是以麻木不仁的态度随便走一条固定的路线，不需要任何刻意的选择，因为任何选择都只不过为了到达最后一个该死的目的地。这一次我稍微主动了一点，也许是天气好，也许是预感到了月考将要推迟，于是我自做主张地把自行车骑上了这条小街。一上这条街我就后悔了：它简直就像刚刚得了一场天花，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碎石头和坑坑洼洼的小洞小坑，我在这条瘢痕遍处的街上跌跌撞撞地骑着车，车子发出一阵强过一阵的抗议声。随着我的骨架的震颤，我的脑神经也在震颤着，眼球好像就要被颠出来了似的。让我感到越发难办的是，还有不少上班的人从这条路上走过，我被坑洼的道路颠得心里一阵阵发紧，还得小心地避让毫不在意的行人和车辆，真不知道他们都是怎么忍受这条破路的，这真是一种痛苦。我现在坐在座位上，感受到的这阵突如其来的眼球底部的震颤，和早晨上学路上感受到的一模一样，紧张的震颤几乎成了我对生活的最基本的感觉。我把刚买的圆珠笔从口袋里拿出来，想试试写几个字。找不到草稿纸，就在课桌上写了一下，然后找抹布。我的抽屉里有一块抹布，前些天从家里带来的。我伸出手，在抽屉里摸呀摸，摸呀摸，奇怪。我站了起来，把课桌侧过来，好看清抹布到底在哪儿。没有。我泄气地坐下来，问左右有没有看见我的抹布，没有人说话，我本来也没

指望谁告诉我“某某拿了你的抹布”。我火气冲天，把课桌里碍事的书包拽出来，斜过课桌，再一次对着亮儿把抽屉看了个透遍，还是没有。我悻悻地骂了一句：“到底是哪个混蛋拿走了我的抹布也不说一声，难道把它吃了？”我气昏了头。

这时右边的同桌一反常态插话了：“你这样骂人很不应该。”

我吃惊地看了他一下，他表情严肃地看着我，我开始为自己的那一句骂人话感到脸红。我别别扭扭地说：“我只是急着要用抹布。”

他说：“就算你急着用抹布，也不能随口骂人。”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开导犯错误的学生的小学老师。我没有吭声，只觉得他这么说很在理，可是刚一坐下我熄了火的大脑就转过了弯儿来，我说：“哎，你什么意思，教训起我来了。我问你，抹布是不是你拿的？”

他说：“就是我拿的你也别想用了。”

“怎么了？”

“抹布在讲台上，我今天值日，拿你抹布擦黑板，用完了还给你。”

“你倒是很有集体主义精神，”我哼了一声，“下次拿我东西告诉我一声，免得我再骂你。”我在说话的时候清清楚楚地闻到一股皮革的气味，我说完了话，他也不再说下去。可是这皮革的气味越来越重，我要求自己千万不能四下里看：要是我能发现这气味的来源，比如谁穿了一双新皮鞋什么的，那还很好，要是找不着这气味的来源，我的心里马上就会产生挫败感，我太了解自己了。我重新拿起新圆珠笔，开始抄历史问答题。

我骑着车回家，刚出校门心头一紧，因为自行车后面被重重地颠了一下。我回过头来，是GR，“往前骑！”他坐在后面拍了我一下后背，说道。“你想到哪儿去？”“我哪儿不能去？”他一句回答把我弄得哑口无言。“那好吧，”我说：“就把你带到我家里去。”于是我就开始骑车。GR住校，我经常看见他放学后到外面吃午饭。学校里的食堂，苍天，谁都知道是什么样子。前面有个女生，她背着书包，拎着一把折叠雨伞。今天预报有雨，可是只有女生才会不怕麻烦，雨还没下就拿着伞在上学放学路上来回走。GR把胳膊伸得老长，在我经过那个女孩身边时，他开玩笑地拽了一下她手里的伞，过后他在我身后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在我想着他为什么不说话的那会儿，他开口了，说出来一句话差点儿把我笑死：“刚才那个女生，我不认识。”我说：“你不认识干吗要拽她一把。”“我看错人了。”说完他就从后面跳下来，要我和他一起去吃午饭。“那怎么行呢。”我说：“你中午多吃一点，就算是把你请我的那一份也给吃了，再见。”我看见WX在前面骑车，就赶快去追，突然想起来他要过生日的事儿，于是我放慢了速度。我明天会托人送他一本书，不管他看不看，可是我肯定不愿意去。他骑车带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大概是他班里的同学，那人转过头来看了我一下，他面孔就像一张苍蝇拍子，细长而有韧性的脖子就是拍子柄儿，看上去是个精豆子的模样。我想了想，还是不过去的好，于是就上了另一条路。这条路很窄，一辆猪肝色的中巴车，它的每一块零部件都在支棱着，气喘吁吁地驮着一窝人，晃里晃荡地在前面挡着道儿。我把车推上人行道，绕了过去，到了P大街那儿又不得不转回来。那条大街正在整修，也就是补一补坑坑洼洼的地方，我总觉得有很多公

共设施都是在修修补补、敲敲打打地凑合着能用且用，叫人看了不干不净的样子。无论公路再怎么修，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还是擦不掉那种乡间小道的影子，大概这就是不发达的一个特点吧。

10月15日

这次月考没有排名，据说是上面要求学校先不要排名。我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不免有些奇怪。根据我的观察，全班好像没有一个人因为月考不排名而手舞足蹈，这再简单不过了：我们早已习惯于考试排名，现在不排名，反而让每个人心里产生更大的不祥之兆。一条鱼要是在咸水里生活惯了，现在突然把它拎到淡水里去，对它来说肯定不是舒服事儿。

晚上是政治课。外面雨很大。我抬起手来，看了一下表，六点半。我把口香糖塞进嘴里，急匆匆地套上雨衣。雨衣不透气，穿在身上很闷。我在出门的时候把口香糖吐了出来，那是一块肉桂味道的，让人更觉得燥热难忍。我推着车子，一阵狂风把雨衣的下摆掀起来，差点儿遮住我的脸。雨衣上滴落下来的水弄湿了我的裤子，脸上到处都是雨水，不过我倒觉得这样很不错，我就喜欢被大雨淋湿的感觉。马路上人不多，有个学生模样的人，在我前面骑着车。他很自觉地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让了个道儿，让我大受感动。当我就要从他身边骑过去的时候，才发现他这么做不是要给我让路，而是要给前面一块巨大的石头让路，于是这块石头就冷不丁地横在了我的面前。如果我骑车不是非常警觉的话，那么今天晚上就没有福气到学校上课，而是躺在医院里了。

我折好雨衣，鞋子啪嚓啪嚓地踩着水。这样穿着半身湿衣服坐在教室里，肯定不会比在大雨里舒服。

今天政治老师不太高兴，本班政治月考总成绩在三个文科班中最后一名，他在刚刚上课的时候已经向全班公布了政治考试情况，也就是明确地向大家表示了他对这次考试成绩的恼火。既然老师不高兴，那么学生当然也不会很高兴，这就像皇帝死了宠妃大臣也得挤几滴眼泪以合时宜一样。虽然我们并不为这次考试感到太难过，可是看着他在讲台上面板着脸，你无论怎么样也不敢放肆地露出笑脸。这堂政治课显得特别漫长，政治老师已经连接着叫了八个人回答一道看上去好像永远也不会有正确答案的多项选择题了，当第三个人被老师叫起来的时候，班里的气氛明显变了，人人自危，谁都不知道要是自己被叫起来该怎么回答好。那些站起来的没有一个被示意坐下。老师还在叫着，叫一个看上去合他意的，或者叫一个看上去不合他意的。好多人一动都不敢动，就像一只觅食的老鼠迎面碰上一条大蛇，由于预感到大祸临头，在原地愣着，只有惊恐的份儿，只等着被大蛇一口吞下去。我真想马上就打下课铃，只有铃声才能阻止这种奇怪的气氛继续蔓延，阻止这个拙劣的把戏继续演下去。我低下头，看了一下脚上的运动鞋，鞋面看上去已经干了，可是里面仍然湿漉漉的。我想回家——突然间，我愣愣地想出了这么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在课堂上毫不遮掩地冒了出来，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学生。可是我真的想回家，而且马上就回去，不仅仅是因为这堂气氛变得叫人难以容忍的政治课，也不仅仅是因为脚上的这双湿漉漉的运动鞋。只是因为，我想干一些我真正想干的事情：我想回家，坐在写字

台前面，写一篇日记，抄一抄诗。现在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在这间教室里呆下去了，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呆下去的地方。我不能忍受这里的窒闷空气，我不想看见他人的眼色，我需要一个人。只有自己一个人，我才能开始独立地思考，而面前的这种气氛和我希望的刚好相反，它扰乱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打断了我生活的脚步，让我老是在做一些无用之功。

“你们都是怎么搞的，啊？”政治老师还是头一次发那么大的火：“都给我坐下！不单单是你们几个，全班都有问题！我上次不是讲过这道题吗，怎么一眨眼你们就忘了，你们都不长记性还是怎么的？我这次再说最后一遍，下次考试再遇到这道题，如果有人还是不会，有他好看的。”和所有人一样，我这道多选题也做错了。我低着头，对着课桌眨了眨眼睛，好像和我的一个小同谋私下里偷偷交流似的。是啊，为什么不长记性？可是这句话为什么不能这样问呢：“为什么要长记性？”我觉得记性这东西，它大不了就是用来记一记门牌号码呀什么的，犯不着把它太夸大。可是记性这东西确实被看得太重了，就连那些电视晚会，都经常把五分钟就能背下来一本电话号码的奇怪人物拉去做节目。让我想一想：在什么情况下，记忆才会被人如此看重呢？大概就是在所有的人都不能主动地去思考的情况下，记性这东西才会大行其道。道理很简单：很多人都习惯于、或者说都需要被告知什么是什么，什么又不是什么，于是他们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记忆。而且是非常可靠的记忆，你记下来的是什么，你就会不加思考地去照办，这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强大而可怕。我不是那种记忆型的人，我并不是因为标榜自己不同于他人而显得前卫，我并不是为了反对什么而去反对什

么，我一向避免的就是让自己陷入那种荒唐愚蠢的前卫姿态之中。前卫、先锋，这些词语都是对那些本来是积极的行动的商业化的称谓，它们原来的含义已经被改造了。我呢，更愿意做的就是找出这个世界明显不合人道的地方，我热衷于不时地跳出文明的圈子之外，好好地看一看它的腐烂的一面，就在圈子里面的人想把我抓回去的一刹那，我会自觉地马上跳回圈子里去，让他们无可奈何。我就喜欢像一只小猴子，跳过来跳过去，这样冒险，感觉也不错嘛。

10月18日

自从雨停了之后，这个早晨是第一个大晴天，天空离我那么贴近，好像空气都是淡蓝色的，不过大街上的空气的确已经成了淡蓝色的：汽车正在跟行人抢着呼吸，它们把令人厌恶的蓝色尾气到处排放，我在往学校去的一路上，简直就像忍受着被人掐着脖子般的痛苦。前面有一队穿着演出服装的小学生，在烟尘滚滚的大街上排着队往前走，刚才在另一条马路上我看到还有一队同样穿着演出服的小学生，大概有什么活动。有两个女老师在队伍旁边跟着，她们把脸和嘴绷得紧紧的，腰杆挺得笔直，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

后面那个女生老是在吱吱歪歪地催着我右面的同桌上前去擦黑板，今天轮到他们那组擦黑板。她在后面催得太勤连我都嫌烦。我的同桌今天脾气真是一反常态地好，一声不吭。就在我快要受不了这个长嘴婆的聒噪，准备回头劝她别再叫唤的时候，同桌狠狠地扭了一下后背表示抗议。这个女生确实有点儿不识时务，还是在催个不停，我看得出同桌十

分为难：只要她不继续催促，他马上就会去擦，可是她就是不知道停下来，于是他就犯了牛劲，坐在那儿死都不去擦。就在她催得很紧的当儿，同桌猛然大叫一声：“你给我滚！”她吃了一惊，我也一样，然后很多人都往这边看了过来。我开始看我的历史书，这事儿我可不想掺和。后面那女生哭了，真叫人揪心。我的同桌看上去一点都不为之所动，确实很有骨气。我用眼角观察着他，他这副冷冰冰的样子着实叫人害怕，他应该把这副表情拿去申请形象专利。我说：“哎，老师在门口呢，去擦黑板吧。”他还是一动不动，下面的事情就不是我应该插手的了。我扭过头去，看着操场，预备铃刚刚响过了，操场上还有那么一两个人在没命地奔跑着。嘿，那不是我初中的老同学嘛！原来他也在这个学校上学啊！不对呀，我这几年怎么一直没看到他呢？他也许是今年上高三刚转过来的。我一直不知道他人在何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以为他死了呢，看来没有我料想的那么严重。他是什么人，初中时全班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你要是不小心得罪了他，他能跑到校外叫人在放学路上布置好了八卦阵等着你；要是你不知情跟他的某个他自己心中内定的女友讲了两句话，他一准要把你车胎给捅成马蜂窝，连高明的修车师傅都会劝你“再换一个胎吧”。他像兔子似的正往后面B栋教学楼里跑，他染着一头黄毛，看上去混得不错，当然混得不错的不一定是像他这样的混蛋，可是混蛋们在这个专门为混蛋开路的社会里总是个个都能混得不错。同桌已经把黑板擦了，他正在往回走，老师进来上课，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到座位上坐下，班长就喊起立，于是他就像木桩一样在课桌前站着，等着周围的人站起来，这样使他看上去很好笑。

上了高三，家在我的眼里已经成了一个仅仅能够用来吃饭和睡觉的中转站，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则是学校那个混乱的所在，父母也就成了每天和我打三次照面的陌路人，有时一天还不一定能看到三次：早上，大多数情况下能看一眼；中午坐在一张桌子旁闷声不响地吃午饭；下午放学，偶尔见面；晚上十点半，只有声音从他们的屋里传过来：“牛奶鸡蛋给你准备好了，在厨房里。”每天都是这样，我甚至不知道我这样忙活究竟是怎么了。我现在正骑着自行车，要去一个叫做“家”的地方吃一顿饭，下午还要回学校上课，现在的情况肯定不能说成是“去上学，然后回家”，应该把主次分清，这样说才正确：“去一趟家里，然后回到学校。”我进了家门，中午有人来，是爸爸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肯定不是我的朋友，不过一般而言，我自然会乖巧地喊他们叔叔伯伯。今天这个叔叔带着一个小孩，大概是他的儿子，至少按照我的眼力，他们看上去长得很像：一个鼻子两个眼，眼珠子还都是黑的。我是在进了自己的房间之后才知道爸爸的这个朋友还带了一个小孩来的。一个五岁大小的男孩，正在爬高上梯地坐在我的写字台上，一手搂着我那被他据为己有的亲爱的糖果盒，另一只手正在剥糖。区区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儿能作出这样的高难动作，也真是难为他了。我走过去，把放糖果盒的床头柜大开的柜门给关上，顺便也想和他讲讲话。“你吃。”我关上柜门抬起头来的那会儿，他把剥好的糖远远地伸过来，小黑手紧紧地把糖块攥着，看不出一点要给我吃的诚意。我一个大人，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剥夺一个小孩的劳动成果呢。我说：“我不吃，我不饿。你吃吧。”其实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劝，他已经不客气地把糖塞进了鼓鼓囊囊的嘴里。“我不饿”——这话是我刚才说的吗？我早晨

没吃饭就往学校赶，第二节课就饿得前胸贴后背，现在肚皮已经快要被胃酸烧穿，可我还嘴硬，说“我不饿”，其实已经饿得简直能把眼前这个小孩一口吞下去。我愣了一会儿，看着眼前的孩子，突然发现自己一点食欲也没有了，大概是突然看见了这个男孩的小黑手。我咂咂嘴巴，嘴里面有一种奇怪的味道，我在上午上完四堂课之后，嘴里面经常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古怪气味。我连忙从书包里掏出一条口香糖，趁着吃午饭之前爽爽口。

“那是什么？”小孩尖声尖气地问道，他一点也不怕羞。我没想到他手里抱着那么大的糖罐子，还能对我手里区区一条口香糖有意见，真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好小伙子。“毒药。”我说。“给我看看。”看来就是毒药也挡不住他的兴趣。他说着就要从写字台上撅起小屁股想跳下来，我连忙上前去把他抱住。我很想知道一个半米长的孩子，到底是怎么爬上一米高的写字台的，他的智商肯定不容忽视。我直起腰，环顾四周：床单上有几个老鼠那么大的脚印。

“你手里拿的是什麼？”小孩在地上站稳了，还是不屈不挠地要把我问个明白，我觉得自己快成一个被刑讯逼供的罪犯了。房间的们打开了，是小孩的父亲。他看我们相处不错，就转了出去。

“这是一块口香糖，”我尽量和蔼地告诉他，心里嘀咕着，他要是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宁可一头撞死在墙上。

他爸正在外面当着我爸的面声音洪亮地夸我：“你家少爷面善，我儿子跟他几分钟就混熟了。”

面善，我心里又嘀咕开了：要是有机会，我非得把你这个宝贝儿子打个八五折卖给人贩子不可。这孩子生就一副精相，看了叫我头疼。我把手里的口香糖递给他：“你拿去

吧。”这样的小孩打小就喜欢耍小聪明，你明明能识破他的小聪明，可是还得做出一副爱怜幼小的样子去迁就他，真是很难缠。我收拾好床铺，回头对他说：“你爸就要走了，快点跟出去吧。”小精豆子开了腔，响亮地说了一句话：“我爸说了，今天中午就留在你家。”

苍天！看来今天中午我的中转站里就少不了要增加两个编外人员了。

10月20日

大街上到处都是车，就像一群群蚊子苍蝇，大呼小叫地在你眼前来来往往，挥之不去。我今天从R大街走，早上七点钟左右，只有这条大街上会有洒水车来洒水，因为这条大街两旁是政府大楼和公检法总部所在地，有限资源总是应该得到合理使用，大概也只有在这条大街两旁工作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到洒水的美妙之处。

学校门口刚开张了一家餐馆，有不少人正在外面等着看剪彩，这年头闲人就是多。餐馆旁边竖起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南亚美食，印尼炸鸡，等等等等。这些菜名让我浮想联翩，好像这家餐馆老板刚刚拖儿带女地从那些动荡不安骚乱不断的国家连滚带爬逃出来似的。我看了一下表，还有五分钟上课，便急煎煎地骑快了车往学校冲，好像务必马上把丢了的尾巴找回来似的，这实在可笑。

前些天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生向我借了一本书，大概就是出于打发无聊吧，我刚进教室坐下，她就的书递了过来：“谢谢。”那是一本杰克·伦敦的书，我就是为了照顾到她

的阅读水平才借给她这书的。我翻了一下，她没看，因为书签还在原来的那一页，动都没动。我本来就料想到她要是看小说，大不了就是看一看那种把一小段情呀爱的言来言去的小说。碍着面子，我就借了这本书给她，她没看也在我意料之中。平心而论，女孩子要是不读书，至少不会像男生那样粗野，她还知道对我说一声“谢谢”，哎呀简直把我感动死了！不过没有头脑的女孩倒是很可能奇怪地让你跟着她摸不着头脑：你实在无法准确地判断出来，一个女生，究竟是简简单单地喜欢上了你这个人呢，还是喜欢上了你身上的某种所谓的“能力”，就是你的那种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往上爬，爬到万人之上，并且给她带来荣华富贵的狗屁能力。

我还没有来得及对她说“不用谢”，旁边的同桌就和她搭上了话，这次不是右边的同桌，是左边的，我一直没在日记里提到他，看来今天应该费点儿笔墨才是，否则就太不尊重他了。他老是瞅准了机会找女生讲话，而且酷爱当着众多男生的面这么干，我想他这么做是出于一种很难说清楚的虚荣心。看着他滔滔不绝地跟女生讲话，你心里总会有那么一点儿不是滋味。我收好书，右边的同桌还没来，我不想让书落到他手里，要不然免不了就是一番糟蹋。左边的同桌还在跟前面的女生讲着，越发兴致盎然了，他的胳膊已经占了我的半扇课桌。我在表面上跟他相处不错，事实上我们的关系甚至比我和右边的那位还要严重，男生之间，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因为我们表面上还算不错，所以我拉不下脸来告诉他：“你的胳膊又要把我挤到天涯海角了。”他也比较自觉，看到我一言不发好久了，才领会到我对他的胳膊有了意见，于是知趣地挪了回去。我早就觉得不舒服了，哪儿还有心思上语文课。还好，语文课不是某一个人不想上就没法

上下去的，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捧老师的场子，那么就让我一个人在一边清静一会儿吧。

可是今天语文课我注定清静不下来：考试。这次用的是学校自己出的试卷，就是各种试卷东拼西凑的大拼盘，老师说是“精华”，我倒觉得那是一盆乱七八糟的大杂烩。试卷还是用油墨印刷的，让你一点儿也无法产生对一次考试应有的重视。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油墨印刷试卷，搞得每个人都像1927年的地下工作者似的。满屋子的油墨味，一点考试的严肃气氛都没有。我做着试题，顺带着也在呼吸着空气中的油墨，就这么一连吸了两节课，吸得我头昏脑胀，晕晕乎乎，连老师说下课了我都反应不过来。

别人都出去做课间操了，在教室里坐着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女生和两个男生，那两个男生都在写数学讲义，我也想写。转念一想，有两个人在写就够了，我干吗也要凑这个热闹呢，于是就用双手把脑袋支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桌子上的这支棱形杆儿的细长圆珠笔看着。它躺在那里，看上去好像是静的，又有些动，就在我快要眼花了的时候，恰好有一束阳光射到了笔杆的一个棱面上，如果我稍微动一动，就能看到一条短短的彩虹。就在我来了兴趣，要把它仔细观察一番的时候，桌子突然被人晃了一下，右边的同桌回来了，可是外面还响着做操的广播。“你怎么不去做操？”他把手里的一本杂志往课桌上一甩，气喘吁吁地问我。

上完了四堂课，现在到了回家填饱肚子的时间了。我当然得回去吃饭，这样不至于在下午的课堂上给饿死。刚好在下课铃打响的时候，教室窗户外边有一阵很凉爽的风像水流一样铺洒了进来，这阵风让我简直爱上了这个地方，我不想动弹，可是教室里已经随着铃声嘈杂起来。在有很多人的地

方，你经常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多数人慌张起来，虽然谁都不知道是否有慌张的必要，这让我想起了动物电视片里的一种小螃蟹，好像名叫招潮蟹：它们被潮水冲上海岸，成千上万只，成群结队地往高地上爬去，每一只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大概只是出于一种本能。它们看上去是那么弱小，身体呈现出毛玻璃那种半透明的质地，甚至连循环系统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鸚鸟站在沙滩上，饱食着它们的同类，谁被啄到了，谁就会把小钳子徒劳地当空舞动那么几下，自认倒霉，被鸟儿吞下肚子。大多数招潮蟹，还是在不管不顾地往前爬呀爬，整个场面看上去非常壮观，那是一股由千千万万个卑微的甲壳动物的小生命组成的求生大潮，带着一种壮烈的和无力自我拯救的悲情，循着一条本能的道路，延续卑微的生命。说到底，人也是一样。我拎起书包，在众人的挟裹之下，糊里糊涂地走出了教室。

10月24日

我看了约摸二十分钟电视，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垂头丧气地打开台灯，尸体一般僵硬地在写字台前坐下来。今天是星期天，现在是五点半，马上就要去上课。写字台上的闹钟，这会儿倒是安静，冷冰冰的像个恪尽职守的士兵，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它的秒针在往前走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副坚定、倨傲、不可一世的样子，我恨不得把它丢出窗外；凡是意志坚定的人，大都是和这个闹钟一样，是一些根本没有自己的头脑的蠢货。五点半，要是平常，我在这个时候下午刚刚放学回到家里。我想自己大可不必在上学之前这么紧

张，也许我可以小睡一觉，放松一下，这样也可以缓解星期天晚上上学前特有的紧张感。我先把表定了时，又把闹钟也定了时，这两个报时器哪个最先响起来，我就随着最先响起的那个醒过来。天色还没有完全黑，蓝褐色的。我坐在床沿，低着头，光线弱到看不清自己的手，连空气也滞缓了。我仰起头来，坐在游移不定的阴影中，静默不动。我的脑子里浮现了一个想法：要是我屏住呼吸，悄无声息地，就这么死掉，那该多么好啊。这个愿望实在是太强太强了，我克制着，不要真的试起来。我只是太累了，产生了幻觉，可是也不全是幻觉，我的确开始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我用双手捧住脸孔，好像这样一来就能不至于让自己再沉没下去，沉到一个我不能预见的万丈深渊中去。呼吸在不知不觉之中离开了我，我缓缓地松开手，心中感到一阵狂喜，四周一片安谧；这种万物被排斥在我之外的绝对清洁，让我欣喜万分，这真是一种绝对自由的感受：我好像就在这一刹那间，获得了可以冲破生活的阴霾的力量；我张开双臂，往前走，走，走。

我太累了，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这一时的灵魂出窍，让我在不经意之间找到了抵抗这个狂魔的武器，虽然它很短暂。

我叹了一口气，回过身来，把写字台上的书掳成一堆，往书包里塞，这个书包还是嫌不够大，而今年我已经换了两个书包了。我说现在的这个书包“不够大”，那是相对而言的，这要看你拿它来装什么：如果用它来装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大概绰绰有余，如果用它来装我现在的各种教科书和学习资料，显然就太小了。最后两本书我没法把它们塞进去，除非冒着把书包撑炸的危险。我背起书包，车筐太小，书包肯定放不下，我就把手里的这两本书放进车筐里去。唉，

上学去。我对上学的态度大概就像一个强迫症患者，可是这种病症的产生，肯定不是出于自身的原因，而是出于一种外来的力量；它不是简单的自我强迫，它始于被强迫。

前面这个人看上去是个复读班的补习生，不是我眼力好，而是因为他太有特点了。你知道，高三应届班的人，往往喜欢把衣服穿得乱七八糟的，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造型，他们借此想表示自己蠢得很有些与众不同的味道。而这些补习班的学生，就不像我们高三应届班的人这么招摇过市了。虽然他们还不至于把自己打扮得像文革时期的人那样以示低调，可是无论他们穿着什么衣服，你总是不难从他们的脸上找到那种倒了八辈子霉，吃了一辈子大苦头的典型的中国人的表情。那种饱经沧桑的样子看了总不会叫人振奋。我没有再看前面那家伙第二眼，把车飞快地往学校大门口骑去。

班里正在传阅着刚刚发下来的校报，因为我来的早，也得到了了一份。“高考将有重大改革”，报纸短讯上这样写着，我放下手中的书包，又是大祸临头的感觉：“数学将采取文理科合卷的考试方法”。我心里咯噔一下，不过报上没有写明到底是不是从今年开始实行，大概不会，因为我们已经把数学课本学完了，课本上面那些标注文科不考的章节一概没有学，现在要是上的话，肯定又是一番伤筋动骨，不过要是真的为了迎合文理科合卷，我们文科班把落下去的这几章给恶补一通，也不是不可能，反正在他们眼里，做学生的都只是被看成一帮活着的死人，人肉机器，想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活见鬼，我打定主意不要被这个消息弄得头脑发狂。我把报纸随便递给旁边哪个人，他毫不犹豫地拿去看。不对呀，我的脑袋一开动，就不大容易停下来了——为

什么要搞“数学文理科合卷”呢，减少印刷成本？不可能吧，可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他们想培养出一只手用来研制试管婴儿、另一只手用来谱写壮丽诗篇的007式的全能人才吗？显然不切实际。

我今天手头上还有一本课外书：《现代主义各派美术集评》，我是从DD的朋友CL那儿借来的。CL本来也要学美术，后来又要考广播学院，所以就没和DD一起去学画。她那里这些书不少，这本书是上个星期五她给我带来的，很大很重，她把这本书给我驮到学校里来让我很感激。这本书很有些水平，主要是把流派分得很内行，不是把画家们一古脑儿说成“现代主义”推到你面前。我已经看到了高更那一章。它对我来讲也许过于专业了，像透视、平面、焦点这些技术词汇很多，让我读起来觉得有些生硬，不过既然是我喜欢的东西，就是有些生硬我也能接受。我真的想学一点美术，今后总不能只凭着感觉看画儿，虽然我的感觉很不错，也许还有点无师自通的味道，可我就是想把美术了解得系统一点，这样看画儿心里也明白一点。

数学老师进了班，我恶狠狠地把数学讲义从书包里连拖带抖地拽出来，老师已经开始讲课了，嗓门大得要命，好像在跟谁发怒似的。右边的同桌还不如我麻利，已经讲完了第二题，他还在找数学讲义，两只手在抽屉里瞎捣鼓着，把抽屉折腾的山响，连我也跟着他的动作心惊肉跳。我说：“找不到就别找了，看我的吧。”他把手从抽屉里抽出来，这下可犯事儿了：我放在桌子上的钢笔，被他毛手毛脚地碰掉了地上。我张大嘴巴，就像遭到了轰炸。我的新钢笔，才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遭到了这场厄运。我刚想弯下腰去捡起它来，忽然想到好像不应该是我去捡。我抬起眼睛，看着同

桌，他也在看着我，“捡起来，”我面无表情地说。

他弯下腰去，这回该让我觉得良心不安了，他刚直起身子，我就殷勤地把钢笔接了过去。

“好好的，”他带着一种小事化了的口吻说道。

“除了笔尖摔坏了，其它地方都是好好的。”我不满地向他指出。

“没坏，”他从我手里拿走钢笔，在草稿纸上随便划了几笔：“你看，不是还能写吗？”

“能写跟好写不一样啊，”我说：“刚才写出来的是钢笔字，现在被摔过了，写起字来粗得就跟毛笔似的。”

“哪有这么严重，”他腆着老脸笑着说：“不是毛笔字，肯定没有毛笔字那么粗，最多是胎毛笔。”

“用你的胎毛做的？”我可没工夫和他弯弯绕。

我现在只是想将笔尖弄得细一点儿，至少对付掉晚上的课，反正这支笔在我手里已经用不了多长时间了，一来是我喜新厌旧，二来是我不能忍受任何有缺陷的物品。

“你给我把笔尖拔出来一点儿行了。”我说。

“这不好好的吗，干吗把笔尖拔出来？”

他这句话讲得叫我上火。他小心翼翼地把笔放在我的桌子上，那神情就像工兵排雷似的，我本来也没有想把他怎么样，可是他这副窝囊相更让我生气。上这么多年学，像这种弄坏了别人的东西，不但不想着赔偿或者修补，只知道一个劲儿往后退的无赖，我见得多了。他开始像个没事人儿似的抄数学笔记，意思是说：看着，我在学习呢，别再拿你的破钢笔打搅我了！我像一条死鱼似的瞪着眼睛愣愣地看了一会儿桌子上的钢笔，笔头被摔得又短又歪，看着它这副严重变形的模样我就受不了。肇事者还在事不关己地写着笔记，我

能怎么办？我拿起钢笔，就当它是同桌的胎毛做的笔用一个晚上吧。

10月26日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我左边的同桌一直在摆弄着一个小电子产品，到底是电子表还是电子记事本，我看不出来，我对这些东西一向兴趣有限。他每堂课都要把这个方正正的小东西掏出来十回不止，这让我很烦。天气非常好，上完第二节课，我没去做操，到花园里逛，遇到了WX。我不知道他在这里干什么，因为长期以来花园这个地方在每到上午第二节课后，都是我和学校里少数几个从来不去做操的人在里面游荡的根据地。WX说：“我就在这里等你。”我装作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快步走过去，他在长凳上坐下，我说：“过来过来，你不要在那边坐，那边你能看得见老师来来往往。”

“我看见他们来往有什么关系？”WX说，我看不出来他这是真犯傻还是假犯傻。

“我不是要你看老师来来往往，我是不想让他们看见你，你现在正在逃操你知不知道？”

他满不情愿地挪到了花园里面，但是没坐下来：“前几天我过生日你为什么没来？你不是说月考考完了就来吗？”

“我说的是月考考得好我就来。”

“那你考得怎么样？”

“学校不是没公布吗。”

“你们自己总该统计一下吧，我们班里就是私下统计

的。”

“我大概二十来名。”

“这还不好？”

“文科班，你以为文科班二十来名就能上重点啊？”

“好吧好吧，”他不想再说下去，我们都不是爱争论的人，这让我想到了我现在右边的同桌，他就爱吵架，而且水平奇低无比，强词夺理，满口歪理，你一场架跟他吵下来简直能给气疯了。WX对这件事说了最后一句话：“这次就算了，等我过八十大寿，你一定要来。”

“鉴于我有可能耗不到你八十大寿那一天，我建议明年我就给你提早庆祝八十大寿。”

花园里新搬进来几个雕像，就是那些私人小工场里的产品。我不能指望学校花园里出现米开朗基罗的《圣母怜子》，可也不能太拙劣了：这几个马、大象、乌龟等等动物石雕，看上去既不古朴又不现代，那种暴发户式的老土样儿看了实在伤眼。我把雕像的可怕之处指给WX看，看来他也观察了多时，他说：“这东西只有钱包撑得难受的没头没脑的笨蛋才会买。”他这句话叫我马上对他刮目相看。我跟他相处了五六年，还是第一次听他说出这么有鉴赏力的话，而且很对我口味。不容置疑，掏钱把这些个庸俗的石雕买进校园来的笨蛋，不外乎就是学校里的一些毫无鉴赏力的、挂着老师名号的蠢货。这些雕像把花园弄得就像乱坟岗子似的，蠢得要命，放在幼儿园里都会把小朋友们吓着。我经常跑到校园北边的这个花园里来，平时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今天和WX坐在一起，打量花园的眼光突然变得挑剔了，好像我俩都在暗暗较劲儿，看谁的目光更犀利似的。花园里所有的东西在我眼中都突然变得乱七八糟了起来，我不是说花园里不卫

生，相反，由于每天下午都有学生打扫，干净得很，问题在于它的风格很是不伦不类，不知道是谁设计的，说成是设计师的风格乱伦也不为过。看看那边的喷泉水池，苍天！看上去就好像是专供考试成绩一落千丈的绝望的学生投河自尽用的，而且还嫌水池浅了一点。WX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讲话，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我走神儿。我有一种本领，那就是在走神的时候，也能做出看上去好像在倾听别人讲话的样子，大概这是上课练就的好本事。我这会儿已经把目光落在了远处的喷泉里。那喷泉好长时间没有用过了，事实上因为它根本就没喷过，所以我没有注意到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当我放学从它旁边走的时候，根据不同心情会产生两种不同想法：心情要是还好，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这喷泉到底是不是坏了？心情要是太差，我就会想，唉，我还等着月考排名统计出来干什么，不如一头跳下水池子里淹死拉倒。现在我心情还不错，想的是第一个念头：这喷泉到底是不是自打建成以来，就一直是坏的？或者是学校专门为了迎接上面下来检查，搞的又一个人文景观？每个人都知道，自然景观资源有限，而且你不好把它们拉到下来视察的大小官员面前取悦于他们，因为实在太劳民伤财。可是人文景观呢，只要你不是个太笨蛋的芝麻官，总是懂得在要害位置搞一些牌牌坊、花园喷泉之类的东西吸引要员大爷们的眼球。水池旁边还垒起一堆石头，冒充太湖石，看上去就像麻雀拉的一大堆屎；原先在那边的一排梧桐树一夜之间被斫了个精光，就是为了盖教师办公大楼。现在那边全都种上了草，草看上去不错，可是一年也就绿那么几天，现在已经枯得差不多了。

WX突然说：“那蝴蝶。”一只特别大的黑蝴蝶，在花园边上飞呀飞。其实我也看到了，可是我没有主动叫WX看，

我心想除了我之外，大概不会有几个人过多注意这些小动物，大多数人看到蝴蝶不比看到一块砖头更来精神，除非他动脑筋想把它抓到手。如果我提醒某人有一只蝴蝶在那儿飞，他要是屑一顾，或者马上要跑去捉它，那我非疯了不可。蝴蝶扑闪扑闪地飞到我们面前，我站了起来，WX也站了起来，他说：“你不要去抓，这种黑蝴蝶比黄蝴蝶更聪明，你逮不着它。”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逮它了？它飞得不是很好看吗？”我看着WX紧张的样子，不免好笑：“这么漂亮的小动物，逮到手里就会把它糟蹋了。”

操场上的人潮已经往教室里回流，有些人也看见了在花园旁飞着的蝴蝶，它特别大，太招眼了，幸好就在那些人对它蠢蠢欲动地动脑筋的时候，它忽闪着翅膀飞出了花园，闪出了学校高高的院墙。我走出花园，WX已经和他们班的一个同学一起进了B栋教学楼。我绕着喷泉水池走了一圈，死水一潭，水池里面的水，黄黄的，真像一大泡尿。

今天我从河坝上走，河坝已经加固完毕，现在我终于可以从河边走了，虽然河坝距离宽阔的河面还有很大一片田野，可是走在上面终究比那些干巴巴的公路要让人舒服得多。我在下了河坝上公路的时候，闻到了一股焚烧橡胶的气味，风从东边慢悠悠地吹过来。让我奇怪的不是这股气味，而是我上午放学经过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焚烧垃圾了，可是到现在它还在烧着，这就让我觉得特别可气。我飞也似地下了坡，上了公路。在公路边有几户人家的老房子，院子的门开着，一只小黑狗随着主人往外洒出去的一盆水冲出了大门，却扑了个空，还好，它没有被淋湿，躲过了从天而降的大水，它还嫌太小，大概还不知道什么叫覆水难收呢，就

在主人关上大门的那会儿，这只小黑狗像弹力球似的飞快地跳过了门槛，进了家门。我又恢复了长时间以来丢掉的快乐心情。

我躺在床上。下午把弗里施的《施蒂勒》买回来了，可是整个下午我都没有把它翻一翻。我意识到如果我要看的话，就得花上三个星期，可是这根本不可能：我没法抽出三个星期连续的时间把这本书看完，我并不是因为买了这本书而后悔，我只是觉得生活在这种块状的、不连续的时间之中，对我来说太苛刻了，这高三的日子，让我越来越局促不安。

在我的心里，没有挑战，我不懂得什么是挑战，我只能体会到恐惧，深深的恐惧。

10月31日

期中考试并不像我想象得那样干脆。在期中考试之前，学校按照惯例要举行秋季运动会，例外的就是高三年级不参加。这样一来，运动会应该和高三没有什么关系了，可是我们也都是从高一高二过来的人，所以在看着窗户外边来来往往的人，听着大喇叭在外面哇啦哇啦地叫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成了一些不受欢迎的化外之民。我自己倒不是特别喜欢在运动会上到处扎堆儿，以前学校开运动会，我更喜欢在家里呆着。其实学校要是真的允许高三参加运动会，我估计十有八九的人都会回家补觉，那些爱学习的好学生们也可能在班里抓紧时间学习一通。学校这么做是明智的，高三当然确实

不需要运动会。

今天早晨下了一场雨。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每当要举行一些根本用不着下雨的活动，老天就偏要和人作对地下雨，好像这么一来就显得它多么力大无穷似的。就连老天也有下作的时候。凭良心说，我很不希望今天下雨，虽然运动会没有高三的份儿，可是看着校园里有许多人都那么兴高采烈地跳来跳去，你也会跟着高兴。能在上课时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学生和感受运动场上传来些许热闹的气氛，总比看着班里死气沉沉的人让我愉快得多。我早上来上学的时候，雨刚好停了，刮起了强逆风。我没有想到会碰上大风，要不然我就会尽早地从家里出发来学校了，因为我得把上学路上被强风的阻力耽误的那几分钟赶路时间折算一下，加到上学路程所用的时间里去，这样才不至于迟到。我大概在一个星期以前就把惯常的上学时间推迟了，推迟到离上课还有一刻钟，其原因在于我不喜欢学校，所以我尽量推迟到校，就这么简单——不要理由，学生不喜欢学校不需要理由，我也懒得说。由于强风的原因，我就免不了迟到了。班主任上第一节课，他也没说什么就让我进班了。他正在讲前天考的外语试卷，照我看全班最多只有一半的人在听课，另一半正在关心外面操场上的变化。有些坐在教室最里面的人看不到操场，就竖着耳朵听喇叭。我刚进校门的时候还以为今天的运动会会被取消了呢，因为我看到许多人都背着书包，好像上课的样子，后来才明白，他们大概接到了这样的通知：如果下雨的话，背着书包来，运动会开不成就上课。这样的通知我在高一高二甚至初中都经历过。

上了第一节课之后，校园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所有的

人都聚集在操场上，只有高音喇叭的声音和操场上人们的尖细叫声和噼里啪啦的零星鼓掌声不时地传过来。你看着空荡荡的教室外面，准以为刚才突然发了一场大洪水，把一大批人远远地卷走了似的，外面的空地上还有一片片的落叶和早上刮风下雨后折下来的树枝。班里有人说这一届运动会已经缩短为两天，我们这帮高三的人还应该庆幸一下自己曾经度过那三天运动会的好日子呢，不过无论是两天还是三天，都不是实际的天数，因为学校总是会通知在运动会最后一天晚上的晚自习照常上课。作为学生，想要的就是那种运动会后放假的感觉，轻松一点的感觉，无牵无挂的感觉，可是现在，学校给你的任何假期都不会让一个人无牵无挂；你要是能在一个到了晚上还要往学校里赶的日子里感到无牵无挂，那我真是服了你的坚强神经。我自从小学起就连放假也开始害怕了。我在上一年级的第二天就开始讨厌上学，大概是因为刚一上小学就碰上了一个凶神恶煞的数学老师和一个太过于自我卖弄的音乐老师的缘故，然后我在二年级就开始知道我应当害怕星期天下午和晚上。在小学那会儿还没有晚自习，当然没有，要不然我现在还不长成豆芽菜一根了。当时我害怕星期天下午和晚上，是因为这两段时间里我总是得考虑“明天就要上课”这个事实，现在我也一样害怕星期天，而且更加厉害了，因为我现在的感受肯定比小学那会儿要丰富得多。我是那种事情还没到来就会早早地紧张地惦记着的人，这不是什么狗屁危机感，这是恐惧！恐惧！恐惧！

我上完第二节课到操场上看看。今天不能做操，因为操场上运动会正在举行着。我看到了一个原来的老同学，他在高一留了级，现在上高二。“这是什么？”我指着他背后用

别针别着的纸牌子问道，那是运动员的编号牌。

“刚刚给班里比完铅球。”他说。

“第几名？”

“没破世界纪录。”他还是那么有幽默感。他人很壮，肌肉发达，这在学生中间不多见，我们原来的老同学都以为他经常去健身，不过他说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健身。学校里开运动会，各班都会选拔运动员，有一条规矩：凡是看上去体质应该不错的人，都很可能被选上参加某个项目，比如我这个肌肉发达的老同学，他就被想当然地选上参加扔铅球项目，反正这种选拔方法不比看到蜈蚣长一百条腿就认为它理所当然地跑得快更加主观。

“你参加什么了？”他问我。我个头已经不矮，可是站在他面前，他的个头还是要比我高一些。他虽然长得威风凛凛的，却并不拿架子。“我顺便来操场视察一下，十分钟后还要回去给班里作报告。”我煞有介事地说道，开玩笑呢。他旁边来了个人，叫他赶快去领奖，他过去了，我也跟进操场去看看。

在操场上你明显看得出来运动会刚刚正式开始，因为那些担任出场式领队的人还没有马上把漂亮衣服换下来。男生们拿着旗子东倒西歪，或者在操场上你追我赶；领队女生们还穿着裙子，在10月底的最后一点温度中，竭尽全力要把它们在身上尽量保持更长一段时间。我不喜欢入场式，在以前开运动会时，我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入场式这个节目，就是那种全班齐上阵的入场式。我会对老师辩解说，我的校服太大了、校服太小了、我生病了、今天再不去医院吊水我就要死了。我胆子不大，可是每次运动会入场式必逃。在这种队形里，你就是想走得整齐一些都没法子，因为这不是你一个

人想整齐全部队伍就能整齐起来的，这是我害怕参加运动会入场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观礼台上开始颁奖，我那个扔铅球的老同学上去了，他站在正中间，像个呆瓜，不知道手脚放在哪儿，看上去既让人觉得好笑，又让人为他揪心。他在正常情况下倒是很大大咧咧的一个人。我们原先都因为他肌肉发达而笑话过他，其实是出于一种掺杂着男孩之间友情的善意妒忌。有一个关于他的笑话是：他打篮球骨折了，医生给他做手术，操起柳叶刀，在身体里面挖呀挖呀，好不容易挖到了一个塑料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距骨头还有两公里。

晚上放学刚回来，DD就来了电话。我前些时候也给她去过电话，可是她给我的号码被吊销了。她开口就问我今天运动会的事儿。我有一种感觉：她每次打电话来都在用一些事情做借口，上次是月考，这次是运动会。她这样欲言又止的让我很不舒服，再说她既然能打听到开运动会的事儿，那么她肯定也会知道高三根本就不参加运动会。我总觉得她在有意无意地推开我们之间的真实感情。也许她刚才已经给别人打了电话，现在捎带着给我打个电话，只不过是出于礼貌。她怕写信，写信她觉得麻烦。我无法满足于半明不暗的折磨人的暧昧关系。

“今天运动会开得怎么样啊？”她问道。

“高三没参加，我快要死了。”虽然我还是活生生的，可是她明明知道高三不开运动会还在那边装模作样地问我，就让我觉得很累。

“那就让我向你表示深切哀悼。”

“我只是说我快要死了，我还没死呢，你急什么，是不

是盼着我死？”

“不是盼着，是渴望。”她大声笑了起来，对我来说她的玩笑开得实在是有些冷血。我沉默着，等着她笑个够。这不是DD的一贯作风。

“你在那边怎么样？”还是我开口问。

“什么怎么样？”又来了，她总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恼火起来，她就乖巧起来了：“哦，你是问我学得怎样，身边有没有男朋友？”

我没有说话，等着她自己说给我听。她可能以为今天的表现很诙谐，可是我实在太累了，情绪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她在电话里好像满不在乎的样子，她这么做只能让我更加烦躁。“这次应该让我来先问你。”DD转过话头。

“问吧，”我有气无力地说，我想她不可能一点儿都感觉不到我的心情。

“你现在有女朋友了吗？”

我惊了一下，马上把手里摆弄着的记事本放下来：“你开什么玩笑。”我觉得自己的口气这么紧张好像不很正常，于是尽力平静下来，接着说：“你不知道我对女朋友的要求是多么奇怪。”

“要求太高了可不好。”她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说道，我不喜欢她的口气，好像跟她毫无关系似的，这太叫我难受了。

我说：“不是我要求高，是要求独特。”

“说给我听听。”

“现在的女生都太过于务实，她们看上一个男生就是看上他的某种能力，而不是纯粹地喜欢他这个人，我要求的女生恰恰相反。”

“交男朋友当然得看他的能力，”DD插进来一句。

“什么？！”我太吃惊了，而且太生气了。“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没什么，现在都是这样，有什么不可以的，起码我就是这样的人。”她淡然说道。

“那么爱情呢？”我问。

“爱情，爱情倒是个好东西，可是你不能拿它当饭吃啊。”

“可是我只要爱就行了，我可以拿它当饭吃。”

“那只是你的想法，你难道今后想去要饭？”

“要饭怎么了？你觉得不好吗？”

“至少我肯定不会找个将来只会到大街上要饭的人。”

“你想找个大老板，你要豪宅名车，你要的就是这些东西，你真是个中产阶级，我以前以为你不是这样的。”我在说“中产阶级”这个词的时候，简直就是咬牙切齿。

“中产阶级，大概是吧。”DD把她那种最让我伤心的脾气暴露了出来，就是那种对我说的话满不在乎的脾气。她说：“我说你让女孩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太不务实，我不是说你这人轻浮，你为人不轻浮，可是你不做实事，你不能给人安全感。”

“差不多，”我说到这儿已经不想往下说了，我精疲力尽了，可我还是鼓起了勇气向她承认了我的缺点，当然就是她眼里认为的那些缺点：“我的确很不实际，我没有经济头脑，我不是个经济动物，我只在乎虚无缥缈的东西，可是你要看到，你的想法其实已经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未来甚至自己的情感完全经济化了。生活原本并不是这样的。”

“可现在生活就是这样的，”DD说：“无论你怎么

讲，生活就是这样的，我没法改变，你也一样。”这和开学时我看到的DD判若两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到那个城市之后，她才变化得这么大。

“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我故作平静地问道。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扔过来一句。

我们两头的电话线，已经成了火线，可是我实在想让她知道我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对她的一些想法，就在现在。DD刚说完“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句话，我的五脏六腑就像被人打得完全错位了似的，痛苦之极。和我没有关系，我简直要放下话筒去大哭一场，可是我一定要坚持到底，最后不一定是胜利，可是总会有个结局，这就是我想要的，这样就是痛苦也不会持续得太长了。“你应该听听我的话。”我稍微带着恳求说道，就算不是哀求吧。我就是这样低三下四的人：如果觉得那个人好，我会没了命地去迎合她。

“我不是在听吗，”她也有些缓和了下来。

“我是挺重感情的人。”

“我也一样，你不要把我想得太势利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马上说道，可是心里却觉得，她今天的表现压根儿就和一个不折不扣的势利眼差不多，也许女孩真的都是这样，这次我又看走了眼：“我是感情占到百分之百的人，我不在乎任何东西，比如，一个人以前和其他男生有过什么关系，只要我觉得她好，我就一直觉得她好。”

“那这个女生要是贱货你也会爱她？”DD说得很尖刻。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才好，我已经是满脑子乱麻，只有凭着自己的感觉一步一步往前瞎撞了：“对，贱货我也爱，只要我爱她，她势利也好，她贪上了金钱也好，我要是有

钱，可以全部给她，哪怕她不爱我，只要她愿意让我爱她就行。”我们现在都心知肚明，这个“她”是指谁，如果她要是还不知道，那也是装傻充愣的。

“可是你现在没有钱，而且，你这样倒显得自己骨头轻。”DD说。

“现在没有，将来会有，”我说的是钱这东西。

“算了吧你，将来你也不会有，我看得很清楚。”我不知道还应不应该往下说了，她也一样，于是电话里就是一阵沉默。“你其实不主动，”DD开了腔：“你这人实在挺奇怪的，明明喜欢上了一个人，却偏偏叫人等着。你不主动，你胆子小，可是要是她主动起来了，你又开始害怕。”她说的正是这么回事，可是今天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干干脆脆地承认这个缺点，我刚才承认得太多啦。

“我不主动那是因为我用不着主动。”

“你把自己看得也太高了一点儿吧。”她对我的辩解嗤之以鼻。

“不是看得高，我觉得感情谈不上主动不主动，主动只是促成行动的一种姿态，感情上，用不着。”

“那你就不要结婚，就一直这样昏昏地谈感情吧，你太浮了。”

“可是现在我们才十七八岁，结婚？结婚、生儿育女，那正是我将来肯定不会去做的事情，愚蠢之极。”我在电话里第一次用了“我们”这个词。我有一种感觉：好像DD在电话那头，突然觉得我在不经意之间用手碰了她一下，我希望因为我突然使用了这个叫人激动的共称“我们”而使她有所转变，我静静地等着，一直等到我整个儿人都快要窒息了。

她过了好长时间才说：“我要是说我必须考虑到今后的

生活，你又会骂我中产阶级。”她的口气已经放得比较通情达理些了，可还不是我想要的。

“不会了，我知道你比我的实用精神更多一些，我总不能让你去喝西北风。”我说完这句话已经几近绝望，“我是个靠感情过活的人，你却有七分的务实精神，咱们要是当一般的朋友，我会让你觉得有点启发，可是我们也只能走到这一步了。”

“大概是这样。”我等着她找些别的话题。

“我寄给你的画儿，你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昨天收到的。坦率说，我觉得你在退步，你画得越来越商业。”反正已经到了这一步，我说话直率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我本来就不是学画画，麻烦你搞清楚，我学的是平面设计。”怪不得她会变成这样呢，我在心里想，不过这样想也没有叫我觉得更好受些。我知道自己在感情上不是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她挂了电话我就会难受起来，所以我尽量拖时间。我还对一件事情有兴趣：

“你现在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我今年十七岁了，没有是不可能的，我受不了寂寞，我放不下来架子，正好又有人追我，而且主动，让我觉得他很好，他还是个很老实的人，尤其能关心我。”

“就一个？”我急切地问道。我没有在乎她说什么，只是在数量上很在乎，已经有了男友，关键问题就是有多少个。

“以前还有一个。”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这事。”

“没有必要对你说。”

没有必要，又是一把刀子插到我心上，可她仍然面不改色，我虽然看不见她的样子，但是仍然想象得出来她到底是一副什么表情。

“那个男生是什么星座的？”我有一搭没一搭地找话说，DD总不能在这个时候把电话冷酷无情地挂了，她至少懂得让我先稍稍平静下来，除非她旁边正站着那个混蛋男朋友，催她到某个混帐公园里去缠绵。

“你指的是第几个男朋友？”DD要是铁了心，简直就是女巫，不过她也知道见好就收，她换了话题：

“你就这么相信星座吗？那是迷信。”

“至少现在可以相信一会儿。再说，星座这东西起码比竖起一个五角硬币，凭着它在桌子上能竖起多长时间来判断你还有几天活头要高明一点。”

DD笑了，她很会欣赏我说的话：“好吧，告诉你，他是天蝎座。”

“天蝎座，嗯，那也好不了多少，你是处女座，对吧？天蝎座好像也不是那种能干大事业的人，你要是想稳稳当地弄到豪宅名车，应该找一个其他星座的人。”

DD恼火了，大概是因为我故意把她描得过于势利的缘故。“或者靠自己。”我觉察到她在发火，就马上补了最后一句，但是为时已晚，她飞快地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知道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指教。”

“对，是你自己的事情。”

对付扔过来的刀子，要想不让它们准确地扎到你的心上，你只有顺势躲过去：“那好吧，今天就没什么了，祝你快乐。”

她在那边躊躇了一会儿：“对不起。”她是用英语说的。

“没什么，我觉得很好，我还很好嘛。”我最受不了她的这句“对不起”，就算从道理上来说DD的不对，可是我一听到她对我说“对不起”，就仿佛看到她在当着我的面抽自己耳光，我的心都在打颤。我还很好？可笑，我都快要痛苦死了。我愿意承担一切，只希望她不要对我说“对不起，”可是我和她相隔这么远，就是想让她不要这么说都不可能。她又说了一遍，这次是用母语，说得很亲切，这样一来，我心里的难受又成倍增加了。“我很好，我无所谓，这没什么。”我在最后挂电话的时候一再说着，可是我已经快要哭出来了。

这是我头一次跟她打电话先挂上电话。我把电话挂上，眼泪流出来了，可是我总得擦干它们，我啊，我真是无可救药了。找一个我想要的女孩，难道真的就那么难吗？我想到英格丽·褒曼的一部电影，有这么一句话：这样一来，我知道她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的钱了。我还没钱，可是今天至少DD告诉了我，没有一个女孩能仅仅为爱而爱。想到这一点，也不能让我觉得好受些，因为我自己也总得去爱啊。也许真的像DD说的那样，我应该务实一点儿了。

11月1日

就像是昨天被人狠狠地打了一顿，当时还不觉得非常难受，晚上睡觉躺在床上，我才觉得真正的痛涌上了全身。我一直折腾到下半夜四点钟才睡过去。要是看到我半夜像狗一样蜷在床上流眼泪的样子，大概所有的人都会骂我没出息。我带着对第二天上课的恐慌，强迫自己在四点半左右昏昏睡

去。还好，今天早晨爸爸叫醒了我，我也没有赖床，因为我一醒过来就想着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嗜睡。原先我以为一觉过后我就能头脑清醒了呢，可是现在看来更是加倍地难过。我除了她再也不能对第二个人这样用情啦，我太专一了，我无法做到不专一地爱啊，太痛了，太痛啦。我实在受不了这份罪，我真是一个没出息的傻瓜。我想去死，这对我自己来说真的没什么，我是一条生活在情感的波涛中的小鱼儿，我太爱做梦了。一个太爱幻想的人是不怕死的，因为天堂就是他的家啊。

吃早饭的时候，妈妈问我昨天晚上是谁给我打的电话，怎么那么长。我说是一个朋友，当然是轻描淡写地想敷衍过去。妈妈说：“要是谈恋爱可不行。”我拿不准在我打电话那会儿他们是不是在听着，不过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会在我刚放下电话时来找我了，也不一定，也许他们昨晚商量好了今天再找我。早上起了床很不舒服，我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在发酸，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醋的滋味。尤其厉害的是，肚子里五脏六腑的那种错位感更加严重了，甚至心脏部位就像快要裂开了似的一阵阵疼痛，吓得我一动不敢动。爸爸说：“怎么啦，还不赶快去刷牙？”我这才装模作样地挪了几步，生怕自己就这样一头栽倒死掉。死掉也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赶快刷了牙，他们已经等着我吃饭了，早上家里人很少在一起吃饭，只是偶尔有之。在这种严肃的场合下，我担心的就是他们知道了我的事儿，可是我根本就不想让他们插手。这件事本来他们就不可能明白，我又是心头乱作一团，唉，真不知道早饭怎么吃。

“现在你还年轻，不要想入非非，学习要紧。”爸爸说，那口气好像我是个成天心怀鬼胎的坏蛋似的。我想他们

已经知道了电话内容了，起码猜出来了一些，可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分机要是被人拿起来接听，我会注意到，不过也许我当时太不小心、太专注于和DD谈话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让他们在教育我的时候稍微收敛一点儿，我不希望自己被再次弄乱，我本来就够乱的了。

“现在确实还不到谈恋爱的年龄。”妈妈说。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以为他俩要现身说法了，我对他们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在感情上的事情很有兴趣，可是最后等来的还是老调重弹：“现在你还没有工作，正在上学，面临高考，学业要紧，再说现在谈恋爱你也没有基础，再说恋爱谈下来了你又能怎么样？结婚生孩子吗？”妈妈说。

“你妈说的对，”爸爸马上跟进，“你还没长大，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我懒得跟他们斗嘴，因为成年人对爱情的观点完全就是跟做生意似的，谈恋爱也要讲老本，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把爱情实利化的观点。我不懂真正的爱情？老天，连池塘里游的鱼儿、天上飞的鸟儿都懂爱情，我一个大活人，竟然不懂爱情。难道爱情还要像上高中那样去学个三四年不成？还什么“不是真正的爱情”，我到现在都没听说过爱情还有真假之分呢！不管是什么爱，只要有爱，就是真的。我对他们管我的私事，尤其是感情上的事儿相当恼火，他们走得也太远了。我说：“我肯定不会再谈下去，十年之内不会谈了，可是有一句话我得说出来：没有什么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感觉上的东西最好不要做这种道德判断，我烦！”

我还是头一次这样跟父母发火。我骑着车到学校，心里又添上了一层负担。第一节课已经开始了，我今天就是五雷轰顶也不会有什么知觉：一方面像个木头人，另一方面又难

受得要命，各种心情搅得我要死要活。学习这东西在我看来已经是身外之物，它本来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今天我就更用不着去管它了。反正现在学校还在开运动会，我就是逃一节 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第一节课是语文，我把书包背上，出了存车处，但是我能往哪儿去呢？操场上人多，正是个好去处，可是这样一来要是碰上了熟人就不好说了，碰上老师更惨。我就去报栏那儿看报吧。

我一直没注意到高一时的政治老师就站在旁边。今天我从早上起就不能集中精力，但是忽视了老师就在身边的错误犯得就有点儿大了。按理说政治老师应该都订报纸，这样起码能坐在办公室里看，大可不必可怜巴巴的像学生一样挤在报栏前，何况报栏里边的报纸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就连《参考消息》都没有。政治老师很年轻，大概二十六七岁的样子，也许正是因为他资历比较浅，在办公室里抢不到报纸才跑到报栏这儿看报的。他当年带我们高一政治的那会儿，是个公认的记忆狂人，他上课根本就不带任何书和笔记，一个劲儿地讲解、板书，从来都不打顿儿。刚开始上他的课，我觉得很好奇，可是到后来当全班的人都适应了他的授课习惯之后，我倒越发觉得他相当可怕。要是我，就是能像他那样把每堂课要上的内容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我也要带着笔记或者课本，以防万一。他每一堂课就这么背着两只空空的手，从办公室到教室来上课，下课了就从教室走回办公室，偶尔双手也有不空着的时候，那就是给教室里带来一盒粉笔。他用起粉笔来特别费，就像是吃粉笔似的。他热衷于板书，而且板书速度跟他大脑意识的速度完全同步，看着他板书简直就是目睹奇迹发生。根据当时班里有些人的说法是：“我怀疑他除了背政治书之外，还会干点儿什么其它的事

情。”我见了他从不向他问好，大概是因为他过于死板，我认为他不值得我问好。他现在就站在我旁边，不到半米，害得我看不下去，也无法无礼地脱身走开。本来我应该向他问声好，又担心他根本就不记得我，他好像早已不认识我了，不过也许是因为他当年背课本背得太猛，把脑子都耗尽了，现在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失忆的征兆。铃开始响了起来，下课还是上课？第几节课？我糊涂了一小会儿，终于明白过来这是第一节课下课。WX远远地喊我，然后径直跑过来。大概他这些天来肚子里积了不少笑话，这里却不是讲话的地方，他过来了。我暗中向他示意站在我旁边的这个人老师，据我看WX把他当成复读班学生了，于是我一把将WX拽到花园里。我不准备把自己昨天晚上的事情讲给他听，其实我很想说，可是我不想当着别人的面大哭一场，那样就太掉价了。WX要我明天带一本书给他看，我说行；他问我高考想考什么专业，我说我不知道；他极力怂恿我学经济，我说我无所谓。我也知道，从现在看来，文科生上大学除了学经济，好像就没什么可学的了；他把他的一个叔叔搬出来，说他叔叔开一家饭店，现在正在攻读MBA。我一直在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说话，虽然脸上装出一副很有兴趣的样子。那个在报栏前看报的政治老师转过了头，往这儿看了一眼，就往前面的教学楼走去，他手里依然是什么都没有拿，看来又要去给学生们表演空手道了。他面无表情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刚才看报的时候就是这副表情，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在他经过我们的时候，我的两腿几乎有些站不稳了，WX这下应该知道他是个老师了吧。政治老师大都这样，面无表情，叫人难以捉摸。

我中午吃饭真想把饭碗端到我自己的房间里去，可是这

样不行。我确实不想看到父母，因为早上的事情让我跟他们不好说话，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他们在我回来之后再也没说什么，妈妈在饭桌上只说了一件事，就是M姐在园林局后面的那条小街上买了一栋房子。在那边买房子有点儿令人生疑，因为要是在那地方做生意，大概只能做发廊。我放学从那边走过好几次，也能看出个大概，在那边做生意的人肯定比给客人洗洗头要复杂得多。好像妈妈对那个地方不大了解，要不然就不会在我面前跟爸爸谈M姐买房子的事儿了。父母一直在讨论那边的房价如何，我却在想着M姐。我从小和她一块儿玩，她比我大好几岁，自从我上中学后她就出去了，现在回家大概有一年左右了，然后就买了房子。她人挺好的，可以说非常好，我觉得只要人好，干什么都不必太计较，这就是DD批评我的地方，她说我没有道德感，可是我看不出来这算什么。

你看，今天我一直强迫自己别去想着DD，她却像鬼魂似的在我脑子里面荡来荡去。就因为她这件事，我的心脏在今天上午差不多有两次快要裂开了，那种在心脏上面裂了好多道缝、就快要炸碎了似的感觉，让我又怕又惊。在第四节历史课上，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竟然看到我站在一条空荡荡的公路上，鼻子、眼睛和耳朵里往外止不住地流着血，浓黑的血，像巧克力奶一样。血流得到处都是，它成了一条河，漫过了路面，一个劲儿地往前流，我只有两只手，根本就无法止住血，我只好在那里惶然失措地站着。这些幻觉都要把我逼疯了。在觉得好些之后，肯定要给DD写一封信，一封信不行就再写一封，我不是想要求她怎么样，只是希望自己能通过正常的交流最终平静下来。我本来就没有明确地向她挑明过我们的关系，因此写起信来也不是很困难。我只希

望我们能当一般朋友相处，DD不会不同意。我在冷静下来之后肯定也是个挺讲道理的人。那么我就把她当作一般朋友吧，而且我不会保留一点点今后和她发展感情的可能性，太痛苦了。我们在大问题上讲不到一起去，当朋友还不错，就当是一对兄妹得了。

我歪歪地坐着，就跟半扇贝壳似的露出一副傻相。不行，第三节课我得回家。既然前两节课班主任没来巡视，这节课大概也不会，不过也不一定，反正这是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的。

我在离上课还有五分钟的时候拎着书包出了门，教室的门在我身后被人砰地一声关上了，我就像被人截断了退路一样。我诅咒着那个撞门的混蛋，同时也很感激他，我果断地向存车处走去。校园里的灯光昏暗，高高的路灯杆挑着几个垂死着头颅的昏黄路灯，它们像在自发地哀悼着什么。我没费周折就把车推了出来，大门口校警已经撤了岗，几个女生正在跟看门的老头儿说话，大概是求他开一下大门，我所在的这所市重点学校其实并不是学生逃学的天堂。我远远地站在花园旁边的树下看着她们，她们在明处，我看得很清楚。三个女生当着老头儿的面装病，只要老头儿心肠一软为她们开了大门我就能跟着出去了，不过要想哄好一个老头儿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看来那三个女生正在团结一致竭力试图感动老头儿把门打开，按照她们那惟妙惟肖的表演，看上去大概都在犯着某种恶性传染病，而且请假也得到了老师的允许，其中一个女生甚至装模作样地用手捂着额头，要是我再走近一些，肯定听得见她在呻吟，当然是无病呻吟。老头儿进了传达室，三个女生在他身后突然间就张牙舞爪，她们欢蹦乱跳，朝老头儿的后背做着鬼脸，然后相互间你打我闹，

着了魔似的，她们肯定得到了老头儿的允许。就在老头儿刚出传达室的时候，三个女生马上又摇身一变，恢复了刚才病恹恹的样子。我就在大门的门锁被老头儿摆弄得叮当响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冲出去。我骑上车，几乎跟那三个女生同时出了校门。还有一条黑影，不知道从哪儿闪了出来，在我旁边倏地钻了出去，我的自行车差点儿撞到他。三个女生好像觉得自己的胜利果实被别人瓜分了似的，不满地把犀利的目光齐刷刷地向我投过来，我装作没看见，擦过了她们，上了公路。

我不能这么早回家，我到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父母肯定会觉得我这几天过于反常。但是这样总比呆在学校好些，在教室里我就困，就不舒服，出来了至少不会觉得太困。我把自行车停在一家礼品店前面，进去看看，买一点小东小西的也许能让我高兴起来。老板娘忙不迭地把一支笔送到我眼前：“刚进的货，水晶笔，试试看。”我不喜欢在没拿定主意的情况下试用商品。她倒是殷勤，随手拿来一张纸就往上划，写出来的是那种闪着光的字迹。我问道：“有没有蓝色的？”“有！”她干脆地从柜台里面拿出来一桶笔让我自个儿挑，我拿了一支蓝色的，几天后给DD写信也许可以用这支笔。我买了笔之后发现钱包里还有一些钱，我是那种有一分钱也要买根针花掉才安心的人，于是就四处接着看，又买了几张有唐诗的书签。我看了看表，回去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于是就出了礼品店，推着车，心绪茫茫地一路回了家。

11月2日

有句老话说：“屋漏偏逢连日雨”。这还是轻点儿的说

法，更可怕的就是在你爬上房顶想把漏洞修修补补的时候，老天爷一个暴雷劈下来，正好把你打个半死，我现在的境遇大概就和这个差不多。

迎来了第一件麻烦事，我就像被套进了一个魔圈中一样，第二件、第三件接踵而至，让我抽身不得。上午我骑车上学，半路车后轮胎没了气儿，而且它不是渐渐地跑气，是毫没来由地突然瘪了下去，这样我就是想将就着把车骑到学校都不可能，于是就只好推着它往学校跑，累得差点儿瘫在马路上。昨天因为种种原因我没去上第一节课，今天可不能再这样了，因为我并不打算成为老师眼中的逃学专业户。在这种誓死要当个好学生的精神鼓励下，我拖着两条灌了铅似的腿，飞快地推着车跑到学校，而且没有迟到，简直就是奇迹。因为车胎漏气，所以我就一直想着中午放学一定要趁早回家，免得耽误了吃饭、午间休息、背书、下午上学的各个环节以及影响全天的精神状态。

我把自行车推到学校外边的修车处，等着别人用完气筒轮到我。这儿有四个人在等着修车，都是学生。我可等不起，我只希望给车子打一点儿气，好让我把它骑回家的时候不至于再一次漏光。我都不知道到底出什么问题了：是这辆自行车方便了我呢，还是我在帮助这辆该死的自行车把它从学校挪回家。最可怕的事情我已经在打气的时候看到了：今天在N街那边堵车，一直堵到校门口。我很饿，不过那是刚才在学校里的感觉。我坐在教室里的那会儿很想回家吃午饭，可是现在看着面前的堵车长龙我就不觉得饿了，因为我的肚子都被堵车的情势堵饱了。我气急了，全身都是气，就是无处撒，真恨不得把手边的这辆还在丝丝漏气的自行车扔在大

路上。

整条街雾腾腾的，还有人在后面一刻不停地按着汽车喇叭。我推着车，站都站不安稳。这条街又是那么窄，进去了就别想出来，连推着一辆自行车都不能脱身。看着前方尘雾中一会儿缓缓前行两步、一会儿又开始打盹儿的车辆长龙，我产生了一种抵达某个朝圣的圣城一般的幻觉，大概这是我被饿得头昏眼花的缘故。不知道其它城市里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DD在那边学画画，哦说错了，学广告设计，也许经常碰上堵车吧。奇怪，本来今天的倒霉事儿多得就足以冲淡这件事，可是我又想起了她，不过我今天感觉好多了，铁石心肠的感觉真是再好不过啦。我就是不知道DD给我打完那个电话之后，她自己心里是不是也会觉得很难受。

我慌慌张张地吃完午饭，慌慌张张地跑回房间里去睡觉，但是睡觉并不是你想急着睡就能那么容易地入睡的，相反，你越是着急就越是睡不着，可我亟需补充十五分钟的睡眠，要不然今天下午和晚上我就等于没去上课，真是完蛋了我。

妈妈把我的自行车推到外面修去了，她回来之后告诉我，我上学路上到那个修车的地方去取，这就让我更加紧张。因为我老是在心里惦着到修车的地方去推车，最后干脆连觉也不睡了，掀开毛毯，气呼呼地坐了起来，背上书包去推车。我是那种还没验货就忙不迭地要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递给对方的人，所以我得赶快去到修车的地方付款以对得起自己的要命的良心。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急个啥，长这么大也没能学会先看货后交钱这最起码的一条社会经验。妈妈在我后边说道：“别急，钱已经给了。”

就在我刚走上公路的那会儿，后面有人大喝一声：“站

住！”那声音虽然苍老但是不失坚定，而且音量大得出奇。我心头一惊，好像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转过头来，我一看就已经明白了七八分：是那个经常在这儿一片游荡的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太婆，她已经老到看不出大概年龄的地步了，从声音也分不出是男是女。所以，我即使知道她是这样一个病人，但是碍于她是个老人，我还是停下了脚步，等着她走过来。她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袄，像游魂似的晃晃悠悠地往我这边来。她以前经常在这儿拦住路人，向他们询问自己家住在什么地方，她好像永远处于迷路状态，而且再也不能回到家里去了似的。我迎着地走了两步，好让她少走两步路。她个头很矮，抬起头来看着我，又不像是在看我，而是在看天上的什么虚无的东西。她终于开口了：“后面有一个人死了。”她看上去有些茫然的样子，又带着一些这种病人特有的认真态度，抬起右手指了指远处。她的方位感还不错，我叨咕着。她的一双干枯的手记录着她的一生。“是的，有个人死了。”我有点毛骨悚然地附和着她，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在大白天说梦话。“事情办得热不热闹？”她恳切地看着我，好像那是她活着所最关心的问题。我倒抽一口冷气，也许她要让自己不久就要到来的丧事办得和别人一样热闹，也许还不行——还要胜过所有其他的死人她才能心满足。公路上大卡车狂暴地掀起一阵又一阵灰尘的气流，空气中满是令人翻肠倒胃的汽油味儿，我就这样和这个老太婆站在路边，只觉得身上燥热难当。我灵机一动：“你回家去吧，你往东边走，东边有条巷子，里面就是你的家。”我没有骗她，她家就在那里。就在她琢磨着丧事和回家这两件不同的事情的关联，还没缓过神来的那会儿，我抽身溜走了，这让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卑鄙的大骗子似的。

让人感到绝望的事情总是没有个完结。当我到教室的那会儿，右边的同桌刚好醒过来，他刚醒来总是双目圆睁，怒视着面前的什么东西，好像正在心里暗暗发誓要给刚才那场春梦中死去的情人复仇似的。我把书包放在课桌上，他把一双充满深仇大恨的眼睛瞄过来，我身边的空气就这样凝住了好长一会儿。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坐直了身子，开始挖鼻孔。他挖个没完，完工之后就把手心手背放在眼皮底下里里外外地看了个遍，就差没把手举起来对着太阳看了。我在拿出政治书准备背那么一节的时候，他正在逐个把手指头一一细看着，那副认真劲儿就像红十字会人员在清点战争伤亡人数似的。他的手指头当然没出什么问题，他总不至于挖鼻孔用断了那么一两根手指头吧。我不仅仅对他毫不遮掩地当着我的面挖鼻孔恨得要命，我更害怕他挖完了鼻孔、检查完了双手之后，把手垂下来四处乱放。因为这样一来我就疑心顿起，总觉得他要把挖出来的污物顺便抹在我的衣襟上或者凳子腿儿上。他平时做事也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他拿了我的东西，要不是他自己良心发现告诉我，我根本就不会知道。和他坐在一起我已经学会了处处留意，我不是说我要留意他趁我不备把一笔巨款塞到我的书包里，一般而言，他只要能不把鼻屎（对不起，这个词儿不大文明）乱抹就算高风亮节了。现在我越发思念原来高二时候的那几个同桌，至少我跟他们还有话好说，现在我和右边同桌没什么话可说，就是跟他吵架你都会发狂。

打个比方，他让你不胜其烦，你骂他“给我滚回去”，他就还你一句“给我爬回去”。连回敬你一句骂人话他都缺乏创意，一句话只改动了一个字然后就扔给你，甚至有剽窃我脑力劳动的嫌疑，所以我不和他吵架，因为听着同样的话

跳来跳去那简直就是天底下最折磨人的事儿。左边的同桌，我根本就不能和他讲一句话，他是那种从小喝可乐吃炸鸡玩篮球长大的亲美狂人，我恨透了美国的经济化文明，所以连带着他也一块儿不喜欢。今天我心情不大好，还特别想找人说说，于是我只好找右边的同桌说两句。我这人就是老鼠爪子一落地就忘了事儿的那种人，所以就是以前我和他再怎么不和，转眼之间就会忘，不知道我脾气的人还会说我是个软骨头，我大概也正是这样的人。我放下手里的书，向他问道：“哎，知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就到21世纪了？”

“什么？”他停下那只正在什么地方乱抹的爪子，皱了皱眉头，好像我对他说他欠了我一笔钱似的。我知道他这人就是拿皱眉头来表示兴趣的，因此也没有在意他的表情。

“21世纪。”我拿起圆珠笔，在我自己的课桌上写下这个词的英文。我本来想让他知道，离21世纪已经非常近了，借此让他一露惊讶的表情，这样我自己也会觉得很振奋，可是我高估了使他惊讶的可能性。我抬起头来，他粘不拉叽地给了我一个白眼，好像在责怪我不该拿这种屁大点儿的小事去烦他似的。他和别人交谈，惟一的兴趣所在就是跟人唱反调；老实说，爱在一些小事上面跟别人唱反调抬杠的人，大都是蠢货，因为他们老是想靠着唱反调来表现自己很有主见，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只能沿着同一条直线，完全反着别人的思路去拼命拉动，这样就把自己的力量抵消了，这就显示出他们只不过都是些大笨蛋。“离21世纪还远着呢，从物理学上来讲。”他俯下身子，拿过我手里的笔就要作图，这下该让我皱眉了：他刚刚用手挖过鼻孔啊！我明确表示不想听他说什么黄道十二宫，还有他刚刚发现的物理学绝对论，他也知道收敛，把笔扔过来，我慌忙去接。他已经摔了我一支钢笔

了，可是还不吸取教训，倒是我吸取了教训，对自己的东西越发小心翼翼起来。他从抽屉里掏出一个小收音机，把耳机戴上，在打开收音机之前他指着我才写在课桌上的字迹，说：“你的字写得太赖了，连我都认不出来。”

“哦呦。”我惊叹了一声，没听说过写英语还要按照书法标准去写呢，我吃饱了撑的啊。他还好意思说我字写得赖，你没看过他的字，就像是一群千年老鳖在纸上乱爬似的。我知道一些只能认识自己写的字的人，他们一般很难认清出自别人之手的字迹，可是要说我这个同桌，他恐怕连自己刚写出来的字都不认识，所以我从来都不敢借他的笔记抄。有一次我借了他的外语笔记看不懂上面的一句话，问他那句话写的是什麼，他拿着笔记本，憋了老半天，我怀疑那是不是他自己写的，最后还是我自己连猜带想地认出来了，不过就是“定语从句”两个单词。

放学路上我骑着刚修好的自行车，实在受不了了：我的自行车是红色的。这辆车是爸爸给我买的，他在买东西的时候就爱鬼使神差地买红色的东西：红色水杯，红色剃须刀，红色电话，家里可以说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简直成了革命根据地。我不知道他哪儿来这么严重的红色情结，我倒不是说爸爸为人俗气，他并不俗气，可他就是不由自主地爱买红色的东西，就像我不由自主地爱买蓝色的东西一样。当年家里买冰箱，要是有红色的话，我估计他都会买回来一台。

我迷迷糊糊地骑着车，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集中精力想些什么。从今天下午上学开始我就没法收拾我的大脑，太乱，今天我遇上了许许多多的倒霉事儿。在一条大街上，一排小汽车把强光向我直刺过来，刚好我到了十字路口，被强光晃得大脑一片空白，除了一片雪亮，什么都看不见，当时

我整个儿人都凉了，生怕被来来往往的车辆给撞飞。我今天真是昏得可以，一个极度愚蠢的念头又把我鬼使神差地带上了R街。这条街肮脏之极，下过雨都晴了好些天，这儿的水坑还是不见干，我得像趟过河一样从这条看似小街、实则为一条臭水沟的地方把车骑过去。今天偏偏就在街道前面还横着一辆紫不拉叽的破皮卡，正好堵住了街心，好像在那里向行人扬言：“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我四下里看了看，总不能老是在这儿站着。旁边有一小溜稍微干一些的路牙子，我要是想过去，只能扛着自行车从上面走，可是我对自己能否完成这项高难度杂技很没有信心。我又看了一眼前面的那辆瘫软的破汽车，怒不可遏。如果我的腿够长的话，我会把它一直伸到那辆车旁边狠狠地踹它几脚，但是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推着车，无可奈何地折了回去，这样一来又耽误了十分钟。唉，今天我的神经看来又要被这些细碎得要命的大大小的狗屁事情给弄得彻底崩溃了。

11月4日

大街上下班放学回家的人都不少，一个卖花的老太太推着满是盆花的小车，沿着街道茫然地慢慢走着。她的头发全白了，腿脚也不大方便。她停了下来，周围没有一个顾客。那些花儿虽然并不名贵，但是带着一种家养的朴实和健康。马路上的空气那么恶浊，花儿却在卷起的烟尘中闪着星星点点的亮色。我本想过去看看，但是又不习惯在大街上买东西，于是就走开了。

下午的历史课叫我倒尽了胃口。当讲到有关郑和下西洋那道题的时候，历史老师举一反三地问道：“为什么郑和只下了七次西洋而没有下第八次呢？”这简直就是促狭，这堂历史课因此成了差不多和脑筋急转弯一样的益智游戏。我估计郑和老爷要是下了八次西洋，现在历史老师就会问我们郑和为什么没有下第九次，这肯定不是学习历史的正确方法，至多只能说是给大脑做体操，不过，也只有高考之下的历史课才会编造出如此奇怪如此荒谬的问题：就是那么一个史实，他们需要用它当材料出试题，于是横的、竖的、正的、反的，都出了，这还不够，他们还要把它翻个底儿出一些看似巧妙、实则花哨的狗屁题目来折磨你，还说这就是素质教育。

我冷眼看着历史老师，我知道那不是他的错，教师也是受害者，但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如果所有的人都坚称无辜，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所有的人都是帮凶、都是凶手，因为他们正在纵容对人的犯罪。难道我们能够相信所有的人都是精神上的自虐狂不成？人人都坚称自己是受害者，这大概正是我们一直受害的原因：首先，没有凶手或者帮凶；其次，拯救者也不可能在这种混沌状态下出现。到最后总会有人把账算清。我并不是说教育改革到最后要把老师们都拉出去枪毙，没那么严重——但是我相信，他们在这种奇怪的教育体制下真正作出的贡献，总有一天会被进行符合历史和事实的正确评价。

我在经过这条每天必经的小巷时，感到自己落入了别人的视线之中。被人注视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儿。我侧过脸去，是个老头儿，他坐在家门敞开的堂屋正中央，看上去就像一个被人供奉的干瘪萎缩着的神龛一样。他正在晒那初冬

正午的太阳，他目光漠然地正对着巷子，来来往往的路人都看见了，可是他什么印象也没有。真可怕，什么印象也没有，这大概也是他一生对这个世界的最终结论。每个人都认为，老年人仅凭着年龄就有发言权，可是我倒觉得他们并不具备多少对事物最准确的判断能力，他们只是顺水推舟地拿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经验之谈，这最让我受不了。一个人要是老到光靠经验过活的地步那就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有一次，大概是初中的那会儿，我问住在我们家旁边的一个邻居——他是一个老头儿——我问他，1937年日本侵华那会儿这座城市是什么样，老头儿一乐，不屑地抬起眼皮，反问我，这个有什么好说的，不就是那样吗？哪样？我被他的话弄得一头雾水，看着这个故作高深的人我感到害怕，不知道人要是老了是不是都爱像他这样当着小孩的面卖老，反正我平时是不愿意和他们接触的。

“你今年都多大了，内裤还要我给你洗。”我把衣服换下来扔到外面的时候，妈妈抱怨了一句。

“多大，不就是十七岁吗？”我穿好衣服，出来吃午饭，随口嘀咕了一句“我才不想长大呢”。

“你这是逃避即将承担的社会责任。”爸爸把手里的报纸放下来，正色道。他的观点大部分都和报纸里边的卫道者们差不了多少，我甚至搞不清他们这一代人是否有属于自己的真正观点。

“我并不是逃避责任，原因比这个要深得多：因为社会太肮脏，我不想急着跳进去。”我试图向他说明。

“肮脏？你给我说说看，它是怎么个肮脏法。”

“这倒不好说，就像要我说一座公厕是怎么个肮脏法一样，我三两句话说不上来，可是它明摆着就是肮脏；说公厕肮

脏不需要理由，说社会肮脏也是一样，不需要理由。又不是证明数学公式，它明摆着就那么肮脏，我还没跳进去，站在这个大泥坑边上我就开始极度恶心了。”

妈妈把菜盘子端了上来：“别吵了，你们爷俩话又说不到一块去，讲了两句就拌嘴，以后就不要说了。”

确实如此，我拿起筷子，回想了一下，自从上高三以来，我在家里说话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

晚上上学前我把语文作文本带上了，今天晚上是作文课。上次写的是一则材料作文，材料内容大概我还记得：一个被叫做“运动鞋”的家伙，（那些材料里面就爱把人称为“运动鞋”“眼镜”之类的，实际上你要是在现实中朝人这么乱喊，不被人一刀劈死才怪）走在马路上吃了一根香蕉，把香蕉皮随便扔在路中间，然后他突然想起来，他那慈爱的老娘就是因为前些天走在路上踩到了一块香蕉皮，脚底下一滑才去了西天的，于是在这件不幸的事情的教育下，他屁颠颠地不知从哪儿拎来了一把扫帚，把刚才扔掉的香蕉皮小题大作地扫到了垃圾箱里去。作文要求是：请按照上述材料，展开合理想象，把它写成一篇记叙文，并总结出该文的中心思想。真是活见鬼，本来就是乱编瞎造的材料，还叫你“展开合理想象”，我只能不着边际地按着要求乱喷一通，写到最后回过头来一看，我差一点就把文章写成了星球大战。

11月7日

昨天中午没有睡好，我躺在床上那会儿眼睛睁开的时候

间比闭上的时间还要多得多，今天也是，因为我老是出于一种对什么都不能确定的疑心重重的焦虑，想把写字台上的闹钟再看一眼，就这样抬起眼睛看了一下又一下。我在心里总觉得闹钟出了一点儿问题，时间不准，但是我每天都把它对一遍了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紧张个没完。睡觉不成，于是我就起床做数学试卷，这样大概可以缓解我的焦虑。苍天，各种讲义和试卷没完没了，我就是把一生中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上面都无法把它们做完。我甚至怀疑，到了明年夏天高考考完的那会儿，我还会有十几本练习题上面一个字都没写呢，肯定是这样。我现在几乎把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一一压缩到了极点，就是为了完成那永远也无法完成的、无底洞一般的要命的学习计划。再这样下去，我就要演化成一个整天在习题和各种资料的森林中过活的当代野人了。

一想到班里的其他人都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拼命地背书做题，我就会为自己的懒惰慌张起来，我甚至只要动一动躺下来歇息一会儿的念头就强烈地感到自己是个有罪的人。我只是希望在做完了一道题之后，趴在写字台上闭那么一小会儿眼。“大概这还算不上有多么大的罪吧。”我在心里暗暗地问自己。在五分钟的闭眼时间里，我只是仅仅把眼睛闭上了，我的大脑却由不得自己地狂想一通。我还能想些什么，只是大脑出于惯性把刚才所背的东西很折磨人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而已，就像发动机在停车之后也会惯性地运转一会儿一样。政治老师要是知道我在中午闭眼的那会儿竟然还在大脑里面翻来覆去地想着书上的内容，他大概会很喜欢我吧。今天上午的政治课，他把试卷上选择题的正确答案往小黑板上上面抄：第四题C，第五题B，依次往下，BDDBD，ACBBA，ACDAB，BCDDDB，听听，还押韵呢。老想着这些不着边际的

东西总不会是一件叫人高兴得难以自持的事情，恰恰相反，我感到很痛苦。我捧着头，狠命地把它拍了一通，要让它停下来，我简直受不了自己的脑袋了，它这么失控般地乱哄哄地想下去准叫我发狂，我得赶快准备书包去上学！

乱七八糟的事情一直盘踞在我的脑子里面，一直到上第一堂课才渐渐恢复过来，也不能说是恢复，那是因为我又的确开始犯困了。数学老师把这张关于不等式的综合讲义讲得这么快，好像是在卖弄水平似的，我一点儿都没弄明白。我在课堂上迷迷糊糊的，想睡又不敢睡，脑海里浮现着各种各样凶相毕露、相貌粗野的表情，就像做恶梦似的。我的同桌在睡觉，他趴在课桌上，脸都睡扁了，像一只溺水后又被车轮压成肉饼的死老鼠。我飞快地把头左右摆动了几下，跟刚上岸的水鸟一样，我知道这样至少可以让自己暂时清醒一小会儿。“我能不能在课堂上放开嗓门唱一支歌呢？”——我心中突然冒出这个奇怪的念头，要是真的唱起来，连老师都会被我的举动吓坏，他会在我的歌声中吓得像个木桩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想象得出他那副因为受惊而痴呆的可怜模样。哈哈，只是在心里跟自己开个玩笑。我既然老是困个不停，那就不要再上数学课了，还是把政治课本拿出来瞄两行吧。

右边的同桌猛地打了一个大喷嚏，风格相当豪放，也不拿起书呀什么的把嘴巴挡一下，他只要把面孔再侧过来一点点，唾沫星子就喷到我脸上了。前面的女生侧过头来，皱了皱眉头，可是他却若无其事地撇着嘴巴，拿起了语文讲义继续往下看。我虽然能感觉得到空气中有一阵腥味儿，可是遮掩的动作很轻微，尽量不伤他的自尊心，只是拿起课桌上的一本书，小心翼翼地挡住了自己的鼻子。他看出来，叽叽

咕咕地说道：“干净得像只屎壳郎。”这句话说得我火气冲天，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似的。我说：“说什么呢你？”我在课堂上说话是相当警觉的，这会儿语文老师把目光抛了过来，同桌正要反驳我的话，就在他轻启朱唇准备跟我吵架的时候，我连忙用胳膊在课桌下面捣了他一下，提示他老师正在注意我们，他也有些灵性，马上抬起眉毛，小心地看了看老师，这才安静下来。虽然他不再说话，可是我看得出来他肚子里有话又没机会说的那种滋味憋得他有多么难受，让他憋一下也好。现在就让我集中注意力不妨听听语文老师在上面叨咕了半天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吧。哦，明白了，他现在说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到底是不是作者本人。我懒得听这东西。小说都发展到什么时候了，这帮搞语文的还在重复着老一套废话，又不是什么大问题，干吗老是不停地说了一遍又一遍，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把昏花的老眼给睁开，看看人家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还在像死人似的就这种超低级问题说个不休，简直就是笑话。

对于马上就要到来的新一轮考试，我要做好准备，背这个，背那个，还要做完数学题；据一些消息说高考在时间上还有个重大改革，然后教育部马上就出来说根本没这回事；还有，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已经神情恍惚，无所适从，云里雾里的，就像一个进了超市要买很多东西却老是想不清楚到底该买些什么的人一样。放学铃声响起，我有一种终于付完了欠账的如释负重的感觉，可是这还没有完：我到了存车处，一看，嘿，车后轮胎又没了气儿，我差点儿瘫掉。不是前几天才修好的吗，怎么今天它又跟我过不去，唉，高三学生难道就这么命苦吗？

11月9日

“洋务运动，”说了好长时间，历史老师终于给了这个东西做了考试答案所认定的最具权威的总结：“可以说确实给清朝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洋务运动的成果，只不过是晚清王朝回光返照的一些表现。”外面的天气还算不错，阳光把深秋的最后一丝热量照射在空旷的操场上，也算得上是最后的回光返照吧。这个秋天，走了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我心中有一个梦想，就是一生能永远生活在春天和夏天里，这很容易啊，因为地球是圆的，我将来就会绕着地球从上往下像条正弦线似的跑啊跑，永远追逐夏天，把秋天和冬天远远地抛在身后，仿佛死神也不能抓住我啦。

我上着课，又想到了早晨迟到的事儿。虽然数学老师让我进了班，但是全班同学都看见我迟到了，这样一来，班主任下周要是发现班级操行总分被扣，来查这件事情就会方便得多。我把右手支在右边同桌的凳子上面——当然不是让他的屁股压着我的手，他今天上午没来上课，昨天晚上的预言得到了证实。昨晚放学前，他对我说：“希望明天早晨还能见到你。”好像很恋恋不舍似的，他还是第一次对我这么斯文地说话。我转念一想，大概是他认为自己活不过今晚了，于是说：“年轻人不要消沉，往后还有奔头呢。”因为昨晚外语试卷发下来了，我看见他考五十多分。谁知道他还了我一句：“你以为我说什么，我是在说你呢！”那口气好像我得了绝症似的。不过从今天的情况看，还是我想得正确：是他没来，而不是我。我希望他不至于因为外语考了不及格

就一病不起，他早上不来上课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相比较而言，我的迟到就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我下午放学出学校的那会儿，全城都在清扫街道，大概是上面要派员下来检查，这是一个需要一刻不停地敦促才能干出些事情来的衰老的城市。无论怎么样，清扫一下，的确让人精神稍微振作一些，要是再不打扫，空气中的浮尘就多得能让我体会到在泥土里骑车的滋味了，真希望上面能经常派人下来检查卫生。洒水车过来了，我躲了过去，有个骑着车的男孩从旁边一直往水帘中冲去，他被浇得满身都是水，看上去他是故意这样的。这个瘦弱的孩子在我前面把车摇摇晃晃地骑得飞快，真让人担心会出事儿。他肯定不是个学生。你看看这是多么奇怪：如果不上学，就会像他那样，如果上学，就会像我这样。二者都是相当难以下判断的奇怪的生活方式。我倒觉得我的生活更加没有意义，因为比起他来，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徒劳无益地背书做题应付考试，并在重重的慌乱之中体会生活带给我的紧张、压力和恐惧。我看着远处，学校大门在灰尘中若隐若现，那真是一个陷阱，而且，只有深陷其中的人才能体会到它潜伏着的巨大的危险，我在这里怎么说都不会有人相信我的话。我无法调转自己的方向，我只能乖乖地自投罗网。校门洞开，门口的水银灯坏了，校园里黑洞洞的。我闭上眼睛，再一次被学校乌黑的大口吞噬。

11月14日

这次联考考完了。我上高三以来，熬过来了五次大考，

每一次都有一种从战场上的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感觉，我就这样没命地往前爬呀爬呀，真是太可怕了。这次大考是“一联”。什么“一模”“二联”“三质检”，没上过高三的人要是听了这些词儿，没准以为我在说鬼话。我在放学路上碰到了隔壁班的BB，他说他好长时间没上网了，他这次考试语文作文写跑题了，就是油锅里有一只青蛙，给油锅快速加热或者缓慢加热，青蛙会有什么反应——跳出来，或者被活活煮死，根据材料写一篇文章，出试卷的人本意是要考生写一些居安思危之类的东西，可是我总觉得拿油锅煮青蛙简直就是变态，至少，在语文试卷上出现这种王八蛋题目，本来就是鼓励或者教唆变态。能出这种作文题的人，照我看比谁都冷血，就这种人还能被当成什么狗屁语文专家找来出试题，简直就是疯了！BB说，他把材料看走了眼，以为是要求写一篇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材料作文，于是就写了一篇保护环境和动物的议论文，等到写完了才发现试卷上的材料是关于煮青蛙做试验的，可是他再改已经来不及了。也许是因为经常上网导致他注意力难以集中，无论看到什么都是一目十行一晃而过，所以才出了事儿，不过这也不能怪他。看着他怪可怜的，一路上老是说着这个事情，我都不好意思打断他，后来他自己换了话题。“唉，”他摇摇头，好像没几天活头了似的：“下周对我来说肯定连天空都是黑色的。”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下周考试的排名就能统计出来。从上次第二次质检开始学校就恢复了考试排名。“我到那边买圆珠笔芯。”这时我和BB已经到了岔路口，他再也没说什么，我就往那边走。“我劝你还是买一支笔吧！”他在路的另一边突然冲我叫道。他这么一说我开了窍，对啊，我干吗不买一支新笔呢。

下午发政治试卷。我考的分数刚好能不让我觉得难受，一百一十多分。我对考试分数的评价没有“好”或者“不好”，我只要它不让我觉得日子难过就行了。考政治的那天我还记得，当时我拿到试卷头脑就乱七八糟，因为脑子里面背的东西太多，就像一个塞满杂物的衣柜一样：你猛地一打开，背过的问题就像垃圾一样铺天盖地地压下来，让你没法收拾，几乎分不清谁是谁。看着面前的试卷，我愣了好长时间，不是不会做，而是因为背过的东西都粘连在一起，使我无法把它们一一理清头绪，我濒于精神崩溃。坐在我右边的那个人把试卷写得飞快，就连桌子都被他的钢笔搞得咚咚直响，这样我就更没办法安下心来做题。我注意到他在回过头来检查单项选择的时候试卷上有一题答案没选上，大概是犹豫犹豫拿不定主意，于是我就在旁边恶作剧似的小声说：“选D。”他就像突然被人非礼了似的，心神不宁地回头看我。他准是那种考试从来不给人抄、自己也从来不抄别人的坚持原则的优秀学生。他慌里慌张地遮住试卷，好像那是什么宝贝似的。我根本用不着抄别人的，我只是一时头脑混乱，然后我好多了，我开始写试卷。

左边的同桌向前面的女生要了一张刚发下来的校报，他看书报的时候就像害怕有人来抢似的，把它们遮得严严实实的，我只是在他拿过来报纸的那会儿瞟了一下报纸，他就带着怀疑的目光给了我一个眼色。我看到了校报上这一期的专稿，是学校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教育专家写的东西：《如何给自己增加压力》。你应该知道那些所谓的教育专家都是什么货色，就是在“高考一线奋战二十余年、培养出四届高考全省文科状元”、衣着光鲜、自信得不得了“现代教育状元”，没准儿还获得过上面的物质重奖，反正我在电视里就

经常看到这个写专稿的专家代表学校出来亮相。有一次他录了一个高考前政治强化的教学节目在市电视台播出。我刚看电视就听见他开口就是一句：“下面我就来告诉你们，对这句话应该怎样分析。”刚愎自用的派头无以复加，我恨不得狂踹一脚把电视给踢炸。现在他又来了个《如何给自己增加压力》，肯定又是鬼话连篇，不过，虽然里面都是胡扯，但是凭着他那种一句一句地把小道理想当然地往前推的本事，照样也能说得头头是道。这样一套一套的鬼话，我是不会去看的。还要给自己增加压力——笑话，我要是再给自己增加压力马上就会被炸个粉身碎骨不可，何况我自己的压力阀并不是控制在自己手里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考试、测验、背书、做题，完全都不是我自己能左右的，不要说给自己增加压力，就是想碰一碰自己的压力阀都不行，给自己增加压力，哼，简直就是大白天的梦呓。我拿起钢笔，这支笔就是前几天被同桌摔得龇牙咧嘴的那一支。我发现用它来写政治试卷和做政治笔记比较好，因为笔水一个劲儿往笔尖上蹿，这样一来你写起字来就不得不加快速度，免得笔水滴下来弄污本子和试卷。做这些没完没了的政治笔记，就是要像抢人似的飞快才行。我在政治课上几乎就是一台写字机器，所以这支漏水笔特别配得上在政治课用。

就在我把这支笔拿出来试那么一试，准备上政治课用的时候，右边的同桌醒了。他开始咳嗽起来，一阵强似一阵，我看了揪心，说：“你怎么不去买瓶糖浆灌它几天啊。”他朝我摆了摆手，还在强烈地咳嗽，我想起前段时间学校里有个得了肺结核的学生，但是同桌的样子倒不像肺结核，难道一天睡到晚的人能得肺结核不成？这几天来他和我一直处于和平状态，前一段时间我们意见不合还会吵那么两句，现

我呢，由于我天生讨厌那种你一言我一语地吵、却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行为，再加上他咳嗽得厉害，所以我们连架都懒得吵了。

我现在不喜欢家里来客人，因为我相当累，还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如果有人来的话，我就得赔笑脸，这样就让我在心里加倍厌烦和劳累。家里远房亲戚又多的是，而且大都是我以前没有见过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的亲戚。今天来的是一个据爸爸说我应当叫他叔叔的人，随便怎么叫我都无所谓，我甚至还碰到过比我大起码三十岁却管我叫爷爷的亲戚，真是吓人。于是从吃饭起我就对这个叔叔笑脸相迎，我的半碗饭还没吃完，脸就完全笑僵了，但是我一直闭着嘴巴不说一句话，我在陌生人面前很容易犯低级错误，所以还是不说话最好。爸爸说，你这个叔叔是上海×大毕业的。我知道他们又要趁着机会给我上一堂人生社会哲学课，但是我很抱歉，我太困了，要是不想今天晚上死在课堂上，我非得去睡一会儿不可。当然嘴上不能无礼，我说，你们慢慢聊，我进去写作业了。

唉，我长叹一口气，不知道天底下还能不能找得到比我更累的人。我还不光是累，我慌，我怕，在压力、身心俱疲和无尽的恐惧之中，我的身体几乎变成了一摊烂泥，我的头脑快要被逼疯了！不知道这次考试我能考多少名，下午就要发政治试卷，我担心得要死。我重重地坐在沙发上。妈妈在外面喊我：“汤好了，来喝一口吧。”我没回答，我虽然还有些饿，但是我不想出去把饭吃完，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仅仅靠着吃饭生活的人。反正考试也考完了，今天就让我把前些日子买的小说拿出来看看吧，看一看小说也能让我获得一些非现实的力量呢。小说，虽然它给我的力量只是感觉上

的，但是，我要是觉得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一定要把它们拿出来看一看。不错，我就是靠着阅读，才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坚持着生活下来的。我能大言不惭地把自己的一天又一天说成是生活，正是因为我在干着阅读和写日记这些还能让我生活得有那么些意义的事情呢！

11月15日

今天刮起了大风，又干又冷，路面被风刮得白晃晃的，一点儿杂物都看不见。大风迎面抵过来，让人呼吸困难。这让我想起前些天看到的一个新闻片：在地震现场，救援直升机上上下下地飞，就在一架直升机席卷着强烈的气流、准备降落在周围满是伤员的场地上的时候，一个消防队员把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遮在距离他最近的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脸上，好让他不至于在强风中呼吸困难。这个镜头我到现在也忘不掉，不单是因为那个消防队员这么做了，而是他干这行也能这样细心感性，真让人敬佩。我想当个消防队员，可我又担心不能忍受在工作中看到的一切，何况，在中国要说“想当个消防队员”是肯定要遭到别人讥笑的。

我把书包放进抽屉，课桌上有个本子。我想不起来高三做过什么课堂作业，因为我每天要做的试卷和讲义就够多的了，在练习本上做作业完全是不必要的。我正要把本子拿过来看看，右边的同桌突然一把将它抓了过去。

“是你的吗？”

“不是。”

“那你抢什么？”

“我拿来打草稿不行吗？”

“行，那有什么不行的。”跟强人说话，你只能顺着说，不然又要吵架。他经常性地先下手为强，而且自私到了极点，鬣狗看了都要让他三分。我掏出信纸来给DD写信。今天下午的课可上可不上，一节语文，两节历史。我说的“可上可不上”，并不是说连逃学都行，我的意思是说，在你的肉身坐在课堂里的前提之下，你可以专心也可以不专心，你的脑袋用在什么地方都无所谓。我今天下午就准备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写一封信给DD上面，而且是一封长信。我正在想怎么开头，右边的同桌就把他的胳膊抬了起来，他的目光从抬起的胳膊下面向我射过来，看来他对我面前摊开的这张信纸有些兴趣。“给我两张。”他理直气壮地说，好像我欠他似的，那口气容不得我说半个“不”字。

我说：“这可不好办，我现在只有五张，写信还不知道够不够，你要是要，那就明天再说吧。”我可不想再像上回那样，他一张嘴问我要拍纸簿我就特地给他从家里往学校带，还诚惶诚恐地唯恐他不满意。现在我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人了，最可怕的是他向别人要东西要惯了，要了还想要，简直把我当成了阿里巴巴的藏宝大山洞。有一次，我左边的同桌正在用双面胶粘东西，好像是要把写给女朋友的信封封上口，我右边的这位看见了，一句话也不说就忽地把胳膊伸得老长，隔着我的桌子就去抓左边这位手里的双面胶。以我左边这位的性格，当然肯定会不要命地死死按住双面胶不松手，于是：一只胳膊像劈雷似的闪过来，另一只胳膊像闪电似的回过去，两个人的四只胳膊在我的面前麻花般地绞缠着。一个不要命地抢，一个不要命地夺，我在中间笑得像个疯子似的。最后左边的这位发火了：“你干什么，我这里又

不是人民公社！”右边的这位这才收敛一些，把手松开。反正他是永远也不会对你说“请把××借我用一下”这种话的，至少没对我讲过。因为他这种劣质的性格，我观察了他很多天，他没有一个朋友，反正坐在这里的人没有谁会主动找他说话。好多天前我跟他吵过一次，他把那句每次吵架必说的话当着我的面很绝地又说了一次：“你以后永远也不要找我讲话，看你到时候用到我我还理不理你！”他这话里面明显有两处错误：首先，不是我经常找他讲话而是他找我；其次，他把这话说得好像我每天都在涕泗滂沱地求他办事似的。他给我添了无穷无尽的麻烦，经常把我在学校为自己苦心营造的好心情打下十八层地狱，反倒说我怎么他了。老实说，要不是我还肯跟他搭上那么几句话，他差不多已经成了孤家寡人。那次吵架我也受不了了，我说：“你不用跟我斗，你指给我看看，班里哪个人是你的朋友？”他指不出来，当然是这样。

“我的朋友不在班里，我的朋友遍天下！”

哎呀呀，说得也是，他的朋友遍天下。要想找到和他同类的人其实很容易，高中里面应该能找到不少。事实上，你不管上过高中还是以后上了大学，学历有多高并不能说明你真的接受过良好教育，像他这样的人一抓一大把。捧着大学本科甚至硕士博士毕业证书，照样能像强盗似的挤占公共汽车、碰了人也不知道说一声对不起，别人为他提供了方便他心里面还认为这是别人应该的——一句话，学历再高也不能说明你受过良好教育。可怕的是我右边的这个同桌将来还很有可能考上大学，这样他就能披着一张高学历的画皮四处折腾人了，简直就是魔鬼一个。幸好这次考试排名下来之后要重新排定座位，我认为我不会再一次碰上他这样的人，除非

班主任认为我和他坐在一起没有必要调换，那样的话我肯定去找班主任，告诉他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调换，不过这些都是长远的事情，现在还不用着急。

“拉斐尔拉斐尔西斯廷圣母西斯廷圣母，”右边的同桌捧着历史书又开始念经，他背书总是要出声，这又是他的一大罪状，害得这儿每个人都不能安心做手头上的事。他半闭着眼睛捧着书，那半死的样子好像快要断气了似的。我敢打赌你就是把西斯廷圣母这幅画拿到他面前他都没法认出来，他就知道在这儿木着脑袋念经似的背着历史书。我侧过身子，尽量不要让他大声背书影响到我。我拧开圆珠笔，刚买的笔又坏了，打开来不小心弄了一手圆珠笔油。我把干净的一只手放到抽屉里摸，找一张废纸什么的。怎么就这么缺记性，昨天下午我才把桌屉收拾干净，现在就是找也找不到什么。

“有没有废纸，借我一张？”我问右边的同桌。“借”废纸，太可笑了，不过毕竟要礼貌一些。

“没有。”他非常干脆地说了一声，大概还记着我刚才没给他信纸的事儿，可我把道理向他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唉，看来一个人要是被利益遮住了眼睛，什么道理都听不进去。他“没有”这句话说得倒是干脆，可我明明看见他的课桌上摆着我前几天带给他的拍纸簿。看来他还有点良知，看我一动不动等着他，就放下架子撕了一张给我。前面传过来一叠讲义，这两堂历史课做讲义。我接了过来，他一下就抽走了三张，正在我觉得奇怪的当儿，他把多余的两张塞到屁股底下垫板凳了，我原以为他这是要拿一张给我呢。我没再说什么，自己抽了一张，把讲义往后面传。

第三节课上我最想干的事就是跳下座位搬个凳子让语文老师安安稳稳地坐下，不是我太尊重他，而是因为当下面的人都

在写语文讲义时他总是绕着教室逛来逛去，还老是冷不丁地把头探过来看你写的是什么，写了多少，或者是不是在看其它的书。我虽然在非常乖地写语文讲义，但是他这样监视着全班，总让我觉得自己是个贼，这种气氛非常折磨人。就在我把讲义翻到背面的时候，老师像一阵风似的从我后面把脑袋探了过来。我坐在靠里面的位置上，左边是同桌。他温和地问我：“你在写什么呢？”问我？我吃惊地抬起头来，我那眼睛大睁的受惊样子一定很可笑。在他弯下腰的一刹那工夫我已经下意识地把正在写着的语文讲义遮了个严严实实。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下以示抗议。他的脸色凝固了，虽然还保持着笑容，但是心里面已经冰冷，我要是看不出来他心里的尴尬我就是傻瓜。左边的同桌责怪地看着我，好像是要我快点想办法把他支走，因为他弯下腰来就把同桌的课桌压在了身下。我本来就在写语文嘛，我毫不在乎地把语文讲义摊开。他直起了腰来，带着一种抓错了人又心有不甘的样子，踱着步子走开了。

坝基公路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处垃圾在焚烧，好像烽火台一般，一眼望不到头。一股塑料味儿直冲脑门。风从河面上刮过来，垃圾焚烧产生的青烟顺着微风攀进了城市。我回到家里，看到浴缸中放了很多水，三条大鲤鱼沉在浴缸底部一动不动。我把手伸进浴缸，它们却不让我碰一碰，赌气似的躲开了，可我就是想摸它们一下，这样一来就上演了一幕人鱼大战，浴缸里水很多，水花被鱼儿溅得到处都是。大概它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了吧，所以这样不高兴。其实我心里虽然不希望这些鱼儿被做成菜，但要是真的做成了菜，我恐怕比谁都爱吃，这是不是有些人面兽心啊？

晚上政治考试，班主任代替政治老师监考。他有时就是

一个义工，但是我们情愿不要他瞎忙活，因为这就意味着考完了试他会有些事情趁着机会要通知，总是这样。他能抓住一切时间来通知各种各样的坏消息。这一次，我相信他是要公布上次的考试排名。我比较心平气和地把政治试卷做完了，同桌没那么幸运，他被班主任骂了一下，因为他在考试的时候不老实。他一会儿狠命地抓腿，一会儿找后面的人说话，特别活跃，我还以为他早已做完了呢。我认为上课转头找人说话是一件叫人特别咬牙切齿的行为，可同桌就是说个没完，他就在班主任眼皮底下这么干。大概他认为这次质检考得好，今天太兴奋了。班主任在讲台上点了他的名儿，问他是不是要交卷，他这才把试卷往下做。老天，我一看，原来他刚做到第二题。在交试卷的时候，他的动作吓了我一跳：他不是像一般人那样工工整整地把几份试卷折好，他是用一只手拎着几张试卷，另一只手猛地拦腰一砍，把试卷劈折，或者说他的动作就是猛地一砸也不为过，那残暴的动作看得我触目惊心。我恨不得马上拎起书包逃回家去。但是，马上班主任要回来公布分数和这次质检考试的排名。

就在班主任把试卷收完，回办公室把工作手册拿过来宣布考试排名的当儿，我在想着我的自行车，我担心车又没气了。今天中午我放学那会儿车又没气了，这次是前轮胎。我把这堆稀里哗啦的废铁推到上次修车的地方，那个老头儿不厌其烦地问我哪儿哪儿需要修理，老年人总是爱把一些简单的事情在嘴里叨咕上几圈，让它们变成麻烦事。我说，你看着办，下午上学我来取。修过的车用起来还不错，但是我不能确定它现在是不是好好的，晚上十点多钟推着车半死不活地往家赶可不是一件叫人舒心的事儿。不过，比起我那辆不争气的破车来说，更让我担心的是即将揭晓的考试成绩。我

在日记里面不想把班主任公布考试排名时的那种煎熬人心的气氛详细写出来，反正当时你要是神经系统不健全，恐怕坐在课桌前都有可能大小便失禁，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在学生时代受过那种罪。

我考得到底怎么样呢？不错，我第十五名，“小小的进步”——这是班主任说的。他在历数班级前二十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幸得到他简单的几句分析；二十名以后的就省得他动嘴皮子了。要是全班每个人他都要说上几句，那今天晚上我大概就要睡在教室了。“小小的进步，”我在他布置着下半学期的学习计划时暗自思考着：“可是从哪方面讲我进步了呢？分数？名次？这些东西要是上升了，是否就意味着一个人进步了呢？我还是看不出来，奇怪的评价方法。我要自己的名次比上次高，那与其说是我要求进步，还不如说是我害怕退步，这两种说法虽然从结果上看都是一样的，但是感觉肯定不一样：一种是像个傻瓜似的认为自己在进步进步进步，但是我却因为需要摆脱交织着担心、恐惧和慌乱的生活，努力使自己远离不安，就得迫使自己不要退步。我做到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有彻底把这种该死的感觉摆脱掉。是不是要当上全班、甚至全校第一名，我的恐惧才能消除呢？我虽然“进步”了，但是仍然徒劳无益地、被动地生活在这种叫我无法作出任何主动选择的荒诞之中。我进步了？这与其说是对我的安慰，还不如说就是一场骗局，一场超大超大的大骗局！我就这样把自己的生命耗费在对虚假进步的机械而愚蠢的追逐之中啦！

由于班主任坚持要把全班每个人的名次当着所有人的面报出来，所以放学很迟。我把自行车推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差

一刻十一点了。就在我刚刚骑上车的时候，被人喊住了，一个让我心慌的陌生又粗暴的声音。我在心里马上升起了一股不祥之兆，我停下来。

“你在这里干什么？”一个校警。鬼才知道为什么半夜三更的校园里竟然冒出这种怪物，他的问题让我疲于回答。

“上课。”

“上课能这么晚？”

“你看看后面。”我扬了扬头，班里大多数人出教室向来都比我慢半拍。我相信在学校里面即使你什么都不干，只是站在随便某个地方呼吸新鲜空气，都会招致某个混蛋的干涉，可你总不能试图让他们相信你呼吸新鲜空气吧。按照他们的智力水平，永远都不会知道空气还分什么新鲜不新鲜的。他指指戳戳地说：“放学就要回去，不准在校园里乱跑。”话说得好像我是飞车党党徒。我骑着克里克朗响个不停的自行车，回过头来厌倦地看了他一眼，出了校门。

我打开紧贴在冰冷的墙壁上的电灯开关，浴室里面有些响动，我马上想起来那是浴缸里的鲤鱼，它们一定是被突然开启的灯光吓坏了。我进去看了一下，水好像有些少了，我想了想，又多放了一些水进去，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我自己就像鱼，我和这几条鱼的处境完全是一模一样。它们安静了下来，我走出去，随手关上了灯。

11月23日

调座位的事情班里折腾了一个星期。本来班主任没有考虑这件事，但是自从那天晚上他公布了考试排名起，陆

陆续续几乎全班一半的人都去办公室里找过他要调座位，大部分找他的人都是这次考试名次有所上升的，因为这样一来，在班主任面前提出要求你才算有一点资本，不至于被他怎么样。

我也去了，我不是凑热闹，我是确实不能再在这种环境久坐下去，这里的气氛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说得专业一点，是一种严重的内耗。我一天起码要花上一个小时的精力来处理纷乱的同桌关系，我希望调换座位后还能和以前的同桌GR坐在一起，我知道可能性不大，但是只要班主任同意调座位，那就是我的胜利。后来班主任对前往办公室上访要求调座位的人一概不接待，于是班里就有胆大的人在他上完课出教室时紧跟着他，在校园里磨他。最后班主任总算看明白了：因为隔壁的两个班都调换了座位，只有本班还是按照开学时的样子坐，再加上有些人迷信或者相信调换座位就能让自己的成绩大步前进（或者更方便在课堂上找人说话），坚持要求给自己调换座位，这样一来，在全班来一次大调动就是必然的了。重新排座位肯定要按照一条标准，那就是你这次质检的排名。这个标准其实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规则没有本质区别。既然整个人类的进化史就是那条该死的“适者生存”，我们在班里按照第一名第二名排排座位，大概也还不能算是非常不人道的行为。于是座位就按照这条标准在前些天排好并且落实下来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往学校里赶，继续磨合我周围的新同桌。

街上刮着砂石大风，就像一把肮脏的钝头刮胡刀在你面孔上来回乱刮似的。路面不十分脏，因为大风的缘故；但是心里面那种看到马路就觉得它肮脏不堪的印象一直挥之不去。不知为什么，我只要一上了这条环城公路的主干道就厌

倦得要命、疲乏得要死，虽然它非常宽阔非常平坦，可我就是抹不去对它的厌恶——还不止是对它，对上学路上看到的一切都是这样。公路上永远都是一些车辆和使人没处躲藏的城市里特有的干燥灰尘。让我惊讶的是，很多人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在意肮脏的空气，他们若无其事地在大街上来来去去。冷风很凶猛，卷起公路边的沙石，让我想起戈壁沙漠。马路两边虽然点缀似的种了一些树和草，但是毫无生气，那些树看上去就像专供人上吊用的枝桠。灰水泥、灰水泥、还是灰水泥，举目所见，到处都是这种让人沮丧的颜色，到处都是轰鸣的建筑工地。经过随便哪一个施工工地往里面看，你就能看见土地被挖得很深，还有那些被水泥和钢筋浇注的地基，就像刚刚出土的古墓群。

我在过马路时后面有人追上来，是一个高二学生。我不知道他确切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和怎么认识他的，反正他认识我。他骑着一辆变速山地车往我这儿赶。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老爱把变速车的齿轮调到最小的一档，这样他就得像猴似的拼命蹬上五六圈才能让自行车懒洋洋地走上半米一米，乍一看就像链条断了。他见了我的那副殷切的样子就像看见了失散多年的亲人。就在我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和他一块儿走的当儿，他已经火烧火燎地到了我的旁边。我们无话可说——这才是最让人火烧火燎难受的事情。不过低年级的学生碰见高年级的人总是有些毕恭毕敬、小心翼翼，甚至有些低三下四的味道。我当然不能泰然自若地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懒得说话，这几天调了座位，我光是听前后左右的人说话就已经听饱了，哪儿还有心思说话。他们甚至比我原来右边的那个同桌还要麻烦，他们惟一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是趴在课桌上睡觉，不睡觉的时候个个都

是相声大师。男生的废话甚至比女生的多，而且下流无耻，再加上每个人都没有看过几本正儿八经的书，因此说出来的东西大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荤段子，毫无趣味可言。我甚至有些想念原来的座位了，不过，说起来我还是更加愿意在这个新环境里面坚持下去的。我现在的座位还是在原来的一排，只是偏右，向右边挪动了两个座位的距离，这些都没什么大问题。我到现在都懒得回过头找一找我原来右边的同桌坐在哪儿，我还不至于那么快就想念他，反正他坐在哪儿都是祸害。有一段时间，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他打扁挂在学校大门的入口处，只是我没有这样做，看来这个工作就要留给他的新同桌完成了。

我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不是很强，事实上，相当弱，就连我要是发现自己房间里的书籍被人动了一下都会感到惊惶失措，那就更不用说现在座位大调动了。原先开学时，班主任说，你们坐在哪儿那套桌椅板凳就是你的，现在重新调座位，他又不让我们挪动桌椅板凳，大概是他肚子里面也有火气，因为调座位的事情是被学生逼迫的，所以就是顺应民意也有些面子上过不去，就借这个命令捞回来一点儿面子。“不准搬动桌椅！”他下令道。

好吧，不搬就不搬。只是我现在的新课桌，那上面被原来的主人用修正液涂满了东西，我又不是那种能对这些小事视而不见的人，这一大片白色的英文字母，我拼了半天也没拼出来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害得我心里烦透了。我试图用手指甲抠它，一直到桌面的漆都被抠掉了一片，白色的字迹也没有掉。下午我用修正液把这笔文化遗产涂上，虽然耗资不小，但这是能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的最好的办法了。

11月24日

中午我正在床上心神不宁地躺着，爸爸在外边叫我的大名儿：“电话，你的电话。”只要有人给我来电话，爸爸就不会喊我的小名，这是习惯，他们知道我不喜欢让同学知道我的小名。不过在家里用正式的名字称呼我，我总是不太习惯，甚至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因为爸爸只要到学校开完家长会，回家之后找我谈话就会一反常态地用大名称呼我。现在我已经对同学是不是知道我的小名无所谓了，在小学初中那会儿我可在乎了，好像当时这算得上一个严重得叫人羞耻的秘密似的。

我拎起听筒。爸爸接电话老是爱用免提，我就是受不了这该死的功能。对着电话大叫一通看上去准像个傻瓜。我怀疑电话这项奇怪的辅助功能就是特地为咱们这个民族准备的。电话上带免提，这是暴发户的大嗓门、不重视个人隐私的坏习惯和绝佳的商业卖点相结合的最好案例。DD在电话里喊了一声“喂”，好像很着急的样子，我应了一声。

奇怪，我现在接她的电话心里面倒是相当平静，也许是上次写了一封长信给她，我把自己的话都吐了出来的缘故。

“我现在在家里。”她说。

“哦，要见面吗？”

“你有没有时间？”她对我的无动于衷毫不在乎。

“应该我问你，你大概就要走了吧？”本来我是想对她说“我很想见你”的，但是这句话里肯定能明显地听出来带有几分虚假，我不能拿自己的标准开玩笑。

“今天是星期六，我走之前想见你一面。”这就是DD的风格：电话卡还剩下最后几块钱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临

走前两天才肯挤给我半个小时见见面，她总是想尽办法把我们的关系保持在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现在嘛，这样做大可不必了。不过她在最后关头还能想起我来，也算是把我当做朋友吧。

“你干吗不到学校去看看呢？我就在学校里面等你。”

“我不想去学校。”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已经和学校脱离了最后一点关系似的：“看到学校我头疼。”

“那好吧，我在运动场旁边等你。我五点在那边。哦，不行，还是五点半吧。”我把时间推迟的原因是我不希望等人，她有一个习惯让我最恼火：爱让人等她。她就习惯于在预定的时间上再加个半小时才姗姗来迟。我不喜欢等人，对女生也是一样，虽然出于礼貌，我一般都能等到她们到来为止，而且马上就能让气氛活跃起来，但是我心里还是受不了等人。

“不行不行，”我再一次反应了过来：因为不论是五点还是五点半都是我自己的主意，谁知道我要说了五点半见面，她会不会到六点钟才过来呢？“你定个时间吧，今天下午第三节课我可以逃课。”

“那就五点，我五点在那边等你。”

“好的。”那就五点半，我在心里想。她等我？那可不一定。

我马上穿好外套拿了点钱就出了门。我要到超市里买巧克力，但是这样就很有可能迟到，现在是一点五十分。我尽量把车骑得快一些，既能买巧克力又能不迟到。风在我的侧面拼命地刮，好像刻意要我迟到或者买不成巧克力或者两件事情都搞砸似的。到了超市门口，看一下手表，才发现我陷入了买巧克力和迟到的两难选择之中。我没有下车来，继

续赶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有些事情很小，虽然很容易理解，但是不会有什么人会耗心来理解你。我不希望再一次被学校的检查人员记名，就这么简单，巧克力不买会有影响，影响到今天下午我的情绪或者DD的情绪，但是这并不比因为迟到被学校第二次抓住更值得重视。

我本来是想在上完第二节课之后逃一节课的，但是本周轮到班主任上第二节课，比这更坏的情况只有一种：第三节课仍然是班主任的。不过我还算幸运，这周没有碰上，下周才能轮到上第三节课。今天班里又有不少人很激动，我是说因为今天又是一个星期六，班里面的气氛多多少少有些不同于平时，哪个傻瓜不盼着早早逃出学校这座魔窟呢？谁都能理解做学生的心情，除了班主任——或者说他由于工作关系，就算理解也只能对我们的心情置若罔闻。他见下面有些闹腾，就放下手里的英语讲义，突然沉默了下来。这一招相当灵，下面的所有人都很知趣，停下手里的一切事情等着他发泄。教室里就像安放着一颗定时炸弹，人人自危，好像每个人都在心里暗自检讨着刚才是否有什么不轨的行为，是否有可能被点名批评，哪怕刚才不小心放了个屁的人，心里面也在发虚。过了好大一会儿，大概是半个世纪的样子，班主任开口了：“不想上课的就给我滚！”我想这句话对全班所有人的冲击都不会比对我的冲击大，因为我正在心里盘算着下节课逃课，也就是所谓的“滚”。他这么一说，叫我心头一紧，好像已经被他抓住了把柄似的，我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本来在第二节班主任下课之后跟着他屁股后面逃出教室就有点儿难度，而且我心里面不会舒服，因为班主任的那种灵异的气息还在下课时分没有完全散尽，现在他又说出了这句话，简直就是要我的良心翻江倒海地折腾。他刚才说了

“不想上课的都给我滚”这句话，谁都不想上课，但是这并不代表谁都想在他眼皮底下滚出教室——除非他滚出去了永远也别想回来。以前他也说过“不想听课的请出去”，注意：他用了“请”，但是仍然没有人出去，他说话的态度不可谓不文明，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什么。文明的言行早已不是师生之间关系的润滑剂了，它只能增加刺激，或者明显就是讽刺，至少对学生来说是这样。

“败兴。”我在心里哼哼着，不知道第三节课能不能逃。五点半，我看我还是五点钟去比较好，这样我至少能让自己心里面安宁，我情愿等她也不想让她等我，否则我会很难受，天生就是迁就别人的命，没办法。

我在中午打电话的时候就预计今天下午的见面会是一件受罪的事儿，迟早都会这样的，早早了断最好不过，做让人不舒服的事情一定要趁早，就像考试考得差你也得马上告诉父母一样。面对这种铁板一块的生活，你只有两种真正的选择：一，马上死掉；二，老老实实地活着。生活就是这样，它就是一场该死的拳击赛，你打不过他，但是你也无法躲避，你只能迎上前去把他紧紧地抱住，好像你是多么热爱对手似的，其实那是出于一种对对方的深深的恐惧。我在和DD见面的时候把这个刚想到的念头说了出来，因为我们之间必须要找一些话，但是她对我做出的歉意让我十分不安，我又不知道该向她说些什么以打断她的令我尴尬的情绪，于是我们就像往常一样说这些话题，只是表面上像往常一样。不过，把心里面的一些突然想到的念头说出来之后，就觉得减轻了很多负担。我在说，她在听，但是我们再也不会被对方的表情蒙蔽了，我们都知道相互之间的兴趣合不来。顺便说一下，这次是她等着我。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得到的相互

许诺就是以后还是朋友。和她道别之后我也不想去上网了，我只想马上回家睡一觉，好在晚饭前把这个星期落下来的睡眠补充一下。

我不太悲伤，因为我做好了悲伤的准备。DD看上去也一样，半个小时之后，我就再一次躺在和我最最亲密的床铺上了。

像往常一样，我半睡着，不久就进入了一个梦，或者类似于梦的幻觉之中——我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闷罐火车里面，被安排到远方参观一个养鸡场。火车总是在路上，好像目的地比太阳还要遥远，几乎就是遥遥无期，这让我开始空洞地担心起来。我在上火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送我，而且我看到车厢外面写着这列火车的名字，名字相当奇怪，叫做“拖死你”。我在火车开动的那会儿，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老在琢磨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管这列火车叫做“拖死你”呢？最后我逐渐得出两个应该很合理的结论：首先，这列火车的车身很长很长，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好像车头已经到了下一个车站，车尾还没有开出上一个站台似的；其次，这列车在路上耽搁的时间特别长，我总觉得自己在车厢里等呀等，已经度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感觉中一年四季已经变更了几次，可是由于它没有车窗，我无法看到外面的任何景物，这一切都叫我心慌意乱。在黑暗中，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就像一只被关进铁笼子里的胡狼一样不安地来回走动，这样一来也许能减轻我的焦虑。最后我拼命地往前（或者往后，因为黑暗，我无法判断方位）跑，跑过了一节又一节车厢，都是黑暗，全部都是黑暗，幸好我没有被绊倒，我就这样惊惶失措地跑呀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前面出现了一个管道孔大小的光亮，它越来越大，迎着我冲过来——我终

于跳出了车厢！我毫发未损地跳了出来，但是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火车，这列该死的火车，它根本就在原地没挪动半步！它静止着！我像个傻瓜似的呆在车厢里面，已经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气愤极了，感到受了骗，正当我冲上前去要把它踢个粉碎的当儿，后面有人拽住了我，确切地说，它不是人，是一只公鸡。我不是被安排参观一座养鸡场吗？我气得差点儿把正事给忘了。可是，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我去参观养鸡场，却派来一只公鸡迎接我呢？这只公鸡完全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像卡通片里的动物那么可爱，事实上，它的尖嘴上面还有乱七八糟的杂毛，鸡冠子也是紫不拉叽的难看极了。一句话，它就是现实中的公鸡的放大版。它的例行公事的派头让我毛骨悚然，它把车开了过来（它还会开车！）我钻进去，倒不觉得自己在前往养鸡场，而是去赴死。这只鸡看上去也有几分警惕之心，大概是在妒忌我作为人的身份。我已经很老实地把背包放进车里，借此表示它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我逃跑，我又能跑到哪儿去呢：火车是停着的，周围荒无人烟，只有我一个人和一只和人一样大小的皮肉松弛的公鸡，如果把所有的东西算得更细致的话，还有面前的那辆破车，但是它对我来说没有用，因为我不会开车，而且由于我并不是很想逃开，就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无论如何，我是一个参观者。

我坐好了，它在前面发动了汽车。我们一直没有正式地交谈一句话，我想大概是因为族类不同的缘故，我想要是我变成它这副样子，那么我们的关系就不至于这样紧张，至少我就不会觉得自己的沉默有些对不起它了。可怕，我的这个荒谬的想法马上就成了事实！我猛地看见面前出现了一张嘴巴，尖尖的嘴巴，那是鸡喙。我吓出了一身汗，就像躲避瘟

疫似的把头往后仰、仰、仰，一直到我的头碰上了车后面支楞起来的一块钢板，这才明白过来我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嘴巴！我连忙伸手去拽，发了疯似地拽！拽！！拽！！！我想把它拽下来，可是前面的那个公鸡看着我惊惶失措的样子却大笑不止。我刚才只是在心里面想着玩玩，我并不是真的想让自己变成这个模样！还有我的手，我的手！它成了羽毛和骨架的混合体，还有我的脚，我的身体——啊，我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毛孔都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我对自己的肉体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惊惧万分，我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只想让前面的这个家伙马上把车停下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称呼它，我甚至连自己是不是它的同类都不知道），可是我只能徒劳地扑扇着一双无力的大翅膀。

我就这样一路折腾，还没到养鸡场我就完全瘫了下来。当我从汽车后座苏醒过来的时候，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只是感到汽车稍微颠簸着，然后十分合乎情理地停在了一个空荡荡的灰色大院子里。显然，周围的房舍都是养鸡场的鸡舍，里面都是……我感到自己的智力正在衰退，无法作出任何稍微长远一点儿的想象，我只能木然地看着眼前能看到的東西。那只鸡给我打开了车门，我的目光碰到了同类的目光，我马上就明白了这只带我进来的公鸡，它的目光为什么如此呆滞了，那是因为，作为鸡，它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不可能有任何想象，它至多对面前的刺激，比如有人随手撵了一下，它才会本能地意识到应该扑扇着已经退化了的翅膀跳开以保住小命。我极力想让自己恢复一些作为人才有的推断能力，可是没有用。我只能做到对面前出现的东西有些最为本能和直接的反应，现在让我有所反应的是我面前站着一个人，至少他的外表是个人，我想，不，不是我想，他肯定

就是养鸡场的场长了。我动了动嘴巴，还好，这张尖尖的嘴巴里还能说出人的语言，我还有一线希望。于是我试着向他解释我是如何不幸地在旅途中变成了一只鸡的，他虽然很有礼貌，可是看得出来他对我的申辩没有少兴趣，这就越发让我觉得我不负责任地变成了鸡是对他的侮辱或者轻慢，我一刻不停地向他解释、解释、解释，我为了让他相信我不是有意要让自己变成鸡，甚至把自己的属相都牵扯了进来，我要借此证明我变成一只鸡不是没有一点点缘故的：“我属鸡，大概到了某个特定的时候，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我就会变成一只鸡。”我非常殷勤地向他说明着。他摆摆手：“我们就去参观养鸡场，但是对于你的变化我不想说什么。我属龙，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变成龙。”他这话好像在暗示我在对他搞什么恶作剧，

我向他说我拿我的头作担保我没有这样做。“你的头？”他不屑地说：“你不就是一只鸡吗？”是啊是啊，我急得火烧火燎，因为我现在说什么都不会让他相信。我耗尽了心力向他说明我不是一只鸡，但是我无论怎样看都是一只鸡，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就像这个场长从外表上看是人一样。“要想真正地懂得这里的养鸡诀窍，你必须身处其中。”他说。我想我用不着身处其中就能体会到了：一排排鸡舍里，鸡们像傻瓜似的挤到前面来，要把我看个真切，我好像不是来参观它们，而是被它们参观。每一只鸡都歪着头，抖动着冠子，斜着眼睛怀疑地望着我。它们那种见了陌生事物的警觉样子十分可笑：鸡冠子随着小小的脑袋左右一顿一顿地摆动，不住地晃动着，这样就更显得它们是多么愚蠢无知了。养鸡场场长说，它们都将在一个月后出栏，这是一种最为经济的速成养鸡法。我已经不再向他做任何徒劳的

解释了，刚才我不遗余力地向他解释个没完，就好像在向他人乞命似的。我不再说什么，我已经明白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再加上鸡舍里的那么多只鸡都在咕咕哒哒地叫唤，好像在提示场长我也是它们中的一员，我就更没办法脱身了。我看得清楚，这群鸡在一个月之后就会被宰杀了当菜吃，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想为它们向场长请命。他看上去不是那种很坏的恶棍，但是，坏事并不一定完全都是恶棍干出来的，事实上，你只要给某些人一口饭吃，他就能按指示做事，而且面不改色，看上去仍然和蔼可亲。

场长打开了一扇铁门：“这是你的房间，请进。”我不能确定这是待客的房间还是专门为我准备的鸡舍，但是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吗？我非常气馁地摇了摇头，一步跨了进去。头顶上的鸡冠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出来，它在我摇头的时候很烦人地晃个不停。就在铁门关闭的当儿，我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我醒来了——这一次是真正地醒来了。我从床上爬起来，看看天色，已经分不清是什么时候，我吃晚饭了吗？不知道。我连忙拿起日记本，把刚才的经历记了下来。要说这是幻觉，大概也行，可是我情愿把它看成是经历。有人认为幻觉是生命的额外部分，不值得认真对待，或者就简单地把它当作一种无聊的行为，可是我倒不觉得，至少我对自己的幻觉很认真，我坚持认为它就是我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我的手指头、眼睛和头发一样现实和重要。今天很碰巧，我把它详细地记了下来，可是它说明了什么呢？我拉开窗帘，想看清楚外面的天色，漆黑一片。转过身打开灯，日光灯久久不亮，坏了，我只好跌跌撞撞地找个地方坐了下来。我双手捧着自己的面孔，我还是好好的，我没有变，但是这并不能从外表上确定，就像我刚才从外表上看上去是一

只鸡，却不能确定我就是一只鸡一样。

11月27日

我发现上午有人来过，家里有香烟味儿。问爸爸，他说，你的一个大伯，刚走。哪个大伯？我问，大概表情显得有些无动于衷的样子。爸爸急了：“就是那次过年来我们家给你压岁钱的那个大伯。”我撇了撇嘴，我不是那种给了钱就能让我把他永远记住的人，我的意思是，我不会从钱上面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值得交往，但是爸爸被我这种可能看上去有些冷血的样子弄得很生气。

爸爸问我这几天学习怎么样。怎么样，就那样，我怎么说得清楚怎么样，又不是病情，今天好了明天恶化了明明白白的，反正就这样在学校里面混日子呗，又学不到什么好东西，成天背书做题，还能怎么样。当然我不会把心里想的对他说，要不然他还不被我气死。父母要是对我有气，我肯定日子不好过，他们叨叨个没完没了，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世界末日。“不错。”我回答道。在这里顺便说一下：上次考试排名，我回来告诉了爸爸，他看上去好像不如我想象得那样高兴。我总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用做生意赚钱的眼光看待考试排名，你明明考得本来就不错，但是还不满足，还要考的更好、更好、更更好，这完全是一种把商业模式引入学习，使学习这种本来很纯粹的行为变了质。“我这几天学习上没什么问题，”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回答完爸爸的例行问题之后，又补上了下面的话：“只是那些新同桌，我还不大习惯。”

“怎么了，是不是把你安排到差生里面去了？”妈妈问。

“不是，还在原来那一排，第三排。只不过我左右现在都是农村学生。”

“农村学生怎么了？”爸爸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农村学生不好，只是和他们交往起来不大容易。”

“在学校你好好学习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吗？”

你看：又说不到一块儿去了不是？我本来就说两代人根本不能讲到一起去，难道他们就一点也感觉不出环境对人多有多大影响吗？他们只知道叫你好好学习好好学习，我的脑浆都快听得翻出来了。其实我对农村根本就不是我爸想象得这样冷酷，事实上，我对农村相当有兴趣。有一次我跟我的初中同学NJ谈到过，好像是在高二，我们在晚上回家，谈了一路，最后聊到了这个问题上面，我说我以后有可能考一所农业院校，因为我对农村生活很感兴趣（这我是肯定不敢当着父母的面说的，那无异于找死）。NJ说，他不喜欢农民，但是他还说，他并不是看不起他们。我问为什么，他说，他觉得农民太守本分的鲁钝性格让他恼火：“他们只要还有一口饭吃，就不会站出来闹事。就是这一点让我感到他们活得太冤太屈太累，就像屈死鬼。”他这样一说倒后发了我：“你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农民们有什么区别吗？”他想了想：“完全一样，一点都没有区别。”

我在黑暗中骑车，这种经历不常有，今晚大街上的路灯灭了，大概是电力不足。国道上的灯还亮着，我从国道上走。行人稀少，路上有些大卡车，当我经过第二个岔路口的时候，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一个家伙正在国道旁边的花坛上撒尿，他毫不遮掩。你不要想错了，他并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他衣着光鲜，一只胳膊下面还夹着公文包。马路上

还有个人站在小车旁边等着他，那人看起来更清楚：酒足饭饱的饭桶一个。我为这个撒尿者的胆识感到钦佩。他就这样高高地站在花坛上面，在水银灯光底下，远远看去，简直就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雕塑。就在那人抖个不停的当儿，我突然想大喝一声吓唬吓唬他，可是我没有这么做。一辆卡车狂暴地在我的视线中轰鸣而过，我像平时一样，带着万劫不复的叹息，骑车进了一条黑黑的小巷。

11月30日

前面的女生转过头来，向我借透明胶带。我找到了，递给她。我一向把这些东西带得很齐备，要是手边少了某一样备用的东西，我就会感到紧张。她用完了，还给我，这时下课了。她转过头来好奇地问我，你的头发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干燥，像每时每刻都带着静电一样。我告诉她，我每天下午放学回家都要洗头。

“什么？你天天洗？”她很诧异：“洗头太勤了损伤大脑。”

“那没什么，”我向她解释：“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得天天洗头，习惯了。我以前在几天内不间断地洗头，然后习惯了，不洗就难受。”

“强迫症？”她倒是懂得一些的。

“大概是吧。不过洗头确实能叫我振奋一些，每天洗一次头发，能让我产生不少活下去的勇气。”我想她应该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们都是高三学生，压力锅里的鸡。“那我也要试一试啦。”她笑了。

但是我不能对她刚才说的“洗头损害大脑”无动于衷。既然她知道“强迫症”这个词，想必“洗头损害大脑”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我记忆力衰退，但是这好像和洗头没什么关系。我是从高一养成每天洗头的习惯的，我的记忆力却在高三才开始衰退。我现在每天上学前都得看一下贴在床头的课程表，我对哪一天上什么课越来越糊涂。按照常理，你在开学上了一段时间的课之后，不用看课程表就能自然地知道这一天有什么课程，但是高三开学已经三个月了，我还是每天都要看课程表。这也许不是记忆力衰退，只不过是神经麻木的征兆。

上午的太阳很纯净，下午的阳光却迷迷糊糊的像语文老师的语文课一样。第一节课上了一半，阳光钻了出来。这几天要是天气晴好，太阳总是很准时地在下午第一课时把光线投射到我的课桌上。我摆在桌面的数学讲义上出现了一道狭长笔直的光线，我在恍惚和疲惫之中，仿佛看到了面前开启了一道希望之门，只要我向它伸出一只手，我就能从这座死气沉沉的教室里面逃走，我就会马上消失在这片眩目的光芒之中。在我眼里，这就像一则童话般的诱人。我伸出了手，顺着这条笔直的光线轻轻地抚摸着。左边的同桌动了动，他在朝我笑。他指了指我面前的圆珠笔，这支透明六棱柱的圆珠笔，它被阳光射穿，同时成功地使阳光解体，桌面上出现了一道多彩的虹。我把它从课桌上捡了起来，虹影温和而闪亮，这是一道转瞬即逝的美景啊，“你试一试。”我把它递给同桌，他拿了过去。他的课桌上到处都是阳光，他试了好多角度，都不行，总是无法出现彩虹。他摇摇头，把笔还给我。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我想我还会再试一试的。

12月4日

今天我精力不济，就像一具空木壳，而且我能确切地感到自己像一具空木壳似的坐在教室里，这才是我更为厌烦的事情。今天是星期六，我一到星期六就没有心思听课做题。这不仅仅是因为明天是星期天，或者今天下午放学就能休息了。我在生理上一到星期六就会本能地觉得这一天的时间比平时任何时候都要过得缓慢，简直就是拖命。昨天晚上——也就是星期五——我在星期五晚上回家后总是放任自己看小说，一直看到半夜。今天早晨起床后口干舌燥，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今天早晨也没有来得及背政治。我当然更愿意看小说而不是背政治，我的政治没有按照预定计划背完第三册课本的第一章，我得抽出时间来把它补上，否则我又要为此而发疯。我强迫自己在心里放下这件事好好地上课，这是一节数学课。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迭加迭减，满黑板都是。我绝望地放下手中的笔。不要说用笔记下来，我就是不用脑子，就是用眼睛把黑板上的板书一行一行地扫来扫去都扫不完，再加上它们在我眼里就像叫人发狂的绕口令一样毫无用处而且折磨人，我就更不能坚持把笔记记下去了。天哪，数学，我还不如趴在课桌上补一会儿觉。

第三节课是外语考试，我不想考。我不是怕，我是真的不想考。我懒得做那些手工业式的选择题，语法语法——算了，我先把最后一道作文写出来吧。但是今天我的肝火太大了，心里面烦躁，大概是因为睡眠不足。我只写了一行就停了下来。我真想把面前的外语试卷撕个粉碎。我的前后左右都在埋头做试卷，看着他们的认真劲儿，我立刻就失去了可以随便做一做其它事情的自由感。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女生正

在把她砖头一样的鞋子一直伸到我的两腿中间，还把我的凳子弄得咚咚响。我低下头来，我没戴眼镜，看不清楚那鞋子的模样，反正就是专门骗没什么头脑、缺乏鉴赏力的美女的廉价货。我戴上眼镜，要把周围的动静看个清楚。我的视力大概又下降了，这是我两年来第三次感到视力下降。再这样下去，我就是坐在第一排都得架着望远镜才能看清黑板。考完了外语，班主任说，上午的最后一节课语文改成数学，下午数学改成语文。我急得直揪头发，这是我能想象得到的天底下最恐怖的调课安排：这样一来，下午就会有两节数学课，外加一节班主任的外语课，我的计划全部被打乱了。我原先想在下午的语文课上把落下来的政治背完，现在我该怎么办？上午最后一节是语文，而我的政治书或者语文讲义都没带来，唉呀我不想活了。

我真不想把这件无聊的事情写进日记：我的自行车又坏了。车支架上的弹簧崩地一下弹了出去。我懒得管它，就这样拖着这辆一直给我添麻烦的车往学校门口走去。那个瘫软下来的车支架随着路面的起伏而起伏，还哗哗地响个不停。我这个星期的最后一点精力都被它折腾光了。难道我就不能强迫自己忽视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事情吗？

晚饭吃得也不让人舒服，因为妈妈老是说个没完：“你今天晚上要自觉一点了，都看了一个下午的电视。”

那不是事实。我在六点整到家，只看了新闻，然后就一直背政治书一直到吃饭。不过我不想和她争辩，像妈妈这个年纪的妇女脾气都不大好，再加上女人都是靠唠叨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如果不让她们说话，情况会更糟，这个我理解。我只是飞快地吃饭，好让自己马上摆脱这一切。妈妈见我不说话，就开始把事情不论大小一件一件地往外抖。

她要是嘴巴来了劲儿真是拦不住：你的房间里太脏；前些天夜里都这么晚了你还听歌；你怎么又把我昨天给你铺好的被子给揭掉了；你穿那么少冷不冷；都咳嗽成这样子了还不快进去把衣服穿上快进去把衣服穿上；你怎么早上没吃饭就跑掉了；等等等等。我被她说得完完全全晕头转向了，差点儿把夹菜的筷子戳进鼻孔里去。不知道她脑子里边是如何装得下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不至于变得疯狂的。我叹了一口气：“不要说了好不好，我一切照办，我现在正在考虑下午的那道数学题。”今天爸爸的表现好一些，平时妈妈一开始数落我什么，他就在旁边煽风点火，他们是统一战线。他听了我的话，连忙向妈妈示意不要说了。

“你不要我说，你得有条理才行。”妈妈好像心有不甘地咕哝着，最后她又把话题转到了邻居家的KK当兵的事情。我无法判断他们是没事说着玩儿还是要故意当着我的面说这些事。我很想安静地吃一顿全家人的晚餐。我现在只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的星期六，能随心所欲地看一会儿电视，而不是在这里让他们有机会把集聚了一个星期的话劈头盖脸地往我这儿扔，让我发狂。

他们总是说这些不着边际的废话给我听：“还在看，都几点了，把遥控器给我，去睡觉！”

“快起来！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就不知道紧张？你还想好不想好了？”

“看、看、看，你就知道看电视，还不准备准备马上上学去。”

他们每到星期天都要说这些话给我听，与其说是对我的关心，还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他们长久以来形成的爱叨唠的坏习惯。把各种各样的垃圾话都往你这里撒，你不被烦死也被

活埋。我受不了他们这种关心，至少关心的表现方式太苛刻了。久而久之我就不会觉得他们在关心我，却对他们唠叨的话语印象深刻。有时候我就直接劝他们少说两句，这样还能长命百岁——不光是为他们，也是为了我自己。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种外来干涉的。老天，活下去就是这么艰难，为什么还要生出来这些乱七八糟的唠叨呢？这是不是证明一个人还活着的必要因素呢？

我很想在我和父母之间筑起一道堤坝，一道抵挡我的自由感被侵犯的堤坝，但我又不能总是这样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再唠叨了。”因为唠叨是他们作为长辈的基本感觉，他们只有在不停地唠叨中才能确信是我这个儿子的父母。可是，我的自由感又是非常脆弱的，它在不受侵犯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你只能感到安静，这正是它带给你的好处。但是，只要是有人唠叨你几句，这种自由感就会被轻易地轰然摧毁。我要自由，并不是想拿它杀人放火，我只是要体会一些安静，不受干扰的安静，但是它偏偏不能持久，这是个问题。

我已经付出了很多，我在上学，这已经让我付出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十年，我还得继续徒劳无功地付下去，这就是我对长辈作出的最大让步。他们要我做的，我已经做了，但是，妥协和后退也是有限度的。我不可能把自己当作橡皮泥，任由他们捏造。我是一个人，就是这么回事。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的一辈子，真的就是你想象得那样，值得孩子们去效仿吗？每个人都会找到他的去处，这是自然的，唠叨毫无必要，毫无必要。

12月8日

坐在前面的几个人正在说着20号放假的事情，12月20号。学校的教室要被市里征用一天，可能是成人高考。我以前听说过成人高考比较乱，但是我不知道能乱成什么样子，据说在考场里面乱飞的不再是纸头和书本，而是人。我们这些高中生当然不能享受在考场里飞来飞去的优待。每次月考、质检、大联考之前，那些你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监考老师，就会像警犬似的把每一本可疑的书和讲义从你所坐的座位里搜走，而且还不时地作出如下威胁：“要是发现违反了考试纪律，我们马上把你的试卷作零分计。”

历史老师的这节课又开始闹暴乱了，也许是因为历史课的内容没什么值得你用心去听，可是看在历史老师当过我们班主任的面子上，我想也不至于在他的每一堂课上，我们都疯成这样吧。他在上面讲课，但是下面没有谁用心听，该干什么干什么，甚至有人在噤里啪拉地嗑瓜子。历史老师在极度混乱中讲课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儿像是在自言自语地梦呓，我想他大概正在怀念自己作为一个班主任时那种安静的课堂气氛吧。就是这么回事：一旦你从班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你在学生面前的可怕级数就会急剧减少，阎王变小鬼，这就是权力交替的悲哀。没有哪个学生因为你是老师而尊重你，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你作为老师，尤其是作为班主任，拥有能够使他恐惧的权力而对你产生敬畏，这是师生关系在这个时代的蜕变所形成的另一层悲哀。

其实我的历史老师在任上并没有为难学生，我可以公平地说，他为人很不错，可是他现在也难逃权力的缩水带

给他的苦恼。他不再有权叫家长到学校来了，大不了在课堂上嚷嚷两嗓子，而且收效肯定不会比原来大。你不要以为学校就是一块绿地，事实上，你在社会上看到的一切事件都能很容易地在学校里找到它们的简化版本，或者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用我的年轻人的冷静把发生在学校里面的事件在日记中毫不留情地撕开了，使它们看上去比社会上的事情更简单一些而已。权力定律在学校里仍然有效，也许表现得更加露骨和直接。一旦我们觉察到班主任要被替换的风声刮过来，就会很一致地把他踢到一边让他凉快去了，该老师将会非常真切地体会到一种人情冷漠的悲哀：他的课不会像原先那样红火，因为很多人之所以认真听他的课只是冲着他的班主任身份才做做样子的；课堂秩序也会比他当班主任那会儿差上百倍，好像学生们成心要把原来在他的课堂上少讲的话给找补回来似的。也许班主任掌握的权力在别人看来非常微不足道，但是它们就是能主宰着一个高三学生对这种可怕的生活最基本的感觉。我们在乎得要命，就像一只可怜的老鼠守着最后一点点过冬的口粮一样，谁都不希望自己被班主任盯上。当然了，也不一定是我们害怕班主任或者其他老师，客观地讲，他们在某些地方也会害怕学生：害怕我们在下一次全市大联考中发挥不好，本来由本校保有的文科理科双状元都被别的学校搞去了，这样一来，在利害得失上面，他们作为老师大概和一个没有完成指定销售额的推销员没什么不同。

12月13日

我走过去，把窗户打开一半，天气很冷，空气肮脏而

干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打开窗户，但是要不把它打开，我就会更加抑郁。天还没有完全黑透，这个冬天，雪迟迟不下，窗外没有什么看头，枯燥的空气，衰败的花园，整个世界都死了。当我把窗户打开之后，我就静静地体会着对于这个世界上所有物体产生的一种强烈的厌恶感。在我和这扇铁窗之间，隔着一层令我的感受变得生硬的东西，它让我无法看清外面的一切，我努力看清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是窗纱。我站在窗户边上，我心中的憎恨呼呼地膨胀着。幸好我马上反应了过来，于是我转过身，正要往外面走，又回过头来把窗户关上，拉上窗帘，走进厨房，吃上学前的晚饭。

今天并不顺利，我在上午放学前就打算好了要去买一副手套。这些天天气特别冷，我开始咳嗽，去年的手套找不到了，妈妈要给我买，我不肯，我想自己买，但是又抽不出时间，只有在上学路上挨冻的时候才想到要买手套。上午最后一堂课政治考试，下课铃响了，政治老师走上讲台，说，任何人都不能不交试卷，我就在这里等着，哪怕你们中午不回去吃饭也得给我写好。本来我以为这五张政治试卷一堂课不可能完成，心里面指望着政治老师能高抬贵手让我们把它带回家去做，没想到会是这样。他刚说完话我就破罐子破摔，一点儿都不想往下写了。班里面至少有一半的人原本以为他不会要求交试卷，现在都傻了眼。我发现我只要一有什么事情准备去办，就会在学校里被耽搁，这该死的生活经常会给你安排各种落井下石的剧本，等着你把它上演。政治老师凛凛地站在讲台上，看上去他今天情绪不佳。他看见下面还有些人不赶快动笔写试卷，就说了一句：“你们以为马马虎虎的是在哄我啊，是哄你们自己！”

当然这句话是对的，我们学习不可能是为老师，同时，老师也不会为我们，各人为各人，一点也不假。学校已经把老师每个月的奖金以及年终分红和学生的分数以及高考入学率搭上钩，我们要是再当着老师的面讴歌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即使不会觉得我们这是在说冷面讽刺的话，也起码会感到脸红吧。唉，看来今天我的手套是买不成了，估计我要是还不赶快把试卷做完，我的午饭都会被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给取消呢。

真不敢想象，一个把你饿肚子不当一回事的老师竟然会一举一动都是在为你好。

我往下做着问答题，头昏眼花，又气又饿，简直要发疯了。

我还是得在下午按时上学，手套没来得及买，中午的一小觉也没来得及睡，午饭也吃得一塌糊涂，还被父母问个没完，好像我要是再晚一分钟回家，他们就会通电全国发布寻人启事似的。我在回家的路上心里面老想着下午第一节政治课我要拿迟到来作为报复，当然这个念头只是在心里面想着解解恨，我不可能真的这样做。作为一个高三学生，你要是想主动报复什么，那么在前面等着你的将是强烈一百倍的反报复措施。你如果是指望着把你的一条小命保到明年7月，你就得学会卑躬屈膝。我下午要是真的迟到，那我就死定了，因为学校已经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规定，就是怎样惩治那些迟到早退旷课以及在校园里闲溜达的学生，至于学校为什么要做这个规定，你应当明白：如果学校是个人人都喜欢去的游乐场，大概这种规定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正是因为学校是一种凡是心理正常的人都不会乐颠颠地往里面钻的地方，因此出台一部关于如何整治迟到早退学生的规定，在校方看

来是很有必要的。就因为这个新制度，我就会在每次上学的路上下意识地拼命把自行车多蹬上几圈，迟到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至于怎样惩罚，我不说，校丑不可外扬，反正还有比我们学校更可怕的学校。我前些天才听说，市七中调整了作息时间表，他们一天上十二节课，比我们多一节，而且晚上每节晚自习都是六十分钟。我自忖本校的作息时间安排已经榨干了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面最后一点点可用的时间，因此我扳着手指头也算不出来，市七中到底是怎样做到在一天里安排第十二节课的，莫非老天爷关爱七中的学生，让他们每天享有二十八小时不成？要是老天爷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我情愿要他让我快点死掉也不要这一天二十八小时的优待。七中真够毒辣的，那个校长，女校长，我看到过她好几次，因为我们学校老是举行各种研讨会，市里很多教育界的明星都会来捧场。七中的女校长看上去倒不错，可是谁都知道她的肉体里面包着一个格格巫的灵魂！要说七中是死亡营，那么我所在的这个学校简直就是天堂。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哇，我还埋怨什么，我应该为自己生活在天堂之中感到高兴才是！

我刚进校门铃就响了，第一遍是预备铃，预备铃之后不准进校门；第二遍才是上课铃，上课铃之后不准进班。也就是说，你要是在上课铃之后没来得及进班，你就只有在校园里站着等死了，当然有分身术的同学除外。那个站在门口的风纪员在我刚进门，铃声一响之后，就把背在后面的双手拿了出来，手里面是笔和本子。我当时非常高兴，骑上车差点儿手舞足蹈，要不是担心我因为太高兴很可能从车上跌下来摔个鼻青脸肿，我真要张牙舞爪一番。生活是怎样变得美好的？就是在你侥幸逃脱了一个差点儿落到头上来的惩罚之

后，在我眼中，甚至下午昏死的冬天阳光看上去都变得明媚了。

你不知道我刚才在赶路的时候心里面是多么恐怖，当我远远地看到校警站在学校大门口的时候，那种侥幸心理和迷信心理已经无以复加：我希望学校打上课铃的机器坏了；我希望突然发生地震把世界震个四脚朝天；我希望在门口站岗的校警站着睡着了。

我掏了一下钱包，还没到月中就把这个月的零花钱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钱还能买几张邮政明信片，寄给几个今年给我来过信的朋友，也要给DD寄一张，还有两个星期就到新的一年了，我还要在年前把历史第四册，就是那本中国现代史背完，要不然就赶不上月考复习进度了。还有数学的讲义和刚发下来的盗版精讲，也要做完。政治和语文，还有外语，好了，这些事情我就不在日记里面罗列了，否则整个一篇日记就成了我苦难生活的控诉状。我还要在新年前一天给几个人打电话，有一两个是我以前的朋友，在大学里的，还有就是以前初中的朋友，再就是DD。一想到新年我就很振奋，虽然我知道，就算到了新年，我的生活也不会有什么改观，可是能有机会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一通，这种自欺欺人的感觉也还不错。

现在离新年还有两周多一点时间，马上要月考，我将在月考中迎来新年，这是高三学生特有的迎来新年的方式，我不知道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有意义的纪念呢，还是一种不得已的冷冰冰的现实。新年，大概这些节日就是人类为了对付生活的艰辛而发明的东西，就像兴趣和爱好一样，但是，这样一个新年，对我来说与其是一种纪念，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嘲笑：你在这过去的一年里，到底做了些什么啊？

12月14日

地面上的水结成了一块块的薄冰，我骑车往学校去，看得见自己雾汽般的呼吸。我的鼻子、耳朵还有双手，好像就快要被冻得掉了下来，那是在寒冷让你失去知觉之前你的最后一点疼痛的感受。不对，我的感受还不止于此，极度的困倦仍然侵袭着我，这是一种比寒冷更加内在的感觉，也是惟一比它更加强烈的感觉。我困得要命，它在寒冷带给我的麻木之中不合时宜地突兀着，让我只有一个清醒的念头：困。就连严冬的残酷寒冷也不可能把我这长期以来的疲倦冻没了。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婆双手捧着尿壶，越过小巷，往那条肮脏的阴沟边走过去；街角闪出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后面随即飞过来一把扫帚，但没有命中这个小小的逃亡者。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正在为我的这个昏沉沉的脑袋担惊受怕着。

极度的困乏霸占了我的大脑，我对一切都不再在乎。我骑车向学校的方向去，我的心脏在自负地跳动着，它迫使我去注意它，我感到有些心率不齐，也许只是疑神疑鬼。

我太需要在上课前睡上一小会儿了，但是我的双脚冰冷，像两块石头一样，冻得我睡不着。头脑里还一刻不停地重复着早晨读的那几个该死的外语单词，我毫无来由地暴躁起来，我正在努力把这种情绪按下去。

做政治笔记时，一边写一边打盹儿，我几乎睡着了，手里的笔杆子还在着了魔似的一动一动的。在迷迷糊糊之中把写政治笔记想象成了刮土豆皮，我就这样刮啊，刮啊，在无可奈何的重复之中，我的动作逐渐停顿了下来。

我开始发呆，看着面前一塌糊涂的时事政治笔记，几乎

不敢相信那就是我一节课的成果，我刚才写下的字，我连一个都辨认不出来，那不是我的字迹，可那又能是谁的？我茫然地盯着面前的笔记本。既然我无法获得睡眠，那么我就把发呆作为短暂的休息吧。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长久的滞缓之中，无法自拔。

困，困，老是犯困。现在倒好些了，我不像刚才那样嗜睡，但是又产生了新的麻烦：我的脑袋在不停地重复着我能想到的任何一件事。只要我想到了一个念头，我就会把它不停地重复，机械地重复，这真可怕，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这些念头紧紧地抓住不肯放手，害得我在晕头转向的恐怖之中僵持着，没有办法干其它事情。那首歌，那原本是一前还算悦耳的歌曲，在神经质的重复之中变成了让我疯狂的魔咒。

我甚至对几支小小的圆珠笔都过于在乎。我从来就不愿意使用那种笔芯不透明的圆珠笔，因为我无法准确地知道它是不是快要用完了，这就让我缺乏安全感，哪怕带上两支备用圆珠笔我都不能把这个念头丢开。细微的事情叫我精神濒于崩溃。我还得强迫性地把圆珠笔一一拧开，把笔芯抽出来，再把笔芯互换装进与原先不同的笔套中去。在旁人看来，这只不过是学生的一些妨碍学习的小动作，可是，有谁想过没有：学生为什么要做小动作？难道是他们天生骨头犯贱？因为他们需要做小动作，他们 need 把笔芯换来换去、把课桌刻得满是刀痕，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体会到某种变化的乐趣。

我也不能再踏踏实实地把手边的这张语文试卷做下去了。试卷上有一首诗，那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诗，事实上就是一段破顺口溜。白痴。不论是出这张试卷的人还是埋头做这张试卷的人，他们都是白痴。我又拿出政治课本，但是我发

现我连书也不能背下去，这本书里面有那么多东西，事实上都是无中生有的逻辑游戏，我腻烦透了！

今晚的月亮是这样明亮，天上的任何一颗星星都看不见了，街边的路灯毫无必要地照着空荡荡的街道。月光并不能在寒冷之中带来温暖，但是它能够让人的头脑变得清澈起来。这个空无一人的晚上，让人吃惊地感到一些节日的气氛，我想到了几个月前的中秋节：那天下午，我走在大街上，就是这样空无一人，可现在是在晚上啊。今天是多少号？14号。就是圣诞节我也得等上十天才来。我虽然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但是任何节日我都会欢迎，因为那样会让我感到稍微放松一些。

12月15日

今天倒是奇怪了，我坐在教室里面一点儿也不觉得困，反倒精神得很。早上我比平时起得早，平时在六点整起床，今天因为要把上午必须上交的历史问答题抄完，我在五点半就起床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对于一个高三学生来说提早半个小时起床是一件需要多么大的魄力才能办到的事情。对我来说，睡眠珍贵得跟金子一样，我甚至不愿意拿半个小时的睡眠换取一块大金子。我晚上的休息时间，已经压缩到了极点，正常情况下是每晚睡六个半小时，也就是晚上十一点半到第二天早晨六点整。也许你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比每天八小时的标准睡眠时间短了一个半小时吗？可是你要看看，在我休息完了六个半小时之后，所做工作的劳动强度甚至比每天能休息八个小时的人还要多一倍。按理说我

应该获得双倍的睡眠才是，可是我目前获得的只是比标准休息时间还要短上一个半小时的睡眠。

平时我早上起床一定要在六点整，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举个例子：要是我在睡眠中出现某种条件反射，五点五十八分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这是常有的事儿，因为我自从上了高三就相当紧张，晚上睡觉必然要做梦，而且百分之百都是噩梦，一个接着一个地做，当然无法进入深睡眠状态），那么我就拚着命也要让自己再一次闭上眼睛，一直等到确信原本属于我的两分钟睡眠时间过去了才肯起来，否则我就会吃大亏。两分钟的睡眠啊，多宝贵！我认为只要丢了哪怕一分钟的休息时间我都会因此而困上一整天，我以前的确有过这种体会，一点儿不是胡说，也没有夸张。我平时就是不耽误睡眠都会经常犯困，更不用说丢了一分半秒本来就属于我的睡眠了。今天早晨提前半个小时起来，就是为了这本没抄完的历史讲义。我昨天晚上一直抄到十二点也没抄完后面的问答题，今天一大早还要交上去，我只好早起把最后三十五道问答题抄好。我不知道被耽误的半个小时休息时间，得花多大功夫才能把它补上，大概一个星期，起码要花一个星期，我才能把长期积累下来的睡眠赤字从永远处在晕晕乎乎状态的大脑中划去那么一小笔。我不可能从学校的作息制度中索取本来应该属于我的休息时间，于是我要是想调整一下我的疲倦状态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学校掌控着其中的十四小时，而且剩下的十个小时的每一分钟都在围绕着学校的那十四个小时打着转儿，我又怎么能抽出多余的时间来补充睡眠？除非我上课打瞌睡，而且还要冒着被老师逮到批评一通、甚至被班主任传唤的危险。可是，如果我不能给自己的身体——这样一台学习机器找到一

个休息的机会，我就会在到达明年7月的目的地之前宣告死亡。我休息，但是我不得不时时冒着巨大的风险这么做，于是我永远生活在习惯性的恐惧和警惕之中。我很累，我需要休息：一个持续长久的休息，一个卸下了负罪感的休息，一个永远也不会被打断的休息，一个不需要惦记着醒来之后会碰上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的休息，也就是说，我需要的实际上是一个死亡。

我问左边的同桌，你是不是觉得困？他说，不困，就是累。那还不是一回事，我笑了。我很奇怪今天我起早了半个小时到现在却不觉得困，也许通常的作息习惯在今天突然变化得太大了，我的身体机能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发现，到校后，我的举动有些反常，就像吸入了某种神经性毒剂：我明明在手里面拿着一支钢笔，却弯下腰来贴着地面把它找了十分钟之久。当我发现钢笔就握在我手中时，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笑自己愚蠢，而是庆幸我终于把它找到了，你看这是不是很可怕？

我在上午的第三节课上终于有了反应：我感到前额压力巨大，就像快要爆裂开来了似的，我知道这是因为睡眠不足，但是我没有什么好办法缓解它。我在发着烧，我很清楚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生病，只要我现在躺下，睡上一个小时，这种症状就能减轻，但是我不能睡，因为这堂课是班主任的外语课。我突然烦躁起来，我对学校把本来属于我的时间进行每堂课四十五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的划分感到厌烦无比：学校掌控着每个人每天最宝贵的十四个小时（就算不是掌控着你的全部生命吧），却把这原本呈流体状态的十四个小时切切割割划分为支离破碎的十几个固态物体，这样一来，你就是想让自己在十四个小时里面完完整整地做一些正

经事都没有办法。滚他妈的蛋！我愤恨地盯着黑板，却被班主任误认为想站起来回答问题，于是我就被他点了名。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不知道，我没说话，于是我就只好站着，一直等到有别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你把他刚才说的答案重新说一遍。”班主任要求我，言语里带着强烈的警示。

我本来想告诉他，既然已经有人回答了，我就没有必要重复，但是我即使相当困倦和厌烦，可还是没有昏到和班主任作对的地步。我重复了一遍，这简直就是对自己的侮辱，可我当时却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我已经非常疲倦、非常疲倦了。一个人在极度疲倦的状态下大概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他还没有叫我坐下，我就擅自一屁股坐了下来，还好，我回答了问题，主动坐下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举动。

我在刚上完第一节课后就出去买修正液，我的那瓶丢在家了。马上还要考试，第二节课是数学考试。这些稀奇古怪的学生用品，你要是用习惯了，突然手边没有了它，就会觉得特别别扭。学校现在也愿意在下课后把校门打开，所以我就不用从学校另一头的那个只有学生才会知道的隐秘的狗洞里偷偷地钻出去，再绕一个特大的圈子跑到学校门口买东西了。我进了第一家文具店就问有没有八毫升的修正液，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小男人背对着我，不知道正在摆弄什么。我又问了一遍。他回过头来，一双沉重的眼皮抬了起来，目光滞缓，看上去就像一个电力不足无法正常工作的儿童玩具。

“没有，只有××牌子的。”

“什么？”我觉得奇怪，他答非所问，我问他有没有八毫升的修正液，他说只有什么牌子的。老天，让他快点

醒醒吧，我还有三分钟就要上课了。我把手臂伸得老长，告诉他柜台上放着的那瓶修正液就是我要的。这时里面出来了女老板，两手水淋淋的正在往围裙上抹。我几乎把她当成了救星，连忙告诉她我想要一支修正液。她倒是机灵得很，我马上付了钱，她在给我找头的时候很殷勤地问我还需要点儿什么别的，我说我马上要上课了，需要什么我会下次再来。“慢走！”她在我出门的时候突然高声叫道，把我吓了一跳。

我要是在进校门的路上慢了半拍就很有可能赶不上数学考试，这是一次摸底考试，要是因为迟到不让我参加考试，我就会变成班里的异类，我怎么敢慢走哇，我还是赶快往学校里冲吧！

中午的饭吃起来很累人。我不想让父母担心我的胃口，但是我又不能逼迫自己把这顿难以下咽的饭吃掉。爸爸上午买了鱼，又是老故事：缺斤少两。妈妈边吃饭边说着这事儿。我心里很烦，这种事情向来会加深我对生活的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认识。我说了一句“这菜真难吃。”妈妈马上放下话题，转过来对着我：“吃吧，专门为你做的红烧鱼，你不是喜欢吃的吗？”

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不想吃饭，反正就是突然之间再也不想吃鱼了。我可不会为了填饱肚子而吃饭，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不如父母。我有时候挑剔得连自己都讨厌自己。外面有一辆大卡车来来回回地开，我要出去看看。我窝着一肚子火正愁没地方撒，我知道我不会有勇气对着别人大声嚷嚷，可我还是放下筷子站了起来。妈妈看出了我的动静：“你可不要去招惹麻烦，那车是KK的叔叔刚买的，他正在试车，已经试了一上午。”试车也应该有个限度，他要是再这样试下

去我就不用吃饭了，光是闻着柴油味儿我就饱了。窗户外面暴土扬灰的，我看了更是愁上加愁、烦上加烦。

我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在我进自己房间的时候，爸爸问我，你的饭吃不吃了？

“不吃了，饿死也比气死强。”我没头脑地甩出这样一句话。

我把窗户又检查了一遍，怎么我的屋子里面也有一股柴油的味道？简直就是无处藏身！我疑神疑鬼地把窗户的每一个可能漏风的边边角角检查了个遍，还是没有问题，难道是我的鼻子出了问题？我无可奈何地一头栽在床上。我太累了，我累极了。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可是眼皮跳个不停，我被弄得越来越烦躁。门被轻手轻脚地打开了。“不要进来！”我突然冲爸爸叫道。

“怎么了，你今天是怎么了？”他最终还是进来了。

我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就是这样，可我怎么对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一个人安静一会儿有多么重要，他关心我的方式就是一句一句地问我的话，问来问去，要是我不肯说话，说不定他会到学校去找班主任把我这段时间在学校的情况问个明白。我最恨这样了。我不知道爸爸为什么在我对他说“不要进来”的时候没有退出去，而是带着一种让人发狂的好奇态度打开了门，进来了，坐下来。就在爸爸坐下的当儿，我一骨碌爬起来，抱着盖在身上的被子冲了出去。

我知道他会跟着我走出来，然后我就冲回房间去把门锁上，这样就能求得一会儿安静。但是我的盘算打错了：他没有跟出来。我在外面等不及了，说不定他在翻我的东西。我又进屋去，爸爸站了起来：“是不是今天挨老师批评了？”真是笑话，异想天开的笑话，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

我驳斥，我作为一个好学生，已经十年没有享受到老师的这种优待了，我在学校的级别还够不上挨老师批评。我知道我得对爸爸说一些什么，要不然他就会打电话找班主任聊我的事儿，谁知道他们会说我什么？

“你出去吧，我睡觉，我下午还要考试，我今天不舒服是因为我丢了钱包。”我说了个谎。

“你还有多少零用钱？”爸爸问。这个机会倒是不错。

“你给我五十块钱就行了，不够的话我再问妈妈要。”

我终于在一点十五分闭上了眼睛，我还以为这个休息机会只有我在临死之前才能得到呢。我的脑袋里面老是在闹哄哄地闪现着各种各样的考试资料，就是今天上午刚刚发下来的东西，尤其是那个关于农业问题的时事政治材料，老天，简直就是一场恶梦。我努力要把它从脑子里面赶出去，它就是赖着不肯走，一刻不停地重复着下面这句话：农业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我无法再让自己这样躺下去了，我绝望地爬起来，双臂支撑着床沿，仰着头，就像我以前经常流鼻血时那样。我眼前好像晃动着一片布，一片花布，那不是花布，我看清了，那是一片讲义，数学讲义、历史讲义、刚刚印好的政治讲义，还有语文讲义，是从著名的海淀考题上摘选出来的，还有外语语法精选讲义，上面还带着油墨的气味，一张、一张、还有一张，这儿又飘过来一张，快点把它捉住，不要掉到地上了；别忙，我往后面传，前面又传过来一份；还有，还有，别抢，人人有份！我被空气中的油墨味儿熏得无法呼吸，我抱紧脑袋，狠狠地捶着它，因为我担心我的脑浆在颅内硬化，我狠狠地砸我的头颅，我已经不能分辨疼痛和痛苦，我只是在狠狠地砸我的脑袋，好像这样一来我就能让自己从这种可怕的幻觉中清醒过来。

我坐在教室里面，我看着黑板，光光的黑板，它的一一
同桌打断了我，他说：“你认识隔壁班的班长吗？”

“我知道他。”我感谢他打断了我的梦魇，并且很想听
听下面他要说什么，这段时间我和他已经混得很熟了。

“他被人打了。”好像觉得我对此有些无动于衷，他又
加上一句：“是被人在学校门口拿刀砍的，现在送到医院里
去了。”

“什么时候？”我问他，那不是出于关心，也不是出于
好奇，我只是希望对同桌表现得友好一些。

“今天上午，今天上午放学后。”

我不再追问，他好像在等着我问些什么，可我还是
没有问，他有些失望地把历史课本重新拿起来背他的书。

12月19日

除了柳树那黑色的枝干还显出一点轮廓之外，田野里的
一切都被一层薄薄的白霜罩住了，虽然这层入冬以来的第一
场霜很薄，但是它把所有的物体都纳入了一层白色的保护
之下。太阳还没有出来，那些柳树，黑色的细细的枝桠就像
炭化了一样，毫不留情地带着生命被挥霍了的强烈控诉戳向
阴沉沉的冬日天空，远远地看去，就像是一片硬化了的毛细
血管林。我忍不住又咳嗽起来，那些柳树的光秃秃的枝桠让
我想到了我肺部的毛细血管。

我每年冬天的这个时候都会咳嗽一阵子，但是今年比
往年更加奇怪，我发觉我的肺部就像一个大风箱，一刻不
停地呼呼作响。我晚上一躺到床上就咳嗽，止不住地咳

嗽，那种内脏撕开的感受真是要命。我只好站起来在房间里焦灼不安地来回走动。爸爸往我的房间里跑了好几回，他很担心我。我为了不让他太过于担心，就忍住不让自己咳出声来，可我还是忍不住，呼吸起来就像拉风箱似的，今天早上爸爸出去给我买了药，我自己没有时间去医院，马上就要月考。我服了药，早上起来觉得好些了，我只感到肺部就像被蚀空了一般。因为不住地咳嗽，我昨晚折腾到半夜才睡觉，今天一点精神都没有。我的肺部不仅仅是在忍受着咳嗽的折磨，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就是那种经常性的胸闷，那肯定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因为压力。我还能感到胸部闷得难受，也许这说明我的病情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只不过是一点咳嗽，吃了这一轮药大概就会好起来。我向远处看去，远一些的地方，目光不必越过河面，就能看到柳树林的树冠上有一抹轻轻的不能确定的绿色，我怀疑是自己的眼睛花了，现在是刚刚入冬，柳树怎么可能发芽呢。河面上好像结了冰，对面的河岸上，树林子连成一片，好像深色的山峦一样，它们制造出春天就要越过宽阔的河面的假象，现在是12月份，春天还远着呢。

风凛凛地刮来，虽然没有沙尘，但是因为它带着冬天特有的干燥和残忍，那种心理上非常肮脏的感觉让人皱缩。废弃的塑料袋紧紧地扯着公路边的最后一点草根，不肯松手。一张垮掉了的面孔，在我的眼前一闪而过，他好像在经过我的时候对我微笑了一下。我回过头，那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他骑着一辆踏板摩托车。我忘了他的名字。他看上去很体面的样子，后面坐着的大概是他的女朋友。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我一碰到过去的同学就会想这一点，好像每个人都比我活得踏实一些。

教室的门在我身后“哐”地一下关上了，不清楚是风吹的还是人为的。我吃惊地回过头去，一个非常简单的惊吓就能让我束手无措，就像身边的人作出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突然间歇斯底里一样。我发现不仅仅是我，班上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极易受惊，极易被恐慌攫住的症状，我把它认为是高三学生特有的精神障碍，根本就无法消除——惟一的可能就是你别上高三，但是那等于不可能。

门窗又都紧闭着了，这是下午上课前最难忍的一段时间：老师迟迟没有进班，我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这种禁闭的气氛中骤然关闭了，我干燥的皮肤甚至能感受到落在身上的每一点细微的灰尘，我别别扭扭地紧攥着这本封面已经烂了一大半的数学自测题。这上课前的等待，对我来说无异于正在努力克服一场精神上的巨大危机。我憋不住，又开始咳嗽了起来。数学老师打开了教室门，往我这边看了一下，走进来。我强忍着咳嗽随着众人站起来，又坐下去，木偶戏又开始上演了。

当我的咳嗽缓和了一阵子之后，我的困倦又开始发作。右腿下的一根血管受到了压迫，导致整个腿部都在扑扑地跳动着。我发觉后就小心地换了一个坐姿。今天的傍晚来得太快，在第二节课上，外面就出现了黄昏的征兆。窗户被人打开了半扇，有些风吹进来，我好像站在一片热力渐退的戈壁滩上，可是现在是冬天啊。我意识到我开始发烧了。

我没有把生病的情况告诉父母，自己偷偷地拿出来一些药，简单地看看说明服了下去，再把止咳糖浆喝一些。晚饭没有吃，因为我吃不下，我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放在我屋里的书柜上，这样他们就不会发觉我没吃饭。我打开台灯，开始写语文试卷。据同学说，电视台通知了今天晚上全城都要停

电，学校没有通知这件事，因此晚上还是要去上课。我收拾好书包，把眼睛揉了一会儿，今天不知怎么的，我的眼睛总是睁不开，看见的所有物体都染上了某种狭小狭小的闭塞和保守的味道，难道是因为我生了病，就把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扭曲了不成？肯定不是这样的。在我没有生病的时候，它原本就是被扭曲的，在我生病时，它只不过由一种扭曲状态变成了另一种扭曲状态，它从来就没有正常过。天黑得很早，我去楼道口推自行车。我那轮廓模糊的双脚，好像两只配合得很好的虫子，一前一后地交换着，尽职地轮流给我探路。天空中满是鱼鳞状的云，中间闪烁着点点星光，今天为什么可以把天上的星星看得那么清楚啊，这不是个冬天吗？我向远处的城区看去，到处都是漆黑一片，全城停电了。

没有确切的日期，一月初

我不知道今天的日记应该算在什么时候，现在已经是一月初，我已经有好些天没有写日记了，从12月20号，就是我去医院看病的那天起，大概三个星期了。这篇日记与其说是日记，不如把它当作周记或者更长时间的记录。12月20号学校放一天假，我由于咳嗽不止被爸爸带到了医院。我得了肺炎，医生建议我住院治疗，但那得耽误几天的上课时间，再加上我受不了医院里面的那种叫人感到恐慌的奇怪气味，还有病房外面来来往往的不祥的人影，我坚持回家治疗。我把我担心耽误了学习的事儿向爸爸说了，在比严重的疾病更加重要的学习面前，任何家长都会不知所措。在我的坚持下，爸爸同意了我的意见。那倒不是说他和我对于学习的观点相同：我担心学习，那是由于我不得不担心，因为我只有整天

看书写试卷才能不让自己陷入恐慌。爸爸当然也认为学习要紧，但他是出于一种对学习的盲目迷信，他是作为局外人来看待学习的。像大多数家长一样，他习惯性地认为热爱学习是一种优秀的好品质。我坚持回家，他一开始并不支持，但是我一谈到就要到来的月考，他就让步了，于是我在医院里吊了一瓶水，拿了一些药，然后回家。我没有考虑到肺炎的传染性，医生在我临走前，向我指出了肺炎是有传染性的，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去学校上学，我得向班主任请几天假，爸爸到学校代请，这件事一切都是我自己拿主意，由爸爸代劳。

想来很可笑，在我身体好好的时候，我要是想请假，就得去当着老师的面说谎，我现在真的生了一场大病，却没有机会向班主任亲自说明。我请了三天假在家里看书，月考在下个星期。这次月考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从哪方面能说它“非常重要”，班主任和大多数老师都说它非常重要，那它就非常重要，也许由于它横跨元旦，因此它就是旧的一年的最后一场考试，又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场考试。无论如何我待在家里面复习备考，我这次考试如果出了问题，肯定不会因为得了肺炎而得到原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学校注重的只是结果，就像工厂注重的只是产量一样，否则它就不会在每次考试之后公布总分排名了。

我的肺炎在一夜之间恶化了。我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我厌倦服药，少了一顿没吃，也许是那天下午一张数学讲义做得我陷入了绝望，也许是我太担心这几天学校将会发生什么不利于我的事情，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我正在不负责任地跳出了生活的圈子之外。我忧心忡忡地睡过去，醒来时一身冷汗，我本来以为身上出汗就说明我的病情已经好转了，

而且我发觉我不再那么严重地咳嗽。由于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咳嗽中度过，我好像还有一些心有不甘地试着咳嗽了一下。我不费力地吐出了一口痰，但是它不再像原先的颜色，它带有很重的铁锈色。我打开灯，我不知道当时已经是几点了，看清了痰中带着血。我发了慌，连忙叫爸爸，然后就是一阵猛烈的咳嗽把我冲击得全身有气无力。我第二次进了那家医院。

要不是父母在我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把情况告诉我，我到现在都不会弄清楚我是在什么时候进的医院、又在医院里度过了多长时间、然后又是怎么出院、在家里又过了多长时间的。那几天里我唯一记得的事情就是我要耽误了月考，这个念头把所有其它的念头都挤压出了我的大脑，它盘踞在我的思维之中，让我怎么都没法恢复清醒。爸爸和妈妈轮流看护我，让我感到不好意思。我已经这么大了，家长在病房里面看护着这么大的一个人在我看来显得实在太滑稽。由于我老是稀里糊涂地嚷嚷着月考的事儿，爸爸就对我说，你要是愿意，我就到学校把试卷要来，你在这里做。我马上闭上了嘴。我念念不忘月考，那倒不是因为我希望在病床上考试，我根本就不想考试，我嚷嚷那是因为我害怕没有参加月考可能对我造成的后果。我的想法爸爸肯定不会明白。他第二天就去了学校，把试卷拿了一套过来（当时月考已经结束了）。我硬着头皮做试卷，政治试卷和外语试卷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就把它们做完了。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那天没有做试卷的话，我起码能早一天康复，但是我不能怪爸爸，这是在不能说清楚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

我是在病愈之后进班上课的那会儿，才从原先的同桌那里听说，班主任在我生病期间在班里表扬我的事儿。就是什

么带病在家学习、学得太猛了病情恶化又被送进了医院、后来还念念不忘地把月考试卷拿去做的这种努力学习的精神实在可嘉。怪不得我刚进班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像看外星人似的看着我，班主任夸大其辞的表扬只会叫大多数人疏远我而不是把我作为榜样，我当然能够理解，这并不是出于妒忌，而是出于反感，一种复杂的情绪，上高三的人或者厌学的人肯定都会有这种感觉，我却无端地成了牺牲品。我发现和我原先相处得很不错的左右同桌都已经调走了，我的座位还在原处没动，我估计这是月考之后的座位调整。我没有参加月考却能保持原来的席位，这大概是班主任对我“努力学习的精神”的一种奖励。我于心不安地坐下来，原来的老同桌GR到我这边来，就是他告诉了我班主任在月考后的班会上是怎么夸奖我的。我的想法非常复杂，班主任这么一夸，我就必须在下一次大考中成绩上升，我被逼上了一条绝路；另外，我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是个死心塌地的，除了学习之外其它所有的事情都一窍不通的笨蛋好学生。如果我事先知道生了一场病会给自己造成这么大的麻烦，我就是冒着死掉的危险也要到学校来考完这场要命的月考。

由于刚刚调完座位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也就是新同桌的最好的磨合期已经过去，因此我和他们就只能把这种冷冷的关系保持下去，长期不见起色。比这个更可怕的是我自己：我一直在提心吊胆地生着病，病愈了又在提心吊胆地害怕对不起什么，对不起班主任？对不起父母？对不起我自己？还是对不起班里面的同学在我重新进班上课时的那种奇怪的目光？我也说不清楚。

生病的那会儿，日记本不在身边，因此我现在要想完完全全地把当时的感受写出来，相当困难。有那么几天，我考

虑了我还应不应该把日记写下去。我在高三刚开学的那会儿也问了自己这个问题，但是当时我这么问是出于我那几天刚提笔感到有些难以为继，现在则是出于另一种原因：我感到写日记并不能让我获得精神上的安宁，反倒对我的混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作为人，他的意识的存在，已经把他的各种行为感染上了意识的病毒，各种用文字和语言表述的东西都很可能只不过是一些徒劳的安慰。

1月21日

昨天晚上，我又是一次接一次地从黑洞洞的床头睁开眼，因为我又恶梦连连了，直到早晨七点，最后一个梦才恋恋不舍地放过我。我免不了又像每天一样，疲疲沓沓、心慌意乱、口舌干燥地从床上爬下来。不过，让我也奇怪的是，我竟然有心在把冰冷的衣服往身上套时，估计了一下我昨晚总共做了多少个梦，也许是六个，或者七个。唉呀！我困得简直想去死。在起床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我硬撑着，捧着政治书，提心吊胆地迷迷糊糊看了一会儿，不小心又被最后一个恶梦拖进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睡眠。不过说老实话，如果有人能恩准我多睡上一个小时，哪怕做高考又考砸了的恶梦我都在所不惜。

我拼命摇动车铃铛。我日复一日地上学、日复一日地碰见成千上万张愚钝者的蠢面孔！停车处的铁门还没关，我停好车，同时哗啦弄倒了一大片别人的车。我顾不了这些屁事儿了，全都给我滚蛋吧！那看车的人绝不会因此骂我没礼貌，许多人头脑里根本就没有“礼貌”这个词儿。我老远就

看见数学老师推门进了班，如果班主任不在教室外边巡视，他倒是可以让任何迟到的人进班，但条件是你站在教室门口时别向他高喊“报告”，以免打断他上课的连续性。数学老师说的是以免打断“我上课的灵感”，可我估计他实际上还是指他上课的连续性。数学老师们总是不大善于表达，我并不是说他们总爱把黑说成白把肥说成瘦，不是那个意思，可是，说老师上课需要灵感，那倒是千古奇绝闻所未闻之事，听上去好像高中老师们都在从事着极富创造性的伟大事业似的，苍天呀！

第二遍铃现在才响，太巧了，我刚好在班门口站定，手放在门把手上。门突然从里边被拉开了。我像是猛然遭到了雷击，可那绝对不是因为爱情：我看见班主任就站在我面前。两个老师不可能总是在同一个教室里，免得一不小心在学生面前互相拆台，于是现在就出来了一个。我真没想到他怎么那么迟才结束他例行的云游四方体察民情的工作，数学老师进班那么长时间他才出来，却被我这个倒霉的人碰上了。

“你怎么不早点来，提前一分钟。”班主任反手砰地带上门，不动声色地说。他连正眼都没给我一个，而且说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任何表情！一脸凶像也比不上这样令我倍感恐怖。我呆愣在他的面前，像个小乖，完全不知所措，好像等着什么命令的机器人一样。他终于看了我一眼，说，不准进班。我接受指示，转身就往花园里跑。当时我当然不会知道，班主任将在下午的班会上正色道：“我一再强调不准迟到不准迟到，怎么今天又有迟到的？总有那么一些人，把时间算得那么准，上学路上跌一跤都会迟到。”老师们在发表讲话时，有些会出于有心或无心地盯着坐在下面的

某一个人看，有的则是目光泛泛，好像把全班所有的人都看遍了，还有的似乎什么都视而不见，目光直射外太空。班主任是第一种人，他在下午的班会课上讲话时看了我不止一眼。当时我可能有点儿心不在焉，最后他干脆不无威胁地盯着我，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讲着。旁边的人听了他的话窃窃私笑，我坚决不笑。一点儿也不好笑。如果我也跟着笑，也许会引火烧身，被他特地关照地提问，“为什么上午迟到？”那我怎么解释？难道我能把我的日记拿出来给他看吗？我迟到，但那根本就没有一两个具体的原因，因为我睡得迟、起得也迟？这听上去不错，可这连我自己都不能说服，我又为什么睡得迟起得迟、七点钟起床还妄想多睡一会儿？难道我得了昏睡症，或者我本来就是个大懒蛋？我怎么总觉得自己就是一条被鬼使神差地装在轰轰轰转个不停电动机上的老皮带呢？我处境窘迫，连迟到这种事儿都找不着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些表面的站不住脚的理由。

于是我在上午迟到之后不得不在花园里东躲西藏，等着下课后再进班。我坐在光秃秃的冬季花园里雪松后边的水泥栏上。

这棵看上去还算郁郁葱葱的雪松，在满目疮痍的灰色花园中遮挡着迟到的我，让我觉得它就是我的一块大遮盖布似的。为了让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我从书包里掏出书来看，这会儿还能看小说？不不，那连我自己都会发出良心谴责，我看的是政治书。也许到明年7月时，我的迟到，还有其它一切稀奇古怪事的原因都能从我的日记里找到了，不过那也没什么用。可我现在不想因此而发疯。

上午那节落下的数学课让我十分惦记。我的数学差得几乎在每次综合考试时都要了我的命。“你的数学情况很严

重。”数学老师有一次说我。他人还不错，比较聪明也不怎么玩人，我是指就我而言，也许有别的人被他搞个半死的。反正在我的印象里，许多数学老师看上去都有点儿心术不正似的，这是为什么呢？数学本身则另当别论。我一上数学课就发狂似地记笔记，连老师在黑板上随便磨磨粉笔留下来的划痕我也恨不得记在笔记本上。事实上，上课记笔记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你有点儿产生干了些什么事情的成就感，虽然事实上你什么也没干。数学，从它本身而言，几乎是无懈可击，不过这很可能正是我恨它的原因。我觉得它太独断专行，没有一点儿人味，而且，我不明白它跟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它自己又有什么人格上的意义。其实我很清楚，作为一个高三学生，你不能老是拿这门课对你有没有意义来喜欢它或者讨厌它，一切都应该以它对你的高考有没有利为标准，而不是什么其它标准。高考就是最实在的目的。现在，这些我毫无兴趣的课程几乎都成了我的枷锁，而且我没胆儿砸断其中的任何一环，否则我将荣升高四，铁定如此。

我放下手里的历史书，前面黑板边上刚刚贴了一张我因为生病没有能参加的这次联考的全班成绩排名，我想仔细看一下。可无论怎样眯着眼睛，还是看不太清楚。

1月22日

几天来，我的紧张有了一些缓解，也可以说成是——它又蛰伏了起来。我没法知道它何时又会像贪得无厌的海鳗一样伺机行动，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给造成我的紧张的因素命名：它含有恐惧，但这种恐惧又不像刀架在脖子上那么具体，因为它

是对我的全部生活而言的。它令人无法描述地交织着，但它自身并不混乱，相反，非常、非常地严密，要想冲破它，简直不可能。它搅乱了我对我面临的生活的一切看法。我急于冲破它，找到自由，这就成问题了。而且，我要的自由，它又是什么呢？无论怎么说，并没有多么具体的东西威胁到我，可我确实时时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我被架空了，我无法为改变生活无意义的重复而自主地作出决断。

下午我迎着风骑车上学，喘不上气来，累得要死，当我在课桌前坐下时，才发觉自己的内衣裤都吸满了汗。为了不让潮湿的内衣上那渐渐变冷的汗水刺激我的后背，我只好动作僵直地坐在课桌前，胸脯紧抵着桌沿。我痛苦地感受着最后流下来的几滴汗在背部从上往下地缓缓爬行着。瞅着身上的冬衣，觉得它又厚又脏。昏死过去的太阳在灰色的窗户外边鬼魂似地晃荡着，让我精神恍惚。这节课是自习，有不少人在半死不活地背政治。我向前边看去，可我桌子上的书包撅得老高，它完全挡住了我观察讲台上动静的视线，而我又无法提起兴趣做一个把它塞进抽屉里去的简单举动。也许我会首先受不了往抽屉里塞书包这个动作，就此一步步变得不可救药。我不敢动一动。政治老师走出了教室。我又发了一会儿呆，一直到我想改善一下目前的呆滞为止。

太阳光把这里弄得像个精神病院，我想从遮住这片该死的光线开始我的改善计划。我把胳膊塞进抽屉，试图找出一张废报纸什么的。准是没有，我想着。当然，总是如此：你想要的东西它不在，你不想要的东西却横尸遍处碍手碍脚，这令我十分恼火。我看见右边这位的桌子上有一些用过的大张草稿纸，我小声请他给我一张。他瞥了我一眼，开始懒洋

洋地动手撕。我尽量不去看他那表情，那肯定只会加重我的恼火和沮丧。我手捏着纸的两角，把它往窗玻璃上搭。同桌连挪动都不挪动一下，像一截死树枝似的坐在那里，还一刻不停吱吱歪歪地说着什么，听得我心里难受。当我非常困难地把废纸贴着窗户弄好了，又重新坐下时，才发现这张薄如蝉翼的纸不但不能遮住阳光，反而会把光线滤得更加暧昧。我的半个脸处于半明半暗之中，身上却燥热难忍。我只好又站起身，一把将纸拽下来。我得说我这么站起来又坐下去重复了好几次，的确鼓了很大勇气，而且动作相当麻利。因为我害怕在我做事时别人哼哼叽叽个不停。但是我的动作引起了站在门口的政治老师的注意。我不是在违反纪律，但仍然觉得被他注意是件十分别扭的事。在课堂上不应当有比放一个闷屁幅度更大的动作，原则上讲是如此。

我只好继续僵直着脖子，坐在那里。我马上意识到该把书包塞进抽屉里去了。我把书包放好，开始掏书，掏呀掏，拖出来那本政治书。

班里闹腾得厉害。乱世出英雄嘛。我的同桌，就是左边的伟大的革命家发泄完了，好像也有点儿举棋不定，在紧握着拳头讲着什么鬼话。刚刚还像一截枯枝一动不动的右边这位听到了响动，放下书，面带微笑地等着看我和这个狂躁者吵起来。他好奇的嘴脸实在是太露骨了，像是枯木逢春似的。我紧闭着嘴巴。我最烦和别人斗嘴。我的确已经沮丧得厉害。我知道也许我还有那么一点儿可能扭转颓势的机会：我的书包里有一条没拆开的口香糖。我买它倒不是我特别爱吃，只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缓和一下情绪。现在它能派上大用场了。如果我把它拿出来，向前后左右四处分发，至少表面上的气氛很快就会起变化，但我

没有动一动。我宁可把口香糖扔到脚底下也不愿意把它分发给这帮蠢物去拉肮脏的关系。他们除了把我搅浑之外什么事也干不了。而且他们还真的会带着理应受到孝敬的大度姿态，矜持地接过你的贡物。我是很胆小，可我还没到奴颜屈膝的地步。我清楚地看到，如果他们真的牛羊反刍似地嚼着我的口香糖时，就会给我一种虚情假意的友好态度，这是我担心看到的另一种极端。我会马上受到殷勤的迎合，我会感到恶心。

我冷眼看着桌子上那一摞书，心生怀疑：我甚至不知道它们被印制出来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我面前摊开的这本政治书，每一页都有大得近乎骇人的严肃而空洞的字眼。有那么一帮人，总以为只要背一背书、做一做题目就可以活下去。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在我们这一代中，最清醒的那一小部分人，却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我每天面对的所有的东西：上课，下课，背书，做题，说起来都是妨碍我看清这个世界真相的速度狂魔。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当然也能形成对世界的看法，但那含有太多的怀疑和有待确定，远远不是世界的真相。疯狂的速度驱使着我的一切行为，我无法集中宝贵的精力看清什么实在的东西和它们的意义。我马不停蹄地一遍又一遍地背书，一张又一张试卷地做，赶，赶，赶，学习计划、测验和月考。我累得像个制衣厂的打工仔，我甚至比他们还心里没底，我从来没有机会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自己究竟是在干什么。我举目所及之处，都是一些从小就只知道努力学习的白痴，好像他们就是专门为上学而生的。“努力学习”已经成为一种不会有人怀疑的，理所当然的，道德化的行为，它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这真是恐怖。有个问题我想挑明了问一问：学习真的需

要你去思考什么吗？我看不出背一篇文章、做一道习题和吃喝拉撒有什么根本区别。我就像一个低等动物似的活着，每天看、背、写、抄、考，紧张、恐惧、颓丧、绝望、疯狂，我花这么多的代价，却换不到哪怕一点点生活的意义。如果意义本来就没有，那么任何生活中的行为都只不过是骗局，这正是我无法接受的！我相信我正在受到愚弄，我也相信我迟早会揪出那个使我看不清事实真相的大骗子手。

课间休息。我坐在那儿，头皮发硬，太阳穴一跳一跳的，腿也发软。我的面色估计跟个死人差不多。我在心中逐渐作出了一个决定。

我看了看表，还有四分钟上课。“我想第二节课请假。”我说。左边的同桌鄙薄地看了我一眼。“我发烧了。”我可真是懦弱，想走还得找借口，像表示歉意似的向别人解释。不幸的是，周围的人个个全身都长着犀牛皮，颅腔里都装着石灰渣子。

他冷冷地看着我，满脸不屑地哼了两声。真让人发狂。我尽量动作自然地收拾书包。当我站起来时，他却表现出了真正的惊愕：“你真要走？”

好像我刚才讲的话都是对着墙说似的。我说，对，然后就往外走。

当我拎着书包走到班门口时，同桌已经举起他的一根手指头指着我的后背，有气无力地奸笑着了。我恶心透了。所有的人都具备把我摧毁的力量，尤其是当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时，这种摧毁性的破坏力更为强大。我拖着重得像块铁砣而且在腿边晃荡得厉害的书包，在楼道里悄没声儿地快步走着。人声鼎沸，而我却差点儿气恼得哭出来。我身后像是个火山区，喷涌的岩浆以一种无赖般的自信态度，慢条斯理地

包裹、吞噬着我所经之处的一切。我实在是永远也不愿回来了。

走出楼梯口，跳到花园里，我等着历史老师。下面两节是他的课。他比较缺乏那种使人局促不安的好奇心。他从办公楼里出来了。我走上前去，说，老师，我想请两节课假。他马上批准。我很高兴用不着向他即兴撒谎了。其他老师就不同了，他们老是逼着你讲出你请假的理由，这样一来，你就不得不撒谎，而你本来并不想撒什么谎。从小到大，我并非出于本意，仅仅是为了自我保护，在没写完作业、忘了背书、考砸了数学外语之后，才不得不提心吊胆地撒谎，而且在重压之下把谎言编织得越来越严密。其实人也可以分为两类：逼人的人和被逼的人。鬼才知道当个逼人者有什么益处，而像我这样一个被逼得要死的人，除了有机会撒一撒谎之外，还很荣幸地一直受到恐惧的关照，那种作为一个被动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才能时时刻刻地体会到的极度不安从来都没间断过。我想我连活着都是出于被逼无奈啊。

我向停车处快步走去，我想象得出周围那帮人在下面两节课上看着我的空位子时将会多么不自在，那倒不是出于喜欢我关心我，恰恰相反，他们希望人人都陪着自己受两节课的罪，看到有人逃掉他们准会失去平衡。那我可管不着。同样，我也会因为少上两节课而觉得不安，但我不会那么卑鄙地把我的不安嫁祸于人。既然别人比我坚强，那就让他们继续坐在教室里等死好了。当我重新修整好自己的免疫系统晚上再来学校上课时，又会成为铁板一块啦。

学校大门还没关，上课铃声传来，还真叫我有点儿揪心，一直到我在宽阔的马路边上看见一只油光发亮的腊肠犬为止。它就在我前边的不远处。一溜小跑着，我摁了一下车

铃，它却站定了，回过头来瞧了瞧我，一副失意者的眼神。我又摁了一下铃，它定了定神，掉转头去，继续跑着。

1月23日

我在早晨五点半就被闹钟震醒了。其实我从五点左右就开始半睡半醒，紧张地等着闹钟响起。它在我已经预料到的情况下响了——可我还是被它弄得十分紧张。这真是讽刺：我每天晚上都得亲手设定闹钟，让它在第二天早上激活我的紧张感。看来我得换一台不用每天定时的电子闹钟，免得连我自己也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使我紧张的不是我自己，另有原因，但我到现在为止还看不清这个该死的混蛋。

我又迷糊地躺了一会儿。六点整，我爬起来，坐在被窝里看政治。马上要有一场政治考试，我才背到第十七页，全部课本总共一百八十八页。不算这一次，我在这个学期已经把这本政治书从头到尾背了七遍，现在我简直不能说是在背它，而是吃它。

我伸手去写字台上捞笔，历史书也跟着从床沿往地上掉。烦死人。我恨不得马上跳下床来踩它两脚。我搞不懂为什么历史这疯子总是得碾着成千上万人的尸体才能前进，真是疯狂。你看，马上要会考了，高二时已经考过几门，现在还有三门没考，在会考后的第三天就是期末考试，它们都将成为我的个人历史。如果我自己不提笔记日记，它们将很快被忘掉。除了我自己，不会有别人更关心我的状况、我的感觉。毕竟，历史这东西从来都没有关注过小人物的生存，但是谢天谢地，我总可以被允许写我的日记。我自己的问题还

是让我自己来对付吧。

一边背书一边犯困。昨天夜里又做梦了。这段时间我没有哪个晚上不做梦，各种怪梦，断断续续地做。这已经成了我没法控制的新习惯。我白天精力很差，早晨刚一睁开眼就犯困，跟没睡差不多。手里的书也背不下去，也没法再睡一小会儿，因为我老是提心吊胆的。

七点，我又坐直了身子，却没能马上穿衣服。屋里有点儿冷，我觉得这个冬天的早晨让我疲倦、乏味、烦躁又没脾气可发。是这么一回事：我的身上缺乏勇气。对那些冲着我来叫我恐慌不已的事件，我无法正面与它冲撞，只是小心翼翼地侧身让它过去。于是我永远都不得不礼貌地容忍着它们在我面前横行而过。我站在一旁，忍受着它们席卷而来时给我带来的侵害。唉，我讲得还是不够明确，我又怎么能真正地看清我的敌人呢？我迅速穿好衣服，下了床。

第一节数学课我困得半死，下课后不得不借一本笔记来抄。我在瞌睡中硬撑着记下的笔记，看来只有当我又一次打瞌睡时才能辨识。这节课是语文，班里面死气沉沉的。老师手捧着语文试卷在讲题目。有些事情，虽然司空见惯，可你仔细想一想会觉得很可笑：语文竟然像数学一样，有选择题，还有填空题，这真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几千年来的一项伟大变革。老师他自己讲着课，也有点儿提不起兴趣。我觉得自己好像身处一场追悼会的现场。右边的同桌动了动，他在翻政治书，同时贼也似地观察老师的动静。这又令我觉得好笑：他又不是在破坏纪律什么的，好好学习也得躲着藏着。不过事情一旦习惯下来，再荒谬也不会有人怀疑它了。他不停地抬头低头弄得我发烦。其实当你一旦不是某个老师的学生时，你就会想，我当年没有必要那么害怕他呀！不过

现在可不同：老师就站在你的面前。

我头脑迟钝地坐着。我想把日记本拿出来写一写。我写日记的习惯是，写一行遮住一行。我不那么在乎给别人看我写的东西，可我不会让别人在我写东西的时候看着我写，绝对不行，不然我会发狂的。我刚写了一行，就被左边那位好奇的同桌注意上了。我掩了掩，继续写。他开始烦躁、恼火，像鳗鱼似的痛苦地扭曲着身体，用厌不拉叽的眼光看着我。在有些事情上，他们敏感得像根引信。只要你干的事情和他们干的有些不一样，他们就会马上心里发痒，要给你搞点儿破坏才心满意足。他懒洋洋地把大腿搭在我的凳梁上，开始不停地抖动起来，这当然不是一种诱惑。我不得不放下写日记的笔，直起身子，若无其事地摊开语文试题看了起来。右边那位同桌早已扭转上身把背对着我了。好像我仅仅写一写日记就对他们造成了多大损害似的。我不可能在这种敌意中写日记。或者看课外书或者做诸如此类其它我想干的事情。在教室里，甚至讲一句话、做一个动作，我都感到有巨大的困难。为什么我的自由总是不得不终结于他人行使自由之时呢？

开始讲题目。巧得很，左边的同桌马上被叫起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没太在意他回答了些什么，但我很高兴，当他重新落座之后，他的精力将会完全放在回味自己刚才回答的问题上，他不会再有精力打扰我写日记了。果然如此。他坐在那儿，像牛反刍似的琢磨着刚才的回答。我继续把日记写下去。

就这么过了大半堂课，语文老师终于闭上了嘴。他讲完了试题，坐在讲台后边的椅子上，一动不动。突然间，我感到气氛在变化，令人心跳骤减，呼吸困难。我缓缓地抬起头

来：原来他盯上了我。我很庆幸自己很早就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一直在不停地写日记，这引起了他的注意。要真的是在写语文讲义，你只用像做数学题一样，不时地划一划ABCD这些序号就行了。我停下笔，低着头。我意识到他在盯我，第六感，随便怎么说都行。

一个上了十几年学的人还没有形成这种本能，那他倒真是愚蠢得不可饶恕。我就这样静默了半分钟，什么都停了下来，心跳和呼吸也放到最慢。我已经觉察到他对我的兴趣正在逐渐减弱。这哪儿是课堂，简直就是一个战场。作为学生，学习一点课堂上的自我保护是很实用的：当你非常不幸地被哪个老师盯上时，你千万得注意一点，那就是别抬起眼睛去看他。一旦你和他的目光对视，撞出了火花，激起了他的惩治欲，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考试时传纸条也一样，只要你别像个汉奸似的鬼鬼祟祟地老是抬头看他，让他发烦，他就是看见你正在作弊，也很可能会放你一马，你一看他他准来劲儿。

老师走下来，在我前边一排处站住，随随便便地靠在一张课桌边儿上，抬起拿着书的一只手：“下面有几个词，需要纠正一下读音。”全班的人这才都松弛了下来。

老师们总是让当学生的每时每刻放心不下。任何一个老师都具备超乎凡人想象的调控气氛的能力，不管他自己在不在乎这一点。我看见两个小丑在老师背后表演哑剧，他们用笔在他的屁股上起劲地比划着，可惜观者寥寥。还有十来分钟才下课，人人都在垂死地挣扎着，好像干涸的鱼塘淤泥中，等着天降大雨的鱼似的。刚才我还有些以为，语文老师突然下来是要没收我的日记呢。我的一只胳膊到现在还在抽屉里，把日记本紧紧地按着。他昨天已经收过我一回课外书

了。不过万一他真的没收了我的日记，咚咚咚地走上讲台，翻呀翻，翻呀翻的，包括我在内，谁都不能确定他究竟看到了什么。我写字极其潦草，内容根本不用加密，字本身就是密码。那天我忘了把日记带回去，丢在了桌腿旁还是什么地方，我心里一阵紧张。晚上来了之后，后边那位对我说，这本子上是不是你的名字？我连连说是，他气鼓鼓地把本子递给我。

下面这节课又是语文课，但是出了一点儿麻烦：我正在赶着写历史讲义，左右二位正在挠心地接着写下一张语文试题，我搞不懂为什么在我的周围总是有那么一两条大腿会永不疲倦地抖个不停，这让我烦得精疲力尽。后边有人用筷子般的硬手指戳着我的背部，我扭动了一下，只过了一秒钟，他又戳开了。看来我非得搭理他一下才能让自己得到一会儿安静，我腾开一只手，向后边伸去，肯定又是传纸条。纸条准是传给前面那个混蛋的。我不得不停下笔，例行公事。保险起见，我瞟了纸条一眼，上面又是连名字都没写。我看了后边那位一眼，他指了指我前边的人。我忍着一口气，狠狠地踹了前面的凳子两脚。他正在跟他前边的一位美女深刻地探讨人生，他刚把红光满面如沐春风的老脸一转过来，我就把纸条递到他眼皮底下，“你的急件。”我说。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假：折得像封鸡毛信似的小纸条上写着两个字：急件。好像真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那么十万火急的事儿似的。他没有马上接纸条，而是先问了我一句，“你蹬我凳子干什么？”干什么？这话问得可真够蠢的。我说：“我就是要蹬，你怎么我？”他一把夺过信，咬牙切齿地叫我老实一点，好像我毁了他的一场春梦。“我又不是邮递员。”我说，“你得搞清楚到底是谁出问题了。”

他转过去，坐了一会儿，眼看没法继续跟前面那位美女恢复交流了，于是有些意犹未尽地又转过头来，低低地向我发出威胁。可我觉得这相当可笑，正应了一句老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语文老师正在密切地关注着他。我知道语文老师百般无聊中很有兴趣来亲自着手改造这个混球。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对面前这个威胁者有那么大的火气。我突然以一种大得足以令老师不得不插手干预的声音，对这个一直在把蠢话朝我说个不停的白痴斩钉截铁地命令道，“把头转过去！”

看他那副马上收敛下来的受惊相，我就顿生怜悯。不过这种感觉没持续多久，因为他甚至在提心吊胆地缓缓转过去时也没忘再把我骂骂咧咧两句，好像想借此捞回一点儿脸面似的。我呵斥完之后，自己也心里没底，因为我不能确定老师是否有明断是非的能力，他们经常各打五十大板。周围的人把眼睛瞪得跟猴子似的看着我，又像吃东西被噎着了似的，只有我一个人装着一副沉稳的样儿，坐怀不乱地往下写讲义。语文老师一刻也没耽搁，马上叫我前面那位跟他出去一下，“其余的人不准说话，继续写题目。”老师明察秋毫，我很是感动，他可是亲眼看见了全过程的，料想那个被他叫出去的倒霉蛋不敢信口开河往我身上栽黑草。今天算他倒霉。他虽然是个喜怒无常的小人，认为人人都该深感荣幸地为他效劳，可是以他那点儿本事，还不至于今后真的能把我怎么样呢。看来今天他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了。

下午我比平时早到了五分钟，刚一进班，就听见有人叫了我一声，这让我十分振奋。我看见了DD，她披散着头发，刚洗过，乌黑发亮，看上去真不错。她说上午刚从杭州回

来，刚洗完澡。我在她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来，她的几个叽叽喳喳的围着她的女友安静了下来。我很爱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清爽活泼的气味，不过再也不是她这个人了。现在我只是喜欢她而已。

DD去杭州学了四个半月的画，终于完全结束了学习生涯。她准备考艺术类院校。她不用把功课学得太好，可是她的文化课还是不足以让她十分有把握地考上大学。学画的人差不多都是如此。“话又说回来了，高考是台疯狂的绞肉机，要是唐伯虎落到它手里，它都敢开足马力照绞不误。何况是你呢，DD？对了，你把我要你帮忙带的书弄来了吗？怎么了？”

“书都太贵，外文书店里我去了，都是上百的。”

“其它书店呢？”

“其它书店我没来得及去逛。”

“那你下回再帮我带吧。”

“行，下次我一定带。”

看得出来，她没有十分用心要帮我买书，可我有为人搭台阶下的习惯。我很失望，寒假我没有新书可看了，但我一点儿也不怨DD。DD这次回来，已然算得上是个淑女，也许稍微太活泼了一点儿。我对她可没什么高要求。当我又开始对她要求很高时，我们就不止是一般朋友了。有时候我的确想过，DD作为我的朋友，应该和别的女生更不同一些，可我知道她当然不会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但是，当我看着她的桌子上放着时髦的日本卡通折叠尺时，还是忍不住诧异：我怎么和她成了朋友？因为我喜欢她。她很懂礼貌，即使她不能时时想我所想，有这一点也就足够了。何况，她的优点还不止这些呢。我和她相处，不用太注意时时迁就她，跟她在

一块儿很省心。如今我经常喊DD“老妹”，而她经常喊我“老弟”，我和她谁都不肯改口，别人听了摸不着头脑，可我们俩总会笑，朋友之间的玩笑。其实就出生日期来说我比她早半年，不过，说老实话，我从来都没想过给谁当大哥。“好了，要上课了，晚上我带巧克力给你，我信里写的。我记着呢，老妹。”

“那你千万别忘啦，我有一幅油画，下周一时装好了送给你，老弟。”

傍晚回去后，我从床头柜里拿了五条杏仁巧克力。我谈不上爱吃零食，但是因为压力大，我总是在睡觉前摸到什么吃什么。这几块巧克力我放了有一个星期。本来我买了九块，吃掉了四块，还有五块留给DD，嘿嘿，我数学还不错吧。外屋电视被打开了。我在家时一般都不开电视，爸爸在跟他带进家的一个陌生人谈话。我坐在房间里的床边就可以看见电视，是双人跳水比赛。两个中国女选手从水池中先后上岸，朝裁判方向一齐鞠了躬，直僵僵的动作假得可笑。这种动作日本人做起来想必更拿手。我关上门，把书包里的东西先放整齐，再把巧克力一块一块放进去。我可不想把它们弄碎了。

“味道很好，我吃过。”我把巧克力放在DD面前。

“谢谢”。她看上去的确很快乐，“五块呢！我要饱吃一顿了，太谢谢你了。”DD说“谢谢”这个词时的态度很大方自然，我很喜欢，她叫人高兴。我自己却没办法自然地对别人说谢谢，好像汉语没有说“谢谢、对不起”这类词的习惯。当我认为我非说不可时，就用英语说。因为你一用汉语对人说谢谢，他们就老爱用看外乡人的陌生眼光来看你。当我走开时，DD后边的三个男生正伺机而动。我坐下时，听见

他们嗷嗷叫着向DD要巧克力。DD说，“你们三个人，只能拿两块，这是我大哥送给我的。”我转过头来，她朝我这儿眨了眨眼睛。坐在我后面的那家伙不怀好意地对我奸笑着。我说，“她是我老妹”。可他就是装作不信，故意要把事儿往浑里搅。我没说什么，转过头来。

我在第一节课过半的时候，又想到了托DD买书的事儿，我的失望又来了，我不大可能在寒假借到什么可看的书了。我呆呆地，就这么一直坐到下课。当离下一节课还有三分钟时，我站起来，走到楼道口的茶水供应处，从人群边儿上挤进去，喝了半杯水，又退了出来，站在两米开外，把一角硬币准确地抛进收钱箱里。它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银弧，随后清脆地一声响，我把手插进裤子口袋，了却了一桩心事似的长叹了一口气，往教室里走去。

我骑着车，出校园后才发觉风起了。在校园里是感觉不到风的。我喜欢一直在变化着的天气，只要它正在起变化，就一定是好天气。没有多少星星，我抬头看了看天空。月亮的轮廓被风刮得模糊了。今天，除了高三之外，其他所有年级的期末考试都结束了，寒假开始了。我出校园时，看见高中部的每个高三班级都还亮着灯，而上面几层都是黑洞洞的，偶尔有几扇玻璃窗在黑暗中泛着冷光，整栋楼远远看去，像个被大火烧过的建筑。我上了马路，风使我的手很冷，但刮得不太大，滚烫的脸现在舒服多了。今天路上的车不多，放学回家走这条路的只有我一个人。我骑着车，看着远处的路灯。不知道明年的这样一个晚上，又有谁会有着和我一样的体会。

1月25日

今天是会考，一天考完，我所在的考场是一所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小学，小学校园里面的气氛跟我这样一个业已衰退和迟钝的高三学生格格不入。从早上起我就一直胃部痉挛，直到开始做试卷时，那种隐隐想呕吐的感觉才逐渐消失。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政治，我本来用不着这么紧张。上午的监考盯得很紧，我们学校的一个初中部化学老师是三个监考中的主监，他好像有点儿认识我，发试卷前他走来走去，在我边儿上停下来，拿起我的几样证件，煞有介事地看了看，又多看了我两眼。我觉得自己被他看得像个通缉犯似的。他放下我的证件，例行公事般地往后面走去。我抬起手来把他弄歪的证件摆一摆正。前面那个不知是啥来头的家伙看了看表，半扭过头来小声对我说：“哎，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到时候关照一下。”我没吭声，我拿不准他这是请求呢还是威胁，不过他的比喻听起来特别肉麻。我倒不反对做一只蚂蚱，可我受不了让自己和另一只蚂蚱被拴在同一条绳上。他第二次回过头来的时候，我对他笑了一下，皮笑肉不笑，他那副粗鲁无理的样子让我笑不开。他看上去是一个敢挣个鱼死网破的亡命之徒，长得很具有攻击性，我不是说他是异形，不过他身上散发着顺手提一把菜刀就会迎面砍人的气质倒历历可闻。

我很怕在考试时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会在快要交试卷的紧要关头一把夺过你的试卷，一堆烂泥似的趴在上面狂抄不止。你只好捏着试卷的一角，想要抽出来，可又碍于情面不能抽，你不住地对他嘟哝着，“行了行了，老师叫交卷了。”可你当时真恨不得把这个两眼聚焦于你的试卷忙得屁

滚尿流的抄袭者给杀了，那倒不能说你为人小气，或者是你多么坚持考场纪律，而是由于保不准他这么一抄，比你多考个三五分，他的名次马上就蹿到你前边去了——这才是最可怕的事儿。你会因此恼个半死，气得发狂，简直气变态了。正是这样：为了让自己的排名能骑在更多的人头上，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成了变态狂。

不过，今天的会考用不着心理变态，反正不用排名，过了就行，又不是抢钱，要那么多分数干嘛？有人要抄，我给他就是了。看上去前面这个家伙很在乎自己的利益，我呢，我不是。我甚至胆小到时时都会出卖自己，否则我就不会在前面那个恐怖分子回头意味深长地看我时，对着他粲然一笑了。

我做着语文试卷，它太蠢了，答案都是标准的，就像问你今年多大了似的。我觉得自己被当成了弱智，或者一个刚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我提笔就写，只想快点写完，此试卷做起来什么感觉也没有。做这种白痴题目，简直就是在侮辱自己，可你明知是侮辱也不得不做它，要不然他们不发高中毕业证给你，那样你就没法参加高考了。不过，要是真的让你做高考类型的语文试卷，你又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另一种玩弄：高考语文题差不多都是类似于问你“你爸爸的父亲的儿子的孙子的爸爸是谁”这种拐弯抹角成心不想让你考好的荒诞的问题。那个坐在我前面的蚂蚱一直没找我要抄，那可以理解，除非他连自己几岁这种问题都得考虑上一个小时。有个细节我不能不提：在作文题里出现的那个上蹿下跳的所谓“文学家”，不论是出场还是发言都被安排在第一位，看上去那帮出题的宝贝蛋子们对文学倒是很重视，或者，更精确地讲，他们对自己自视甚高，不过他们自己能不能算得上是

文学家还值得商榷。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李白死了，熟读了唐诗三百首，能猪也似地哼哼两句的混混儿也能搞个文学家的帽子戴戴呢。

下午考政治。我一进考场就吓得不轻，人都到齐了，我刚进门，人人都像惊弓之鸟似的直勾勾地看着我，考试期间所有的人都有点儿神经兮兮的不正常。我坐了下来，边掏笔边抬头看正面墙上的钟，还有一刻钟。怎么这些人都那么积极？我在肚里瞎捣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等我一个人？我恨不得站起来向各位赔罪，“对不起，让各位久等了”。——真要命，我知道明明不是这么回事，可还是偏要这么想，没办法，我就这性格，太在乎别人，在乎到了几近失常的地步。

下午换了主监，是个老头儿。他走过来看我的三证，半小时后考场里将上演星球大战。纸团乱飞，到底是谁扔给谁都没法弄清，教科书也长了翅膀，偶尔还有两三个胆大的人，不不，人怎么能飞呢，我是说有人跑下位子抄，其中有坐在我前面的那只蚂蚱，他握着试卷攥着笔，跳到东来跳到西，四处撷取精华。三位监考的老师在门口无所事事地抽烟闲聊，为什么成年人在相互交谈的时候，脸上都像是套了块不能表达出精确而活生生的表情的木偶面具呢？

那蚂蚱正在抄我的试卷，怨我无礼，他这个混蛋哪怕抱着书抄都难及格，因为他平时把精力大概都放在怎样砍人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上去了。过了四十分钟，我收好笔和证件，挟着试卷走上讲台，交给主监。他侧着头，将我的试卷对着光线，把右手夹着的那根让我恼火万分的香烟叼在嘴边，眯起了眼。我抓起放在讲台边上的书包，他就要翻看我的试卷了，他就要看了，他就要——我忽地冲出考场，吓了门口的监考们一大跳。我咚咚地下了楼梯，天气冷得出乎意

料。我戴上手套，别扭地从书包里翻找车钥匙，打开车锁。我在逃避着什么？我又开始愁眉苦脸了，今天真是糟透啦。我现在倒真恨不得变成蚂蚱呢。

晚上回家时，我在路上看见一群狗狂追一条狗。在夜里，大街上到处是野狗。那只被追的狗身上板结的毛就像一块一块的饼子。我怕狗怕得要命。这群狗都是杂种狗，或者血统更为复杂。当它们冲进一条黑乎乎的巷子时，狗的狂叫声尖利地传来，令人毛骨悚然。我不喜欢看那些老是把动物恶心地叫做猴宝宝狮子妈妈之类的节目，那些比喻叫人难受，我爱看大象、海豚和其它鱼类的纯粹动物片。

我坐在床边，把政治书摊开，泡了一杯茶，又找来了一些可以入口的东西：两根胡萝卜，一小把香蕉，一个洗好的苹果，几块冷肉。我的胃口大开，不过由于经常性的紧张，没有变胖的可能。现在我六十五斤，一米七六。我在家里养成了不饿但总要吃东西的坏习惯。当我近几天开始发现我在吃东西时脑子几乎动都不动这个特点时，我就一边吃东西一边背政治，有时也背历史，效果好得很，几乎是一目十行。我为吃而吃，为背而背，都不用动脑子，惟一的区别是吃东西至少有些快感，而背书却一点儿快感都没有。今晚能背多少书，得看我能找到多少往嘴里放的东西了，但第二天往往就会出现因为前一天晚上吃得过饱不想起床的事儿，我无论怎么吓唬自己都没法从床上爬起来。有时候我真想把手指头插进床头的电源插座里醒一醒困，可我又怕因此而长眠不醒。最后还得靠爸爸：你这孩子，怎么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快起来！

明天早晨肯定又是如此。

2月4日

我昏头昏脑地躺了十几分钟，由于神经紧张，身体一直在微微抖个不停。我坐起来，双手扶着床沿，低着头，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我出去洗了脸，在转身进来换鞋的时候，注意到了沾上泥污的裤脚。我木然又绝望地盯着它看，为什么我一穿上干净衣服就会下雨，再不然哪儿就突出个钉子在等着我呢？我弯下腰，双手猛力搓着裤脚上的泥污，它看上去淡点儿了。我放下裤脚，稍微有点儿心安地换好了鞋子。

天空使人阴郁不快。前天下雨，昨天放晴，今天上午出了一会儿太阳，可是转眼之间，既没刮风，又没下雨，它又阴沉了下来。天板着老脸纹丝不动，就连我经过骑车的这条灰不溜秋的水泥路面也比它的颜色亮堂一点儿。今天我为了防止心情变糟，特地走这条远一点儿但比较宽阔的公路。我还可以想走哪条路就走哪条呢！凭良心说，生活给我的这么充分的自由不多。

我看见一个班里的同学在前面走着，我和他不很熟，但我打了一个招呼，他稍有犹疑，想让我骑车带他，我没有表示。我害怕骑车带人，这样一来，坐在后边的人就会出于感激过分热情地找一些愚蠢的话题与你讲个没完，而且当他下一次碰到你时，他就会认为上你的车是他的权利了，于是你就不得不忍受长期的折磨。你总不能又骑车带着他又叫他闭上嘴巴吧。干燥无情的风刮过路面，我转过W街路口时，后面有个什么人发出了一声短促尖利的怪叫，我心惊肉跳地回过头来，什么人也没看见，可恨。一些摩托车在街道上鼠蹿，我在冷空气和微温的燃料废气中痛苦地呼吸着。三个女

人从人行道上走下来，同样的长相、打扮，穿着同样的入时又极度缺乏鉴赏力的衣服，染着黄毛，看上去都有几分侵略性。那个同她们一块儿的家伙正在路边叫出租车，他那张胖脸上有一条刀疤。人总是使我感到恐怖。

雨终于下了起来。我套上雨衣，骑上车。在雨中，我体会到了我所能找到的最近似于安全感的東西。我爱这场雨，爱得发狂。从家到学校的路上我一直在深深地呼吸。雨冲开了猥琐的气压盘踞已久的空间，“春天就要来了。”我安慰自己。现在还算不上是春天，两个星期后，雨就会下得更加顽皮了。我喜欢春天和夏天，在这些季节里，不管天气把自己的力量挥发得轻快还是笨拙，都是十分讨人喜爱的呢。现在是2月份，2月初，春天正在冲破阴霾（悲观的说法是：“隆冬正在肆虐”）。我穿着冬衣，披着雨衣，在满是泥泞、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前行，裤子上溅满了泥污。公路上迎面开来一辆又一辆汽车，强烈的车灯把千万滴雨点撞击地面的一刹那照射得纤毫毕现，但车一远去，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淡淡的令人痛苦的甜腥味儿。这是雨中汽车尾气特有的怪味儿。一个女人站在路边的杂货店旁，叉手叉脚、咬牙切齿地骂她那个在雨里奔跑的小孩。我把手从雨衣下伸出来，看了看表，我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赶路。

看门老头儿正在关大门。他明明看到还有人没进门也不肯缓那么几秒钟，这样一来你就不得不下车来推着车艰难地挤小门。他爱干的事儿还有，在放学后大门口聚了上百人等着出去时，他才慢慢吞吞地亮相于传达室门口，好像要借机狠秀一下似的。他在拎着一把钥匙挤开众人时，真可谓是个焦点人物，可是等到他颤颤巍巍好不容易把大门打开，冲出

去的人几乎都要把他给踩扁了。为了不成为众人的脚下鬼，看门老头儿只好急颠颠地双手紧握着大门上的钢筋，“慢一点，慢一点”嘶哑可怜地叫着。

我下了车，随着五六个人从小门鱼贯而入，刚进校园里就看不见几个人了，这令我有点儿心慌。刚才可能打过了预备铃。我进了停车处，有一个人在锁车，另一个人在我之前拎起书包从存车处冲了出去。世上少有像我们学生这样的人，明知是去赴死还那么积极，这实在是精神可嘉。班主任正在门口站着，我边跑边脱雨衣，还有三分钟，我赶上了。听，叮铃铃，叮铃铃，死亡列车开向奥斯维辛。

班主任的课一结束，我就把从DD那儿借来的美术画册从抽屉里取了出来。左边的这位大师级同桌闻风而动，他像个猴子般地对着其中一幅康定斯基的画左看右看，最后怪声怪气地发表声明：“真差！”

我不动声色地看了他一眼，这个什么都不懂还自大得要命的恶棍。我一边翻页一边说，“要是你来画，比他画的还好。”

“对，你是不服气还是怎么的？”他恶狠狠地说道。

我当即向他表示，我对他的鉴赏力很服气。他讨个没趣，不再说话。我还以为又要拌嘴呢。我的美术水平还没有高到吵一架就能把这个同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种程度。不过，他也不好意思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不错”，真是够自大的。据我所知，他从来都不看书，也没受过教育，因此毫无教养，愚钝得吓人。他真是个典型的中国病人。他的学习成绩倒不差，可这说明不了什么。也许这说明他有适应高考的素质，我也不清楚这种素质究竟意味着什么，总会有人知道的。

历史老师进了教室，我把历史书掏出来。美术画册太大，32开的历史书遮不住，我只好惋惜地把它放回抽屉。这时候班长喊起立，于是我就不得不一边塞画册，一边弓着腰站起来。我很烦听他喊起立，他要是不喊我们也得站起来，可他这么一喊，感觉子然不同，好像我是被监工逼着站起来向头儿致意似的。“下面，”历史老师示意都坐下：“回答上一节课剩下的几个问题。”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就装着一副认真看书不愿被打搅的样子，可他叫的偏偏就是我。我瞎编了一会儿，他听得不耐烦，叫我坐下。我运气不错。赶上有些根本不在乎学生的老师，你回答完问题站在那儿都快变成化石了，他也不会在意你到底坐没坐下。好啦，看来他要是不特别关照我，我这一节课就没必要担心又被他提问了。我把画册抽出来，一页一页地翻看着。

下了历史课，语文老师就无事忙一般地跑进教室，像是刚刚在大街上捡到了慈禧用过的金马桶似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刚才新到了十八套试卷，北京的，代表了今年高考的大方向，晚上我们准备考一套，试题很新颖，同时语文课代表把十八套试卷的钱收上来。”语文老师刚说完，人们便继续着呻吟起来。试题新颖？怎么听上去就像是在搞商品大热卖似的。就试卷而言，它多么多么新颖，其实就是变着花样玩学生，反正就是成心不想让你高高兴兴地考试过关，还有商业上的考虑：只有不断推陈出新，货才有人买，高考工业才能红火下去。

晚上我一点儿做题的心思都没有，还老是走神。我很喜欢第二十题的那首唐诗，是诗，不是题。

看完诗，我不得不做下面两道怪得离谱的选择题，它们马上扭歪了我对这首唐诗的正常感受。我被一种外力卡紧

了，我被要求选出“对于该诗的解释，不恰当的一项是……”可我敢断定，就连写诗的人看了令人晕头转向的ABCD四个选项之后也不会知道到底哪种理解才是恰当的，但是这帮出题的语文专家非常高深，他们无所不知，包括作者本人都没法知道的东西。我死抠着ABCD四个选项，有种被逼着生啖人肉的感觉。我的大脑像是被塞进了软盘驱动器，喀喀地格式化着。唉，我真恨不得杀了出这鬼题的疯子，再跑到他的尸体上跳那么三跳。语文老师从后面走上讲台，说：“不要急躁，慢慢写，时间还很充足。”那口气像是要请你喝一杯热牛奶似的，还“时间很充足”。时间当然充足，凡是不必花自己的时间干这种蠢上了天的事儿的人都不会痛心。听他这么慢条斯理地说，我气得头都大了一倍，差点儿翻过去。可他还在“不要急要细心做写完以后要检查”唠唠叨叨个没完，我差点儿要把试卷扔到他脸上。我憋着一肚子气，往下抠题目。没错，这就是一场妙不可言的语文考试。

2月7日

整个上午就像是一块被开水烫过的牛皮糖，拖得老长，长而不断。我早就收拾好了书包，等着放学的铃声响起，像个只等着一声令下就冲出战壕的不要命的战斗人员。天气格外晴朗，在这个季节里实在不多见，近几天都是如此。这样的好天气要是放假在家里那该多好，我会拎着小板凳到阳台上去看书。可是现在我无事可做，只能干等着下课，得知自己被无谓地消耗着那种感觉真是可怕啊，可是我又能怎样才能阻止这一切呢？

铃响了，我走在校园里。除高三外其他年级早已放了假。校园里非常安静，可是小鸟却从不光顾这里。我骑着车出大门时，看见几个高二的住校生背着大旅行包结伴回家，其中有一个我认识，他是学校体育部的一个“干事”，他的确是个干事的人。他人很热情，特别爱帮助人，不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混上个官当当，就把自己扮成个大忙人，开始在别人面前煞有介事起来，得了上边的宠就更是不知道自己有几个鼻子几个眼了，屁大点儿的孩子就学会了耍官腔。我就是受不了那帮学生会里的自大狂干部才不愿当什么宣传部副部长的。看见好人我总是要礼貌几句，我向他打了一声招呼，谁知和他走在一起的另两个人也同他一起招呼我。我交际甚少，除了班里的人之外，全校范围内我至多只能叫出十来个人的名字，还包括校长在内。就连这个体育部的干事，我也只知道他的姓，在日记里老是“他他他”称呼他，真是不可饶恕。我在日记里只有写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时才不提名字。不过，那两个人的招呼叫我好生奇怪，看来学校里有不少人都认识我。我注意到三个人中有两个刚剃完头，头发又短又硬，像新买的鞋刷似的。要是走运的话，他们在明天的这个时候就会躺在家里的床上好好地睡个懒觉了。

经过百货大楼，楼前面的钢质路牌上，甚至可以看见太阳照到树木上落下的投影，十分清晰，原来并不是每个冬天都那么一团灰乎乎的啊。我看了看路边的树木，上面还有一些黄绿色的叶子，不过看不出来到底是新长出来的还是老蔫了的。我在早晨上学时，从来不走这条路。有一帮老头子常年把蒙上黑布的鸟笼子挂在这儿的树杈上，也不怕爬高上梯的摔坏老胳膊老腿。鸟儿叫得像是疯了一般，我隔着一层黑布看不见鸟儿光听它们叫都难受得心痒，何况是鸟儿自己呢。要说那帮老头子

还真有定力，他们不闻不问地下棋、闭目养神、锻炼身体。听了鸟儿叫得这么寒碜人，我就恨不得要跳下车来把鸟笼子砸个稀巴烂，当然，事先得放了鸟儿才行。

对面骑车过来的人很多，现在是下班时间。一个爸爸骑车带着他的女儿，小女孩只有五六岁，眼睛美极了，爸爸是个大个子，俩人在一块儿看上去挺卡通的。我想起了一件什么东西：一块烫石头。烫石头，对了，那是戈达尔的一篇童话，就叫《一块烫石头》，可我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个来呢？也许是因为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小女孩美丽的眼睛，一双童话里的主人公才会有的清澈的眼睛。在我的心目中，那个发现烫石头的小男孩一定也有着这样一副会说话的眼睛。那是一个挺神奇又有点儿魔力的童话故事，任何一个读过它的孩子，都会为那个不愿推石头返老还童的老头儿感到惋惜，而且，我想，别的孩子也会像我一样，有一点儿小小的嫉妒：为什么发现那块烫石头的不是我呢？要是我，我准会说服老头儿的。现在我长大了，也明白了看果园的老头儿为什么不愿推那块石头了，可我还是一直觉得很可惜，这个想法我一直没变过。也许说到底，我还是小孩，但我没把握这么说自己。

晚上上学时，我从图书馆旁边的一家快要倒闭的旧书店里买了一本书。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里，所有的书店看上去都好像正处在不可避免的倒闭之中。我把书放进车篮子里，书包压着它。有时候我也带书到学校看。老实说，我一掏出书来看，我周围的群魔中就有人咬牙切齿。他们中间倒不乏能考个全班前三名五名的货色，可我要是说他们不看书，都显得有点儿轻描淡写了。何止是不看书，他们简直就是与书不共戴天。他们对书的态度差不多与我对课本的态度

一样，可是我不能不看课本，而他们却可以不看书，这简直就是天下大谬。

从停车处出来的时候，我把书装进书包里，不知道这本正经书正跟那么多课本躺在一块儿时会有什么想法。按我的观点，书包其实不是用来装书而是用来塞课本的，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本来我没必要弄得这么麻烦，都快进班了还把刚买的书往包里塞，因为我进班坐下后肯定会马上把它拿出来翻一翻，可我不想在进班时让它给人看到，那倒不是我抠门儿，可你知道“暴殄天物”指的是怎么一回事儿，比翻一翻往你桌子上一扔还叫你难受的事儿他们都做得出来。

我这辈子真够倒霉的，从我进了校园的那会儿开始，实际上就一直不得不跟一帮又一帮三教九流之徒为伍。当左边这位发完威，把他的蹄子搭在我板凳的横梁上时，我就知道久经考验的时刻又要到了。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会遇上，我不知在日记里写过多少回了。为了免得他一再把他那条过于活力充沛的腿轻而易举地搭上我的凳梁，叽叽嘎嘎地抖个不停，我刚才坐下的时候已经把凳子掉了个方向。也真是难为他了，冒着把脚扭伤的危险也要把脚往我的凳梁上搁，连我看了都难受，想马上给他把凳子再掉过去。看来，只要他愿意，甚至坐在教室里就能把腿架到“空军一号”上去。

他开始抖了，我马上站起身，拎起凳子，我希望我把它掉成原样这动作可以给他一个警示，让他不要再抖。可他正好把意思搞反了，也许他以为我这么掉换一下是为了让他架起腿来更舒服，或者说他根本就没在乎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刚一坐下，他就把腿再次架好，又开始他那万劫不复的抖动了。我停下笔。他也太不瞅人眼色，可我这人有一大缺点，那就是太给人面子。不过今天我实在忍不下去，我轻描

淡写地说：请别再晃了。我说这话时极其礼貌，极其温和，听上去几乎像是在拍他的马屁，但是一点儿效果都没有。他一副木相，也不知是真的还是装的，反正对我而言的确痛苦而气愤。这时要是谁递给我一把板斧，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他来个不上麻药的截肢手术。

看来我不得不集中精力对付这一事件，我把手中的习题放在一边，等了一会儿，看看他对我的请求的反应，没作用。我鼓起勇气好不容易说出来的话竟然一点作用也没有，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又说了一遍，仍然不那么刺耳。我总是尽量用缓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使我像戈尔巴乔夫第二。戈尔巴乔夫不适合当政治家，我也不适合生存。在我轻声细语地讲完第二遍“请不要晃了”后，他倒是很领情，瞟了我一眼，其气质极具大将风范，然后再不紧不慢地抖上那么七八秒钟，看来他还认为应当像开车一样有个减速的过程，以确保自己的形象不被撼动。最后，苍天有眼，人造地震终于告一段落。

我把凳子摆摆正，继续做题。过了一小会儿，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的小说书呢？”嘿，没想到他恢复得这么快，也许他根本就没受我的打击。难道他想看看书了？我疑惑地抬头看了他一眼，他那漫不经心又有点儿幸灾乐祸的表情使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为了报复我看他们憎恨的书而折腾我的神经呢！

2月10日

放寒假以来，我差不多有三天没记日记了。昨天妈妈叫

我今天早晨早点儿起床打扫卫生。家里房间倒不算大，可爸爸非得三天两头扫地抹桌子，有时候我进了家门好像有一种进了旅馆的陌生感觉。有一次我对爸爸说：“我到过不少同学家，他们几乎连被子都不叠，臭袜子扔在沙发上。你要是把家收拾得太井井有条，就不像是住在家里了。”爸爸说：“懒人有懒理，你不打扫我帮你打扫。”

要说我懒，那真是冤枉，我再也提不起兴趣去叠被子、扫地，那完全是因为厌倦。一个年轻人对生活的厌倦，我想那就是一种病入膏肓的绝症了。现在爸爸认为我“学习上很紧张”，每天早上在我上学后就给我清理屋子。有一个星期六下午WX来我家玩，他在我屋里坐了十几分钟，把房间打量了老半天，最后憋出这么一句话：“你可真是个强迫狂。”我笑着说，“那你是个天下第一大懒蛋。”他懒到了家，但他活得绝对不累。有一次我去他家，家里的卫生间搞得就跟公厕似的。也许他对自己房间的杂乱感到不好意思，我还没在里面呆几分钟他就提议出去玩，然后他就换鞋。天呀，看他换鞋简直无异于亲眼目睹一场滑稽剧：他先是把脚从花纹里嵌满了灰的脏不拉叽的拖鞋里抽出来，脚趾头一挑，拖鞋咕噜噜滚出半米来远，像翻了的船一样横在冰箱旁，然后他用脚把那双没垫垫子的、里边黑乎乎的像个黄鼠狼窝似的球鞋从床底下一勾出来。看得出来，不管是穿鞋还是脱鞋，WX从来都不解开鞋带。我怀疑在这双球鞋的一生中，它的带子能有幸被解开几次，它又能尝到几回洗澡的乐趣，不过它的寿命一定不长，这可以肯定。我有一个小外甥，一脱鞋子就用力蹭，脸都憋紫了，那副犟劲儿看上去像只小公牛，你要是在他旁边就只好为他解鞋带。WX可真够洒脱，还好意思当着同学的面不开鞋带就穿鞋。他把脚往鞋

子里一塞，下面， 请注意，全过程中惟一用手的时候到了：食指往脚后跟处一插一拔，搞定了。那双绿球鞋在他脚上穿着，怎么看都像两块绿苔藓似的。我说，“你也太邋遢了吧。”拽着我的衣袖就往门外走，“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还知道打马虎眼。

我穿好衣服，爸爸刚拎着拖把进屋我就跳出去了，手里还装模作样地拿着一本书。到了外面房间我才发现这是一本老杂志，就是老爱登“一旦你的房门上了锁，接下来就得担心丢钥匙了”这类屁话的杂志，架子端得像头爱思考的母牛，其实这类似是而非的小哲理小麻醉的危险性比母牛不知大多少倍。我只是偶尔翻翻这类杂志，看看笨蛋的队伍是不是又见扩大，水平是不是又提高了。外面这儿有另一本书，看上去还有个书样儿，是班里那个语文课代表借给我的。我本来想向他借一本小说，可他把他认为当前最“畅销”的一本“好”书借给了我，我受宠若惊。这本书的名儿一听就能把你我等闲之辈吓个屁滚尿流：《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说不》，书名儿读起来就叫人晕头晕脑的。他庄重地把书递给我，好像是要要不把它拜读一下就会失掉中国知识分子良心似的。在平时我跟他这个作文才子并无深交，只是期末考试考语文那天他坐在我前边，我随便问了他一下有没有书可以借我看看。要说这语文课代表在学校里可真是个人物，每期校报里都有他的专栏，我有一回看见他在报上创造性地把“小资产阶级情调”缩写成“小资情调”，如果这真是他的首创，我估计他还会为这事屁颠屁颠地乐上好一阵儿呢。我不是那种读了“可以说不”、“不可以说不”、“可不可以说不”，“为什么不可以说不”，“可以说不不不”这类书就忧愤得肝肠寸断的社会良心级人物。

我的书柜里至今还能找到我一年级的课本，早该扔掉了，不过那好像还有点儿纪念意义，有点儿舍不得似的。我揣摩着一个美国大兵在越战中要是被枪子儿击中了卵子什么的，他也会把这颗枪子儿好好保存着的，这跟我为什么保存一年级时的课本差不多是一回事儿。我毫不怀疑这些课本直到我的小孩上了一年级的时候还会被使用着，现在一年级的学生就仍然在用这种课本，可曾经用过相同课本的我都高三了。

2月21日

今天起得有点儿迟，当我一睁开眼睛，就在心里盘算着还有几天就要开学。我不可能在这十四天假期里放开手脚干点儿正经事，我只能时不时地背背书，做做题，同时还得老在心里担惊受怕地琢磨着假期还剩下几天。

我从床头柜里抽出一本书。这几天电视里老是在放排场大得吓人、举目所及之处血红一片的各类春节晚会，免不了七上八下地在台上再挂几个糙不拉叽的破灯笼。那帮每讲一句台词就把脖子勒得青筋毕现、老是把小品演得太过火的演员，看着都让人心里难受。我今天看的书是《好兵帅克》，是昨天从一个我从没去过的旧书店里买的。我有很多铅印书，都是早些年出版的老版本，字体有一种很实在的兀凸感，不论从它们本身的印刷质地还是事实上的文化水准，都给人一种严肃认真的实在感觉。我在买这本书时，注意到这家书店有不少日本的小说。我倒不在乎二手旧书，可我从来不看那些连内容都是二手的书，有一点儿模仿的痕迹我都

能识破，更不要说这个几乎全部的作家都有生硬模仿西方写作技巧的传统劣迹的国度了。他们要是真的什么都想学学，应当能学到更受人欢迎的好品质。

《好兵帅克》的确很好，而且看它你不会觉得一点儿累，惟一的缺点就是书太薄，经不起看。这本书里的帅克可真是个好样儿的，看上去既纯洁又老辣，搞得笨蛋们团团转，连我都被弄糊涂了：作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我可做不到像帅克那么快乐。我们的快乐和这个家伙比起来，显得太廉价了。帅克当兵有他的一套，不知道他要是上学会不会也有那么一套。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把我的日记写成《好学生帅克》。要是真的把帅克逼到学校里读书，保不准他会变成一个再也没什么头脑的毫不可爱的混蛋了。

下午我要去叔叔家一趟。叔叔有一次建议我看一看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书，其实我并不是像他认为得那样，从来不看古籍。古籍本来就不多，可惜值得一看的更少，让我有什么办法。老子只不过是善于玩弄以退为进策略的狡猾大骗子手，我在高一时就得出这个结论，高二暑假再看老子时，认识非但没变，反而加强了。要想详详细细地讲出来，我非得把我那本关于老子的读书笔记整理出来不可，可这毫无必要。庄子我很爱看，但他好像不是个哲学家而是个文学家。不过，无论是哪个古人，我都不相信他的观点一点儿也不能让我有所怀疑，我不是在自吹自擂，可我总是不相信，一个人的经验，对另一个人来讲有什么用处，如果真有用处，那么人类的境遇应当越来越好才是，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我不想深谈，何况我和那些古人还相隔十万八千年呢。但是，宽容倒是必要的。我不要别人教我什么，可我愿意做个倾听者的角色。我只是受不了现实中众多的混蛋的聒噪。

我刚穿好衣服DD就打了个电话过来，她说她失恋了。听得出来她很难过，不过她有点儿把情绪夸大了。女生们都爱这样。DD说她还把日记本也给撕了。我说：“不用太伤心，日记没了还可以重新记，至于恋爱嘛，你要是愿意咱们俩可以再试试。”DD说：“你还好意思在这个时候跟我开玩笑呢，我都快要死了。”

DD有一次这么说我：“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得太透，而我就是不要别人把我看透。”我问她，“为什么？别人把你看透，你会失去安全感么？”“差不多吧，”她回答道。“那我呢，要是这么说来，你在我身边会失去安全感喽？”我继续问道。“那倒不是一回事，”DD笑着说，“你现在是我大哥嘛！”她的鬼心眼儿倒不少呢。其实我连自己都是一团糟，哪儿还有功夫去看透别人。女生们给我的评价千奇百怪，有一个还说过我，“你的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三十岁。”听得我毛骨悚然。我想我知道她指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她要是换一种说法，表达起来不那么专业也许更好听一些。

我六神无主地听着DD在电话那头说话。我可不知道失恋的女孩到底要什么。刚才我建议她和我拍拖，她又说我开玩笑。我都把我自己奉献出去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刚起床，脑子还没预热呢，你讲清楚点儿好不好？”电话里安静了下来。突然，DD怒气冲冲地问道：“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一愣，她已经把电话咔地挂上了。于是我蹲下身来系鞋带。接电话时，我的确有些心不在焉，刚穿上的衣服还凉得让我难受。DD是有点儿生气，不过按照她的脾气大概还会打过来的。她的朋友不少，但像我这样的肯定不多。我刷完了牙，喝了一杯茶，开始叠被子。电话果然

又来了。她道歉，我原谅；我反过来道歉，她原谅。我发现DD情绪好多了。她问我男生恋爱到底想的是什麼，我说我自己也不清楚。于是我说，给你讲个事儿吧：“高二时坐我旁边的一个女生说我‘很真诚’，乐得我心花怒放。”DD接过话头：“本来就是嘛。”我听了更是高兴。我说：“其实男生在女生面前都是如此，或者都是假装如此，其实男生们之间斗得十分黑，当然，我可是一直很真诚，哈哈。”DD说：“你别臭美啦。”她在电话那头笑，“然后呢？”“什么然后？”“就是那个女生夸你之后怎么样了？”“然后，”我想了一下：“然后她说：‘可惜呀，我不喜欢你。’”DD没说什么。我有点儿担心，我说：“DD，可是我也不喜欢她呀！”DD并不笨，我只是希望她不要跟我耍女孩子的小心眼儿瞎琢磨才好。她说：“那好，有事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还有，反正我也没事可干，咱俩拍拖吧。”她可真真是个明白人，这么快就情绪好转了。我说：“那你可得想好了，我这人太浮，这可是你说的。这样吧，定了的话呢，十分钟后给我来个电话。”

“行啊，你等着吧。”

我开始背书，不过没用心。要是DD打来电话涮我，我得说点儿什麼才是，不过不太可能。五分钟，电话铃又响了。我跳过去，拿起听筒：“这么快就决定啦！”

原来是找爸爸的电话。“他不在，你中午打来吧。”我挂上了电话。爸爸妈妈一块儿上街给我买衣服去了。他们给我买的衣服我不会喜欢穿，不过既然他们要买，我也不拦着。我拖着步子走回里屋，顺手把刚才撞翻的凳子扶起来。

我呆在光线不良的屋子里，又开始想着还有几天就要开学的事儿了，就像一个重病患者在牵挂着自己还有几天可活

似的。的确，开学这事儿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站起来，收拾了一下桌子，看见了我的日记本。我想起DD在电话里说她把日记撕了的事儿。我的日记也记了有两三本了。自从我再也受不了那天起就开始记日记，要不然早就发狂了。我在拯救自己，因此我显得比别人更加伟大和明智。不对，应当有比“伟大”更精确的词，可我一时想不起来。我不清楚DD会在日记里写什么，但愿她不像其他人那样，老爱在日记里用“无奈”“理解”这类肉麻的词儿，我一碰见这些词就会吓得跳到月球上去。我知道许多人写东西都爱向那些被戏剧化地夸大了的大恶愤怒地挥动小拳头，可他们对现实中已经成为被大多数人默许的真正的具有腐蚀性的荒谬却迟钝得要命。我没看过DD的日记，我想她不至于是这种人吧。

傍晚时分我爬上楼顶，不为什么，也许只是想看看上面的积雪是不是都化了。开学前的最后一两天好像要与家里的一切、院子里的树木花坛生离死别似的，真的是这样。在上学时，它们都裹上了一层灰色的硬壳，那也很可能是我自己的眼光由于紧张和不安变得生硬了，可我也没什么办法让它重新柔和起来啊。

楼顶上几乎没什么雪了。我一直站在那儿，仰望着天空。黄昏刚刚掠过蓝天，还有一丝光线尚存，那是被太阳丢弃了的顽皮的孩子。天空渐渐变成了深蓝色，夜的气味在冷峻的空气中散布开来。我头脑清醒，不再想着开学的事儿了，我想着春天：田野里黑色的柔软的泥土，粪肥的气味，油菜花的气味，春天的腐烂和生长。现在，风刮得还很紧呢。我若不是每天晚上都得骑车在这烟尘滚滚的马路上往学校里赶，倒是可以爬上楼顶兴味盎然地仔细观察春天的到来。

2月26日

刚才到学校报过了名，寒假放完了，要开学。一种牵肠挂肚的感觉结束了，另一种实实在在的恐惧马上就要登场。学校的办公室刚粉刷过，看上去很宽敞。我去得早，在里面交学费的至多不过十来个人。我站在窗户边上，等着别人挤完了再上去。窗户很大，办公室里很明亮，但是，办公室毕竟是办公室，在这个地方，总叫你心慌、紧张、发闷。有几个班里的同学，看上去都还没从寒假的懒散中恢复过来。我交完费用，把注册证明交到班主任手里。他腾出夹烟的右手，把证明拿过去，头也不抬地说，“明天下午四点，开班会，不能迟到。”

我骑着车，在这条散发着湿石灰气味的小街上哐里哐啷地前行。刚才我的车子被一块红砖狠狠地咯了一下，我心头一紧，差点儿摔下来。这会儿家家都在盖房子，而且家家都把自家门前的街道当作建筑工地，结果整个儿一条街就真的成了建筑工地。我在沙堆、石砾堆、石灰筐、水泥包中费力地骑着车。街道两旁的房子都盖得跟火柴盒似的，这些都是花了大半辈子的积蓄为自己建造的监狱。我要是有那么些钱，宁愿打点一下行装买张机票，跑到塔斯马尼亚当野人去，也不肯为自己盖在里面慢慢腐烂的劳什子监牢。

后天就上课了，这样算来，不算明天下午的班会课，我还有今天一个下午和明天一个上午的假期。虽然只有这么一点儿时间，可它们给你的感觉与开学后的任何一个星期天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早上我起得早，把卡夫卡的《美国》看完了。也许是我看书时的情绪不对，太着急看完它，因此它给我的感觉一

般，反正我以后还会把它再看一遍的。要是不出什么问题，一本不错的书我会一遍又一遍地一直看。我甚至把一本好书读过二十遍，当然不是连续地重读，是在一年里的不同时间看那么两三次。

我看着对面镜子里的自己，倚靠在沙发里，突然涌起了想干点儿什么事情的不可遏制的强烈愿望。我坐起来，有些茫然地愣了一会儿。“明天就要开学了。”这个念头像一句魔咒似的在我的头脑里总是挥之不去。我把眼镜戴上。手旁就是电话。我把它托到茶几架上。电话铃在这个时候响了。

是NJ。他说他还没报名，问我学费多少。问我知不知道班主任在开学后一两个星期内要换。我不知道，是谁？他说他也不太清楚。再见。再见。

班主任的位置是人坐的么？想都不敢想。这真是一项把天使变成魔鬼的工作。谁要是想当班主任，他可得先考虑好了，就为每个月多拿那么点儿工资，为了自己将来仕途通达，被全班上下暗地里唤作老李老张老杨、被骂个全身通透是否值得。妈妈希望我高考能报个师范专业，她想让我当老师，想得要命。我可没法铁下一条心来训小孩，良心上过不去。老天，我还是不麻烦大家自杀好了。

我打开电视，教育台新闻：高考将有重大改革举措。我一时没找着遥控器，只能干看着播音员的嘴巴像大头鱼似的一张一合的。这事要是与我们高三关系密切，学校迟早会下通知。我总是不大相信这类关于高考改革的新闻，听上去让人一惊一乍的却没什么实际作用。爸爸一看到电视里有这类新闻就把我拖过去看，我于是就不得不放下正在背着的书，慢吞吞地走出屋子，去看电视里的播音员瞎咋呼。

晚上有个刚上二年级的邻家小女孩来找我，要我教她包

书。她拿来的书里有一本《中国古代传统道德读本》，还是“小学版”。我把书包好后，把书翻看了一会儿。我从来都没听过这本书，看来又是教育改革的伟大产物。书编得倒真够直观的：封面画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正把身上的衣服扒下来给另一个人看他后背上的文身。他当然就是岳飞了。可这幅图画得实在太差，那后背上的“精忠报国”四个字不像是岳飞老娘刺上去的，倒像是谁拿大拖把毛笔刷上去的，粗黑得骇人。书的纸质量很好，而且书的定价极其便宜，等于白送，内容编排上却没什么好说的。刚翻到第一页就看见编书的人急颠颠地引用《论语》，那玩艺儿不知道二年级的小孩背了之后，到五年级时能不能明白当年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在封建时代也都是先叫小孩死背了几年四书五经以后再慢慢消化的。一条条既定的标准先入为主，不怕你不理解，反正最后你照办就是了。背书，看来也是一条老传统了。血馒头早早送到你嘴边，只有先把它吃了，才能谈其它的事。我把这本书跳来跳去地翻着，小姑娘问我，“好看么？”我说，“还不错，只是我想找一篇我能看懂的来看一看。”

2月27日

中午我把闹钟设定好，倚着被子在床上闭了一会儿眼。双脚冻得像冰块。我爬起来，坐在床沿上，一切又都要开始了。我盯着钟看，眼皮一眨不眨。两点十五分。蓝色的秒针在颤抖着前进，不，它在绕圈子。无论它看上去是多么坚定不移，它都逃不脱这个使它慢慢磨损、慢慢消耗的怪圈，或

许它根本就没想到要逃脱。

在校园里我碰到不少班上的人。老远就看见有一股尘浪从教室门里向外涌出来。班长拎着扫帚，挟云带雾地出了门来，他叫我倒灰。干活的都是班干部哇，我算什么东西，在里面瞎搅和。我不想让自己难堪。不过我还是迅速把他递过来的一簸箕垃圾给倒了。

班主任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进班，他是惟一的迟到者。在班主任出现的那一小会儿，聚在教室门口的人都像是要找个藏身之地的小虾小蟹似的，乱哄哄地鱼贯而入。我也挤了进去。我掏出手纸，开始擦在两周寒假中覆盖了一层厚厚灰尘的桌子。有人向我要纸，我没了手纸，就把课桌里的抹布给了他们。这张我半个月没见着面的桌子，我站在它面前，仅仅有那么一小会儿恍若隔世的感觉，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人和桌子又要开始相互漠不关心、甚至相互厌倦了。班主任叫“安静”，好像没有哪个人叫安静的，于是班里的人大眼瞪小眼，都安静了下来。本来就是刚开学，人人都疲乏得很。我止不住要咳两声。我在进班前想在花园边儿上来个深呼吸，却一不小心把口水吸进了气管，差点儿没被呛死。

班主任开始讲话。高考，高考，高考，期末考试，班级排名。再宣布一遍：学习，计划，稳，新老结合，四十五分钟，课程安排，纪律，宿舍纪律，课堂。上课，下课。两操，生活，有利于高考的生活方式。保证一天六个小时的睡眠——听到这里，有人在下面窃笑，看来班主任把下面的笑声理解错了：“我再强调一遍，睡眠很重要！”没人再说什么。下面，人心惶惶的时刻到了：“最后，按这次期末考试的名次，重排座位。”轰隆隆，卡嚓嚓，桌子凳子震天价响。“我被卡住了！”“操，你让一下又怎样！”“老师，

我坐在那儿看不见黑板！”我把桌子凳子搬到指定地点就回家了。

晚上我看了一会儿政治辅导书，又摆弄了一会儿闹钟，我担心它明天早上不准时。我检查了它约莫有半个小时，很准，我把闹铃设定在六点整。从明天起，我的每个早晨都将以怀念前一个晚上的睡眠开始了。今天我得早点儿睡。我克制着自己不去看课外书，关上了台灯。钟面绿色的荧光点清晰异常，看着它，你像是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东西的不幸的人重新获得了视力和生命一样。现在是，十点五十五分。我躺在床上仔细地倾听，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着，只有闹钟在咔嗒咔嗒地响动。

3月2日

我预料今天晚上路上行人会很多，交通有可能堵塞，于是早早就去上学。明天是元宵节，我上学经过的那条马路从早上起就挂满了灯笼。灯笼那么多，但是都不好看。我喜欢看严密没有瑕疵的工业产品，也喜欢拙朴可爱的民间工艺品，可我从来都不爱看那些拙劣的、土头土脑的、毫无才气的庸俗的东西。我怀疑挂灯笼的单位找的都是同一家小作坊订制的，要不怎么看上去都是一副丑样儿呢？

我气急败坏地把书包往抽屉里塞，抽屉里面好像有一样硬东西，我伸手去拖它，是两本被礼品纸包好的书，上下册《乱世佳人》，书签上写着是送我的生日礼物，落款是“NF赠”。我有一种难以领情的感觉，我一直没发觉NF这么看重我俩之间的交情。我回过头来，向NF晃了晃手中的书。他微

笑着摇了摇头，表示不值一提。我转过身来。这类书我自己是不会买的。我没看过这书，只看过电影，女主角站在黄昏的大树下，望着广袤的红色土地，长裙给微风吹动的那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很长一段时间我看书已不是看情节，而是看感觉了。我买的那本《厌恶》，随便翻到哪页都可以继续看下去，因为它没什么情节，同一段文字你读十遍八遍都不会烦，你甚至觉察不到自己又读重复了。感觉是绝对真实的，而且次次不同。我们不可能把握住自己的感觉，可这决不像你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理智那样会使你焦虑不安，相反，从文学上说，它带给我们某种不确定性的美感。

晚上第三节课老师没来。差不多上课都有七八分钟了，班上的人才认为老师的确是不会来了。我看着昏黄的路灯中校园里陆陆续续往外走的人，班里有不少人和我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外边，跟一群引颈待毙的俘虏似的，可就是没人动一动。我早已收拾好了书包。只有在要离开学校的那会儿，我才会觉得沉重的书包真是个好东西。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接到元宵节放假的通知。今天是农历正月十四，托这良辰吉日的福，逃那么半节课估计问题不大。有几个坐在后边的人咋呼着没背书包就从教室里出去了，班里开始躁动不安起来。我拎起书包，紧跟着他们出了教室。当我绕过讲台时，有不下七八个人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到最后，班里总会剩下那么十几个铁杆木鱼似的人物还在抱着政治历史书，目光呆滞地啃呀啃。

大街上干燥寒冷，但是一上了有灯展的那条大街，扑面就是一阵燥热的人味儿直冲过来。手拿灯笼吆喝的小贩；举着花花绿绿的电筒往你脸上直刺过来的无礼小孩，站在路边

等着卖主为自己削菠萝皮的急躁的游人，扯着嗓门高叫失散的亲人小名儿的大妈。人群一会儿往东边涌，一会儿往西边涌，就跟90年代初火车站广场上的盲流似的。人人叫嚷着要到这儿看耍龙到那儿看舞狮子，可究竟到哪儿看，谁都没有个主见。要是不太挤的话，我也想去看一看舞狮子，我喜欢看那种眼睛可以眨巴眨巴的狮子舞，但我不爱看舞龙，因为我不喜欢龙的那副凶样儿。昨天中午我看到好几辆卡车载满了农村表演队的人马进城来。我去上学的时候看见一帮带队的乡干部在午后心满意足地从学校那边的饭店里走出来，个个都是又矮又肥，脸色发紫，披着灰色呢大衣，手中托着嵌有黄铜标牌的红褐色牛皮公文包，再不然就拿着个流行全国的式样难看的杯子。全是一群酒囊饭袋。不过，他们走在大街上时，你还是看得出来这帮乡干部偶尔表露出来的不自信：你在后边一按车铃铛他们就会忙不迭地马上闪开。这和市民不同，油不拉叽的小市民们可不会在乎有谁在他后面摇铃铛。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从人群中脱身，就像是踩着一堆在河面上滚来滚去的圆木头往岸上跳似的。

回家后看了一会儿电视，书包还背在身上没放下来。父母问我，怎么回来的这么早。我说学校刚开学，课程还没调整好。我说起谎来很利索，反应得快。为了减少良心上的折磨，我总是把谎说得很快，我说良心上有折磨那是因为我到了在自己回家后班里还有那么些孩子正在努力用功地学习。我当然是个有责任感的孩子。我说，看看新闻吧，于是爸爸把遥控器递了过来。我操起遥控器，把一副灰头土脸的××台换了过去。有一次我看见该台播出一个片子，叫《恶之花》，我一时还以为这个电视台品位突然提高了呢，然后大

标题下面一行小字差点没把我笑死——狱中女子访谈录。要说咱们中国人给电视节目起名儿的水平就是高，扫黄打非专项斗争的专题片也能大言不惭地叫作《在路上》。

“好了，现在该回你屋里学习了。”爸爸说。

我把书包倒扣在桌子上，里面的书滑得满桌子都是。今天背不完那么多刚上的新课，明天多背一点才能不拉下来。不过是刚刚开学而已，来日方长，我有的是罪受。

我不很爱吃口香糖，可我有一个不良嗜好，上课时爱搓口香糖玩儿，此怪癖相当恶心，但我之所以养成这个习惯是因为，上课本身使我更加恶心，于是我不得不找点儿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干一干。我玩口香糖甚至玩出经验来了，哪种牌子的嚼起来像驴皮，哪种牌子的捏起来像乌龟壳我都一清二楚。我还经常把口香糖粘在桌子下面、抽屉内侧、凳子腿上。有一回MS坐在我这儿，临走时才发现自己被粘住了。她找到我，把粘上口香糖的裤子、鞋子，还有一双细嫩的小手上的污迹——指给我看，我就顺水推舟，把书包里的口香糖掏出来给她一支。MS也会开玩笑，说，下回我就叫你口香糖王子了。

下午第一节课刚下课，隔壁班的CL就来找我。CL挺漂亮，我满心欢喜又有点儿受宠若惊地出了教室。老实说我不是经常被人找，我在学校朋友不多，严格说来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不过CL来找我倒在情理之中，在初中的那会儿她跟我是学校宣传部的一对拍档，我编新闻她播音，我很喜欢她那流利又不拿腔拿调的播音风格。为了让她发挥得更出色，我总是让她多读一些字句显得精确而专业的国际新闻。CL在教室门口，倚着栏杆站着等我。

“你想不想报广播学院？”我刚出去，她就问道。

我接过她递过来的材料，看了一下，我明明知道爸爸不会同意，可嘴上却说回去跟家里人说一下就行，因为我不想让她不愉快。其实我倒不在乎能上什么专业，只要能考上大学，至于哪所大学倒在其次。我想持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个人。就像是蹲在监狱里的人一样，十个里面有九个想要的只是自由，那惟一的一个说自己想当比尔盖茨，因为他已经疯了。

CL说：“那好，你先把材料拿着看看，明天别忘了还给我。”

我兴高采烈地要往教室里走，却被在花园那头的外语老师叫住了。他让我把外语课代表叫出去一下。我进了班，班里顿时安静了不少，所有的人眼睛都盯着我手里的这摞材料，让我觉得好笑，他们一直以为这是什么关于高考的重要文件呢。我煞有介事地走到外语课代表那儿，伏下身来，对她小声耳语道：“快，外语老师有急事找你。”看来她吓得不轻，连忙停下话头连滚带爬地出去了。平时她的架子特别大，看上去有一种矜持中透着轻贱的做作样子。我回到位子上坐下来，手里的材料被后面的人抽去看了。

我要是回去对爸爸说我想报考广播学院，他非气疯了不可。在有些事情上，爸爸算得上是个家教狂，我经常会因为他的过度关心而感到很尴尬。我不会把这事儿对爸爸说的，说了无益。那么我还是安下心来，老老实实在地准备7月高考吧。

3月3日

下午第三节课想走的人都可以走，这不是老师的通知，

恰恰是由于班主任还有其他所有的老师都去开会了，班里没人管。我中午上学进校门那会儿，看见团委办公室门口有两辆装满食用油和成箱苹果的卡车，估计把老师们叫去开会跟发福利品有关，今天不是元宵节吗？这种一到过年过节就发放战略物资的做法实在太俗不可耐。你想象一下：满校园都是搬苹果拎油瓶喜气洋洋笑开颜的教职工，是不是跟老鼠搬家有几分相像？这节课逃课的人比昨天晚上多得多，我由于昨天已经逃了半节课，现在不是很想走，因为我不能老让自己有种作贼的感觉啊。左右二位都走了，再过一会儿，我所在的这一排人中就剩下我一人。我六神无主地坐在这儿，像兔子的门牙一样突兀显眼滑稽可笑。白天逃课安全系数比较低，一不小心碰上开完会拎着油瓶往家走的班主任，你就有暴尸于校园的可能。我就算不是个多么积极勤奋的学生，可我也不至于是个逃学先锋。现在坐在班里的只剩下两种人：超级学习狂人，或者是超级闲话狂人。

我翻开数学讲义做起来，又卡壳了。我一向如此，无论做多么简单的数学试卷，三分钟之内准卡壳。不过今天我心情不算太糟，就继续做英语题目，一直做到离放学还有几分钟。我收拾好书包，出了教室门。GR从后面赶上来，拍拍我，问我到哪儿去。“回家啊。”我说。GR看上去比我长得老成，他的脸庞又圆又黑，也比我结实一些，不过个头没我高，我们喊他“萝卜”。GR特别老实，我不是说他是那种受气包，只是他有一种少见的天生的憨直。他说：“今晚大街上有灯展，看看去怎么样？”我说行啊，反正今天我也不能在人那么多的马路上骑车回家，一块儿走去看看吧。GR住校，他要我陪他上宿舍楼把书放回去，于是我就跟在他后面上了楼。楼道里又黑又湿，有种阴沟被堵住污水溢出来的味

儿。我虽然在楼道里什么都看不清，可还是忍不住左顾右盼，不小心一脚踩空了楼梯差点儿跌死。他掏出钥匙，打开宿舍门。地上很干净，上下铺共有六个，我在最乱的一张床上坐下来，又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我还是第一次以这种视角看校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整个学校在我眼里好像由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突然变成了个跟我没什么关系的小公务员。我关上窗，桌子上东西很少，一面镜子，一把梳子。我自己的桌子上总是有永远也收拾不完的各类东西：回形针、圆珠笔芯、胶水、拍纸簿。它们就像自己长了腿似的，今天收拾了明天又在桌子上乱作一团。我说：“你们这屋子不错。”有时你进了一间陌生的房子，就能感觉得到有一种使你的感受变得生硬的气味，这间宿舍里倒没有。

GR一边换鞋一边说：“看见那边女生宿舍楼了吗？就是对面的那栋。”

“是那栋新楼吧。”

“对，你听说过VR的事吗？”

“什么事？”

“去年夏天，他洗完澡，也没穿衣服就爬到窗台上乘凉，下面看门的老头儿上来检查卫生，一开门就看见他在窗台上左摇右晃的，就拎起门后边的扫帚打他。”

“那些女生看见了吗？”

“这我怎么知道，她们就是看见了也不会说呀。”

“这事儿的确有趣。”

GR站起来，跺跺脚：“走吧。”

我先出了门，一时光线不适应，我把双眼瞪得像只猫头鹰，又差点儿撞在一个往里走的人身上。他抓住我的衣袖，扯着嗓门叫道：“你不住在这楼里吧。”我认出来这家伙是

宿舍管理科的。我说：“我在这学校里上学。”GR一边往腰里挂钥匙，一边走上前来，“他是我同班同学。”这家伙看了GR一眼，放开我。我和GR一同走出宿舍楼。他笑得抖个不停，好像这事真那么可乐似的。

“刚才真有意思，”他说：“他把你当成贼了，这几天宿舍里老丢东西。”

我问他：“难道我真那么像贼？”

“你不像贼，像个大盗。”

我说：“今天我没带钱，我不回去了，你请我吃一顿吧。”

“行。”

我们出了校门，我看见电话亭，想去打个电话给家里，又不想让GR觉得别扭，就没去。“你不在学校的食堂里吃饭吗？”他说他不在那儿吃。GR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从来不说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儿，比如“最恨”、“从来不”、“受不了”，可是只要你和他成了朋友，你可以放心，他会很铁。我问道：“学校食堂里的饭菜不好吗？”

“还凑合，就是食堂里有味道。”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那种叫人作呕的泔水味儿。我初中时有一段时间在爸爸的单位吃食堂，有个女服务生，真叫人永远难以忘怀。在你要两份菜时， she就把一份菜扣在另一份菜上，用一个盘子端给你，好像成心要把你当成是一头食不辨味的猪似的。我向来在吃饭上特别在乎，可以称得上享受的事物不多，干嘛连吃饭都弄得叫人痛苦不堪呢？那个女服务生的迟钝，或者是满不在乎的态度终于惹恼了我，有一天，我在窗口点菜，口气生硬地说道，你把这份菜装在这个盘子里，另一份用另一个盘子装。站在她后面的一个闲着没事看到了这一幕的矮个

子男厨师，手握着汤勺柄朝我笑着，我向他扬了扬眉毛。有些事情男人之间很容易互相理解。话题扯远了。

我问GR：“你吃东西口味重不重？”

“不，不算重。”他的回答我听了很舒服。我不在乎胃口大的人，可我就怕那些一操起筷子就大声嚷嚷盐少了盐少了的人，我不喜欢那种性格的人。我自己在饮食上也有缺点，妈妈说，噪音太大，吃起东西来咯吱咯吱得吓人。因此家里一来客人，我就在饭桌上缺乏自信心，我得老惦着嘴巴弄出的声音是不是太响，结果过于拘束却弄得连饭也吃不饱。我和GR走到离校门最近的一家小餐馆，他要进去，我说，再看看别的吧。因为我看见这家餐馆里面有两三个熟人，我不希望在吃饭时跟他们老打哈哈，不然我非得被噎个半死不可。这家餐馆墙上挂着个电视，放着香港片，所有的香港片在我眼里都是恐怖主义风格的，不论它到底是什么内容。GR说：“就在这里吃吧，别的餐馆也都一样。”我说：“现在我还饿，你要是也不急着吃饭，我们先去街上逛逛，看看灯展怎么样？”

“也行。”

我们沿着人行道旁的花坛走着。他问：“DD是你老妹？”

我看了他一眼：“前天我才寄了一封信给她，她又去学画画了，你知不知道她到杭州去了？”

“知道。”

“哎，你怎么知道的？”我揶揄地问道。

他笑着说：“干吗告诉你？我还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3月底，不错吧？”DD没告诉过我她跟GR关系挺好，下次写信我得问问她。

前面有几个班里的人，正在往学校里走，他们那垂头丧气的样子看上去像是被人满为患的大街上的观灯者挤出局的一帮倒霉蛋。GR和谁都能玩到一块儿。我不是说他圆滑，可他的性格跟什么人都合得来。那几个人拦住GR，要他跟他们一起去吃饭。我说：“我得回家一趟，我忘了把晚上要用的书带来了。”

GR有点儿奇怪地看着我，说：“那么忙走干什么，一起吃饭去。”

这帮人中间的有些人我从来都不想搭理，看了就烦，他们也烦我。我坚持说：“不行，时间来不及，我还得回学校推自行车，再见。”

“真要走？”GR问。

“对啊。”

“行，那你去吧。”

看来我非得回去不可了。可是街上人这么多，回家后再来上晚自习肯定迟到。我又回到教室里，看了一会儿新发的语文讲义。班里只剩下五六个木头人还在死抠着习题。我又出来，到校门口的一家有电话的商店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在等着家里接电话的一小会儿，我抬起眼睛看着这个小商店墙上的挂钟，它的秒针在坚韧又毫无主见地转着魔圈。明天是我的生日。NF送给我的书，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向爸爸解释清楚不是我自己买的。“都快高考了我怎么还敢买小说看。”我信誓旦旦地向爸爸保证。家里没人接电话，我挂上听筒，从小商店里走出来。我恨透了过生日。可是，如果明天家里人不给我过生日，或者他们忘了，我又会感到一种事事与我无关的悲哀。我又走进了教室，那几个木头人还没走，他们倒活得很充实呢，在无可逆转的空虚的生命旋涡里

自以为积极地干些什么。我又手叉脚地坐在位子上，一动也不动。我是在等待着什么呢，还是在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在我的空虚而不安的心灵深处，有一只野兽正在凝视着我，准备伺机而动？

3月7日

七点多我就醒了。今天是星期天，本来可以多睡一会儿，但是当我睁开眼睛时，我感到心里起了一点微小的变化，有一种不同于上学的神日子里的新的危机感，我说不上来究竟是因为什么。星期天要是在床上躺得太久，你就会发现这一天会以一种让人咋舌和惋惜的速度飞快地与你擦身而过，本来这一个星期中的惟一个不用去上学的神日子过得就比其它任何一天都快。雨从昨天半夜就下了起来，春雷阵阵，我却没受什么干扰，马上就睡着了。这场雨使本来有点儿回升的气温又降了下来。我拉开窗帘，虽然有点儿冷，但是湿润的空气使它与冬日截然不同。雨水像瀑布一样从楼上铺洒下来，啪啪地撞在水泥地面上，撞得粉身碎骨。

外面饭桌上放着一盒生日蛋糕，塑料包装盒上还满沾着雨滴。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我的阴历生日。一般来说，只要不是我主动提出要过阳历生日，父母就会给我过阴历生日。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说：“你今天十八周岁了，这个生日是你最后一次在家里过。”她的意思是我今年高考要考上大学。我用手细细地比划着挂历上的日期，没错，是我的阴历生日。不过，我怎么是十八岁呢？我一直以为今年我十七周岁。我问妈妈：“我是虚岁十八岁吧。”

“没错，是十八周岁，你好好算一算。”

我弄错了吗？近两年我一直没注意自己的岁数。这样一来，我好像又平白无故地突然大了一岁似的。雨声变大了，我走到门口怔怔地看着远处，一阵失望的潮水把我淹没了。我紧紧地闭上双眼，过了好一会儿才重又睁开，目之所及之处，花园啊，树木啊，雨啊，这一切都好像变得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这场越来越大的春天的雨；雨中看上去很远、仿佛被湿润的空气奇怪地拉近了的花园；身边的被湿气浸得发潮的黑乎乎凉冰冰的门框，都被一样什么东西从我的感受中割离开来。我放下撑着门框的右手，把它拿到眼前，缓缓地、仔细地端详着。十八周岁，我有什么与以往不同的地方么？我的手还是我的手，它没有变化啊。只是感觉，听到了我十八岁的消息突然间变得有点儿迟钝啦。十八周岁，这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令人压抑地突兀着。我打开门，也许我需要被雨水稍微淋那么一下。我稍有迟疑，然后毫不在乎地走出门去。

3月13日

已经下了好多天的雨了，今天终于放晴。第二节课后，还没等广播响起，我就跑到了操场上。场地泥泞，还不能做操，但是阳光充足，让你走在湿泥地上也不会产生丧气感。有几个班里的人在操场的另一头，他们手插在口袋里，钝皮老脸地说笑着。还有那么三两个在绕着操场追打，远远看上去就像一群鸡。

最后一节是历史课，讲的是辛亥革命专题。“辛亥革命

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段话在小学时我背过一遍，初中时又来一遍，现在还要再背一遍，想靠这样左背右背翻来覆去地背背背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根本不可能，因为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铁定了心认准一个死理儿：背书最终就是为了考上个什么大学。我讲义上记得太乱了，就向前面那个女孩借了把尺子，把讲义上剩下的空白部分给分割一下。

我的自行车在回家路上又出了毛病，后轮克里克郎地响个不停。车虽然还能骑，可是那稀里哗啦的声响总叫你觉得像是自己的心被放在油锅里炸似的难受极了。我又气又恨，跳下车来，恼怒而绝望地把后轮四周检查了个遍，却不得要领。于是我提起车子，使足了牛劲狠狠地把它往地上磕了磕，推着它继续走，老天——还是响，但声音变了：哗哗——吱啦啦啦。一个穿着一层又一层厚衣服的家伙，骑着噪音大得吓人的老摩托车从我身边开过去，卷起的灰尘那么大，以至于整条马路看上去都像是从其所经之处被劈成了两半。刚才我在N街上时还有点儿犯困，现在好多了。反正车坏了回家准会迟，那我就大可不必过于在意路上又耽搁多少时间了。我推着车子在路上慢悠悠地晃着，有时候你真该切身体会一下自暴自弃的极度快乐。

下午进教室时，有个从来没跟我讲过话的女生正坐在我的位子上，她在跟我前面的那个女生聊天。她看见我走过来，就起身换了个位子，继续聊起来。她走下我的座位时，我注意到她脚上穿着一双头也大跟也大的鞋，看上去就像一只钉了新掌的母骡子似的，真滑稽。我不太能分清班里的一些女生谁是谁，她们的衣着打扮还有性格是如此相近，有时你就不由得想，她们是不是刻意要把自己弄得让彼此之间

看上去差不多？

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声一响，班主任就像几天来一直的那样，令人泄气地出现在教室门口。不过，今天先别忙唉声叹气，他手里还抱着一摞小本子，这倒让我们有点儿好奇，于是喧哗声像潮水一样落了下去。他挨排分发。等了一会儿，他把一个小黄皮本子飞也似地旋到我的面前：《文明市民行为准则》。这我倒是头一回听说。小本子不知是刚从哪儿运过来的，油墨味儿还浓浓的呢。“干吗发这个，要考试吗？”我右边那个家伙拿到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不要“考试”，的确有点儿发神经。班主任把本子分发完毕，走上讲台：“你们把发下去的这本书拿回去仔细看一看，背一背，大家知道这两天市教委有个检查团要来学校检查工作，有可能要提问你们这里的问题。”班里顿时嗤声大作。确实，学校方面不大可能会笨到要把那帮人带到高三教室里提问的地步，谁都知道高三学生个个脑袋瓜子里边早已都撑满了乱七八糟要记要背的东西，现在又临近高考，在脑子里再给一本乏味之极的官味儿材料腾出个位子，恐怕比让我们生吞了这本小册子还要难。何况我正处在背书的极度困难时期，现在我背的是世界近代现代史资产阶级革命那一章，有那么一节拗口得很，我背了起码有两个小时了，可头脑像起了排斥反应，老是没法记住里面的一句话，这还不算什么大事，问题在于，我甚至下课去厕所，撒尿的时候脑子里还不由自主地浮动着如下残章断句：“阿克巴阿克巴，北起中亚，南达，南达什么地方，奥朗则布，是阿克巴的孙子，那么那个叫巴布尔的又是谁的爸爸呢？”我焦头烂额地从厕所里出来，一走回座位上就狂翻历史书，以尽快摆脱记忆残缺带给我的折磨。刚才班主任在讲台上下达通知时，你看得出来他严肃里

带着紧张，我们这些学生倒对上面派人下来检查这种事儿不紧不慢。

“下面，开始大扫除。”班主任说道。学校听说市教委要来人，已经火烧火燎地干等了好几天。这几天里我们每天都被布置大扫除。事实上学校每周都有两次大扫除，在我看来已经很干净了。反正用不着那帮头头脑脑们出力，随便下个通知还不是容易的事吗。

风迎着我猛烈地吹，它一刻也不停歇下来，使我没法呼吸。大扫除耽误了我半个小时，我看了看表，晚上要迟到了。我下车来，迎着风走着，心里又急又慌直想哭。我实在不愿跟这该死的生活纠缠不休啦！有个妈妈单位里的同事从对面过来，骑着车子向我扬一扬手，我只好向他笑了笑。街道被大风刮得特别干净，干净得有点儿反常。

当我进屋看见爸爸站在我的桌子前时，我就预料到出了问题。他手里拿着我的一篇没写完的读书笔记，问我是不是又在看课外书了。我中午上学前忘了把桌子上的东西锁进抽屉里。他说，你不能在离高考还有四个月的时候看课外书，现在你要一切以学习为中心。然后又走到书柜前，看了一下，问，你怎么不听话，又买了小说？他指的是那两本NF送的《乱世佳人》，可我前些天已经对他解释过一回了。自从我上高三起，爸爸站在我的书柜前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检查我是不是又买小说了。我都不知道我天天因为上学累得要死、烦得发狂究竟是因为什么，还不是要让父母高兴，否则我连马上死掉都无所谓。作为一个高三学生，半死不活就是他的正常状态。爸爸有时能在一小时内把头探进我的屋里达八次之多，为的就是看看我到底在干什么，是不是又看课外书了。我开口说，你出去吧，我要学习了。这一招特别管用，

“一切都要以学习为中心。”这是爸爸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前几天过生日时，爸爸又是冒雨给我买蛋糕又是做菜，仅仅是为这一点，我就是再恨上学也要上下去啊。

3月15-16日

我在昨天下午就开始心神不宁地惦着今天早上两节连上的数学课。我希望数学老师安排做一张试卷，而不是讲题目，这样的话，两节数学课就不至于太难捱下去了。可今天照例是讲题目，“先把昨天没讲完的试卷掏出来，把最后一题给讲掉。”我没带来那张试卷，可是我不想跟左右同看一张，于是就记起笔记来。我一字不漏地抄着黑板，怀疑自己在数学课上除了能抄一抄笔记之外，还能干点儿什么别的正经事。笔记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是一种证明，让我产生了每天这么急颠颠地往学校跑，的的确确做了点儿什么事情的错觉，纯粹是聊以自慰。题目讲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我就开始像一只缺水的鱼儿一样，只能嘴巴一张一翕地干瞪眼了。我开始犯困。我的睡眠债一天累着一天，像欠上了驴打滚的高利贷，它在我的脑子里逐渐积成了一片阴云，越来越大。有时候我会突然疑心自己是不是长了个脑瘤，要不然我怎么会像个死人似的整天又困又昏，简直在太阳底下都能睁着眼睛睡觉说梦话。上课，下课，骑车，掏书，背，记，我再也弄不清自己是不是还保持着真正的清醒了，都说用手掐一下胳膊试一试有无痛感，可以证明你是不是在做梦，可当我真的下手一试时，同桌却大叫了一声。还好，下课铃已经响了一——原来是我精神恍惚，错掐了他的胳膊。道歉道歉没完没了

地道歉，在自己的道歉声中，我终于开始有点儿清醒了，于是我拿起笔来，照着黑板上还没被擦掉的板书，继续往笔记上没头没脑地抄了起来。

这时坐在门口的人开始一窝蜂地向外涌，恐怕是出了什么事情。校园里不管出了什么突发事件都是受欢迎的。像我们这样活着却没有目的和趣味可言的一群人，惟恐天下不乱，真正怕乱起来的，都是活得挺舒服的人呢。由于人突然一走而光，教室里显得十分明亮。我站起来，像动物园里可怜的猕猴一样双手抓着窗子的铁栏杆，往外面看了看。太阳出得迟，不一会儿天空就又要被阴霾霸占了。校园里有两棵雪松，遥遥相对。我没法看到侧面的花园，风在吹，很冷很疾，但毕竟是早春了，因此不那么干燥。我嗅到了一些气味，春游的气味，让我想一想——

浓郁的参天松柏下，苍老而粗壮的树根盘根错节，攀结在湿润、阴凉的林阴大道两旁气势不凡的人工斜坡上。这片森林，既古老，又保持着活力，让你心生敬意。我在小学三年级春游时去过南京，至今还记着在公共汽车上看见的车窗外那一幅连绵不断的景象。我希望能考上那儿的一所学校。我不很适应北方的干燥气候。在北京上学的LC去年12月给我来过一封信，他说他那个学校期末一到，图书馆里就突然人满为患，到处都是找杂志抄的人，因为要交“影视鉴赏”、“美育”或者是“环境保护”这些课的论文，被人抄过的文章上还堂而皇之地做着标记：“该文已被选用，请另寻其它文章，避免雷同。”LC是我高一时在宣传部认识的，他不像大多数学生干部那样是个只知道一心想往上爬的混蛋。于是在整个宣传部里我就跟他还能讲几句话。他比我高一个年级。他来的那封信我到现在也没有回，倒不是因为我想疏远

他，不过你知道，一个高三学生同一个大學生通信，虽然俩人只不过相差一两岁，可是处境的不同会使人觉得别扭。他在信里的口气虽然不是有意那样，可你看得出来有一丝春风得意在里头。LC学的是文科，考上的却是个什么理工学校。他在信里挺抱怨的，可这是他当初填报志愿时自己的选择啊。不过啊，当一栋没有出路的大楼失火时，你能做的自由选择，好像就只剩下从窗口往楼下跳这一损招了，而结果呢，你不外乎是在水泥地面上被栽个口歪眼斜弟弟子翘。

还差三分钟上第二节课。有那么三两个男生女生闷声不响地勾着头在座位上一动也不动，看上去他们已经把这种姿势保持了起码有一年。他们像是在背书，又像是在打盹。一个班里总会有几个这样的人，他们的分数撑死了只能算是中等偏上，可是看上去却比谁都用功，学得像个阿呆，尤其是女生，更让人受不了。你甚至一年里也看不见他们把头从课桌上抬起来几次，永远也没机会搞清楚他们的长相如何。我想到了DD，她可要活泼多了，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我关上窗，铃响了。我缩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后边的人戳了我一下，用的还是圆珠笔的硬杆儿。我最恨别人戳我让我传纸条了。“给你的。”他说。是ZY写的。读他的纸条，还不如干脆让我光着脚丫子在钉满了铁钉的板上走路。他的英语差得像个漏水破瓦罐，可还偏偏要在纸条里夹上那么几句。他那文理不通的字句把我的心咯得难受极了，读起来非得叫我在他的巴比伦楔形文字里头跌个破血流不可。

语文老师开始评讲试题了。“第一题，读音全都正确的

一组是——”有人在下面嘟嘟地说，“D。”

“什么？D？错。你们查一下97年新版的”——又来了，唉，继续听吧。“D项第三个词的注音，新版和老版字典不一样了。”

我搞不清他手头上究竟有多少个版本的字典，好像就那么一些人，闲来无事，老爱翻字典呀之类的做研究。慢工出细活儿，这我得承认，不过，眼见这么下去恐怕我这辈子都出不了什么细活儿了。更不用说现在：我哪儿有那么多精力去查字典？

我把刚刚写好的纸条给ZY传了出去，心里想着这张纸条一路上所经之处不要有人发烦才好，可我又没法向给我传纸条的人——表示抱歉。我打了岔，没记下来第二题答案，向考八十一分的这位问了一下。他把试卷倾过来，看上去对自己的分数十分得意的样子。要说人吧，骨头轻，因为他只有通过别人才能证明自己，可是有些人的骨头就只能说是贱了，非得在一些奇怪的事情上，比如考分啊，长相啊，钱财啊，跟别人较劲儿，才能让自己有一种被证明的满足感、胜利感。末了，他还想讨个嘴巧：“你考多少分？”其实每次发下来试卷都是他抢着先看一下分数，不管试卷是不是他自己的。我的分数，他比我还要先看到，可他这会儿却装得像个关心你的白痴，还问我考多少分。我说：“我吗？一百五十分。”他把试卷猛地收回去，看得出来他不高兴。有什么不高兴的？又不是他拿着一束鲜花来探望我，被我猛地一关门给撞扁了脸。我扭过头，不想看他的样子。

另一边的同桌正在像喝一剂刚熬好的浓汤苦药似的，愁眉不展地面对着摊开在眼前的古代史。这本三十二开、土里土气的小破书，不要说背，看一遍都比吃下跟它同等体积的

铅块还要折磨人，我上学期期末考试为了背完它差点儿玩儿命。我在盘算着今天还有几件事情得马上赶完：高三政治，高一下学期的政治，时事政治，现在还在上的政治新课，近代史上册——以上都是要背的，下面还有：解析几何解题全讲，外语第十四套语法强化训练，这些是要写的。如果我把上面所有的事情都给完成，而没有被累死，那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得马上再把这本铅块儿似的古代史给背一背，好赶上同桌的进度。

我装作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他到底背到了多少页，我得承认这使我有几分像在做贼，刺探敌手的商业情报似的。“宋太祖，宋太祖，”他在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双目微合，眼珠子在半张开的青黑色眼皮底下直打转，像个招魂的小神汉。我还有外语课文要背，要把语文下一张讲义做个十题八题，看大绿本子里的古代常识，古人编造出来那么多讲究可没想到今天竟然会叫我吃苦头啊，天啊，天啊。还有，还有，还有。我想把所有的事都记在一张纸上，干完一件划掉一件，可我上学期试过，那样的话不但不会让你获得解脱，反而使你陷入一条精心编制的罗网之中：你会发现事情划掉了一件就得再添上几件新的，于是要做的事情就会没完没了，越来越多，你就开始狂乱了。

傍晚了，风从田野那边吹过来，好像经过了长途跋涉，它开始变得疲惫起来。沉重的、带着湿润的气味，不甚温暖，但已是春风了。一只狗，耷拉着脸，屁股对着风吹来的方向，露出一副丧气样儿。蝙蝠，一只熬过了一个严冬的孱弱的蝙蝠，在落幕的深色天空中，试图尽量熟练地扑打着翅膀，刚才我还以为它是一只黑蝴蝶呢。风把它推推搡搡地玩弄着。春天，这么说，很快就要像一阵绿色的波浪一样涌来

了。它来得快，走得也快啊。你看，春天甚至还没来，我就想着它要走了。我推着车上公路，只感到一阵没人关心的、成长中的寂寞像涨潮般地袭来。

我疲惫不堪，甚至不想抬手把灯打开，也没脱下外套，就摸索着往里走，把自己一下子撂在床上，闭上一会儿眼睛。黑暗就在屋子里，它发出贪婪而嗦蟋的啃噬的声音。夜色驱走了黑暗，它庇护着自然，却没想到黑暗藏进了一个孤独者的屋子，在这里肆虐起来。可是，它又能把一个原本就无可奈何的人怎样呢？算了吧，收拾一下，明天还得早起，背书。我晃晃悠悠地在黑暗中站了起来。桌子上的钟，不自信地向我发出一星微弱的荧光。

3月17日

昨晚睡得不好，我口干舌燥，像是被放在文火上烤着。爸爸一连喊了我两次，第三次他亲自进屋来，把床头的台灯打开，拧到最大光线，问我还想不想上学了。在强光下感到自己就像个被审讯的犯人，我从床上坐起来。我关心的是他开灯时有没有注意到桌子上的那套玩具茶炊，那是昨天DD托人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她托的那个人忘了我生日，所以我收到时已经迟了。

我下了床，外套也没穿就跑到外屋打开窗子看看天气，还是老样子，像一口浓痰。我从歪在床头的书包里掏出一本笔记。唉，我觉得自己好像快要死了，这拖沓、粘滞、老是重复个不停的恶梦一般的生活！自从我上高中起，就老是想到死，倒不是想要去自杀，只是老觉得自己每天都跟死了似

的。现在啊，我真是快要死了呢：班里黑板上辟出了一小块空白，触目惊心地上“高考倒计时”几个大红字，班长每天一大早就跑上讲台去更改日期：还有一百天，九十九天，九十八天——好像你的死期真的是那么指日可待了似的。

吃早饭的时候我感到吞咽困难，嗓子右边一块痛得厉害，我这才知道为什么起床前会头脑发沉，看政治笔记的时候总觉得干渴了。我高烧发到四十度自己都感觉不到多么严重，还仅仅以为是嗓子发炎。我没有告诉父母，我不想去医院，那太麻烦，太浪费时间——我的时间是要供奉给高考这头怪兽的。上学路上随便到哪家药房买点儿药就行，我得早一点儿去上学。

外面是纹丝不动的死沉沉的阴天。我本来就发着烧，现在，坐在教室里，上着乏味的历史专题评讲课，只觉得自己像是一只风干了的老桔子。远处操场上到处都是黑黑的烂泥浆，像一片沼泽。风跟强盗似的在校园里两栋教学楼之间水泥地面的小操场上横冲直撞。我端坐不动，试图让自己发一会儿呆。我一天总要发那么一两次呆。睡眠不足，于是坐着发呆便成了最奢侈的休闲活动。但是今天我没法集中精力盯着什么东西发呆。下课了，人人都不知道在忙什么，出来进去，哇啦哇啦。我的脖子硬撅撅的，像一节没有知觉的钢筋。我看着从讲台上过来过去的人，这引起了我的兴趣。看人走路也很有意思，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走起路来动作假里假气得让人发笑。你真该看看班里的那个学生会文艺部部长的步法，她像是长了根猫尾巴，走起路来要是不扭一扭屁股就难以保持平衡似的。

“你笑什么？”右边同桌问道。

“看他们走路好笑。”我说。我想起了还没吃药，就把

药从书包里摸出来，走出教室，到供应开水的地方去。回了教室，我发现同桌已经把他的凳子往里边挪了一点，他抬头用疑虑重重的眼光看了我一下。好像我就是致命病毒。我说，小病，发烧。他没再说什么，继续背他的外语单词。

放学经过邮局时，记起来要买一份新闻杂志，于是就进去了。付了钱后，我看见柜台上有一份报纸，题头照片是一个背着空篓子的北朝鲜老太太，她站在光秃秃的到处是砾石的山坡上，抬起满是皱纹的脸，眼巴巴地看着我。这眼神叫人无法回避：这是一种苦难、困惑和责备交织的眼神。这是最后一份报纸，我买了下来。我要是有足够多的钱，就会买尽可能多的食物给这些吃不饱饭的人送去。有些问题，我知道明明可以凭着人类现有的力量很容易就得到解决，却因为一些奇怪的、疯狂的人和事的阻挠没法得到解决，这会加剧我头脑的混乱和痛苦。我只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因饥饿而死，因为这种死法毫无道理。我想不通：一个人被平白无故地饿死，难道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儿吗？

从邮局出来，骑着车，差点儿把一个老太婆给撞飞。她过马路的劲头真可谓是勇往直前，也不往左右稍微看一眼就直往马路对面闯，她这么急煎煎地过马路，仅仅是因为她看见对面有一堆人在围观打架，她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去扎个堆儿。我反应迅速，双手马上捏紧了车闸，可她从我自行车前面走过去时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好像她根本就没注意到刚才是多么危险，这真让我气愤。我吓得魂都飞出了躯壳，出了一身汗，惊魂不定地推着车走了一段路。这些人啊，他们确有一种叫人害怕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恰恰来自于蒙昧和愚蠢。只要认定在一件事上有点儿蝇头小利可捞，他们就会把一切置之度外，闭着眼直往前闯，甚至考虑不到会不会

把自己的老命给搭进去。

下午进了校门，看见高一没分科那会儿教过我物理的老师正站在办公楼前，好像在等着什么人。他招了招手。“我？”我受宠若惊。好像我这个学文科的一辈子也不会跟物理有什么瓜葛，除非有幸能在下次世界大战中见识一下原子弹的威力。他指着身边的一摞书，说，“来，给我把书搬到楼上去一下。”他抱一半我抱另一半，我跟着他上了楼。做学生的不管什么时候都不爱在办公楼前转悠（除非他疯了），因此楼前干净得很，看不见一个人，楼道里边却看不见一个老师在走动。这些老师总是能在上课前一分钟准时站在教室门口，搞不懂他们是怎么把时间掐得那么准的。我把书放在物理老师的办公桌上。他的桌子上有一块平板玻璃，下面压着十元钱。坐办公室的人就爱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往玻璃下压，我甚至看见过有人把一只黑色的大蝴蝶压在玻璃下边。不过像这个老师在玻璃下压上一张十元钱的人我还是头一回看到，有几分傻里傻气的。其实这物理老师倒不是个傻里傻气的人物。高一时他没收了班上一个同学的集邮册，那个倒霉蛋下课时跑上讲台，苦苦哀求了他很长时间，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甚至都以为他会给老师下跪了，可他带着无动于衷的表情，推开这个学生，走了。难道你相信他会把那些没收了的精美的邮票上缴给学校？也许他昨天晚上还躺在被窝里，舒舒服服地把集邮册又欣赏了一遍呢。这些老师啊！

放学谁也别想溜。班主任已经是第六天在放学时堵在班门口了。还是大扫除。谁都搞不懂市教委的那帮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期期艾艾地不来，他们在开头的那几天被我们发狂般地诅咒，到了如今，他们简直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大救星。

班主任一连几天都来布置大扫除，结果每个人都心存侥幸地想，明天大概不会再来一次了吧。我可不这么想，也许我还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发昏。当班主任又出现在门口时，我既不唉声叹气，也不大吵大叫，我背起书包，攥着抹布就出了教室，走到外面窗户下。我抬起头来，就差把这扇窗子给整个儿卸下来擦了。都说看见了自己的劳动果实会挺高兴的，可我一看见这扇窗户就七窍生烟。怪不得每年都有一些高三毕业生高考考完了也来不及好好地睡上一觉，就拎着根棍子千里迢迢不辞劳苦地跑回亲爱的母校，为的就是把教室的窗玻璃给捣个稀巴烂。我站在窗下，等了好一会儿，可我所在的那一组没有一个人出来拎桶水。我一个人站在外边，全身冰冷，骨头被冻得叽叽嘎嘎作响。你看怪不怪：你扫地擦玻璃，没人领你的情，可是你一旦不扫地擦玻璃了，你那组里的人就去班主任面前像狗一样地汪汪叫个不停。可我不在乎，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我拍了拍手，背好书包，去取我的自行车。只要你的眼神儿还好使，总能看得出来这几天校园里打理得就跟一个乱搽乱抹的半老徐娘差不多，仅仅是为了要迎接市教委的一个检查团。要是中央派大员下来，全校还不推倒重建才怪。

3月18日

上午我在几公斤重的书包里拼命塞进一包雨衣，雨偏偏不下，下午我在上学前把雨衣从书包里费劲地掏出去，扔在桌子上。现在，我刚一到学校，雨却下了起来。

刚一打开教室的门，就有一阵温热肮脏的气味猛扑过

来，就像迎头碰上了一个几十年没洗澡的野人。我在经过讲台时向下面扫视了一眼，差不多有一大半人到现在还穿着冬装，一副油腻腻的样子，看上去就觉得不爽快。我就是不爱穿得太多，不是不怕冷，我觉得衣着臃肿比冷还要叫人难受。我从来不穿太多衣服，并不是要让自己看上去不错，只是我不希望自己就那么简简单单地有受到束缚的感觉。我特别在意这些细微的，可能影响到我的感觉和情绪的东西，能避免的我尽量避开。教室里各种混杂在一块儿的令人作呕的古怪气味，再加上大雨前的憋闷，让我没法集中精力在上课前背一会儿书。我要打开被关得严严实实的窗户。手刚一碰到窗子的把手，左边的同桌就把一句话向我劈过来：“你发什么神经！”我站在那儿，愣了半秒，动作稍有迟疑，但还是打开了窗子。我没有看他一眼。他见刚才那一声恶骂不奏效，就像安了弹簧似的，从座位上一跳而起，狠狠地砰地一声把窗户重又关严了。我不再试图打开窗子。唉，好像除了我，没有人在意教室里污浊的空气。我只等着铃声响起，老师走进来——

语文老师走进来后，随手就把门给带上了。关上的铁皮门后面的木制骨架顿时暴露在我的眼前。那种我想捕捉到它并把它放倒的焦虑感，随着关门的一声响突然烟消云散了。我紧握着语文讲义的手随即松弛了下来。我只觉得教室里上课前的短暂的喧哗、稀里哗啦翻书的声音、凳子的挪动，都像同我隔了一层真空的距离一样。眼前的黑板啊，桌子啊，都变成了一些与我无干的，徒有其表的杂物。我的意志，我的悲恸，我的愤怒，我的感受，都在这一刹那间消失了。我只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真实的，宽厚的坦诚之中。我的身躯，在“现在”的泥淖之中，想要挣脱

开来。我在像一个气球一样，不可遏制地膨胀着，膨胀着，飞升，飞升。我仰起头来，上面有一片光芒，它吸引着我，引导着我。我的体内，被赋予了一种力量，那是我真正缺乏的，强大到能够打碎一切的力量。升腾，升腾，我置一切与度外，我——

我心头一紧，原来是我右边的同桌用胳膊肘儿捣了我一下。我往讲台那儿看了看，以为我的走神被老师注意了。没有，他还在耷拉着眼皮讲题目。“你有笔吗？借我一支。”

“没有。”我的确有点儿恼火。虽然嘴上说没有，但还是把手里的笔给他递了过去。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接过笔。我开始垂头丧气地跟着老师的评讲往下做题。

我在脑子里盘算着我的历史还有多少没背：古代史还有大概一百四十多页还在我脑子的某个角落里挺尸，中国现代史估计还有七十多页要再放进脑袋里涮一涮。我疲惫得差不多成了一块捏一下就会碎开的老木炭。

老师开始提问了。第一个倒霉蛋是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名气挺大的人。要想在学校里有点儿名气，可不像你想象得那么简单：你得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成绩极好的优秀生，要不然你成名的机会就只有是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极差的学生。这的确有点儿滑稽。不过，我想一个学生之所以被人（尤其是老师）认为是个极差的学生，那倒不是他希望能借此出名，倒是拔尖儿的那些人，很有可能是心里有点儿太过于在乎考试排名的虚荣和嫉妒掺杂在一起作怪而出了名。被抽出来回答问题的那个家伙，一双手支着课桌，胳膊微微抖个不停，桌面以上的半个身子直挺挺地紧贴着课桌边沿，像是要刻意避免自己被紧张之风刮得左摇右晃似的，真是一副不堪目睹的场面。他的细脖子支楞着头，把一双惊惧的眼睛

睁得又圆又亮，梦呓似的含混不清地咕哝着什么。我想不到就连他这个人物也会怕老师。我私下里想，他可能挺笨的，因为他怕的是语文老师，又不是班主任什么的。有节制的一些笑声从他的周围传来。朋友嘛，在这种场合下是没法帮你忙的，他们又不能代替你回答，惟一的鼓励也许就是讥笑你一番，虽然你的这些狐朋狗友们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能回答好，可是，你站在那儿听见他们的笑声，也许还可以放放松不至于太紧张。这道题他肯定不会，可是他不敢说，也许是不甘心这么说，于是整个课堂就这么像一块老牛皮似的僵着，谁也不敢动一动。老师也没让他坐下，就把课代表叫了起来。我琢磨着这对那个倒霉的人来说算不算是体罚，如果算，那么全国老师里面可能找不到几个没有犯罪前科的了。不过说一个老师对高中生实施体罚好像有点可笑：你让随便一个老师试试看，他敢同一个高中生对视一分钟么？他们都会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我说过，我们这些高三学生已经长大到能够独立地观察人了，只不过我们还有一点没学会，那就是给虚假的、捣糨糊的东西留一点儿面子，一点儿余地，不去戳穿它——这才是成年人怕我们的地方，也正是年青人的力量所在呢。

正在回答问题的语文课代表的确是个天才，他的回答总是跟老师手里的标准答案差不了几个字。每次回答，他都能得到最高评价：“基本正确”——老师们嘴里没有“完全正确”，“好极了”或者“很好”这些词儿，语文更是这么回事：满分是五分，他们至多给你四点九分，要是满分是四分呢，那你至多只能得个三点九分，这的确叫人着恼。不过，想一想也讲得通：要是把水缸里的水添得太满，都快要溢了出来，那么给水缸添水的那个人倒显得自己像个笨蛋。想想

是不是这个理儿？

其实老师们的不良癖好还不仅如此，我高一时的那个刚从某个师范大学毕业的语文老师，也不管教学大纲有没有做要求，偏爱随随便便地布置课文叫我们背，可他才二十多岁啊——我不是对他年纪轻轻就这么堕落感到痛心，只是，一想到今后还会有至少三四十茬儿学生要经他之手调教，我就不寒而栗。有一次他叫我们背《荷塘月色》，当然是全文，传世之作嘛。我回家后没背。我敢于冒这个险，部分是由于我估计该老师抽的不大可能是男生：一个男老师，还年轻气盛的，想想吧。另外呢，由于课文实在是超级长，不大可能在一节课上再抽第二个人起来背——请注意：我在上面说了两个“不大可能”，希望你不要把我看作是一个把老师的心理摸得透透的、简直能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诸葛亮才好。干咱们学生这一行的，怎么可能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恐慌之中呢？于是当他第二天上课开始抽人背课文时，我还是提着我的小胆儿，差点儿把自己缩到抽屉里边去。深得垂青的是当时的语文课代表，女生。（就在老师叫她名儿的时候，她简直就成了全班人心目中的女神。救命恩人哪！）从她那两扇薄薄的嘴唇里像瀑布一样往外倾泻不停的句子你可以想象得到，她为了背这篇课文，起码熬到下半夜一两点钟，又怎么可能不愿把这个劳动成果当众演示一下呢。看看正在背课文的语文课代表：你要是不听她背的内容，光看她嘴巴动呀动的，那简直真是像极了一个泼妇在起劲地骂人。下面坐着的人都一直在惊叹个不停，却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年轻的语文老师却摆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认为理所当然的得意表情。我一直在为她担心，万一她突然打了个顿儿，那准会像每分钟发射一万发子弹的高射机枪突然卡壳一样危

险。那样的话，下面的内容她可能再也无法续上来了。为了等着她流利地背完，花了我们好长时间。最后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好像是在庆幸自己脱离了危险似的，表情中又含着一些骄傲，这很自然，我也终于可以不再揪心了。当然，全班人人都在她叹完那口气之后，跟着叹起气来，于是就掀起了一阵气流的狂潮。背书时的一片寂静开始被打破了。倒是一个人的反应不够自然——何止是不够自然，简直就是没人性。语文老师的面孔像一座蜡像，他说：“背的总体上看还可以，但是中间有几个停顿”——简直就是反动言论。大家都看得明白：如果她背书时一点儿也不停顿，那她非得因为一口气接不上来给活活憋死不可。这件事也使我明白了，你要是想从哪个老师嘴里听到“非常好”这类完全肯定的字眼儿，差不多比坐着风筝去新西兰还要难。他们总是在你明明干得符合要求的情况下讲两句好像在肯定你的成绩、其实会让你不爽快的该死评语，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批评者的身价。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其实是世界上最为廉价的东西，五毛钱一斤？不不，白送我都不要，免得找气生。

现在的这个语文老师不怎么叫人背书，他爱用“什么是什么”这种固定格式讲题目。还行吧。他正在讲一篇现代文阅读，科技短文那一类的。从那些语文专家们选的科技短文就暴露出了他们的超级农民意识。他们总是这样，看到几个时下流行的科技名词就半通不通地冒充很未来主义很有那么几分现代精神硬要生搬硬套，好像这么一来语文教育就能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了似的，把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用拐弯抹角的“科学术语”表达得肉麻极了，给人一种孔子撩起长袍要扒火车的感觉。

也许是天气对自己明天将要扮成什么样的脸孔还有一点

儿拿不定主意，于是他那风做的灵魂就争吵不休了，真是很奇特呢：又是北风，又是南风，还有一点儿偏西。可是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老是迎着风骑车了。小学一年级语文书上有一页就告诉你：不可能有从不同方向对着刮的风，还有模有样地附上一张图叫你挑错，可我现在就身处这样一种被权威的课本认为的不可能的风中。想当然的东西再简单不过了，只要你坐在教室里随便想想就行。我费劲地骑着车，快到家时，咽了一口口水，这才觉得我的嗓子又开始肿了起来，它简直要把我的喉咙给撑破啦。

3月19日

天还是没有放晴。我在下了第一节课时沮丧地看着中间第二排的两个女生闹来闹去。经常这样，她们就这么一直闹到上课铃声响，然后在全班的突然沉寂中双双警惕地收手，以便观察已经站在门口多时的老师是否对她们的打闹加以注意。女生们好像都是乐天派，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女生陷入长达三天以上的沮丧，有什么问题，说一说就通了。也许这就是她们没法想得更深的原因。看着她们俩吵闹着玩儿，我几乎都被她们的活泼感染了。她们的一对胳膊绞在一起，另一对胳膊相互抵着对方的下巴，双方集进攻防守为一身，尖叫不断，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养过的两只鹌鹑。她们周围的别的女生都避让开来，有两个跑到远点儿的座位上抱着书继续啃。像这样的局部战斗，每一节课下课都在班上发生多起，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的时间，被一节课一节课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十分钟——我们又能拿这些残缺不全的十分钟干点儿什么呢？反正打打闹闹也是挺有意思的，总比

那些下课了还在苦着脸看书的人有意思多啦。我饶有兴味地看着两个女生的战争。其中一个的下巴被抵得紧，她连叫都叫不出来了，不得不渐渐地往后仰去。我注意到占上风的女生把指甲染得黑乎乎的一团，像个菜市场里拎着斧子砍肉的老板娘。终于支持不住了，占下风的那个尖叫了一声，松开手慌里慌张地要拽住什么，不要让自己跌落下去，最后却拽住了一个听见上课铃响往座位上跑的男生的腿，幸好力气不太猛。那个女生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连忙松开手，这样一来她就不得不用手撑着脏兮兮的地面了。

语文老师早就站在教室门口等着战火平息，他正在酝酿着要不要在上课前先来一段反学生暴力大谴责什么的。新时期的道德主义者总有他们的一套。他果然讲半句咽半句地把刚才那两个女生狠狠批了一通，虽然听他的话就像是吃了一碗夹生饭一样别扭，可是只要你还有一点悟性，绝对明白他的意思。他有个本领，讲话拐弯抹角，可是比直截了当骂你还叫人难受：“有些人，成天疯疯傻傻的，一点也没有做学生的样子，尤其是女生，就更不应该这样。”

语文老师在黑板上抄完了成语解释，开始讲下面这道古代礼仪常识题。像我这样的人，要是在大清王朝过上一个小时就准会因为不懂礼节给杀了头。古代人的礼貌不是像说谢谢再见对不起那么简单，反正我觉得我无论如何是没法钝皮老脸地开口说“你家这个犬子好可爱哦”这种话的。

“把别人家的孩子称为犬子是不对的。”老师纠正道：“犬子，只限于向别人谈起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才能使用。”班上的男生看来都好像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有不少人忙不迭地叽咕着女孩子是不是应当被称为犬女，老师没有肯定这种说法，这叫我们很失望。在这个国家，男女在表面上是一

种不平等，在实际上则是另一种不平等，挺好笑的。不过有一点你可得搞明白，中国是礼仪之邦这种说法只不过是讹传说。

现在老师说到哪道题了？是这道题：“如果一个男子有老婆和小妾，那么她们之间该怎么称呼呢？该男子又怎么称呼她们呢？”老天，难道就靠教我们这些差不多都死绝了的东西来抵御外来文化侵略？真是劳神，我一瞅见这本封面被磨得发白的历史书就联想到一堆石灰渣子，这可不是什么让人心里舒服的好印象。什么猪牛羊马狗，粟稷麦稻桑麻，我每背进行一字，它们就要变成一梭梭的子弹，把我的活生生的脑细胞成批成批地枪决。我就像是个在给自己行刑的刽子手，我真是不得已啊。

我一直在背历史书，脑袋垂死般地耷拉得太久。当下课铃声响起，我准备缓缓地抬起头来时，几乎感到脖子上的关节像生了锈的机器零件般在咯吱咯吱地响动，吓得我停了下来，好像这么一直把脖子动下去就会把它一不小心弄断似的。老天，我只觉得双眼快要瞎了，干渴得跟一块老生姜差不多。当我想到要出去喝一口水的时候已经迟了，还有一分钟就要上课。

中午我刚要在床上闭一会儿眼，妈妈就在外面说有人来找我。我一骨碌坐起来，理了理头发。原来是一个邻居小孩儿，他想问我借一本初一外语课本。我是整个单位大院里年级最高的中学生，所以经常有小孩儿来找我借书。我甚至还不知道今天来的这个孩子叫宁宁还是林林，不过他的长相叫人喜欢。院子里的小孩，大半我都叫不出名儿来，妈妈却能。现在的家长把小孩的名字起得一个赛一个肉麻，不过今天这孩子的名字倒还好看。他个头不高，有一双黑得亮晶晶

的像涂上了一层釉似的脱俗的眼睛，每说一句话都带着诚实的灵气，短短的又黑又浓的眉毛向上挑起，看上去更加让他的脸蛋整个儿神采飞扬起来。还有他那张淡黑的圆脸，真可爱，他的皮肤天生有那么一点儿黑，可是不同于大多数人那样黑得不干不净的，他全身透着一种可爱的、小孩子们特有的懒散脾性。我问他，你自己的外语书呢？他说他在踢足球的时候把它弄丢了。我想他恐怕把整个儿书包都弄丢了，就告诉他，要是还要借其它的课本，我也有。他只说要外语书。我看了一下钟，现在给他找书时间来不及了。我说，你叫宁宁吧。谢天谢地我没有弄错。不过小朋友是不会在意你是否弄错他的名字的，他会很主动地给你纠正。我说，你看，我得马上去上课了，下午放学回来我帮你找，晚上你过来拿，行不行？我又告诉他我晚上要是不在，会把书放在外面的桌子上。他谢了我，还说哥哥再见。我记得当时我上初一那会儿，就是脸上还很光滑没有一点点青春痘的那会儿，像他一个样儿，可是个头足有一米五了。现在转眼看看学校操场里满处跑的上体育课的初一学生，绕着操场像豆子似的颠来颠去，个头全都那么小。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发育比我们慢，而是他们的头脑在这短短的几年里又在小学老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被加速人工催化了，而个头的增长已经来不及跟上这种伟大的脑催熟工程的进度。要是按照比例让身体发育和大脑发育达到正常比例，我怀疑那些初一小孩的个头得长成长颈鹿才行。

下午第一节课是班主任的课。他在开始讲课之前，尽量用一副宠辱不惊的神情把本班被评为先进班集体的事儿给泛泛地说了一下，还是市级的呢。鬼才知道他们评先进班级按照的到底是怎么一种鬼怪评价标准——不过要是根据本班在

连续几次全市高三大联考中，文科前二十名就占了一半还多为标准，也许还说得过去。我仔细地观察着班主任，就像在看一部动物科教片时那样。他表面上漫不经心地向我们宣布这件事，可你看得出来他在心里准是快乐死啦。所有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没有一个不对这种无聊透顶的东西，比如评先进呀什么的，在乎得要死，很容易理解：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精神物质双丰收了。宣布完了，下面没有几个人在说话，人人都很平静，我不再盯着他看，翻开讲义。要想看到一个老师真情流露恐怕跟看到老虎吃树叶一样不容易，据说这是教育心理学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不便乱说。

一天终于过完了。我在睡觉前背历史，一直背到我的脑子像一块在污水里泡胀、胀得不能再胀的馒头为止。我托着我的这颗价值连城的、装满了宋太祖和慈禧太后、青花瓷器和青铜工具的腐败的头颅，小心加小心地脱掉脚上的拖鞋，上了床，再把那本《数学巧解点拨》从书包里取出来，翻了一会儿，就这么稍微安心地睡着了。

3月22日

现在算是春天了吧，可是今天早晨却比刚刚过去的冬天里的任何一天都冷。我六点钟起床，把窗户关严，拉上窗帘，蜷缩着身子在开到最亮的台灯下面抄政治问答题，只觉得披在身上的被子像冰壳一样。

今晚的历史考试是预先通知了的，这样我就可以早早地改动了一下复习计划，免得又因为冷不丁一杠子插进来的事儿给搅得大脑支离破碎。两节课，考的是世界近代史部分。

我要是在第三节课能抽空背上十来页古代史，今天就算过得不错了——看看一个高中生是以怎样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一天的吧！回放一遍：“再背上十来页古代史，这一天就算过得不错了。”

老师把卷子发下来之后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前排一片翻书抄的人很少，这并不是说这儿人人都有把握考得好，只是，学习成绩越是拔尖儿的就越不会去抄。我不是在夸他们，不过要想把他们这么做的动机给写出来，得出一部书才行，我恐怕没法三言两语概括出来。不过我想，要求学生考试不作弊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考多少分真的能说明什么问题吗？源头都早已被污染了，你在入海口搞环保工作有什么意思？那不是有点儿像王二麻子暴打了你一通，你却跑到张三家门口去破口大骂？反正最后为难的总是做学生的。唉！我不是那种不明不白的人，既然我把分数看得开，就没这个必要抄书，不过要真是遇到一时忘了的内容，我也不至于坚持不掏出书来看一看。我把历史书大摇大摆地放在桌子上，可我没有想到这么一来，坐在我左右的两位同桌会有这么严重的反应：其中一个人，你看得出来，他看见我掏出了书，那心就跟猫抓似的那么难受，他别别扭扭地往下写试卷，可是一点儿也不专心，老是看我；另一个，自己没胆儿动手翻书，就跟在我后面遮遮掩掩地抄我的。我由于还要在测验完之后背书，就有些急，试卷上的字写得有点儿发毛。我的五个手指头全都被油墨印的试卷给染黑了。这次测验是“亚洲革命风暴”那一节的，在短短的一节里竟然能找到那么多、或者说竟然能编出来满满一张试卷的题目，可真是难为那帮出题高手。不过这就免不了在试卷里碰上叫人气恼的八格斯：有三个问答题，翻来覆去地问，问的其实就是同一个内

容，于是你就不得不翻来覆去地写呀写，把这同一个答案在同一张试卷上写个没完。我写得急火攻心，在最后一个问答题的空白处索性写上“详细答案见第四十三题及四十四题。”出这三道问答题的人准是个虐待狂，他可以从强迫众多学生无意义的重复性作业中获得某种性快感，铁定如此，这个变态狂！

下了第一节课，出去十来个人，有两三个是去方便的，但大部分出去的人都是坐在后排的所谓差生，这简直把正在埋头写试卷的我给羡慕死了：你一旦被认定是差生，那你就有权随时随地给自己放个假，连班主任有时都默认这一点，可我不行，目前我已经是全班前十名。我想他们那些所谓的“差生”就是将来考不上什么大学都不会比我们这些人表现得更加呼天抢地那么绝望。在前面坐着的，包括我在内的三排学生，为了让自己在一次历史小测验中考得比其他人高一点儿分数，连下课都情愿憋着尿不去上厕所。外面传来刚才出去的几个人的打闹声，我的同桌们看上去很不耐烦。我一走神，试卷被前面女生给一把拖了过去。她一边抄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同桌讲着话。突然，她打住话头，转过身来，“这是什么？”她瞪着一双鱼眼，指着最后一道问答题问我。

“没什么，我不想写了。”我淡然说道。她指的是我没写答案，注明叫老师往上面两题找的那道啰啰嗦嗦问个没完的问答题。她把我的试卷拿到她同桌的眼皮底下晃荡起来，这还不过瘾，还在前后左右都四处张扬个遍，她也不管别人爱不爱看，烦不烦她。

她终于在上课铃响起时安静了下来。她抄我试卷的时间足以把一钵中药都给熬成汤。我有点儿急，小声叫她快点

儿抄，想了一想，又补上一句：“你别一字不漏地抄！”她头也不抬地说她知道，可我认为其实她除了只知道抄，其它的什么都不知道。历史老师看来是不会来收试卷了，他一连两节课都没露面，像个骗子似的一去不复返了，还害得我们白忙活了两节课，真有点儿苦苦干了一年挣来的血汗钱被人骗走的感觉。大多数人都写完了试卷，于是就吵吵嚷嚷地开始对答案。严格讲来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集体抄袭了。前几天班主任搞得很严重地在班会上说：“这次月考不准出现抄袭情况，谁要是想门门都抄个一百分，他不用抄，直接到我办公室来要，我保证给他，门门都是一百分，叫你满意。”

我当然会满意，只不过恐怕这么一来他不会满意。说真的，要不是担心班主任会气得发狂，我马上就会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口向他要几个一百分，那倒不是我太看重名次，我只是实实在在忍受不了考试——排名——考试——排名的恶性循环。

班主任老爱说那些不着边际的、根本不能兑现的话。想来下面的话你也从他们嘴里听说过：“你们不是想放假吗？现在就放，是我说的，今天晚自习，任何人他想不来就能不来，我保证不追究他责任，我还要放他一辈子假，叫他高考也不用来考，轻松了吧！”可是到了晚上上课时，班里的座位比任何时候坐得都要满，班主任在窗子外边像倩女幽魂似的游来荡去，他正在好好地检视一下到底是谁想给自己放个长假。

还有十来分钟就要放学了，前面的女生终于把试卷还给我，好像自言自语般地嘀咕了一句：“乌贼他人怎么还没来？”

“乌贼是谁？”我好奇地问。

她吃惊而不屑地看了我一眼，好像我是一只蜘蛛。“不就是历史老师么。”

怎么把他叫乌贼，难道他长得像乌贼吗？

“因为他黑。”

我真是服了班上女生们的想象力了，起外号都那么有创新精神，我大笑不止。班长站了起来，说，“第二组和第六组的试卷交上来，老师通知的，这次是抽组改。”班上起码有二三十个人听了班长的通知特别失意，尤其是坐在前排辛辛苦苦地做完试卷的人，简直像是遭了五雷轰顶。花了这么大力气，连屁也没捞着一个。“班主任，班主任！”下面有人小声发出警报。班主任进了班来，是晚间例行巡视。我马上抱着历史书翻起来。本来我就计划好了要背背历史书的，可他这么一进来，我却有点儿觉得自己看历史书是在装腔作势，好像成心要摆个学习的样儿给他看似的。

下午上学，太阳照耀着，这是春天特有的阳光，很纯净，很天真它不会给你那种赤裸裸的肉欲的感觉。有个人在水塘边钓鱼，用的是质量极高的渔具。“原子弹炸蚊子，”我想：“只有根本不会钓鱼的家伙才会迫不及待地背着这样的全副武装，见了有水的地方就往里面乱捅一气。”这个水塘里淤泥很深，前两年差点儿有个小孩被陷进去。与其说是水塘，还不如说是盖着一层水草的沼泽地更为合适。天气好得很，就算他整个下午只钓到一只破鞋子什么的也不会太失望。我在心里祝他好运。

下第一道坡上公路前我推着车走了一段路，前面有一群小孩。为首的是个黑黑的男孩儿。他在我经过他们时，忽地跳出来问道：你是不是在X中学上学？他有一副一点儿也不胆怯的粗野样子。我不由自主地问他：“你是怎么知道

的，小朋友？”他说他的外婆家就住在那儿，他看见过我。我努力回想着以前见过这个孩子没有，好像没有，这叫我大伤脑筋。我还想听他往下说点儿什么，可他带领那帮孩子往我身后跑去了。我骑上车，顺着坡往下滑。我往往会想，我的样子会不会吓着小孩们——因为我小时候一见到十几岁的小青年就跟见了鬼似的四处躲，尤其是满脸长着红疙瘩的那类。今天看来，我还不至于在小孩儿的眼里那么恐怖呀！只觉得心里急剧地喷涌出一阵欣喜。

3月23日

我真是被班里的卫生委员给烦透啦！他老是在刚一下课时就像扔炸弹似的冲我狂叫：“快去擦黑板！”这已经是今天第四次了！我最恨不过别人跟我用这种口气讲话，尤其像他这样的蠢货。我仿佛觉得自己在他的嚷嚷声中成了个低三下四的跑腿小厮。他把命令嚷得是这么露骨，简直连大赦国际都要出面干预了。我就尽量在他朝我嚷嚷完了之后一个劲儿地拖时间，想借此挽回一点自尊心，可这头天杀的老驴一直在不知趣地嚎叫个不停，擦黑板！擦黑板！弄得我越是拖延就越是下不来台。我恨得心里发痒，打定主意要在高考之后把他好好地揍一顿。我在菜市场里看过人杀鸡：那些鸡，一看到有人把手伸进笼子里就一个劲儿地躲、缩，因为惊慌咯咯地小声叫着，还挤成一团，好像这么一来就能从同类那里获取一些临死前的安慰似的，可是，安慰也根本没有什么用，它们最后还是免不了被——宰杀掉。只是在被人伸手捉的当儿，它们却因为互相之间挤得太紧，以至于腾不出一点儿地方来让自己有机会逃命。纵使有那么一两个胆大点儿的鸡想扑扇着翅膀做一些挣扎的努力

都没有足够的空间，于是它们全都难逃一死。我看人也不过如此。我并不太赞成“他人就是我的地狱”那种说法，可是，你得看清楚，人，确实能够非常严重地妨碍你。人之所以不能够得救，就像我刚才说的菜市场里的鸡的故事一样，源自他们之间的相互妨碍。唉，说到底，这跟我不太赞成的那个说法还是差不多嘛。

我擦完黑板在浓烈的粉笔烟雾中转过身来，把黑板擦摞在讲台上。我一边往回走，一边愤愤地瞪着卫生委员。他也瞪着我，好像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看他似的。我拿他又有什么办法？今天我有些后悔跟坐在我前面的女生如此分工。我和她，俩人今天值日。我一大早到学校就问她，“我下午扫地扫中间五组，你打扫两边的行不行？”她马上问我黑板谁来擦、谁倒灰、水谁拎。我说我擦一整天的黑板，你只要拎桶水就行。她说，“那灰谁倒？”我说，“我倒。”她这才满意。这个女生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不过我却觉得两个人扫地倒比较清静，就是自己多干点儿也无所谓。

下午刚一放学我就拎着桶去打水，因为我把上午分工说好了的事儿给忘了——水本来该她打。刚放学，厕所里人很多。我排队打水等了老半天，心想着她在教室里是不是比我干得多了，这让我很过意不去。我提着满满一桶水往教室一溜小跑，刚一进门差点儿被气死：她正站在窗户边上，手支着窗沿，像个没事人似的吹风呢。我放下水桶，狠狠地把凳子往桌子上搬，弄出很大的声响。她转过头来：“你到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半天。”——真有意思，“等了你半天。”我不想让她难堪，女生毕竟是女生啊。我说，“搬凳子吧。”随即又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客气了点儿，找补一句：各搬各的，我的中间五组不要你搬，先扫完的先回去。她走到

前面，挑挑拣拣地捏了一把扫帚回来，说，“灰不是你倒么？”我说，“对，我倒。”她说，“那你先走了怎么办？”我直起身来，“那你就快点扫呗，你扫得比我快不就行了。”她不再说什么，开始搬凳子。我看她把凳子往桌子上擦的差不多了，就给她要打扫的地方洒水。先洒水后扫地，这本来是公认的步骤，可是现在却成了我一个人特有的怪癖：本来在小学二年级的劳动课上就讲过，要先洒水后扫地，这样可以避免在扫地的时候吸入过多的灰尘影响身体健康。不过，由于学校卫生部的检查人员都养成了这样一个臭得要命的官僚脾气：他们一看见教室的地面湿湿的刚洒过水的样子，也不去仔细看一看究竟有没有把教室打扫干净，就给你打个不错的分数，于是久而久之，学校里所有的人就都养成了先扫地后洒水的习气，以挣得卫生评比的高分。这也算是一种适应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嘛。可我偏要先洒水后扫地，我可管不了什么班级荣誉，靠搞这些鸡毛蒜皮的屁事儿挣个高点的卫生分数就让我受不了，我总不能把我自己的健康给搭进去。别人不在乎，我在乎，反正我又不怕被罚再扫一次。

那女生见我在扫地前洒水，嘟哝了几句，说扫完了地来检查卫生的人看见地上干干的给打了低分，明天要是被老师罚扫她可不愿意。我理都没理她，意志坚定地拎着桶，把整个教室给洒了个遍。最后，她终于让我安静了一会儿。我这个人十分讨厌跟一大组人马一块儿扫地，那样到头来准会什么都干不成。因为人人都自认为自己干得比别人多，于是还没开始干就闹得炸人脑子，组长嚎，组员吵，人人都像发了羊角风，还不如我一个人干得利索。也不知道这些习气他们都是跟谁学来的。在我看来，事情只有一个人干才行。我扫着

地，如果林立的桌子腿儿能突然变没了，那扫起地来该多顺畅，但这样也不错。我把灰尘垃圾一古脑儿扫到前面讲台边，从后往前放凳子，倒了垃圾又回来，一看，那个女生还在磨磨蹭蹭地扫着她的地。我回到座位上，抽出书包。随她瞎捣鼓去吧，我可等不及要回家去了。

我只希望今天晚上上课前那个卫生委员别再用他那该死的口气叫我擦黑板。我恨透他这样的没有礼貌又特别爱指教人的杂种。在下午扫地之前我就把黑板给擦了，为的就是晚上上课前好堵住他的一张臭嘴，免得他对我像个乌鸦似的聒噪不休。晚上是英语练习课，短文改错强化练习。上这种课，我总觉得我所学的英文就像遭到了粗暴而残忍的肢解似的，被切割成了东一块西一块的东西。该死的语法分析把好端端的读起来很上口的一个句子弄得兴味索然。我漫不经心地把手放到鼻子上揉了揉，好像手指根上有点儿湿漉漉的，我把它拿到眼前。还没等我细看，血就从鼻子里一滴接着一滴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桌子上、卷子上滴了下来。幸好现在老师刚刚把卷子讲完，人人都在低着头做题目。我摀紧鼻子，轻手轻脚地走到老师那儿，把手伸给他看看，说，“我流鼻血了，得去洗一下。”他说，“那你去吧。”我从他旁边走出门。他在我后边追了出来，说，“哎，拍拍后脑勺！”他还做了个手势。我一时没弄明白，他说，“用凉水拍拍后脑勺，止血快一点。”我把仰着的头困难地轻轻朝他点了点。我真是被他感动死了！

3月25日

早晨下起了雨，但它没能把寒冷给勾引回来。昨天太阳

照耀了一整天，温和的感觉好像还没有褪尽。任凭淅淅沥沥的雨再怎样百般劝说，寒冷也只是畏畏缩缩地不愿跟它前来冒险了。春天真是个温和而有正义感的大家伙。

下午的雨逐渐变成了清清的雨雾。你看不见它，但是当你走在路上时，你就能感到它在亲切地靠近你，吻着你的面颊。有时候，它像一只小猫，在你熟睡时用它的毛皮蹭着你的脸，有时候，又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在抚摸着你的额头。

数学课是第一节。还有六七节课就要结束数学的高考第一轮总复习。我总是没法让自己静下心来做一做数学题，于是在数学老师评讲讲义的时候，就不得不手捧着没有写一个字的空空的数学讲义遮遮掩掩的，还不得不注意听讲——专心听讲，这可是做个好学生的底线。

讲起数学我还真有点刹不住话题：我记得高一时班上的那个数学课代表，只要他一被提问，就站在那儿，上身晃得像个风雨飘摇之中的老旗杆子，像大头鱼似的嘴巴一张一合只是动，却发不出声，梦游症患者一样。他数学好得可不同一般，我当他同桌那会儿他每次都是一百分，他还在省里拿过数学奥林匹克大赛二等奖（据说只比一等奖差一分），可你想不到他竟然连自己其实心里很明白的东西——比如说“狗屁不通”这个成语呀之类的怎么解释——都没法在老师提问时给表达出来。我甚至怀疑他会不会喊爹喊娘。还有个秘密：我发现他从来不看课外书，但他数学就是好得非同一般，咦，这可真他妈的神了！

最后一节课终于能处理一些我计划内的事了，赶快背政治！我知道在晚上九点多钟我就会面临着精力枯竭的危险，在刚翻开政治书的时候就防患于未然地深吸一口气以提提神。在每背完一页后，我都要仰起头做个深呼吸，那样子恐

怕和什么宝贝也没捞到的失望的潜水员浮出水面换气差不多。我走了神，忘了一句话里的两个词，可又懒得翻开自己的课本，就向同桌的政治书看过去。他见我正在看他的书，露出鬼也似的神情，好像我侵犯了他的私有财产似的，极不自然地用胳膊把书整个儿给围了起来。我知道他是怕我弄清楚他现在背了多少页，晚上回家恶补一通，好赶上他的进度。刚才他的表情让我想起了猴子：你盯着它看，它就马上烦躁不安，甚至野性大发。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吃吃笑了两声。他马上把半个身子侧过去，用后背一片灰不溜秋的衣服对着我，这是他最伤人的地方。他是一点儿也不在乎别人的想法的，也就是说，他不懂礼貌。除此之外他还是有一些天才的，比如说，他记性好：你不论给他一本电话号码本还是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第几百位数，他在几分钟之内就能背给你听，这个天赋在我们这个国家里确实有很大的用处，高考就用得着嘛！要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怀疑这种记忆力天赋至多只能被一个马戏团老板看中用来搞搞表演。我的记忆不行，骑驴找驴，不仅如此，还发现自从上高三起，在填写大大小小的各类表格时，甚至突然把自己的名字给忘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人调侃“我惟一没有忘记的是自己的名字”。看来我比这个还要糟糕，我难道是受了来路不明的过量辐射伤及大脑了？从高三开始我的记忆力就每况愈下，我甚至怀疑自己得了疯牛病。现在正是背书用脑子记东西的时候，我又愁又急，真恨不得在脑子里边装上个硬盘驱动器，高考在即，我心急如焚啊！

3月26日

天气真好啊！让我觉得自己又像一个快乐的小学生了。第二节课上我就打定主意要出去一下。外语课课文已经讲完了，教室里闷声不响，我难耐窗外春天的第一阵诱惑，只想着怎么样才能让老师放我出去，我兴奋得连一点多余的担心都没有了。外语老师走了过来。我合上书，轻声说道，“老师我请一下假，我得到外面买一支笔。”外语老师特别好说话，他点了点头，甚至没有想一下我这个借口是多么简单多么可笑。我高兴得几近癫狂。我的左右同桌都觉得诧异，用那种审视非我族类的眼神看着我。我可不在乎。

其实要是单单为了买一支笔，下课也行，因为有十五分钟的课间操时间，但是我担心刚一下课学校大门就要上锁，那样我要是想出去就只好到操场后面的花园里翻墙过去了。我的确在课堂上无法自持，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出去跑一跑，透透气。为了不让自己有什么负疚感，我在一整节外语课上都学得特别专心，刚才向老师请假前又看了好几遍课文，所以我认为我不会因此而拉下来一点课程。我这么干还是第一次，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在上课时出校门，这个念头就像是突然想吃糖果一样没法克制。天气太好了——可是在别人看来，这一点好像算不上什么大理由。我还想买一支笔，但这个也不是什么正当理由。我不要让我的热情减退，我一边往校园外边走，一边想：在我的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上学，背书，写题目。于是我所做的其它一切都不得不以这些个东西为正当理由了。现在我要把这个叫我紧张不安的念头给拔除。我一句接着一句地念叨着：

我得买一支笔我得买一支笔。这好像是在为我的逃课辩护。我终于意识到我不能完全做到让自己的良心安宁。我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搞的，我的良心竟然用在了不必要的鬼地方。我根本没有想到从教室里出来以后我会这么糟糕，这就像一个刑满释放的人站在监狱外面，因为害怕世界对他的排斥突然极度想回去一样荒谬。我的确从昨天起就想着要买一支圆珠笔，星期二买的那支笔写起字来难以控制走珠。我有一个习惯，只要买了一支新笔就老想着用它多写几个字，于是我就经常买笔，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克服厌学情绪。我靠着这些新笔就能连续地产生一些做做题目的微小冲动。

不过，虽然这些都是不错的逃课理由，可是哪怕我在心里把它们全都加起来，也没法跟上课的重要性相抗衡，我这么请假，简直就是要跟驻扎在我心里的一个强大的敌人兵团交火。我看了看教学楼，像个无法回头的在逃犯。我绕过花园，这样一来就可以不经过办公大楼出校门了。门卫不大可能在还没下课的时候盘问进出校门的人。一切都很安静，可我隐隐觉得有人在监视我，那不可能是班主任，他没有看见我，因为我没看见他。

出了校门，在走上人行道时又回头看了一眼，还没下课，这叫我几乎有一点儿发慌。我看了一下表，快了，还有一分钟，估计他们在教室里坐着也不能比我多看多少书。马路上很静，路面很宽阔。学校大门正对着的马路两旁，大大小小的商店起码有二十家，现在把店门打开的只有四五家。整条大街就像是一个懒汉，虽然没有什么睡意了，可还是睁着眼躺在床上。这座城市到处弥散着懒散的气息，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好像没法分清，所以看上去人人都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泄气样儿。处在这样的生活之中的人，他们本身也许并不

太累，可是我倒觉得在我来说，不要谈让我过这种生活，就是看一看都会累得要命。我感到脚上的运动鞋轻飘飘的，这叫我试一试试在马路上跑上一会儿。

“我在为买一支笔而逃课呢。”我想。我虽然不会完完全全地心安理得，可是现在我也没有太把这个放在心上。我在春天没有什么污染的温和中一路跑了起来，越来越轻快，越来越爱上活泼的阳光、拂面的暖风和我要买一支笔的念头。如果不是心里还揣着要回去上课的想法，我真的会一直跑呀跑、跑呀跑，就这么一直跑上云端呢！

下午的阳光投射在我面前的讲义上，讲义微微腾起了一阵温和的油墨味儿。有一只绿色的身体细长半透明的嫩虫儿，颤颤巍巍地用细细的脚勾住我的文具盒，它想往上爬一点，终于爬上了文具盒的盖子。它自如地撑开在温暖的阳光下闪动着的翅膀，那是一双水滴状的，看上去极度柔弱无力的翅膀。有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副小小的翅膀，却肩负着一只小昆虫的全部自由呢！肩负着自由——这真是一项叫人幸福之极的使命啊。我要是想自由，那得给自己找一个多大的翅膀才行呢？它就要飞啦。可是我因为长时间盯着它看，再加上疲劳，所以视线不由自主地突然模糊了起来，眼睛也开始呆滞了。我多么想能目送着这个春天派来的第一个小客人离开啊，于是我只好不停地眨巴眼睛不让自己错过它的起飞。小虫子在我的眼里一会儿清晰，一会儿又蒙上了一层白翳。同桌突然翻动了一下试卷。它不见了。我找了一小会儿。没有。我想它可能是被试卷的油墨味儿给吸引过来的。今天我可真是够得上模范，因为平时我只要看见桌子上有什么小昆虫，就要拿笔尖去戳一戳，我在上课时好奇心是很强的。等一下——我伏身向课桌：我又看到了它。它正在讲义

的页角，一只翅膀抵着纸面，另一只翅膀服服帖帖地贴着身子，全身在像推磨似的转个不停呢。它在干什么？搞不明白。也许是在跳它那含义深刻的土著舞蹈吧。过了一会儿，它觉得自己的舞跳得差不多了，就停了下来，收拾好那扇充当支点的翅膀，用后腿把双翅往上托一托齐，开始向前跑了起来，像要赶紧去完成另一件重要任务似的。我对它的认真感到好笑。这只小虫子真是有意思。一个小顽固。行了，随它去吧，我还得做讲义，马上要上交了。

今天是星期六，我不急着马上回家。我沿着护城河骑着车，又把车搬到河边上，看了一会儿刚发芽的垂柳。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甚至怀疑自己能看得见柳树枝条上的嫩芽儿生长的细微动静。我看着河水，河水不太干净，现出深绿的粘稠的颜色，水面上浮着一股糜烂的气味。我过了半小时就上了马路。在走之前，我探头向河的栏杆外面看了看，垂柳很长的枝条，在风中悠然地摆动，要是再长一些，就会碰到河水了。我飞快地穿过这条河边的窄马路。垂柳真是很多，春天的气息还藏在刚刚发芽的柳枝中，没有完全散发出来呢。前面不远处有一只蝴蝶，白色的，有着漂亮的黄色斑点。我马上骑上车，要去追赶它。我伸出手，想捉住它。它撞上了我的胳膊，飞跑了。哈哈，我一定是吓坏了它。有一阵微风，在我转过头看着河面时，拂过了我，捎来了春天风和日丽下的浸润的农田气息，平原的气息。油菜花，它们开得是那么叫人惊讶，你平时注意不到，可是当你向田野看去，突然间就会发现，遍布整个平原的清新的嫩黄的油菜花，会叫你大开眼界呢。再给我一阵清新的春风吧！我带着感恩的心情，一次又一次深深地呼吸着。

3月27日

昨晚背书拖了好久，一直到十一点半，上了床大脑还在轰轰地转个不停，现在我整个儿都要垮了，连呼吸都没法保持自然均匀。我呼哧呼哧地喘息着，一片芒草般的混乱直向我刺过来：数列、数列、提供的信息理解正确的一项、突厥、淋巴、九月三日、春天、春天、春天——我提心吊胆地打着盹儿，在眼皮开启的只有那么一度的缝隙里仿佛看见了绿色的什么东西。我顿时让自己从狂躁中退了出来。我把眼睛睁开，难道我刚才迷迷糊糊地看到的绿色，只不过是教室里青灰色的水泥地面吗？我侧过身子，地面不过是灰灰的。我想了一下，投眼向外面看去，太阳光经过对面教学楼窗户的反射，看上去像是从西面升起了似的。我想打开窗，心里顿了一下，还是不要打开的好。湛蓝的天空就像刚刚染过颜料还没有被风干一样。我收回目光，可是那一片蓝色在我的心里总是挥之不去。我又看了一眼，真是很有意思呢。“你看看那边。”我对左边的同桌轻声说道。他先是疑心重重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才把头转向窗外。他把上身东摇西晃，脑袋像个木瓜，雷达兵似的要从天上找到飞机导弹之类的异物。我拍了拍他，“行了行了，不要太夸张，我只是想让你看一看那儿有一块云彩，就在天边，白得像块棉花糖，挺有意思的。”他恼怒地瞪了我一眼，骂骂咧咧的，好像觉得被我作弄了似的，可我一点儿作弄他的意思都没有。

4月2日

刚上完第二节课我就跑出教室去喝水，到了开水供应处

那儿还一个人都没有呢。只是照看水房的人变了，也许是那个老头儿的儿子。据说他大学刚毕业，正在找工作。我问他，哪个水箱里是凉的？他说，都是热的。我试了第一个水箱，凉的。今天我运气不错，有时你要是不开口问，得把三个水箱——试过才能找到凉水。我猛灌一通，又来了一杯。这时挤来挤去的人已经把这儿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喝完了，还没来得及把杯子放到桌子上就被人一把夺了过去。我看了看学校大门，那儿有一盏水银灯，但不是很亮，不过你要是想在放学前从那儿溜出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回到班里，坐在位子上闭目养神，教室里太嘈杂，我只好把头埋到胳膊中去。我的眼睛还没有闭上两分钟，后面那个家伙就要向我表示友好，他把手搭在我的后背上，还不停地拍呀拍的。我虎着脸，转过头去：“把爪子从我身上拿开。你没看到我在睡觉？”考虑到他个头体重都比我有优势，我缓和下来，补上一句，“我今天生病了，不要惹我。”可是我没有办法叫右边的那两个家伙不要再讲废话，他们正在直着嗓门扯着“蛇有没有那玩意儿”，其中一个老是说他亲眼看过，另一个则一直在大摇其头，可他们前面就坐着一个女生。我的书被我弄落到地上，我弯下腰去捡，刚一抬起头右边这位就问我：你知道“去势”是什么意思？我瞟了一眼在他身后居心叵测地奸笑着的人，那家伙的老爸在市里大小算个什么官，要不然班主任怎么会像对待干儿子似的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还把他插到前面这儿坐。不管他每次考试排名倒数第几，反正第三排正中间的这个位子总是他的。看来只要他老爸在市里的位子能保得住，他在班里的位子就能保得住。我估计他正在对这个向我提问的笨蛋使坏，我说，“你难道就不能问水平高一点儿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一时半时讲

不清楚，你拿一把刀来，我在你身上示范一下你就明白了。”这回他才有点儿开窍，于是转过头去找他那个朋友算帐去了。

班主任下午第二节课下课后宣布这次全市大联考的“考试程序”。还有一个通知：明天不上课。其实我们早就知道明天不上课，反正在学校里关于放假的正式通知永远也不会比小道消息传得更快。放假的原因是明天上午大部分高三老师都要去参加一个高考前的教学研讨会，当然体育老师之类的就不用去凑热闹了，还是在家里歇着吧。我所希望的是，他们不要因为开了这场研讨会，而造出个新型紧箍咒让我们活不下去。算起来还差三个月我就要与学校没什么关系了——当然这是比较乐观的想法。不过，多多少少我还是对这个学校有那么一点点感情的，比如说，我就觉得我跟屁股底下的吱吱咯咯作响的老板凳的关系就不同一般。我心里也不希望自己那么无情无义，三个月后把我的高中生活就这样一脚踹飞，只不过是去看学校方面在这最后三个月里是否愿意给我们留一条活路了，大家好聚好散，免得不少人高考考完了还要屁颠颠地跑回来搞一搞恐怖活动，比如砸窗户呀什么的。

老师在讲台上站定，他抽出口袋里的工作笔记开始布置这几天的任务：“明天虽然放假，但是不能不学习，更不能玩，一定要抓紧时间做好迎考复习工作，不管你在家里也好，住校也好，或者你到教室里自习，都要先制定一个复习计划。今天晚上的课照样上，不要以为明天不上课今天晚上就可以不来了，晚上我要检查，不准有旷课现象。这次考试安排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我把考场秩序和考试时间贴在黑板这里，下课来看一下。现在宣读一下考场和座位排序，排序

是按照上次月考成绩排的……这二十个人在第一考场，就是后面实验室旁边那栋楼，知道吗？电脑教室旁边……这最后二十个，在本班教室，我监考。还有一件事要强调一下，划答题卡不要划错了，我们班的准考证号码是以990302XX打头，最后两位数就是你上一次在全市大联考的排名，要是有什么不知道的或者忘了的下课到我这里来问一下。好了，想去厕所的赶快去，下节课上课不要迟到。”

我去了一趟厕所，又在外边转悠了一会儿，进了教室坐下来。前面有个女生用一种榨乳小儿的腔调奶声奶气地向我借一支黑色钢笔。我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说，现在我还真的没有。我最怕那么大的用这种叫人肉麻的口气说话。后面那个家伙正在有气无力地呻吟着，像个垂死的人似的把胳膊直挺挺地伸到前面来。他侧着半边头，贴在桌子上，胳膊探得老长，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那只伸到前面来的爪子，总是挠呀挠的，逮着什么挠什么，像一截没有意识的断臂，闹得我心烦。我随手捞了一支破笔插到他那一刻也不老实的手中，他像一只猴子似的突然坐了起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中的笔，把它给扔了。我翻开语文讲义，准备把这节自习课所有时间都耗在这张破试卷上。

晚上下起了小雨，外面很黑。头两节课外语测验，完了之后我出了教室。我在晚自习下课后只是偶尔出来一次，只要不是室内的空气太叫人憋闷，我是不愿意跑到外面像个傻子似的站着的。今天我想去一趟操场，我还从来没有在晚上到操场上去过呢。通往操场的小门没有上锁，我走了进去。雨已经不再下了，可是空气中还饱含着浓浓的雨意。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不得不老是移动目光，好让自己把操场看得清楚一点。好像没有什么人。我想走上那个升旗平台，在往上面走的时候踏空了

一节梯子，打了个趔趄，就在我惊魂不定的时候下面有人叫我的名字，为了把他看清，只好走下来，是NJ。他给了我一拳，我发觉他在笑着。不论你什么时候碰见他，他都在笑。他叫我过去跟他们哥儿几个玩一会儿。我这才注意到前面老远的地方有两点红光一闪一闪的，那帮人抽着烟。他们只不过是成绩不好，人都还不错的。我要是有下辈子，也许愿意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我说，你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你要是愿意，我们就在这儿随便聊聊吧。那边开始传过来零星的掌声和吆喝叫NJ过去，我说，咱们抽空再聊，你去吧。NJ跑了回去，我也回头往操场大门走去，当个好学生真是太累太累了。教学楼上灯光明亮，老远就传来有人在教室里敲桌子的声音。我回过头，看了看，NJ他们不见了。被黑暗填满但又显得空荡荡的操场上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躺在床上，被小雨浸透的头发还是湿的。我想马上闭上眼睛休息一小会儿，然后再起来背书；可是我的眼皮像钳子似的，把眼睛紧紧地卡住；深呼吸，深呼吸——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法使自己完全放松下来。我的睡眠被一道紧张而焦虑的堤坝给阻断啦。考试，后天的综合考试又要来了。

4月5日

终于考完了，我像是被吸血鬼吸完了血，从它的巢穴里毫不留情地抛出来的一具躯壳，一点儿知觉都没有了。妈妈问我晚上上学前想吃点什么。想吃点什么——在很久以前，要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也许还回答得出来：饺子啊，菠萝啊，现在，我甚至迷迷糊糊得连自己想吃什么都不知道

了，难道我就是这样，昏头昏脑地没有什么需要，没有一点感受了么？我只想好好地睡上一觉，可是我要趁着上晚学前还剩下一点儿时间马上洗个澡。洗完了澡，我把单被裹在身上，打开电视机，心不在焉地一个一个换着台，就这么害怕又担心地苦捱到了上学时间。

一个清洁工正在有气无力地扫着人行道。干燥而闷热的气压凝固在城市的上空，仿佛是一种不祥之兆。我要自己尽量不去想上午刚刚结束的大联考的事情。我并没有认定我这次考得很差，可是总有一种使我心中很悬的感觉，在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教室里来的人还很少，我早早到学校，就是为了能让自己在人群中把这种悬而未决的令人恐惧的折磨减轻一点。从今天开始，学校改了作息时间，晚上九点四十放学。反正总课时不会有所减少，好像是把把你从一个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事实上你的处境其实一点变化也没有。教室里地面上到处都是考试后随手乱丢的草稿纸，没人扫。教室里比外面还要燥热。前面的女生正在看一本课外书，是一本娱乐杂志，全彩印刷的那种，版式和内容全都花里胡哨的，远远看去像一堆破布头。在这个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的时代，各种文化媒介也只能靠炒一炒花边新闻小道消息来吸引注意力和由注意力带来的商业机会了。像这些明星啊之类的，是容不得你去近观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靠踩在众人的肩膀上大红大紫，于是，当你想到要走开一点儿，仔细地看清楚他的真实嘴脸时，他势必会站不稳当，从你的肩膀上一个倒栽葱摔下来跌个鼻青脸肿。

“宇宙感悟”、“主体精神”、“文化人格”、“封闭式的道德完美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老天，这不是明摆着在耍花腔吗？有一句混帐话我一连看了十遍还没搞清到

底是他妈的什么意思：“我们是宁愿去体验当它业已明白自己承受自己的命运。”——看得让我肠子都打成了死结。这句鬼话简直就是用密码写成的。管他三七二十一，胡乱选一个答案算了。大联考刚刚考完晚上就又来了一次语文测验，我真是再也没兴趣活了。我感到鼻子里有一股铁锈的味道，明白自己又要流鼻血。我一边用手纸轻轻擦拭着从鼻孔中渗出来的一点血，一边在试卷上随随便便地划着答案，划完了，我开始专心对付流血的鼻子。老师下课收卷纸，我叫同桌给我把试卷顺便带上讲台交一下，可他不敢，因为他抄了我的不少答案，害怕两张试卷放在一起老师看出来抄袭，于是我只好自己上去交。这次小测验的试卷谁都没有心思做，有好几个人甚至连名字都忘了往试卷上写，走上讲台后又慌里慌张地折下去随便从哪个人手里拽一支笔把名字补上去。

作为一个高三学生，好像他的一生只有三天，7月的三天。高考完了，他就一点儿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了。

4月7日

下了第二节课，我拿出一本小说跑到花园的亭子里，准备看上十来分钟。校团委书记正在喇叭里劲头十足地号召同学们快到操场集合，说是有个重要事情要在做操前通知一下。他这人在学校出镜率特别高，看上去好像从来都不知道累似的。他老在胳肢窝里夹着个薄薄的钢板一样的公文包，脖子硬梆梆的，头上几撮像刚刚被狗舔过的毛总是湿淋淋的让人看了恶心。他每天都像要去会晤各国政要一般，目中无人地从学校这头蹿到那头，又从那头蹿到这头，看上去他准

是全校第一大忙人。他拍起马屁来露骨得让人胆战心惊，他总是在学校的任何大小会议上拎着个破话筒，吱吱歪歪地先讲上两句：“下面是X校长为我们发表讲话，大家热烈欢迎！”“我先介绍一下，Y主任是本市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在数学教学上有独到的见解，希望大家注意听Y主任讲话。”“为了落实N精神，市团委Z副书记莅临我校，为学生会干部指导工作，希望Z书记的这场报告能使学生干部们在工作上有所收获，让我们鼓掌欢迎！”可笑的是，那些被他拍马的XYZ之类的头头脑脑们还真吃他这一套，接过这个马屁大王手里的话筒还对他煞有介事地点点头才开始讲话。

他现在是广播里宣布的是，下午学校有个重要活动，上课时间比平时提前一个小时，一点钟上课。可他没说明是什么活动，只是说上完第三节课要搬着板凳到学校大礼堂集合。反正不管是什么活动都不会有高三分的份儿，当然全校大扫除之类的除外。只不过由于考虑到和其他年级上课时间一致，高三分的学生也要下午一点来上课，这样一来我又没法在中午休息了。我要是一个星期只有那么一天中午没睡上一刻钟，那我肯定在整整一个星期里都没法补上这个睡眠债。一点钟上课，老天，那个时候我吃下去的午饭还没开始消化，就得慌得像个野兔子似的骑着车子往学校赶。拜托学校这帮以慈悲为怀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在制定什么通知的时候发扬一点点人道主义精神，考虑考虑我们这些可怜的小生命好不好？

历史老师今天挺有意思，我有好多天没看见他上课如此精力充沛了。他用两根手指头捏着粉笔，眉飞色舞地讲着课，他要是再戴上一顶礼帽简直就跟一个魔术师差不多。像政治历史这些本来就没什么讲头乏味得要死的课程，老师的情绪特别能影响到我。高一有一段时间，政治老师的可怜

老丈母娘死了，而他又不懂节哀顺变，于是那会儿一上他的政治课我就觉得自己像一堆土一样被人夯来夯去的，那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你躲都没法躲。

中午回到家里，妈妈正在我屋里给我整理柜子里的衣物。她问我，你要不要衬衫，明天叫你爸给你买两件？我说我不要。自从我长大到能随意决定自己穿什么不穿什么那会儿起，我就没穿过衬衫。我一看到衬衫硬领就难受极了，我从来都不愿意穿硬领的衣服，好像是枷锁，让人动弹不得。我对妈妈说，你出去吧，我自己来整理。可是我明明知道我在刚放学到家的时候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去整理衣服。唉，我四仰八叉地躺在衣物散乱的床上，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就这么召集学生们下午早早到校开一场劳动动员大会，散会后马上冒雨到大街上去擦马路栏杆，未免太无耻了一点，可这也是义务劳动啊，也是学雷锋啊，但是为什么偏偏在大雨哗哗下的时候让人劳动，难道是特意要考验我们——不是“我们”，是他们，那些高三以外的学生。我们快要高考了，就连学校也体贴我们，不让我们出去瞎忙，高三的人都好好留在教室里努力复习准备迎考吧。根据我后面那一排的一个女生说（她妈是本校初中的班主任），明天省卫生部门要来市里检查卫生。我的天，我要是没有记错，上个月我们学校才因为市里来人检查卫生搞了好几天的大扫除，现在省里又来人到市里检查卫生，难道他们就不能凑成一伙一块儿来吗？

那个校团委书记从教室窗户外面走过去。这次他手里的臭名昭著的公文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水杯——下那么大的雨还带着杯子，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儿。恕我孤陋寡

闻，他手里的那个水杯是我迄今所见过的最具现代精神的一种款式：看上去极小，小得连一泡尿都装不下。这帮无事忙，总是走到哪儿都要拎着个水杯，好像时刻准备着喝口水以免被突然渴死似的，而且他们的水杯花样不断翻新，今天是太空杯，明天是磁化的，后天再来一个子弹头式的，简直就像在搞军备竞赛。也许办公室的人也寂寞也闲得慌，在随身装备上动动脑子也不失为一种消遣方法。他另一只手撑着折叠雨伞，雄纠纠地往人最多的地方走去，看来他又要靠发号施令来过瘾了。像他这种人，只有在一群笨蛋当中才能显示自己的价值。也许呆会儿就在学生们冒雨擦栏杆的当儿，他的手机又响了，他回答道：“好的好的，今天晚上，P大酒店，六点半，好的好的。”——我这么猜测总不会一点点依据都没有，因为我在晚上偶尔第三节课逃课经过P大酒店的时候，经常看见这样的场面：几个从外貌上根本分辨不出谁是谁（一样的大衣，一样的公文包，一样的水杯，就连头顶上的几撮毛都是一样的）酒足饭饱后，在P酒店门口握握手，握握手，再握握手，抬抬手，抬抬手，再抬抬手，哈哈，哈哈，再哈哈，然后作鸟兽散，好像相互之间在大餐一顿后离开之前还真有那么一点儿恋恋不舍似的。

我没带雨衣，刚才坐在教室里以为雨下得不小，出来了才知道不过是稀疏的中雨。为了不让书包里的东西被雨淋湿，我把书包带子调整好，双肩背上。有好几次书包里的书被雨淋了，我回家后就打开煤气灶用火烤，或者用电吹风吹、熨斗熨。有一回我用熨斗时把桌面上的玻璃板给烫炸了，爸爸进来看了看，见我在熨书，他认为为了把这本数学书熨干而弄烂一块玻璃也还值得，就没有怎么说我，只是要我小心别划了手，我倒是跟自己过不去，为这一大块玻璃心

疼了好一阵子。

中午我没有睡觉，现在头脑发胀，全身像是发了酵似的又酸又累。雨不再下了，河边的柳树林长长的枝条被东风轻柔地梳理着，绿油油的麦苗好像获得了新生，整个田野，远远望去像是一幅还没有晾干的出色的水彩画。联考考完了，我也该放松一阵子，要不然一直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总有一天我会断气。全市统一大联考的考试通知还没下达的那会儿，学校原先是计划要搞一套湖北的试卷来做做的，现在那套湖北的试卷到了，就当成普通测验试卷发下来让我们做。就在等着那套试卷运来准备来一次月考的那几天，真是倍受煎熬，因为试卷总是迟迟不到，而我们又不得不为了备考像冒烟的机器一般拼着老命一刻也不敢停下来地复习复习复习。我在那几天里，上着课都在幻想着运试卷的卡车在半路翻了车，或者遭了劫匪。不过好像没有哪个劫匪对试卷这种东西感兴趣，在他们眼里，试卷不过是一捆一捆的废纸，可是在我们看来，那就是镣铐、判决书、或者是死亡证明。幸好这次大联考把我从提心吊胆的等待中解救了出来，这么说我还要感谢联考呢。

晚上进教室的时候，外语老师正在跟我右边的同桌讲着话，老师叫他“好好干，争取在高考前把外语补上去。”他不说什么，只是用笑脸迎和着老师，不过笑得不大自然，很艰苦的样子，好像是费力地从牙膏皮中往外挤着所剩无几的一丁点儿牙膏似的。现在开始发外语联考试卷。我下午已经知道了总分，在班主任那儿有打印成章的这次大联考的成绩报告单，我因为受不了那种在公布排名的最后关头恶心难忍的翻江倒海的感觉，就让GR帮我看一下，在我傍晚回家时他打电话告诉我，我的总分在全市排到四十一名，班里的名次

班主任还没有统计出来。这样一来我就不太担心单科分数了。我能接受的底线是全市第五十名，想来爸爸对我的这个名次也不会不满意吧。

4月9日

评卷人给我的作文下的评语实在好笑：“该内容稍嫌消极，应端正部分看法。”不过这次联考我的语文分数还不错，一百分制我得了八十一分。第一名九十五分。不是我狐狸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我认为谁要是用这种试卷考出个第一名，至多也只能说他的脑袋瓜子确实实变异得可以了。试题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就连语文老师手里捧着标准答案，在课堂上评讲的时候都不能自圆其说，我也懒得听他说。看他把答案解释得口干舌燥的苦命样子，就像一个身高两米的人极力要用一张半米长的毯子把自己全部裹起来，结果只能顾头不顾腩或者顾腩不顾头似的。我们这些手里没有标准答案的学生，要想把试题做得跟那些出卷纸的人想要得到的答案丝丝入扣，那就更是难上加难。

早上我起得早，拿起政治书到阳台上去背。昨晚下了一场雨，鸟儿在刚发芽的树林中啾鸣，楼下的湿地上爬着一些蚯蚓，我面前的阳台也是湿漉漉的，泛出一点绿色，好像是薄薄的一片苔藓。一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肥硕的大红公鸡仰起脖子叫了几声，然后一跳跳进花园里。一阵阵轻疾的风掠过河面，碧波微澜，像一位大师在用一双饱含感情的巧手弹着钢琴。突然间，眼前的这一切，跟我童年时代对春天的一个印象完全重合了起来。一种似曾相识的喜悦在我的心中被唤醒，进而令人心怡地舒展开来。我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在这

种状态下背什么书的，于是没多耽搁，马上下了阳台。

上学路上，雨后的雾气还很浓，我骑着车，眼镜片上结了一层水汽，但是我没有擦掉它，我觉得挺好玩的。到了学校，就出了下面这档子事儿：

我把书包里的书一本一本往外掏，这时班长从座位上站起来，宣布：学校要求大家在毕业前集体捐一笔款，名义是毕业生向学校最后一次献爱心。每个人至少交二十元，多交不限。真是有意思，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献爱心还有这样明目张胆向别人主动提出要求的呢，这可不能叫做献爱心，这叫把手直接伸到别人胸膛里掏心。钱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学校这样露骨地向学生索要爱心，是不是太无耻了点儿？还有模有样地印上一打通知，叫各毕业班班长在班里宣读，然后再把它贴在墙上。就为这事儿，上课前班里一直闹哄哄的，一直到语文老师来发联考试卷。

我向来爱在语文课上走神，窗户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往外看。现在，我坐在教室里，甚至没有看着窗外，马上就感到天气在一刹那间凉了下來，原来天又阴了。我就这么干着急地等呀等，一直等到西风开始吹跑了乌云，像赶一群绵羊似的把它们赶到了东边聚拢起来。旗子在操场上空哗啦啦地摆动，晴空蔚蓝。离我最近的窗户被西风挑开了，风洋溢着它的欢乐冲进教室里来。我左边的同桌赶紧举起手来护住头发，他怕头发被风吹乱，另外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嚷嚷起来，于是窗子又被关上了。我最爱关心和上课无关的事情，尤其在上课的时候。看到小鸟的啾鸣、小狗奔跑，就会不由自主地重新拣起我那丢开已久的生活，再次鼓起兴趣。我是那么容易地被生活中的小小的闪光之处所吸引。

傍晚回到家里，爸爸正在看报纸，他看起报纸来速度慢

得出奇，我总觉得他好像把报上的每一个栏目都要看一遍。他尤其喜欢看那些跟贪污腐败有关的报道，看完了就会发火，老在饭桌上讲这些事儿。我顺手捡起一张报纸，国际版，南斯拉夫和北约那档子事儿。我用不着劳神去管两帮军队火拼谁胜谁负谁是谁非，讲到底只要一牵扯上杀人放火，在我看来就跟黑吃黑没什么本质区别，干脆都死光拉倒，省得电视报纸老报道，吵得人心烦。要是这条新闻跟政治高考有关，老师在上课时总会抄一点东西叫我们背一背，这就足够了。为了高考，政治不能不关心一点啊。我注意到报纸上有一个关于这场战争的平民死亡人数统计表，呃，这就另当别论了。看来不管是什么战争，都少不了要拿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当沙袋，反正倒霉的到头来还是普通人。

我把车推上马路，上学前刚刚洗了脸，现在它绷得紧紧的，不肯放松，让我觉得生硬难忍。几只蝙蝠在我的头顶上飞舞，个个都像拿不定主意要往哪儿飞似的。天空中的光线已经散去，它那无所事事的样子十分可爱。有一片浮云，在苍穹的压力下不情愿地向这边游过来，一副舒缓无力的懒惰相。有个脸庞黑黑的小男孩在前面跑着，后面远远地跟着一只跑得东倒西歪的白色小狗，圆滚滚的，一定是刚出生没多久。它想奋力追上小主人，只是力不从心，老栽跟斗。我想着今天晚上该干点儿什么，数学要发试卷，就是上次大联考的试卷。一想到数学考得不咋样我就发慌。这会儿，我心里一发慌，好像连眼球也跟着震颤起来。唉，我不该在上学的路上想这个事情，干吗把上学路上的十几分钟也给白搭进恐惧中去呢？

我的数学考了七十八分。我表面上作出一副早就知道会

有这么个结局的样子给别人看，可是心里还是不相信我竟然考这么低。怎么可能：我考完试对着正确答案给自己估了八回分，每次都是刚够及格，九十分，这到底是怎么搞的。我马上浏览一下试卷，明白了。凡是那些我自以为做对了一半的题目，全都是一分没给我，真可怕，因为以我的水平，几乎每道数学题至多只能做对一半，讲成诌对一半也未尝不可，好了，这下我拿到试卷之后起码在心里就不用慌了。我彻底完蛋了，反倒不用再害怕什么，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彻底完蛋的那会儿，整个儿人简直都快在疑神疑鬼中发狂了。现在我只要考虑着编一个说法，回家后，等着爸爸问我数学考了多少分的关头拿出来回答他，他要是不问，我决计不先提这个事儿，不过，爸爸就要关心我数学考多少分，每次都是这样，这可麻烦了，我到底要不要先告诉他呢？还是不要先说吧，捱过一阵子也好，反正这次我的总名次还不算差，实在不行了我可以拿总名次挡一挡。

我考得差，心里那么难过，数学老师却一点儿都感觉不到，他平静地讲他的试卷，我做我的习题。一个班里有多少个人，发了试卷后就会有多少种想法，每个人都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课堂里暂时安静了下来。唉，又是老故事，我就是知道了老师说的正确答案都没办法搞清这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离高考还有三个月。我到现在还在幻想着在这三个月里一定能努力把数学补上去，只要到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昏得失去理智，准不会有我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可是，要是不这么想一想，我连一天都撑不下去，还是把事情想开点儿吧。遇事想开点儿，再想开点儿——人就是这样缝缝补补活下去的。

4月10日

我在星期六起床一般都很迟，因为马上要到星期天，这样我就不由自主地把星期六当成是半个假日了，虽然星期六一样照常上课。要是在星期天，我就会在床上躺着看书，一直躺到连自己也觉得有点儿过分的时候，才穿好衣服下床来。明天就是星期天了。刷牙的时候我把窗户打开，雾霭重重，我看见有小鸟在树林中飞，我希望它们不要总是叫出声来，要不然就会把住在后面的那两个爱用气枪打鸟的家伙给招来。那俩人是兄弟，一直无业，打鸟狂人，去年冬天他们甚至把一对大喜鹊给打了下来。那是我在这儿第一次看到的喜鹊，严格来讲这里不是北方，冬季很不容易看到这种大鸟。就在那对喜鹊叫了第一声不到十分钟，那两个混蛋就拎着气枪兴冲冲地跑到树林子里，把鸟儿给打了下来，那片树林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去过，我喜欢在初夏的早晨到那里散步，阳光在树叶中间跳跃着，甚至会有露珠从树上滴落到你的脖颈里，真是叫人心里痒痒的呢。

我在上学路上有点儿担心昨晚我没请假就逃课回家的事儿。进了班，没等我提起这事，我右边那位就殷勤地向我嚎丧：“唉呦你死定了！”我可没指望能从他嘴里听到什么好话，只要他一开口，不是令你泄气就是让你慌乱。经他这么一惊一乍地叫唤，我心里确实六神无主。我问，“怎么了，昨天晚上班主任来巡视了吗？”他利索地抛出这么一句：“我不知道。”然后就没事人似的看他的外语书，那样儿简直把我给急死了。

祸事成双，好戏还在后头：我拿着历史课本，刚想趁着上课前还有最后几分钟，把最后几行昨天上的历史课背下

来，前面那个一刻不停地和同桌讲话的女生转过头来，一把夺过我的历史书，一双眼睛野心勃勃地盯着她的同桌，露出一副凶相，说，你看我敢不敢撕！这儿一片的人都知道，她跟她那个同桌闲来无事总是喜欢做一点出格的事儿调剂胃口。这女生逞强好胜，她的男同桌也不是什么好角色，两人坐在一块儿，虽然碰出了爱情火花，可是两人中谁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他们之间的火花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于是，他俩就成了这儿一片的扰民双人组。我说，“怎么啦，你们玩也不要玩到我头上来，把书还我。”我伸出手要去拿回书来。那女生把书猛地一抖，像个刺猬似的。真是岂有此理——她不让我取回我的书，而且连正眼也不给我一个，虎视眈眈地紧盯着她的同桌，好像一只蟒蛇盯着一只猴子啊什么的，她那个好样儿的同桌也紧紧地盯着她。这种蠢事让我恼火得厉害，我叫了起来：“我告诉你不要撕我的书，你以为你撕了别人的书就能让人以为你多么有魄力吗？把书给我。”我终于把她的脸给撕破了。我刚把话说完， she 就把目光转过来紧盯着我。我向来不喜欢和别人对视，尤其是女孩子，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止不住要笑出来，但是这一次我把握住了自己，事实上我盯着她根本就没想到要笑。我也狠狠地盯着她的眼睛。周围并没有几个人有心要看我跟她之间的僵持，他们知道我不幸撞到枪口上去了，都在专心地背书，不想插进来。僵持也不过三五秒钟，突然，她开始撕我的历史书，我迅速站起来去夺，她好像也想找个台阶下，一动不动地等着我把书抢过来。她把我历史书的封面给撕掉了一半，我强忍着火气没有直接跟她大吵一通，只是低着头看着手里的书，想让我的安静使她受到一点震动。可是，当我抬起头来看她时，她早已转了过去，用手重重拍了一下桌面，再举

起一根手指头，指点着她那个正在一边讪笑个不停的同桌，起劲又刻毒地骂着，好像刚才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他们俩人之间的事儿，容不得其他人插嘴似的。我真想呵斥她几句，但是我没那么厚的脸皮插话，只好翻出一卷透明胶带，把被撕烂的历史书封面给粘起来。该死！

我恼火地看着教室外面，理科三班的班主任骑着车，带着他的那个长着一双和他一模一样的暴眼睛的乖儿子。儿子坐在车子后面，紧紧地握着一根棒棒糖之类的玩意儿在起劲地吮着，吮得腮帮子唧唧响。三班班主任推着车走到窗边，探头往教室里面看了看，又缩回脑袋，开口问一个坐在窗边的人：“你们班主任来了吗？”这时坐靠窗的人都放下了手里的活计，等着他说点儿什么要紧事。“班长，你们班班长在哪里，过来一下。”班长俯首帖耳地从座位中挤了出来，看上去神色紧张。“你们班主任来了告诉他一声，预选报名费上交时间提前了，截止到今天下午，交齐了马上送到我这里来。”说完他就走了。有人在教室里小声朝他喊，哎，进来坐一会儿，喝一口水再走！

“预选费？怎么没听说要交。”后面有人说。班主任进来了，还没来得及回座位的班长诚惶诚恐地往讲台上跑，跟班主任交头接耳了好一阵子。班长这人其实不错，只是最让我讨厌的就是身居班长之位所扮演的那种上传下达的角色，走狗似的，简直让人恶心死了。班主任说，“对了，通知一下，关于预选报名费的事情。”我想着要不是班长太过于勤快而导致全班的人预选都报不上名那该多么有意思，预选通不过，高考也就没法考了，那该多好！

第四节课，班主任叫班里这次大联考的前二十名学生到后面学校主会议室去开个会。根据经验，文科班里的前二十

名，一般都是一些有很大把握在高考中发挥出不让母校失望、给班主任脸上增光的水平优秀的高才生。“快点，还磨蹭什么！”班主任在门口催道。班长第一个站起来，接着是学习委员，还有几个人慢吞吞地收拾桌子上的书本，我也别别扭扭地跟着几个人往外面走。我一点儿都不想去，这肯定又是一场高考动员大会，而且，在班里作为那一小撮被老师特殊对待的二十个中的一个，我感到非常不自在。有些人出了教室之后在校园里往会议室就是一通跑，我跟着他们，要是到了会议室却找不到空座位坐下来，那的确是太显眼了。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远离门口的最后两排还有空座位。坐在这里的人都是高三应届班的，理科生居多。讲台前面也坐着不少人，当然都是在学校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四班的班主任本来态度比较谦卑，他不到台上就坐，刚一进会议室就径直走到第一排听众席上，把一个可能是他们班的学生给撵走，坐了下来。二班的班主任赶紧从上面跳下来，执意要把他请上主席台，看他俩那你推我就的样子真是没多大意思。我只希望这场大会不要尽是讲一些废话大话，什么什么“好好干，努力，努力，你们要在最后关头加最后一把油，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母校，对得起老师，对得起自己”——我不想听这些。谁要是水平，我就请他告诉我，我现在所不知道的和我真正想要知道的，而不是这些老掉牙的说教，让人听了起腻。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的教导主任手握着话筒站起来，开始主持大会。我最讨厌看到别人戴那种茶色眼镜，总是给我一种不太诚实的感觉。他的嗓音听上去黏性很大，说起话来好像有一只冰凉的虫子爬在你的后颈窝里似的。他那张脸，看上去就像新鲜鱼类的粉红色的肉。我要是想中途溜掉很容易，在坐下的那会儿我就注意到会议室的后门开着，

也许是一时疏忽，但这的确是个大错误。要知道，如果会场里有下水道入口，至少有一半的人情愿半途钻进去都不愿等着大会结束，何况今天会场的后门洞开，真是好机会。我只要转过身轻手轻脚地出去，就不会引起注意，可我担心坐在讲台上的班主任觉察到我在逃离全场，会后他可能找我麻烦。已经有几个最后到场找不着座位的人蹑手蹑脚地从后门出去了，还有一大半的人趴在桌子上做习题，要不就在背着带进来的课本，只有少数几个彻头彻尾的笨蛋，木然地看着前方主席台，不知道自己该干点儿什么。

我开始注意我的班主任，目的是我在呆会儿从后门溜走的时候他不要注意到我。他开始喝水，就在喝水的时候他的眼珠子也盯着下面的某一个地方看，眼皮连眨都不眨一下。他好像在往这里看，还好像在看我。老天，我这么疑神疑鬼肯定没胆量逃走。就在他把杯子放到桌面上的一刹那，我确定他把目光收了回去，于是我猫着腰下了座位，一眨眼的工夫就出了会议室后门。

风是这么强，天上的云被吓得四散而逃，一会儿就没了影儿。天边将要落下去的太阳仿佛再也没有一点儿力气来劝一劝正在耍着小孩脾气的北风，现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田野里，小麦绿油油的细长叶子，被风刮得像丝绸一样泛着柔和的光泽。风很大，但是慑于春天的正义，它还不敢狂妄地飞沙走石。

4月16日

我总是做恶梦，醒来后，恶梦停留在记忆中的时间总是

比一般的梦更长一些，对情绪影响也更久更深一些。

又是一个阴天，这使我的头脑越发晕得厉害。说来你也许不相信，自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头脑就这么一直晕晕乎乎的，好像永远都是睡眠不足似的，不管再怎么睡都没法恢复过来。我在五年级那会儿，学校要求每天早晨六点整到校上课，当时我大概十二岁。考初中刚考完我就大睡了三天，醒来后，发现我这晕晕乎乎的头脑再也不能恢复到以前那样纯净的状态了。可是奇怪得很，就我这样的浆糊脑袋，还偏偏对周围的一些细小的东西特别在意，有时候同桌的一个眼色一个动作就能叫我发狂，大概做学生的都有些神经过敏，不过，像我这样一天晕到晚的人好像不多。我晕，可我不愚钝，这一点我倒是有把握。

今天要照证件照，是那种黑白的半身像，把你照得像个强奸犯似的那种照片。班主任早就叮嘱我们要穿得正式一点，以便高考提档的人看了你的照片至少对你有个好印象。我想他指的“穿得正式”大概就是要穿件衬衫什么的，可我不想现在就穿上。我拿一个袋子把它装进去，塞到书包里。我可以到学校再把它换上，实在没地方换，到厕所里换也行。我随手把贴在桌子上写着“照相，衣着正式”的备忘录给揭下来，扔进废纸篓里。我有好长时间没去倒废纸篓了。我跟爸爸说过，要是进来给我打扫卫生，不要清理掉废纸篓里的纸，因为我说不定错扔了什么东西，突然想起来要翻一翻。有一次我把千辛万苦抄来的几道数学题给扔了进去，那几道题是人们事先传言联考一定会考、事后又不了了之的重要题目；还有一次是我的会考准考证，红色的一张纸片儿，我想尽了一切可能丢掉的地方，最后在废纸篓子里把它给找了出来；最近的一次就实在太没有理由了：我竟然把预选报

名表给揉成了一团扔进了纸篓子里。这么糊涂的事情，要是换了别人也只有在梦游的时候才干得出来。

我们站在小会议室外面窄窄的走廊下，等着在里面照相的人出来，然后一个个轮流进去。风挟裹着细细的疾雨洒落在我的身上。有一些人站在报栏那儿看报，我往小会议室里看了看，还没轮到我们班的人。我冒雨跑到报栏前，在教育专栏前看报的一个人都没有，我走过去。一个很知名的老教授在报上鼓吹高考要尽可能多地增加科目。反正他已经老得快要涅槃了，讲什么都不用负责，只是这样一来，又害苦了下一届高三学生。我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看报纸杂志，政治高考要考的热点啊焦点啊之类的东西老师都会在课堂上讲，我只要在考试碰上这些时事材料的时候，用他们要求我采取的那种所谓的“正确政治立场”进行分析回答就够了，至于我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既不会有人问，我也不会说。我自己喜欢看的新闻类杂志在市面上很难买到：联合国难民署有一本杂志叫做《难民》，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吧，我也是在叔叔的办公室里偶然看到的。邮局年终都要到他们单位征订下一年的报纸杂志，同时也会把上一年卖不动的杂志白送给各个单位权当作人情（其实就是垃圾再利用），《难民》就是其中一种，我把十来本都拿回了家，并且认认真真看完了。做一个难民拯救人员，他的压力肯定比一个人在面临自己的生存问题时所感到的压力大得多，他的工作使他不带有一点私心地目睹了整个人类的痛苦，看完了那些杂志我几乎要号啕大哭一场，可我相信我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今后要是有机会，我一定会做一个这样的人，或者做一个环保志愿者、一个救援队队员。

那个摄影师真有意思，看见有人戴着眼镜来照相，就把

自备的一副眼镜框儿取出来叫他戴上，免得镜片反光。我摘下了眼镜，拒绝了他给我递过来的镜框。当他开始数“一，二，三”的一小会儿工夫，我就直勾勾地盯着镜头发愣了，大概是因为睡眠不足，我看着黑洞洞的镜头就不由自主地想睡觉。

语文课上，外面雨声变大了，我身旁窗户的钢筋横梁上一个劲儿地往下滴着雨水珠，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窗户的一道钢筋给弄断，这样一来我在向外看时视野就不会被它弄得支离破碎了。坐在前面的人，手里正在摆弄着一支圆珠笔，他把笔杆子在两根手指头上不停地旋呀旋，看得我眼晕。我不知道自己该把目光放在哪儿。这堂课我是再也没法安心地上下去了；坐在我前面的三排人，都是些全班前二十名的优秀货色，他们不是嫉妒心强得骇人，就是傲不拉叽的一副嘴脸，再不然就是一碰上大扫除就开溜的混蛋，我闭上眼睛想着他们都烦，更不用说看一眼了。我刚要开始死死地盯着一样什么东西发一会儿呆，让自己惬意惬意，偏偏在这个时候下课铃响了。我困、困、困得要死，不知道还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自己不那么累得像头老牛一样。

同桌打开的文具盒的铁皮中晃出了我的面孔：青青的眼圈紧紧地箍着一双由于过度劳累而向外鼓突着的眼睛。我突然大笑起来。自从下半学期开学，几个月里我都不敢轻易照镜子，要不然准会被自己这副未老先衰的鬼样子吓一大跳。现在我不管看见什么东西，不管它到底好不好笑，都要抓住机会狠狠地狂笑一阵，像个疯子似的。

人们在等着班主任前来通知预选考试的事情。预选是这么一回事：考试后，凡是达不到学校划定的预选分数线的人，高考就不能以本校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当然不是说你

不能参加高考——学校怎么会这样不人道呢？学校的意思是，如果预选不过关，那么你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高考。也就是说，预选只不过是个名义上的问题，对没有被预选上的那些人没有实际损失。我们当然总不会弱智到听了校方的这个解释就心满意足：既然学生没有多少损失，那学校还要兴师动众搞个预选干吗？吃饱了撑的。最后把班里各个小脑袋的推测一汇总，我们得出了这么个结论：生意当然不能白做，谁都看得出来，高考前来一次预选，高考后统计升学率，那个让学校领导揪心的大大的分母在数目上就会有一个可观的减少，升学率也就会有一个更可观的提高。根据上一届高三预选的情况，大概一个班总会有那么四分之一的人预选过后要成编外生，今年不知道学校有没有魄力把这个比例给做大一点儿。要是个班预选过后只留下十来个学生，大概高考升学率达到百分之百没问题。虽然嘴上说预选考试过不过关对你高考没什么影响，可是大家都是要面子的人，就算不是为了争个面子，你预选不过关，要想回到教室里当个旁听生，那可就得出一血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此，无论如何预选是不可能不让我们诚惶诚恐的。

班主任一进班就开始布置预选考场，全班都慌了神，个个大气不敢喘。我全身直打颤，右边这位同桌在一个劲儿地做着吞咽动作，还目不转睛地盯着班主任。左边的同桌不小心碰掉了桌子上的书，他还敢弯腰去捡——在这种紧要关头，连咳嗽一下周围一片的人都会朝你翻白眼。他脑壳儿抬起来的时候顶到了他同桌的胳膊，他那个同桌不放过机会，腾出一只手，把他的头往下狠狠一摁，我看不见他头被摁下去时的表情，反正他不会太快乐。他又一次抬起头来，沉着嗓子对他的同桌说，“你怎么搞的？”班主任见下面有动

静，火冒三丈，马上停下布置考场的工作，使足了劲儿把讲台猛敲一通：“不想考试的都给我滚出去！”硬脑壳儿勾着头，居心叵测地往讲台上看了一眼，随即紧紧闭上了嘴巴。有些人的一举一动看上去就跟动物差不多，尤其是当他们在小事上心怀鬼胎的时候。

我呆呆地坐在窗边，今天，我不想跟着一大帮人在刚打放学铃的时候蜂拥出教室。等着教室里的人走得一千二净了，我才开始收拾书包，值日生已经在后面搬动凳子。我出了教室。两个追打的初中生从我面前嘻嘻哈哈地跑过去，突然间，我不想再往前走了。我不敢想象，就在两三年前，我还是和他们一样的中学生，可是现在，唉。我，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夹在不能让人信服的经验 and 非常不确定的对未来的预兆之间苟活着。除了自己的感觉，我还能相信什么？

4月21日

今天预选。

对于预选本身我倒不是十分担心，我最担心的是预选过后还要排名，那是肯定的。这么一来，预选就不像你认为得那样只不过是选上选不上那么简单了。既然人靠年龄说话，工人靠工龄说话，教师靠职称说话，那么，学生靠成绩说话，好像也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预选考试里，语文考的是什么呢：从一段文章里挖出来几个词，再把这几个词打乱顺序，编成ABCD四个选项，让你按照“正确语序”重新排列，这怎么算是考语文，简直就是在做一道排列组合的数学题。这段要你重新排序的文字，还

偏偏是那种拗口得完完全全驴头不对马嘴的所谓科普短文，我花了二十分钟，费尽心机，把四个选项像七巧板似的拼来拼去，最后折腾得我只想去死。

看来DD早就交了卷纸，她正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手里捧着的大概是下面马上要考的政治课复习提纲。我说，“哎，现在背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怎么办，你能给我抄啊。”DD说。

“只要你脖子够长，我就给你抄。”

“知道么，我这次美术专业课考试过关了，分数昨天刚刚公布，通知寄到家里。”

DD曾把监考她美术的那帮人称作“一群色盲”。

我说，“那太好了。”

我注意到她把眼神定在了我后面，我随着她的目光转过头：几个班里的男生正站在考场外的阳台上往我们这里看。DD开口说，“你看，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关系了。”

“你若是在意我可要走了。”我说道。

“不，我有什么在意的。”

说实话，我到现在仍然觉得和DD在一起使我很有面子，她很漂亮，而且，站在她旁边你能感受到她散发出的一种植物的清香味儿，很舒服。她说，“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啊，我有个朋友，人不错。”

我打断她：“高考，你知道，现在是紧要关头，不能有家属牵扯的。”

她只顾一个劲儿往下讲：“她也是学美术的，长得不错，肤色很白。”

我说，“肤色白不白无所谓，我不是种族主义者。”她

说，“你到底要不要我讲啊。”

我换了个话题：“我问你，你语文考得怎么样？”

“不好。”她短短地答了一句。

“带钱了吗？”我问。

“干吗？”

“借我十块钱，我忘了带钱，放学回家想买一本书。”

“行。”她把随身带着的透明手袋打开。我说，“你很款，随身带这么多钱。”

“没办法，经常在外面学画画，不能不随身带着些钱物啊。”她装出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来。

“金钱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什么本质问题。”我撇撇嘴，说道。

“所以你不带着钱，发现自己没有钱了向我借。”DD揶揄我。

“倒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不但对我来说是这样，其实钱这东西永远都不会是本质问题。”

“这我还是头一次听人这么说呢，”DD笑道，“要是没有钱，你不就等于活在半空中吗？饿死你也不是本质问题？”

我想了想，简单地说道：“你正好说反了，只知道钱的人才是活在半空中呢。好了，马上要考政治，回考场吧。”

DD和我不在同一个考场，她晃了晃手袋：“其实我并不把钱看得重，我只是说钱是少不了的。”

“我明白。”我说。她的基本立场在那次电话里我就全都明白了。“但愿你预选能过关，不要把钱白白地扔给这个混蛋学校，就拿省下来的钱请我吃顿饭吧。”

政治试卷做得很顺手，所有的内容都背到了，把那些原理

啊定义啊给穿一穿，大概也就考得差不多了。只是有一道时事题目，关于“入世”的，可能有一点超过了考试大纲要求。我本来以为时事方面的内容考的范围是上年5月到今年4月，也就是3月底截止，这个时事题目已经考到了4月初。说老实话，我很不希望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又发生什么重大事件，要不然政治课上肯定又得给大脑进补。我不是说我不希望中国入世，只不过，任何事情一旦可能加重我考试的负担，我认为它还是尽量缓一缓，等到我高考后再发生比较好。

下午考得一般，因为是数学。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现在终于可以让数学不那么拖累我的总分了，至少考试后自我感觉是如此。我往往不敢，或者是出于一种隐隐的担心，我不愿意在考得不怎么样的情况下早早回家。

下午考完数学和历史，大概五点半，我把明天上午要考的外语复习资料带来了，想找个地方把单词扫一遍。学校的办公大楼后面有个图书馆，我只知道那个图书馆的门朝哪儿开，高中三年里从来没进去过。现在要毕业了，进去坐坐也好，免得留下什么遗憾。图书馆门半开着，里面坐了不少人，大都是高一高二的学生，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还用应付铺天盖地的考试，所以放学后有时跑到这里来自习。我捡了一个靠里边点儿的座位，摊开外语讲义，准备看上半个小时，这样我晚上就可以早点儿踏实地睡觉了。但是，坐在我左边那人叫我安不下心来：他眯着一双近视小眼，每隔几秒钟就要往我这里探一探，像个探子，只是搞不清他到底在为谁工作，也许仅仅是为了满足那永远也不能满足的好奇心。当他不往我这里看的时候，就乐此不疲地手握一支老钢笔，一个劲儿地甩墨水。于是我不得不在他每甩完一次钢笔后就揪心地仔细查看我的衣服，捋起衣襟，检查袖口，一

直到确信衣服上面没有什么墨点子才稍稍安心，可是还没到两分钟，右边的那个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女生，就像惊厥似的一抽一抽起来。坐在她对面的小同学，看来是个今年刚入学不久的高一毛头新生，手里捏着一支足有一公斤重的钢笔咚咚地敲桌子，他还不时地一抬胳膊一跺脚，把桌子弄得像一块砍肉的案板。那女生最后被折腾醒了，满脸怒气地坐了起来，新生一脸无辜地瞅着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呢，举起杯子，表情痛苦不堪地喝着里面的不知什么成分的苦水。我实在坐不下去，拿起东西转身就走。

我回到家竟然看起了电视。家里没有人。我看了“探索”，少有的几个可看的电视节目。我很喜欢观察那些动物：落入狮子之口的羚羊，眼睛里流露出听天由命的神情，还有自私的小松鼠，一个劲儿只顾啃东西，还东张西望的，像个小守财奴。爸爸说我小时候差点儿被大人们当成发育迟钝，因为我能一连两个小时蹲在大树底下跟小蚂蚁讲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外面一阵开门的响动，我马上关上电视，捧起手里的书，坐在沙发里看了起来。

“今天考得怎样？”妈妈问。他们总是爱问我这些叫人难以回答的话。

“还好。”我说。

“第几名？”老天，这句话问得叫我恼火。

我说：“你直接打电话问班主任，只有他知道。”

“怎么了，考得不好？”

又来了，我都懒得向她解释：“这不刚刚才考试吗，名次还要等到下星期才能排出来。”

“难不难？”

“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我耐着性子向她解释，“是

怪。”

“怪？”妈妈加重语气问道，好像是觉得我说的这话挺奇怪似的。

我闭上嘴巴，因为爸爸进了家门，我不想跟他们在这上面拌嘴自讨没趣，捧着外语讲义，继续看了起来。

4月24日

下午放学，天气稍微有点儿凉。刚才照了毕业纪念照，就是那种全班合影。人头摞着人头，一层又一层，黑压压的一片，跟梯田似的，前面第一排半跪着女生，她们后边总是正襟危坐着学校的一帮大小干部和班里的老师，后面站着两排呈引颈待割状的傻男生。不知道几十年后老师们手里拿着这张照片，会不会油然而生一种桃李满天下的自豪感，据我的长期观察，这个班里的学生，到头来还是烂桃子烂李子占多数。照相前一分钟，校长啊主任啊这些人物突然之间就冒了出来，于是就是一阵骚乱，当然不是我们在骚乱，大人物大驾光临，我们怎么敢犯上作乱呢，我说的是前排的那些老师。他们正在众多的学生面前，上演一幕互相谦让的温馨短剧，而且对我们来说颇有几分教育意义，堪称道德典范：

校长校长，你坐这儿；

主任主任，你在这儿；

我嘛，我站在这里就行；

那怎么行呢；

对呀，班主任怎么能在旁边站着呢，我俩调换一下，来来来，来嘛；

我还是坐在这里吧，不麻烦了；

校长校长，你往中间坐一坐，那边的人往旁边挤一挤……

要不要拿个全球定位系统测量一下校长是不是刚好坐在众人的核心位置？“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摄影师拍拍手，举起脖子上挂着的那架虽然还算值钱，可是早已破旧不堪的老相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他手里捧着的广角镜头给吸引了，小操场上顿时安静了不少。“看着镜头，不要眨眼，找找感觉，自然一点，一，二，三，好。别动别动，再来一次，一二三，好。再来一次，那边的往中间靠靠，好，行了！”

下午上课我迟到了，因为我拿不定主意穿一件什么衣服去上学。要照毕业照，我总不能让自己随随便便的像个二流子，穿得太正规了也不合适，校服免谈，硬领衬衫我是不愿意再穿了。上次照证件照，我穿了一会儿衬衫，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缩紧了一整天。我换好了一件棉质单衫，忘了把手表戴上。进了学校大门上课铃就响了，我意识到没有戴手表，拿不准这是第几遍铃，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预备铃。这堂课是班主任的；下学期虽然换了班主任，可是迟到不准进教室的规定没有变。我想我还是不要进班安全一点，要不然很可能被轰出来，我可没有那么厚的脸皮。现在花园里的草木已经很茂盛了，在花园里躲着就不大容易被校警啊这些靠啃骨头过活的人给抓住。我拨开灌木，进了花园，没想到副班长也在这里。她坐在花园里的水泥花坛边上，听见响动，像个兔子似的警觉地抬起上半身，把耳朵竖得老高，手里还拿着一本打开看了一半的笔记本。她问我：“你怎么没进班？”

“跟你一样，迟到，不敢进去。”我说，“刚才打的是第几遍铃？是第二遍吗？”

“大概是吧。”

我最怕别人对我说出这类模棱两可的话，什么“大概”“基本”“一般”之类的。我问她：“现在几点？”

“两点多。”她看都不看一下手表。

“两点多多少？”

“不知道，我没戴表。”

“那你怎么知道刚才打的是第二遍预备铃呢？”

铃声突然再次响起。“算了。”她朝后面扬了扬头，“这一次响的才是第二遍铃，没法进班了。”

我站在一棵松树后面，一动不动。她也站了起来，一只眼睛看着我，另一只眼睛却望着铃声传来的方向。我和她就这么站着一直等到第二遍铃声响完才挪动身子，好像是对法庭的最后判决表示应有的尊敬似的。她把手里的笔记本塞到书包里，背起书包，往花园外面走，不知道她要往什么地方去。一个副班长，一定有办法找到一个能更好躲避校警的地方。我有点儿想跟着她，可是又觉得一个大男生上课的时候不上课，却那么显眼地在校园里跟着一个女生，实在很可笑。我站在春光明媚的花园里，心却在胸腔里荡来荡去的很想呕吐，眼球下面好像也在发颤。

第三节课历史复习课上，有人把一本同学毕业纪念册递过来，要我写。我翻开第一页，上面没有署名，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同学录，也许看看里面别人的留言会知道这个本子的主人，可是里面只有三四个人的留言，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以表明是谁的。我问了后面把本子递过来的人：“是谁的？”

“不知道。”

“那你怎么把留言写在上面？”

“递给我，我就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你写完了往你这一排前面传，每个人都写。”他交待我。

写这些毕业留言，既要写得模模糊糊的让人看了有点儿懂又有点儿不明白，显出自己好像有一些水平，还要尽量让自己的留言跟其他任何人的留言都不一样，这样才能显得你有个性。我在这本来路不明的同学录上写着一段短短的通用祝词那会儿，简直不想在放学后去凑热闹照什么毕业合影，可是我不想让一些人认为我这么做是出于自命不凡，还是去的好。

天气很好，太阳照在身上，有一种白银般的光泽，前面走着个身材窈窕的女人，黑色的长裙在傍晚的风中轻盈地飘荡着，就在这一刹那，我几乎爱上了生活——可是，这种美好的感觉我不能保持多久，因为刚才照了相，耽误了好些时间，要是不想晚上上课再一次迟到，我就得把车骑得快一点回家。

WX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带着他的一个同学。他那个同学个头很高，叉着两条腿骑在车后面的货架上，双脚拖着地，发出一阵摩擦响声，看上去像个遭受刑讯逼供的犯人正从监狱里被拖泥带水地拽出来似的。我问WX：“嘿，你有没有照片，咱们班里有不少人都在互相送照片，你要是有，别忘了给我一张。”

“我哪儿有照片。”他别别扭扭地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人是不错，可是说起话来总是冷冷的，好像劈头浇你一盆冷水，就因为这个，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跟他维持着这样一种不冷不热的普通朋友关系。

经过一家小书店，他俩先走，我进去看了看。这家书店里的书起码有三个月没换新了，老是同样的书，一点儿挑头都没有。我认定了要买一本加缪的选集，一有空就往书店里转悠一圈。其实书这东西并没有哪一本是非看不可的，可要是不看我总是在心里跟自己过不去。也许有人抬杠：依我看，看书就跟女人化妆一样，化了妆就觉得漂亮，不化妆也死不掉。此言极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个人的感觉：要是让一个爱美的女士不化妆，大概还不如宣判她死掉。一样小小的嗜好，也许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活呢，何况是读书？

市郊公路冷冷清清，路旁边有一群鸡，有那么两三只母鸡正在起劲地刨着沙地，动作看上去机械而熟练，它们既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卖力，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找什么，只是出于一种本能，上一代鸡们遗传下来的本能：刨刨刨，爪子转得像风轮儿似的，刨到小虫什么的，赶快啄到那张永远都不会嫌食物过多的尖尖的嘴里去。其中一只母鸡的羽毛被风吹得从身后向前撩开，看上去它并不为自己的一时失态感到害羞，它只是抬起脑袋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又继续刨了起来。

4月29-30日

昨晚是我自从上高三以来头一次看那么长时间的电视。我费尽心机向父母解释：刚刚预选完，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看看电视。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么说算不算是信口胡扯，也许只是听上去有点儿道理。于是他们就一致同意我看到十点半（我近来发现，他们对我作出任何决定都要相互达成共识），最后他们都睡着了，我坐在沙发上一直看到了十一点。

我回到屋子里，打开灯，有一只孤零零的蚊子在我面前晕晕乎乎地晃悠着，大概很长时间没有吸到一滴血，出现了贫血症状。屋内很闷热，夏天就要到了。

放假要是一直呆在家里，我到头来只能干两件事：看电视，看课外书。要是想把三天的计划完成，我肯定不能在家里呆着。我收拾好书包，去学校，这样一来在父母眼里我还落个努力学习的好名声。教室的门一定会有人打开，那些在学校住宿的人大都在班里复习。我八点半到了学校，没有什么假可放的其他年级正在上课。我没多费口舌就进了学校大门，大概门卫知道高三预选后放假的事儿。我绕到教室后面，往教室里看了看，里面没有人。我想还是得去前面看看教室门到底开了没有，要是没开，我就去图书馆。今天我很轻松，要是每天都在八点半上课那该多好，至少这样一来我就能踏踏实实地吃一顿早饭了。门没上锁，我一脚踢开门，它晃里晃荡地发出一阵冷笑似的响声，我愣住了。不是因为门，而是因为教室后面最后一排座位下冒出一缕缕青烟，我一只手马上按住还在冷笑个不停的破门，这时有个人从座位下面站了起来，是SL，我跟他比较熟悉。然后又站起来一个人，这个人我不认识，他看起来比SL年龄要大，手里夹着一支没熄灭的烟。我嗅了嗅空气。

“来一支？”SL玩魔术似地在手掌心里变出一盒香烟，看上去瘪瘪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我观察着那个我没见过的人，小心地说道：“我不会抽。”

“蚊子不叮抽烟的人。”SL说，“你得学学。”

我微微摇了摇头，笑了笑，“吃大蒜蚊子也不会叮你。”我本想这么就走，可还是随便补上一句：“看见NF了

吗？我正在找他呢。”

“刚才还在，出去快半个小时了。”SL说道，又点起一支烟，“快走吧，马上我们要砸窗户，你在这儿校警以为你也有份。”

SL那帮人预选肯定会被刷下来，我一听他说要砸窗户就在心中窃喜，就算他这是为班里做最后一件好事吧，免得在今后两个月里学校再要我们像苦力似的擦它们。我早就料到班里的窗户会有这么一天，不过没想到竟然这么早，预选后就有人要砸，而且他们还特地从外面请来了一个看上去有几分敲窗玻璃手艺的家伙，更令人兴奋不已。我拿不准的是，他们在其他年级上着课的时候砸完了窗户怎么脱身，但这不是我该管的事。我一句话不说，像鸟儿一样轻盈地飞出教室。

要是不能把一件事按照原定的计划干完，我就会焦躁不安，哪怕这件事事实上是多么不值得我为之焦躁不安。我已经成了一个强迫症患者，我不能够让自己把脸扭转过去，不去面对这些愚蠢的事物，我实在做不到。这不是一个懦夫和勇敢者的问题，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我甚至不能让自己把注意力从我偶然看到的一个小事情上挪开。

我心里很清楚我做不完数学试卷，这冷血的东西，它已经把我一次又一次掀翻，可我甚至不知道我哪儿招惹它了。我相当恼火，拿起笔来在桌子上乱划一气，可是没有办法，还是腻烦得要命。

下午五点多我被一群在外面吵闹的小孩吵醒。我是一点半睡觉的，醒来后，脑壳一阵阵发酸，两只胳膊也是这样，全身都在发酸，像是有一根线正在把嗓子往外牵扯着。我咽

了一口口水，嗓子底下好像有一块东西，干巴巴的，也许睡着的时候我流了鼻血，那是在喉咙底部凝结的血块。我一遍又一遍地使劲儿咳，好不容易把一半血块给咳了出来。我的胃一阵阵收紧，眼球往外暴突着，双腿在颤抖，我的感觉，它背叛了我。我渴望和一件东西和解，我不清楚它是什么，可是我知道，一旦我和它达成一项协议，我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以一种有害的状态悬停在半空中，不能上，不能下。这也许是一种卑鄙的媾和，可是，也许我会因此得到喘息的机会，如果我要活下去，那么这个机会就不能不引起我的重视。我走到写字台前，这就对了，我要安下心来，继续我的高考复习计划，这是和解的第一步。

这几天在家里，妈妈老在做饭的时候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无所谓，哪怕中午让我啃砖头我都不在乎。我的舌头好多天来几乎没有什么味觉，嘴里像是衔着一块橡皮，又涩又胀。我走到书架边，想随便抽出一本书在吃午饭前看一看，可是当我面对这一排排挤得紧紧的书，我的烦躁又来了。人类创造了那么多的思想，写了那么多书，可是没有一个能够救得了我。明天是我们放假的最后一天，我要到学校看一下预选考得怎么样，过了关就回去背书包，继续上学，没过关的那些人当然也要继续上学，只是除了背书包之外还要拿钱来交。今年预选后过了几乎一个星期才放假，我怀疑学校是不是想赶上五一节假期，把两个假期重合在一块儿，这样一来就不用额外放假了。高，实在是高。

有什么东西紧紧堵在我的喉咙口，这一次不是因为流鼻血。今天我要去学校看预选排名。我不想吃早饭，心慌，吃

不下。妈妈非要我吃，我对她发了怒，说，“一顿饭不吃饿不死我。”说完拎着书包走出了家门。马路上到处都是车，扬起的灰尘简直能把人活埋。我走进了一条猥琐的巷子，一边快步走，一边担心着巷子左右的每一扇门里会不会毫无预兆地突然向我冲来一盆肮脏的刷锅水。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在路上碰见一个同学，好像这么一来我就不会在到学校看预选结果的路途中过于紧张了。也许迎面会走过来一个刚从学校探听完分数的同学，这样一来我就能先问一问他，也好心里有个底儿。

今天是五一，其他年级都放假，校园里没有人。我怀疑自己记错了预选分数公布时间，还是进办公大楼看一看吧。刚踏进办公楼第一级台阶，里面就出来两个女生，“看到我考多少分了吗？”我问。

“没有，没注意。”其中一个说。“大概是第十二名吧。”另一个用猜测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同伴。“好像是。”

我心头顿时抽紧了，这个名次比上次的月考后退了四名，我不可能不在乎：因为班主任在乎，父母在乎，同学在乎，于是就由不得我自己不在乎了。我觉得好像被一棵突然倒下的大树砸到了脑袋，而这棵树，恰好就是在我上一次考了第八名那会儿由我自己亲手栽种的，一棵危险之树。唉，为什么老是分数分数，天啊，难道他们非要把一个人放在分数这种狗屁试管里进行量化评价吗？

我出了办公大楼，班主任到底没有把我给吃了。也许你会说：那你有什么害怕的呢？可我就是害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从楼梯上往下走的时候我小心翼翼，最好不要迎头碰上班里的任何老师。于是后来我又想起我忘了问今天晚上

要不要上晚自习，肯定要上，但是没有从班主任嘴里得到明确的通知，我至少还有一点侥幸心理。不行，上学的事儿怎么当儿戏呢，我还是得问一下，我又折了回去。走过一楼宣传部办公室，里面没有人，只有一块大黑板，安静地躺在地上，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美术字：“多一所学校，就少一所监狱。”不知道学校又要搞什么重大活动。

5月2日

父母都知道了我的成绩。妈妈说得很简单：“赶快用功吧，脑子越用越灵，再不用就要生锈了！”好像我这段时间以来什么都没做就在干等着让大脑生锈似的。我对这类俗不可耐的经验之谈相当头疼，但是，我考得不好，家里没有我讲话的地方。爸爸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看电视了。”他总是把我的成绩和看电视挂上钩，或者归咎于我看课外书看得太多，这简直就是牵强附会。我怎么可能那么蠢，竟然能让电视这类屁玩意儿支配我？我说，你要是认为我考得不好是因为看电视，那我就不看。“好好总结一下你这次考试为什么退步了！”退步？这个词蕴含的道德含义叫我非常害怕，怕得要死。可是，我又怎么能总结出来，这次考试又有三四个人爬到我头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书背得不如人家熟，是因为我某一次早上起床比人家迟了五分钟，是因为我在做政治试卷的时候，有一只瞎捣乱的蚊子飞过来，叮了我一口，害得我手背痒痒，把一段问答题写花了。因为这，因为那，千万个因为，就是没有一个能让我自己心服口服。我摊手摊脚地仰在椅子上，我能拿最后一点可以自

由支配的力气来干什么？总不能这样一直愤怒下去啊。我真害怕自己变得又老又无耻、自私自利、漠不关心，可是，我能改变什么呢？

昨天学校改了作息时间，晚上七点十分开始上课，十点放学。我不知道这个通知，去早了，正好班里要在上课前重新调整一下座位。坐在前面的没有几个人需要调动，后面现在只有十来个空位子，而昨天预选后第一节上课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位子空着的。那些预选没选上的人，只要他们愿意，一天工夫就能重新回到教室，这倒不是他们有多大法力，有钱能使鬼推磨，也能使学校张开双臂热烈欢迎你这个预选完蛋的人重新回到教室，当然在它搂抱你的时候，你的钱包要瘪下去一点儿。要是单单为了排一下名次，一个简单的月考就能搞定，可是月考终究没有来一次预选大餐那么丰盛，名利双收的事情，只有蠢货不愿意干，而众所周知的是，学校从来都很精明。

我刚进班那会儿头一件事就是骨碌着眼珠子关切地看窗户，你想不到我在上学路上有多么激动，激动得要命，而且浮想联翩——可是SL让我大失所望，他根本就没砸坏一扇窗户。我叹了口气，走到座位上，暗自想着我高考后是不是要亲自出马，给教室窗户动一场外科手术。今晚班主任代替政治老师监考政治。我刚拿到试卷时，不小心瞟了一眼后面的大题目，于是我在做前面的单项选择题时老是头脑越界，往后面的大题目上想。同桌早已把试卷翻到了第二页，我握笔的手又开始抖个不停，心里急得火烧火燎。我试图让手不要那么紧张，眼不见心不烦，我把它暂时放进抽屉里去，也许在黑暗中它能恢复过来。现在正是考试，用得到这只手的时候，它却这么不争气，我不知道为什么手长在我的身上，我

却没法克制住它不要自行其是地乱抖，我在等着这只用得过度的右手逐渐冷却下来的同时，眼巴巴地看着面前的试卷。班里许多人写起试卷来刷刷的像印刷机，想都不用想，就这么一个劲儿写写写。我看着周围，突然间哑然失笑，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右边的同桌诧异地看了我一眼，我笑着摇了摇头，把手抽出来，尽量把字写得工工整整的。天很热，我心里发虚，像个贼一样，我想透透气儿，可是离下课还早着呢。中午已经下了一场雨，我在去学校的路上，看到许多槐树都开花了，一嘟噜一嘟噜的小白花，清香味儿引得我想要跳下车去摘那么几朵，但是我不能，要是在这个时候带一串花到教室里去，他们准会认为我是个疯子。我看见树阴下也落了不少被雨打下来的槐花。其中有一棵小桑树，看样子很贪心，它趁着下了一场大雨，喝饱了水，绿油油的叶子在太阳底下发出乌亮的光泽。上学前我在家饶有兴致地啃了一根黄瓜，有一只小蜜蜂在窗外的花园草丛里飞舞，也许迷了路，它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尾巴对我有多么大的危险似的，在我面前飞呀飞。我呢，就那么趴在窗台上观察它，一直到它厌倦了，飞开去，我才把手里的半根黄瓜扔出去，收拾书包去上学。

半夜里我醒过来一次，窗外哗哗地响着。五点钟，我又醒了过来，这一回我清醒了许多，我发觉外面正在下雨。我这会儿再也不能入睡了，真是奇怪，我在大白天老是嗷嗷叫着困困困，现在反倒睡不着。我爬起来，可是不想拧开台灯，就在我静静地站在窗前的那会儿，那种心虚的感觉又来了。我这是怎么啦？我难道做错了什么，非要跟自己过不去，一次预选名次下降，要我去死我的心里才能平静下来吗？我这几天一直把自己当成一堵麻木的老墙，拿着预选分

数这柄利刃拼命地刮着，刮呀刮，没个停，我倒是想马上住手，可是我停不下来啊。

昨天我附近调过来两三个人，其中一个女生。她被安排在我前面那个女生的旁边，和我前面那个女生很合得来的男生被调走了（还记得我的历史书是怎么被这天造地设的一对撕烂的吗？）棒打鸳鸯飞啊，怎么能不叫人惋惜，想当初，他俩谈得挺热火的那会儿，这儿一片谁看了都打心眼儿里为他们高兴。刚调过来的女生好像不习惯坐在前面，她上课时老是把头往后面拧，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要回过头看看，唯恐少看了什么，而且在回过头来看看之后，还少不了撇一下嘴，然后才转过头去，害得这儿一排我们三四个男生总是傻里傻气地大眼瞪小眼，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下了第一节课，我刚想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面前突然摊上一张数学试卷，而且还是这次预选刚发下来没多久的试卷。这些个冷冰冰干巴巴的东西，一看到它们我的头“嗡”地一下就大了。“怎么回事？”我抬起头来问，是那个刚调过来的女生，她侧过身子：“问你个问题。”

“哎哎，先别忙，我数学考多少分你知不知道，七十四，现在一看到数学试卷我就受刺激。你考得比我还多，瞧瞧，九十。其它的也许还行，数学我不行。”

她转过头去。几秒钟后，又来了。看来我这十分钟得奉陪着她了。我开始有点儿怀疑她上课老是回头，是不是存心要多看我几眼，不过，我用不着那么自作多情，DD说过，男生就爱自作多情，于是我处处提防着自己不要这样。“哪儿？”我接过她的历史试卷。

她热心地问了，我泛泛地答了，我心里想：这事儿也算玩完了，可是最后她说了一句话简直没把我给笑死：“你讲

的解题方法确实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我的妈呀，我差点儿被她麻翻过去。不就是告诉她一下这道历史选择题在书上哪一页能找到吗？还还还什么“具有可操作性”，那口气好像是在操纵什么航天飞机似的，哎呀我要笑死了，真滑稽。

这次政治考试，我又是班里第一名，可是，我仍然觉得真是奇怪：一个人，怎么能靠着区区一纸试卷使自己得到证明？我听够了“目前还没有比考试更为有效的方法”这类陈词滥调，人类并不缺乏智慧，解决之道很容易找出来，可是，人恰好就是一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丢人的动物。人缺乏的只是勇气再加上那么一点儿，嗯，人性。

放了晚学我留在教室里，要把历史古代史最后一章背完。我憋足了劲儿要把它在今天解决掉，这就让我在不经意之中发现了一个叫我毛骨悚然的大秘密：原来班里面竟然有一半的人，晚上放学后不回家，都留在教室里看书！我思来想去，还是开口问后面的那个住校生：“晚上放学后他们是不是经常留在班里？”

“你说谁？”他问。

我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他这句话问得像个傻子。“就是现在坐在班里的这些人，”我加重语气，说道。

“不知道。”他说。

我草草背完了历史书，收拾书包，赶紧走人。

槐花的清淡香味，在夜晚凉爽下来的空气中轻轻地摇荡着，混杂着晚春的慵懒和一丝初夏的风，万物都躺在夜的大摇篮中，它们都在贪婪地生长着，就这样，心安理得地度过一个春天，而我，我能这样下去吗？这个夜晚，仿佛是一杯美酒，在我的鼻尖轻轻地摇动着，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张开嘴巴，把它细细品尝。我不需要什么精神寄托，让一切思想

都滚到一边去吧，那些徒劳的思想，好像是个溺水的人在空喊救命一样，毫无用处，我不要在这最后两个月里盼望什么了，一切都已成定局，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再也不要自己不肯承认我碰上的一切倒霉事啦。让我平平静静地，像度过这样一个夜晚一样，度过我的一生吧，纵然它不会像这个夜晚一样美好，可是，既然我高中三年都爬了过来，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是我不能够忍气吞声地平静面对的呢？

5月5日

DD上课写纸条给我。她把纸条折得一层又一层，我在费劲地拆它的时候，看的兴致已经消耗掉了一半。我认不清上面的字迹，钢笔写在破纸头上，写出的每一个字都在四处蔓延，叫人心生绝望。我好不容易猜出个大概：她想问我要照片做纪念。我给她回信，找了一张作业纸，尽量一笔一划地写。DD有个让我恼火的特点：你写的字稍微潦草那么一点点她都不认识。我今天缺乏耐心，写了一行字，揉成一团，丢了。下课找她聊聊，现在我的心思不在她身上。我机械地拧了一会儿钢笔套，看着政治书，整个学校里的一切事物中，只有下课的铃声跟我最亲切。还有五分钟——

DD向我这边看着，我随着一些往教室外面走的人走到她那儿去。她让了个座儿给我，说：“看看你那边的人。”我看了一眼，我的同桌们正在咧着瓢也似的大嘴朝这里狞笑，我说：“他们总叫我不得安宁。”我转过脸来，看着DD：“我现在没有照片，你要是想要，我这个星期天照，行不

行？”

DD说：“不行”。

“怎么啦？”

“你星期天不复习吗？我可担当不起。”

“那好，给我我小时候的照片你要不要？”

“行啊。”

我在和她说话时愣着眼神，盯着她的课桌：一个双层文具盒，上面是卡通图案，里面放着女孩子的小东小西，还有一个银色的精致胸饰，她看上去和其他女孩没有什么不同。这时班主任进来了，外面有许多人都在往教室里涌，但是没有人大叫大嚷，只有身体摩擦、桌子移动和慌乱的脚步声。

DD，给我让了一条道儿，我低着头，匆匆回到座位上。

在下面坐着的人焦虑地等着讲台上的班主任通知重要事件，讲台上的班主任却固执地等着下面的人完全安静下来才肯发言，于是一时间整个班里大眼瞪小眼。我的右边同桌动了动，把手伸到我的座位上要拿我的书。他经常从我眼皮底下擅自拖走我的各种参考书，连屁都不放一个。我非常想告诉他，他这么没有礼貌让我难受异常，可是对他这么一个用铁丝折成的人物而言，这些微小的事情他永远都不会明白。

班主任在说着通知了，大概是说办身份证的那档子事儿，高考要用到。全班就数我的身份证办得最早，今年春天爸爸就托他一个在派出所的熟人早早办理了，交了一百块钱，还说是加快办理，一个月办好。现在呢，一个星期就能办好，而且价格也跌了不少。

5月9日

自从上次预选英语考了个全班第二名，外语老师就开始在我的每次小测验的试卷上写good, very good, very very good这些勉励词儿了。只要他开始在你的试卷上写上一些评语，那就说明你在他心中算得上是个大有前途的优等生了。我受宠若惊，看了血红的very good，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在学校里我做惯了别人不问我的事儿，我也不去干涉别人的角色，这一次外语老师亲自向我抛橄榄枝，却弄得我心慌意乱起来。为了不让左右同桌看见外语老师在我的试卷上写的红字评语，我就一声不吭地把它折了起来。我告诉你：越是临近高考，班里的大小人等就越是心理变态，现在刚刚发完外语试卷，班里的气氛很不友好，坐在我左右的几个人要是知道外语老师对我态度甚好，他们恨不得马上把我给生吞了，连骨头都不吐出来；那些考得好的人，又一刻也不安生，脑袋伸得像个防风话筒似的，一定要打听到周围是不是有人考得比他还要高。我本来是不喜欢考完试后过多地谈论分数的，但是这帮人就是要谈，而且乐此不疲，于是弄得我也不由自主地不在乎起分数来了，最后搞得肚子里一个劲儿泛酸水，因为要想在班里找到一个考得比你还要高上几分的人，总不是什么困难事儿。

老实说我不喜欢老师偏爱我，现在我甚至开始害怕历史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提问我什么，因为我历史背得熟，回答问题不费劲，成绩也总是没出过前三名，这么一来历史老师就爱在课堂上提问我，因此我在这儿一片人的眼里就成了异端分子。除非是个死人，要不然你总能感觉得到，你周围的人在老师优先请你回答完问题再坐下的那会儿表现出多大的敌

意。表面上教室里风平浪静，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使足了劲儿要把其他人压在自己下面才善罢甘休，这就是高考带给我们的道德教育。

MS想从我这儿借一本书。在这紧要关头，连我自己都不敢看课外书了，没想到还有人要问我借书。“什么书？”

“《茶花女》。”我就知道女生们一开口向我借书不外乎就是《茶花女》啊《巴黎圣母院》之类的，她们大都是从语文书上得到的一点可怜巴巴关于外国文学的介绍，于是就想当然地认为外国文学就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加现实主义，我怀疑语文课本那么卖力地大肆宣扬这些老掉牙的东西，一个重要的原因会不会就是他们随便摘一段年代久远的现实主义小说充当语文课文，用不着掏腰包付版税。要是我们的国宝级语文老学究们对外国文学的认识仅限于此，我们好像也没有多少资格，要求别人不把我们想象成至今还留着大辫子、穿着长袍马褂、浑身脏兮兮的一帮乌合之众。我本来想告诉MS快要高考了，看课外书要当心一点，可是转念一想，她不会连这个都要我提醒吧。

MS现在坐在第一排，她旁边的那个女生跟我有疙瘩，我不是说我跟她吵了架什么的，比这个更难解释：我早就发现她上课老是回头往我这儿看，（这个女生不是上次调座位调到我前面的那个女生，虽然她有一段时间也爱回头，可是请不要把这两个人搞混）她的眼神不是含情脉脉，而是疑神疑鬼。我思来想去明白了，这里其实有一个误会：很不巧，我上课要是想抬头看一眼老师，就不得不越过MS旁边的这个女生的头，因为她恰好就坐在我和讲台之间的一条直线上，我要想看老师一眼，她就会以为我是在看她，最后吓得我不敢抬头。MS放学偶尔和我同路，我跟她在幼儿园是同学，所以

很能说到一块儿。她问我，你对XX（就是她的那个同桌）感觉怎么样？我一下就猜到是她的那个同桌对她说了什么，我又不是厚脸皮，马上把事情向MS说明白，这才换来今后课堂上的自由。

今天晚上是语文晚辅导，要做一张语文试卷，这张试卷可能又是北京哪个区的高考押题高手们谋划着出的，据说命中率还比较高。想一想很可笑：我们那些长期奋战在高考一线的经验丰富的敬爱的老师们，对付高考的方法，竟然比算命的小神汉好不到哪里去：押题。

同桌递过来一本同学纪念册，“要谁写？我吗？”我问道。他没说话，懒洋洋地把本子扔到我的面前，像一条粘虫，好像给了我很大面子似的。我很不喜欢别人给我脸色看，生硬地说：“哪儿来的你给他拿回去，我不想写。”

晚上最后一节课班主任又来了，这次他不是来下什么通知，而是想借着自习课的机会说一说关于高考的事情。有什么好说的，反正就是老一套，听得我哈欠连天。我简直就是为了高考而活着的，这比起让你绕着一泡狗屎跳舞好不到哪里去。班主任正在开动他那压路机般的嗓门，把班里面的大事小事无巨细地放在舌头上碾来碾去。我现在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他讲得那么起劲，放学了是不是能准时放我们回家？我困得要命，哪怕站着都能睡着，真希望我能活到不再有人对我唠唠叨叨个没完的那一天。他们要我做的，我已经都做了，还有什么拉下的东西没有做？要知道，我已经把整个青春都献给了高考啊！

5月13日

我早就想着放学后要去取照片的事儿。上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跟NF还有GR到学校后面的树林子里照了一卷照片，GR拿去冲洗，说好了今天中午能拿到照片，但是那家小照相馆老板说洗印机器坏了，要GR晚上再去。GR下午跟我说，你放学回家正好走那条路，待会儿我把发票给你，你去取。但是放了学GR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他还没给我发票就蹿出了教室。我知道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放学后马上把书放回寝室，然后出去吃饭。于是我就背上书包，往他的那栋宿舍楼走去找他。

我所在的教室离宿舍楼比较近，当我走到宿舍楼下的时候，还没有几个人上楼。一楼进门处有个传达室，正对着人来人往的楼道开了一个木头小窗户，就像老式医院的药房似的。我刚要往里走就被叫住了，一个女人的沙哑的声音。我又转了回去。那守门的女人从木头窗户里探出一张干巴巴的又黄又尖的长脸，上面有一双猴子似的好奇和惊恐兼而有之的小眼珠，紧贴在眼窝子里。看得出来她没受过多少教育，对自己并不自信，但是又有点狐假虎威，认为学校既然给了她监管宿舍的大权，她就应当不时地用一用。她问我：“你干什么？”我说：“找同学。”我想我从外表上看还是属于比较乖的那一类。但她的好奇心极为严重，非要问到底不可。我有一种感觉：许多人都把自己强烈的性欲转变成了强烈的好奇心：“你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

我想了想，不得不坦白：“叫GR。”那感觉像是在把我的犯罪团伙供出来似的。于是她开始翻弄着胳膊肘旁的一个本子：“他是不是406室的？”她厉声问道。“这我怎么知

道。”我没好气地说。她说：“你上去告诉他，他要是再不交罚款，我们后勤部明天就把他的名字上报到学校教导处，写到他档案里去。”

我不知道GR犯什么事儿了，只是小心地盯着那女人看，她的眼神显出一种在威胁别人的同时也在替自己的信口胡扯提心吊胆的心理状态。一派胡言，我想道，还还“我们后勤部”呢，毫无疑问，我要是戳穿她的威胁只不过是吓人的鬼话，她准会变得歇斯底里，这种女人只有一道防线：大吵大闹。但是我不想把火烧到GR身上，我连忙点头称是，说我一定转告。她的样子使我想到一种蜥蜴，脖子上有扇子的那种蜥蜴，当它想威胁别人，或者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就会虚张声势地撑开那面扇子来吓唬人。这种虚张声势的本事人类也学到了不少，而且技艺精湛，这个女人就是一例。

我们是害怕自己的档案在高考前被抹黑，但是学校也不见得就比我们踏实多少。GR是班里前三名，学校计算高考升学率的时候，他铁定是充当分子的那一部分学生，而且重量很可能不轻，学校不会因为宿管科的一个小报告就跟他这样一个有着巨大潜在价值的学生过不去。我想着他究竟是怎么了要被宿管科勒索交罚款。这年头罚款多得是，我高二那会儿班里大大小小起码有十个罚款项目：嗑瓜子罚款，上课睡觉罚款，期中考试退步了罚款，地没扫干净罚款，迟到罚款……就差一条：你这次考试不是全班第一名就要罚款。我就是想不明白，学校或者班主任罚我们的款有什么依据没有，连个收据都不开，就理直气壮地朝你嚷嚷：“某某，明天交罚款！”好像你上辈子是他家佃农似的。

我爬上四楼，找406室。如果我没记错，这就是刚才那个好心的女士提供给我的GR的房间号码。门锁着，我轻声喊了

两声，又敲了敲门，不见答应，就下楼去。在二楼迎面碰见NF，他一碰头就问我跑到哪儿去了，他说正要把发票给我，可是找不到我。我说我来找GR要发票。原来是GR托NF把发票给我，他去踢球了。我问他：“GR怎么了？下面传达室里那个女魔头要我转告他交罚款。”

“GR买了个电水壶，被没收了，电水壶是那种双保险的，根本就不可能出事，GR好话说了一大堆，就是要不回来，他们还要他交五十块钱罚款。那个水壶我前天到传达室打电话的时候还看见那女的正在用它烧水。”

我在想着GR对那帮宿管科管理人员说一大堆好话要水壶的时候，到底会是怎样一副可怜样儿。

“GR太老实，现在每天下午放学都不回宿舍，要等到六点半那女的跟值晚班的老头子换班才敢回来。”NF说。

我跟NF道了别，直奔那家照相馆。店主从我手中抽出发票，对着灯光看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发票不是正式发票。我说：“怎么了，还没洗好？”他没答话，只说：“明天来拿。”那口气好像我是个大闲人，明天什么事情都不干就等着到他这儿来拿照片似的。

“中午我已经托人来过一次，你不是对他说晚上来就能拿到吗？”

“晚上？”他把脖子伸得像只甲鱼，我甚至能闻到他嘴里的烂菜叶子味道，他那不紧不慢的喘息声历历可闻：“你想找麻烦还是怎么的？”

我听了一愣一愣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到底是谁找谁麻烦？”我问。

他又叉着腰，这就开始满口喷粪：“我什么时候说叫你晚上来拿？”

我说：“不是对我说的，是对中午过来拿照片的我一个朋友。”

“没有，我说的是明天。”听得出来，他已经把这些谎话冲着许多同我一样不小心踏进这家黑店的人说了很多次，早已烂熟于心。我还想说什么，他早就等不及了，一看我要张口就开始大放厥词，一会儿说他不怕我找人砸他的店一会儿怂恿我去找消协，还给我出谋划策，说公用电话就在门口，方便得很，你还不赶快去打12315，好像那个公用电话亭就是他特地供人投诉他才出钱建的。我的思路跟不上他那九曲十八弯的绕口令，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我不能为了现在把相片拿到手就耽误了自己。虽然我相当窝火，可我不能把最近几天保持的还算好的情绪搭进这头钝皮老脸的野猪的蛮横中去：我是高三学生，眼看就要面临高考，人整个儿金贵得像刚出土的宋代瓷器似的，我估计他要是知道打一场架对我来说该有多么严重，他早就动手了。这时有一对女孩进了店，那老板马上收住嘴，看来他还不太蠢。他把我晾在一边，开始满脸堆笑，全力以赴来骗这对送上门来的新顾客。我很想知道，他要是和女顾客吵架会不会也摆出一副要打人的架式。

“那好，”我向来不喜欢受到冷落，我收回发票，说：“明天上午来拿，一定要拿到。”

我从这头野猪的老巢里出来了，他在我身后骂了一句，我装作没听到，只是把他扔出来的那句脏话把玩了一会儿。他骂得很有创意，大概是他伶牙俐齿的老婆教给他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搞得这么恶心，我忿忿地想着GR怎么能到这样的小破店里洗照片，我知道这样想对他不公平，但是我止不住这样想，越想越来气，恨不得把手里的发

票给撕个稀巴烂。我好像被一只毒蛇咬了一口，现在才毒性发作似的。

5月16日

晚上要考试，而我的胳膊又开始僵硬了，它牵动起来很生硬，就像是抽去了原来的骨头换了一根竹竿似的，右手还止不住地抖个不停，这几天来它老是这样，我身上的每一个器官好像都开始不听使唤，不管是手臂、脖子、眼睛还是肩膀，都给我一种并非肉身的、陌生的零部件感，我简直成了一个机器人。我想提前去学校，也许这样能缓和一下。

大街上闷热肮脏，到处都是小吃摊点，棚子搭成一条长龙，就像难民营。大人带着小孩，在路边坐着埋头大吃，就像一群难民。我最怕看见别人吃东西时显露出的那种可怜表情。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浓烈刺鼻的臭味，是到处乱扔剩菜剩饭泔水之类的东西沤出来的气味。我太阳穴一跳一跳的，后背右下方一片突然涌起一阵热流，然后像裂开了两道缝，隐隐作痛，要是肾衰竭的征兆就好了，这样我就不用去上学啦。离高考还有四十八天，听上去好像我还有四十八天好活似的。

教室里乌烟瘴气像个赌场，我厌倦地翻着手里的参考资料，这次月考再也不能叫我提起兴趣了，现在我连对考试的恐惧感都麻木了。我试了一下刚削好的铅笔，到黑板前再看一眼月考考试时间表。学校满打满算，这一次把月考放在晚上，考一个星期，正好五个晚上，一天一门课，星期天晚上正好是班主任的课，于是他可以对这次月考做做总结，真是天衣无缝的安排。

我有一个担心：从今天开始，我大概就不能经常写日记了。记日记，已经成为上高三以来我在这个腐烂之年里所能做的惟一有点儿意义的事情。

我感到有一星雨滴落在我的脸上，又怀疑是自己神经过敏。我抬头往天空中看了看，一些鸽子在我的头顶上低飞着，看上去个个又大又壮，沉闷的雷声从天地交接的地方传来，我好像闻到了一阵落叶的气味。马路上到处都是下雨前低低的气流扬起的灰尘。有一片空荡荡的黄土地，大概要在那里盖楼房，土地被夯得湿润平坦。三个衣着干净的孩子正在那儿做游戏，他们做的是刚好让三个人在一块儿玩，谁都不丢下谁的小小游戏，最小的孩子乐颠颠地跑来跑去，总是能不让自己被捉住——不被捉住，我笑了笑：我呢，我早已经被捉住啦。我不用再逃，只等着最后发落。我甚至深深地厌恶起自己来了，我怎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投降了呢。

5月22日

闹钟又响了起来，我伸出手抓过它，要把声音停掉，慌乱之中只是用手指堵住了背面的发声孔，叽叽的声音像个快要窒息的婴儿，我只好把它放开任由它响。我和衣睡了半个小时，心事重重。今天是星期天，但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星期天的滋味，为什么我在星期天里总是这么提心吊胆。我站起身，走到窗前，关上窗户，天又变阴了，室内光线黯淡。我坐在写字台前，闭了一会儿眼睛。这个星期天正在像一个陌路人一样从我身边冷冷地走过。

青灰色的天空露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那棵又高又细的

小树，在窗外左摇右晃着。我把窗帘拉上，这就换上外套，准备穿上鞋子。又是这样的一个星期：穿外套，换鞋，洗脸，梳头，整理书包，打开车锁，上学。我真想让这一切都静止下来！我坐在床沿，拎着鞋子，突然涌起一阵抗拒力，使我不愿把它穿上。我紧盯着写字台上的灯，像一块沉积岩，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像岩页一样在我的头脑里剥落下来。唉，我要是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变成一块石头那才好呢。闹钟用它那不可逆转的声音提醒着我：快点准备上学。我愤恨地看了它一眼，好像我的不幸就是由这个该死的小机器造成的，而我还不得不给它许多它不应该得到的关注，我得时不时地看它一眼，否则我将难以把握自己的感觉。

5月25日

我放了半杯水，开始刷牙。刷到一半，牙龈被牙刷狠狠地捅了一下。我打了个顿儿，忍着剧痛。真是可恶，刚才被牙刷戳伤的地方又被碰到了一次。我把牙刷抽出来，使足了力气向浴缸里掼去，一阵乒乓的响动让我冷静了不少。我漱完口，到厨房里，又是牛奶鸡蛋，早餐，早餐，我看了就晕，难道早上就不能吃点儿别的吗？

我空腹去上学，走之前没忘把饭食给倒掉，这样我中午回家后爸爸妈妈就不会一句接着一句地问我早晨为什么没吃饭了。学校大门两边站着八个学生，四男四女，正好成对，他们都在肩膀上斜挎着红布，红布上写着“不准吃零食”这类标语。我下车，走过校门，他们叫我恶心透了。劳动力过剩有目共睹，可是我想不到学校竟然一下子就派出八个人在

大门口站岗，而且都是那些有着学生干部的煞有介事的自大气质的人，尤其是女生更是如此。

我把书包扔到课桌上，同桌也是刚到，他坐了下来，开始翻弄文具盒，那种奇怪的金属声音，好像有人在你身边玩弄着一副齐全的手术器械似的。我的眼球开始震颤，嘴里泛出杏仁的苦味。前面那个女生“咯”地笑了一声，像只母鸡。她捧着一份摄影杂志，往我眼前伸过来：“你看看你看看。”她迫不及待地说道。那是一张关于核污染的黑白新闻照片，一个受到辐射的头部畸形的婴儿，我以前看过。我皱起眉头，不愿意再看下去，可她好像非要让我看得更加清楚似的，把杂志在我面前放了很长时间。我把杂志拨拉开，她又把它拿到其他人那里去。我真的一点也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可笑的地方，但是，就在我旁边，竟然有人看着这幅图能笑出来，这太不可思议了。她还在一刻不停地咯咯笑着，我心烦意乱——正是她的笑声，在这笑声里，潜藏着巨大的破坏力，让我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烂、多么混蛋。我真想就这么猛扑上去把她给掐死，可我只是用脚蹬了蹬她的凳子，轻声说道：“咳，班主任来了！”

下午有雨，爸爸把雨衣装进我的书包里，我告诉他把雨衣放在桌子上就行，可是他已经把它放了进去。我闷闷不乐地停下手里正在背着的历史书，走过去，把雨衣拽出来。我不喜欢自己的东西被别人乱动，哪怕是父母也不行。下午怎么可能下雨？我看了看外面，没带雨衣就去上学。第二节课上到一半，开始打雷，班里乱作一团。其实雷声并不是很大，但是教室里的人有许多都想找刺激，于是就开始闹哄哄的，好像真的五雷轰顶了似的。

我没带雨衣，不过，刚才下了那么大的雨，放了学，雨

却刚好下完了，这大概就是我在上高三以来碰上的最最幸运的事儿了。在湿湿的路面上骑车，给人一种很实在的感觉，我很久没有这么踏踏实实地骑车了，今天我有意放慢了速度。回家早几分钟晚几分钟，有什么关系，把日子过得那么精确干什么！现在我为了放松而透支五分钟，总不应该让自己就因为这个又感到惊慌不安吧！

5月27日

“对不起。”我的同桌细声细气地说了一句。我根本没弄清楚他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只是一阵愕然，因为从他的口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如此礼貌的词汇。我在吃惊的那一小会儿，已经错过了向他说“没关系”的机会。我四下里找，心里想着也许他把我的笔啊什么的碰掉了地上，但是我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他主动弯下腰来，把一支笔捡起来，放在我的桌面上。那不是我的笔，不过我没有说出口，免得闹个红脸。也许是因为离高考还有最后一个月，同学之间快要分别了，才会如此礼貌得让人动容。我几乎要大笑出来，我得趁他不在的时候把这支笔还给它的真正主人。我把笔放进抽屉里，抬起头来，向外望去：今天的天气再好不过了，好像连天空也在盛赞着同学之间的伟大情谊似的。

历史课第二轮复习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在高考前起码得有三轮复习才行，我现在很担心历史老师能不能完成预定的复习计划。我是不可能课外加班加点让自己提前复习的，我挤不出时间来，除非我身怀在梦中背历史书的绝技。不过要想找到比我还用功的人，那倒不难：前些天我下了课，到

学校公厕里去方便，碰见一个班上的人正蹲在里面看那本八开的外语强化训练题。学校要是设立“年度优秀学风奖”，这个奖项必定颁发给他无疑。在那种怪味儿直冲脑门的地方呆一分钟，出来之后你都不辨东西南北，还有人能在里面蹲着巍然不动地背外语单词，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啊！

上午的太阳照在我的背部，暖洋洋的，我甚至担心今天衣服穿得有点儿多了。我坐的这个地方没法直接看到太阳。高考，让我来算算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不用算了，我这是昏了头还是怎么的，前面黑板上不是写着嘛：距高考还有四十二天。我现在精神状态不佳，干什么都是糊里糊涂的。昨天晚上就是因为老想着高考的事儿，失眠了。一个极度缺乏睡眠的人竟然会失眠，这又是一个奇迹。我到房间外面拿了一片妈妈的安眠药，吃了，但是不大管用。今天早上醒得早，我把两眼瞪得老大，死盯着天花板，眨都不眨，心里就像有鬼似的，再也受不了神经高度紧张对我的折磨，于是又出去打开了装药品的抽屉。我发现昨天晚上我吃的不是安眠药，是一片消炎药，不过也没什么大碍。

我在早晨上学的路上注意到校门旁边有一片树阴很不错，太阳在茂密的绿色纱笼般的树叶中间闪烁着，有一棵树，很高大，叫不出名儿来，它的树叶很像含羞草的叶子，它整个儿就是一棵含羞草的放大版。我当时想过去晃一晃它，后来又想，要是我晃了它，它的树叶和树枝真的像含羞草那样齐刷刷地耷拉下来，那我还不慌了神。我就这样一边想着一边进了校门，眼前突然跳出一片血红，定睛一看，学校办公大楼旁边的那块露天黑板上贴着一张红布条幅，上书：“加强备考工作，严禁考试抄袭。”这个标语是冲着中考来的，过几天就是中考。估计每一个参加中考的学生进了

校园，看了这句标语心里都会免不了要紧张一番，甚至会心慌意乱乃至心惊肉跳。虽然他们本来就没有动一动在考场上抄袭的念头，但是看到这东西心里面免不了要咯噔一下。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无时无刻不害得你神经紧张。这种张贴大标语的手段，总会让我毫没来由地联想到文革时期，而且这条标语还是用红布做底儿，老远看上去，更富有强烈的警示作用，好像学校意在表明：只要你考试抄袭，就一定会被校方伸出的铁拳砸扁。我远远地绕过那块贴着标语的大黑板，像躲开一只咬人的疯狗一样。穿过花园时我被一棵树的枝桠挂住了衣服，扭头一看，吃惊地发现这棵树到现在还没有变绿，可现在已经快到6月初夏了啊。它的枯黑的枝桠戳向四面八方，就像一个等待别人救它一把的屈死鬼。就在它的枯枝冷不丁地把我的衣服死死拽住的那会儿，我吓了好大一跳。我刚才在学校外面看到的茂密的树阴和身边这棵枯死的树，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奇怪的反差。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心有余悸地进了教室。

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抄满了政治时事资料，紧急补充的时事新闻，就是要命的美国总统访华的事儿。后面还列出了三个大系列的提纲，明确地告诉我们这帮蠢货，应当就该事件作出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考。

我第二节课下课后出去转悠了一会儿，进班时看见有些人正在发卷纸，前天考的政治卷纸。我的试卷在课桌上摆着，但它显然已经被我的前后左右翻了个遍。他们就喜欢趁你不在的时候翻看你的试卷，而且还死都不肯把自己的分数给你看。每个人都在这种所谓的“学习竞争”中心怀鬼胎。

我碰见了WX，每一次碰见以前的老同学我都有些惋惜，因为相互之间不再像以前初中那会儿有着说不完的话

了。上了高中的人都是如此，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嘿，想好了考什么学校吗？”我问他。

“想好了有什么用？可不是你想考什么学校就能考什么学校的啊。”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像还有些不耐烦，不过这种不耐烦并不是冲着我来的，这是临考的高三学生都有的一种习惯性的焦躁。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想考什么学校，而是有没有大学可上。”

“你以前说过你想学医，是吧。”

“那是以前了，现在不能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说得是啊。”

“我想考个师范学校。”WX说。

“你疯了？”我愕然道。

“怎么考师范就叫疯了昵？”

“你喜欢当老师？”

“不是喜欢，这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有那么多人学高分子材料之类的专业，也不见得他们真的喜欢这些东西。一点儿都谈不上喜欢，只是师范专业比较好考一点。”

“要是所有的老师在考师范之前都像你这样想，那当学生的还不遭殃。”

“本来就是这样，你以为我们现在的老师都是天生就喜欢当老师吗？那不可能！”

我哦哦了两声，半晌没说话，后来他突然说了一句：“你有没有想过去死？”

“我可不住那上面想，反正现在就是特别累，但是还没到认真地考虑去死的地步，只不过偶尔有这个念头。高考考完了再考虑这个问题也不迟。你现在难道比我还累？”

“我现在不但是身体累，心里更累。”

“心要是累，那就没什么好办法，咱们都一样。”

“你怕不怕死？”他问我。也许他爱上死神。

“不怕，不过我不是说我不怕在大街上被人乱刀砍死。”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知道吗，我不相信前生，但是我相信来世。”他的表情看上去很严肃。

我笑道：“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我确实看不出前生和来世有什么不同，也许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许我头脑比他简单，不过我以后肯定会找个时间好好想一想。

WX有些尴尬地说：“好了，不说这个了，说说你，你想考什么大学，上什么专业？”

“我想当一个作家。”我直言不讳，一点儿都不脸红。

“我不是问你想当什么，我问的是你想上什么大学，什么专业。”

“我想当一个作家。”

“我知道你想当一个作家，你在初中就跟我说过。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坠呢，我问你想上什么大学，你不会不明白吧？”

“那对我来说不重要。”

“不重要？你能不能清醒一点，马上就要高考了，你还说这种话。”他故意模仿着我的满不在乎的腔调，让我感到好笑。

“确实不重要，我只想当一个作家。”我收敛了笑容。

“那你这个志向可真够伟大的。”他有些不屑地说。

“作家并不一定伟大，不过我真的希望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你这是迷信，知道吗？”他颇有点儿自负地断言道。

“什么？”我扭过头去，认真地看着他。

“我说你迷信，你对文字迷信。”

我一时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我倒真的没有想过。

一群衣着肮脏的孩子从我们面前疯跑过去，其中有几个看上去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我想到了WX刚才说他想考师范专业，谁知道在这帮小孩中间将来会不会出现当老师的呢，这可说不准。我敢肯定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从小长那么大全都没看过什么书，他们接受的上学前的启蒙就是光着屁股、肮脏的脸上拖着鼻涕、穿着油腻腻的衣服、跟在一帮比他们稍微大一点儿的野孩子后边遍地疯跑，一直到有一天，大人们把他从大街上像提小鸡似的拎回家，拉到洗脸盆前简单地洗洗涮涮，然后送往学校这样一个让你过早地体验到同类之间的尔虞我诈的鬼地方。这几天我正纳闷儿，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新闻：“高中老师长期强奸本班女生。”——一个老师，而且还很有可能是师范毕业的，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强奸犯呢？大学教育又是干什么的？上大学难道真的就那么有必要吗？现在我想通了，人就是人，你不能指望人有多么高尚，老师也是如此，就是这么回事。

我整理着写字台上的各种复习资料，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想放一把火烧掉它们恐怕都得花上整整一个下午的功夫。不知道这些标价几十元一本的学习资料在高考完了之后还有什么用处，卖到废品收购站去人家都嫌上面写的字太多了，压秤。高考已经成了一门工业，你到任何一家书店里的学习资料部走一遭就看得出来，不知道这算不算工业的畸形发展啊？

今天早晨我在吃早饭的时候，翻看了一下墙上的日历，日历上印着四个红色的大字：今日立夏。

5月30日

中午放学后，我到学校门口一家新开张的书店里去看了看，就在我翻阅一本小说的时候，旁边有个人走过来找我说话，是MS。她说：“前些日子我向你借的书，明天还给你好吗？”

我说：“无所谓。你想买什么书？”

“那个××出的一本新书，就是《×××××》，你看到了没有？”

“是你自己要买？”

“不是，是送人，××过生日。”她说了一个我没听说过的名字，又说：“书里面好像附送光盘。”

“那我不知道，我一般不看这些书，你最好到那边国内部分书架子上看看。”

她迟迟没有过去，还是在这边浏览。我说：“你要是在别人生日时送书，我建议你不要送刚才说的那本，你就送他这本，《刀锋》。这书你以前看过没有？”

“你有吗？”

“有，你要是想看，下午我就带给你。”

“那这本书我还买不买呢？”她半开玩笑地问我。

“当然要买，我借给你看的书，你不会把它送人吧。”

“可惜没有光盘。”她抽出《刀锋》，翻着，看了看，很惋惜地说。我不明白她买书为什么偏要在乎配套光盘这些个玩弄噱头的东西。

“这本书肯定不错，我都看了八遍了。”我老实地告诉她，可她明显不相信。我说：“要不然今天中午你到我家吃饭，我把我那本书后面的标记拿给你看看，我每看完一次

都在书后面做一个标记。”

“中午就不去你家了，下午别忘了把书带给我看。”

“下午再见。”我向她说道。

我在书店里大概呆了有二十分钟。今天爸爸妈妈不在家，我的一个表姐结婚，他们都去了，本来他们让我放学我也去，我没答应。我一个人在家里只要泡方便面就行，一个人吃饭特别省事、清静、简单。

这也许是高考前最后一次逛书店，所以我总觉得有一些仪式性的意义在里面。我心想一定要买一本书才走，但是书店里值得一看的书全都是我看过的。我在书店里呆的时间越是久，那帮愚蠢的店员就越是以为我是来偷书而不是买书的，这真可怕。于是我随便买了一本小书就出了店门。

我小时候个头很小，却背着个大书包，看上去一定像个小苦行僧。我天生就是那种乖孩子，循规蹈矩得要死，现在想起当年我小学时的样子，实在是机械又温顺得可怜。我就这样咬着牙把可怜的童年耗过去了，现在还是咬着牙熬过同样可怜的少年时光。也许等我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我还会回过头来可怜可怜高三时期十八岁的现在的我。都说回忆是老年人的事，所以我说啊，别看我现在才十八岁，可我都老得差不多啦。

一只灰绿色羽毛的小鸟，两只细小的脚爪紧紧地攀住细长的电线，风一吹过来，为了保持平衡，它就会把那条长长的尾巴上下翘动个不停。可是无论风怎么猛烈地吹，它都不愿意忽地一下飞走，它毫无意义的坚持，让我看了感到别扭。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爸爸妈妈不在家，我什么都自己解决了。我把书包上的这枚船锚形状的别针摘下来，放进抽

屉里去。别针是DD在好久以前送给我的，让我想想，嗯，那是在去年夏天。当时她经常把画好的画儿拿给我看。有一天我在去她家看画的时候看见她别着这枚别针，就随口说了一句很好看，她就把它摘了下来送给我。我并不喜欢随便要别人的东西，而且我当时只不过是为了让她高兴才随口说说。别针的形状是个小小的船锚，银色的船锚，有一种很好玩的象征意味，这是我在后来想到的。自从下半学期开始把它别在书包上，大概已经有半年了，它的银色还没有褪掉，我有点儿怀疑这是纯银的，我现在把它摘下来放进抽屉，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因为，我觉得再这样别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不想让DD看到我的书包上还别着这东西，我把它从书包带子上取下来，对着亮光看了看，随手扔进了黑黑的抽屉深处。

中午我一直没睡着觉，外边老是来来往往跑着要命的小踏板摩托车，还一个劲儿地鸣笛。每发出一声尖锐的鸣笛声就让我心惊肉跳一番。我恨得咬牙切齿，反正觉是没法睡了，就坐在写字台前削铅笔。今天下午需要填写一个表格，我在临走之前把这支铅笔削好了，套上保护套放进书包。下半学期以来，尤其是近半个月，班主任经常要我们填写各种表格，并且在填写之前嘱咐我们，一定要工工整整，不要涂抹，因为这些表格以后都要作为档案被封存起来，你自己是永远也看不到的，但是它能对你的一生有着各种各样决定性的影响。

高考将至，如果说什么事情是我最担心的话，那就是我的数学。一个人总有什么需要他去担心，否则他就不会有活着的感觉了。问题在于，这种担心是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担心、毫无必要的担心，就像我现在担心我的数学一样。咱们

的数学老师在课堂上讲完一道题目之后，经常会把手里剩下的一段粉笔头儿向讲台上随手一丢，然后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道题，怎么就是有些人总是玩不转呢？”说得不错，我就是玩不转。

在数学课上，我一直撑着一双眼皮，唯恐不小心栽倒在课桌上。我精力不济，为了不让自己睡着，费了好大的力气，可是最多只能让一双眼珠子跟着老师的身影转来转去，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靠着最后一点力气提起笔来，记了一些笔记，一个圆， $P(x, y)$ ，跑到这里，跑到那里，轨迹方程，求解。我放下笔，双手支着眉骨，老天啊，为什么我一在课堂上犯困，就会发现离下课时间还有要命的半个多小时呢？可是一到了下课，我又不觉得那么困了，这真是奇怪。我准备把抽屉里面的毕业纪念册拿出来，随便翻一下。刚把它抽出来一部分，就被后面的人要了去，他和他的同桌就着我的纪念册唧唧喳喳了一堂课，下课的时候还给我，指着其中一张照片，嬉皮笑脸地问我：“她照这张相的时候没穿内衣吗？”我根本就没有看一眼他指的是哪个女生，就把纪念册一把夺过来，告诉他不能把自己家里人照相时的习惯往别人身上套，人跟人是不同的，瓢虫还分几颗星的呢。他缩回脸去，露出一副下不来台的苦笑，同时还在狡猾地看着我。听见我和他说话的人都讪笑起来。我一点都不在乎他有什么感觉，这是他自找的。

数学老师下课之后一般都很难脱身，因为有不少人都拦住他要请教一些题目，因此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下课后不着急回办公室去，而是在教室里面转悠一会儿，等着有人问他问题。作为班主任，这样也是应该的。今天好像没什么人问他问题，于是他就左看看右瞅瞅，一直走到我这边来。

他坐在我前面的空位子上，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出教室躲开他还是继续坐在这里。就在我没打定主意的当儿，他转过身来：“你的数学，看来得加把劲儿才行啊。”他很和气地对我说，手里摆弄着我的尺子。他跟我说话的口气，和他在班会上当着全班人的面说话的口气截然不同。我连忙称是。我的数学成绩是所有科目里面最差的，数得上是全班倒数十名，不过我的其它科目都是数一数二的前几名，因此每次月考的总分还算不错。所有的老师都知道我的这个弱点，有一次，甚至上学期的班主任，也就是我们的外语老师，也来跟我说：“一定要把数学成绩搞上去。”你知道高考对于一个人的要求是多么高，反正你不能偏科。至于高考对一个人的要求是怎么个全面法儿，谁都说不上来，好像只要你不偏科，你这个人就真的全面发展了似的。

我又僵着笑脸和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说了一会儿话。他看看手表，时间不早了，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后边有个女生连忙跑过来，递给我一张照片。我没看清照片，倒是对她的到来很吃惊，因为我以前从来就没有和她有过交往。她看上去也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解释：“DD昨天寄信过来，叫我把这张照片转送给你的。”我道了谢，接过照片。DD前些日子又出去了，这张照片上的DD穿着和服，让我吃惊的是，这身衣服确实就是一整套很考究的日本和服，相当漂亮。她还打着一把油纸伞，身体微侧，藏在和服下摆里的右腿微微屈起。这大概是她自己想出来的造型。她总是能想出这些小小的造型花样，要是朋友们想照相，都愿意请她帮忙。我拿着照片，高兴得忘乎所以，但是我马上收敛了些，我不想让前后左右的这群笨蛋拿DD的相片开什么荒唐玩笑。我把它夹在历史课本中，放进抽屉里。

一只细线般的小蜻蜓，飞到我的课桌上来作客。在阳光下，它被照耀得全身通透，不过你看得清它是绿色的。它有一双莹莹的绿翅膀，让我想到了古代精美的翡翠手工艺品。它个头实在太小了，全身上下只有一双大眼睛是有些力量的。它的脑袋还没有发育到大点儿的蜻蜓那样，可以一百八十度转动的样子。它很无知，我伸出手来，一下子就捏住了它的双翅。一直到我把它举到了眼前，它才翘起长长的尾巴，摆出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来，实在很有意思。我又担心长时间把它捏在手里，会不会把翅膀给捏化了，于是松开了手。它一时没有缓过神来，呆呆地在桌面上落了脚。我的同桌已经注意上它。我托起它落脚的课本，顺势一吹，它就没了影儿。同桌那脸色大概就像一条跟丢了猎物的狼差不多。

然后就飞过来一只苍蝇，今天雨后的小虫子特别多。苍蝇大如一粒黄豆，圆鼓鼓的肚子上还闪着一圈又一圈的黄绿色金属般的光芒，看了就让人呕吐。它落在同桌的课桌上，停了好大一会儿，然后就搓起最前面的一双脚，看上去就像一个偷窃得手的老贼，又有点儿像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我屏住了气儿，同桌一个巴掌打下去——他好像一点儿都不在乎苍蝇的肮脏。可惜没有打到它。苍蝇这东西估计没什么记性，要不然它也能背背政治历史书参加高考了，仅仅两秒钟过后，它就忘了危险，又飞回了原处。就在它刚想落脚的那一瞬间，同桌用手掌一扫，把它捉到了手心里。他侧过身去，往走道上狠狠一甩，你甚至能听到“啪”的一声响。

6月1日

今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去医院做体检。就检查一项，做

透视。我没去存车处推自行车，因为班主任要求所有的人都排好队去，我估计就是学校门口不远的某家医院，做完体检之后我就能回学校来，于是排着队，两手空空地出去了，走了没过一会儿队形就开始大乱，就像一条痛苦地扭曲的蛇，又过了一会儿，已经没了队形，三三两两的人就像战场上逃下来的残兵败将。我是最后一小部分进去做检查的人，小房间里漆黑一团，隐隐约约地现出一丝红光。就在主持检查的医生拉开日光灯的一刹那，我看见一架到处支棱着零部件的破机器，在日光灯刚刚启动的闪烁之中，唉声叹气地矗立在墙角，要不是事先就知道来这里做透视，我肯定看不出眼前的这堆废铁就是X光机。下面，关灯，一个一个地上。暗室里很安静，只有机器的咯哒声。有一些人站在医生的后边一惊一乍地小声叫着，那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人体内部的骨骼。我站了进去，机器在咔哒咔哒地一上一下。“下一个。”医生说。我摸索着走到门口，等着检查室的门被打开。

下午上课时，我的同桌脸色铁青，脑袋上渗出了汗，潮湿的衣衫，钮扣全都没有扣上。他半张着嘴巴，一双无神的眼睛睁得老大，露出焦虑和被痛苦折磨的神色。我看了他的样子大吃一惊。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厌烦地摆摆手。我有些担心地看着老师，我想向他报告一下同桌生病了，但是又没有勇气打断他的讲课。我又观察了他一小会儿，但是他明显不想让别人关注，就在我恢复听课的姿态时，他举起了手，说要去厕所，外语老师准许了。他快步跑了出去。突然坐在靠近楼道窗户一排的人中有两个女生轻声叫了起来，班里一阵骚动。原来他在外边楼道处呕吐了起来。外语老师停下正在讲的课出去看了看，所有的人都在低头看着试卷，人

们对这件事感到很恶心。又过了一分钟，外语老师走了进来，继续讲课。我的那个同桌到后边厕所里去清洗了，十分钟后他回到教室。我递给他一张面巾纸，他拿过去擦了擦嘴巴和手。我又抽了一张给他，他不要。他愣坐在座位上，不知道想些什么，然后他拿过我的外语讲义，把刚才落下的笔记补上。下课了，他到墙角拿起扫帚和簸箕，出了教室，他得把刚才的呕吐物给打扫干净。我本来想帮帮忙，到学校茶房那边给他拿几块烧过的煤块撒在上面，好让他扫起来更方便一些，可是想到我跟他以前就没什么太深的交情，也许我这么做会让他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就断了这个念头。

我很长时间没有把家里的窗户打开了，窗沿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还好没有风，只是外边有一些人在来来往往。有一个看上去大概二十多岁的家伙，骑着小踏板，带着年轻的老婆，老婆手里抱着他们那可怜的孩子，可是我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因为结婚而获得甜蜜和幸福的样子。那个男人眼睛发暴，从身材上看，他正在不可避免地陷入中年肥胖的危机中。我总觉得他们是一对典型的失败男女，彻底地失败：他们成天就这样，抱着孩子，骑着小踏板，早上从丈母娘家赶到婆婆家，晚上又从婆婆家赶到丈母娘家，整天就这样走马灯似的混吃混喝。老天，看他们才多大，不过二十来岁，他们刚刚开始人生的失败旅程，而且这样下去他们注定要失败一辈子——难道我能让自己像他们这样了一辈子吗？

我把上次考的数学试卷拿出来，又掏出私下里准备的一个笔记本，我准备把上面的错题记下来，总结一下。就因为我的这个笔记本，我的同桌今天上午夸了我一通——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他把手放在我的一大堆数学资料上，看着我往笔记本上写东西，过了好大一会儿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

一时没反应过来，困惑不解地问道：“你说什么‘有毅力’？你说我学习有毅力？”

“对，你学起数学来实在是太有毅力了，看看你的这些资料，还有这本笔记。”他把我的资料拍得嘭嘭作响，搞得我有一种受之有愧的尴尬。我倒真的没想过什么毅力不毅力的，我这么做只不过是想要让自己考个高点儿的分数，不至于在高考时玩儿完，就这么回事。你看，我的同桌现在已经很习惯使用“毅力”这个词汇来评价我的学习行为，这不怪他，因为他也是被经常告知，要“在竞争中事先实现自我价值”、要“战胜自己”、“每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还有什么“要当个知识英雄”——这些愚蠢的论调，真是蒙蔽了许多人。

6月3日

有些人因为报考军校，就在第一节课和第二节课去后边做复杂的军检。还有一半的人坐在教室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知道自己考军校根本就是妄想，因此没去做军检，另一小部分是根本就不想当兵，因此也没报名，我就是其中一个。校园里人来人往，天气阴沉沉的，闷热。历史老师带来了试卷，但是由于有些人去军检了，他没法让我们考试，我们在下面随便复习。有一个小道消息，五分钟之内就传遍了全班：去后边军检的人，他们都要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边，让他们跑三圈，然后检查生殖器官的功能。说得活灵活现，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这个消息肯定是从坐在教室后边的人中传过来的，因为你能感觉到里边有点儿狐狸吃不到葡萄

嫌葡萄酸的味道。军检后第一个回到班里的人注定将会变成今天的关注中心。

我是被一阵喧闹吵醒的，抬起头，看见副班长莫名其妙地往座位处走，原来班里的人冲着副班长瞎起哄，还有几个人在后边狂笑不止。那帮人，总是一天到晚毫无来由地狂笑，干巴巴的笑声就像鸭子叫一样，还把嘴巴咧得跟河马似的，真是吓人。历史老师见人都到得差不多了，就发卷纸开始测验。还是老一套试卷，反正就是那么些内容，翻来覆去地做。我面对试卷早已不再惊慌，再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天我思考问题就根本不用大脑，做高考试卷只要直接调出脑袋里现成的答案，稍微整合一下，分割一下，就这样往试卷上写，肯定不会有什麼大问题的。

“你老妹DD怎么还不回来，她不想参加高考了还是怎么的？”下课后，我的同桌翻着我的毕业纪念册，看见了DD的照片，问我。

“我也不知道，她肯定要在高考前回家。”老实说，我现在一点儿都不想她，她回不回家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们学美术有什么屁用？反正你老妹的文化科成绩肯定够不上中央美院。”

“干吗非要进那种学校不可？”要是有人在我面前说起DD的不是，我还是要辩护几句。

上午放学路上和BB走到了一块儿。他说话慢条斯理的，天生的慢性子，和他说话就像在逗小孩玩儿，他是绷着脸说笑话的那类人，看上去那副认真劲儿实在可笑。他说昨天体检他被查出来是色弱。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你又不考美术专业。”

“今年我是不考，但是明年我可能要考美术专业的。”

“今年高考还没考呢，你就想着明年了？真有远见啊你。”

“考美术专业不用考数学，我数学不好。”

“我也是，既然你数学不好干吗要学理科？”

“一时糊涂，今年高考考完了我就转学文科。”

“复读班也能转文科？”

“能，怎么不能，肯定能转。”

“今天你军检了没有？”

“没有，我怎么可能考上军校，要是去当志愿兵还差不多，军校太难考。你去军检了吗？”

“没去，我也不想考军校，我干吗军检。”

“你成绩不错干吗不考一下试试？你不爱国。”

“胡说，我爱国，可是方法不一样，不一定非得当兵才叫爱国？”

我很疲劳，但我发现越是疲劳越是压力巨大，我就越是神经质，一只苍蝇嗡嗡叫着飞过来都能让我恼火异常。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已经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班里的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谁要是能在班里给我找到一张还算真诚的脸，那我真是佩服他。事实是，现在每个人都在为了减缓心中的压力，瞅准了一个机会就会爆笑一阵，那种让人骇然的笑声与其说是出于高兴，倒不如说是阵发性癫狂。

6月8日

高考全真模拟是从昨天开始的，今天考了数学和历史。

中午考完了数学后骑车回家，在N大街等着过马路的时

候，我的旁边站着两个老太婆，她们挎着菜篮子，看上去刚刚从买了菜回家去。其中一个老太婆拉着另一个老太婆的胳膊说：“别忙，等车少了点儿再过马路！”另一个呢，好像跟谁赌气似的，把胳膊一甩，说：“我就是要走，看谁敢撞我！”她还真的颤颤巍巍地从马路上穿了过去，把我吓了一跳，旁边的人也都很吃惊。

白天考试，晚上虽然不用上课，但是大部分人都在七八点钟来到教室。我原先以为班里不会有这么多人，来了之后才知道，一场高考模拟会让所有的人学习积极性加倍增长。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来教室里找人讲话的，很明显，你看看后边几排闹哄哄的就知道了；另一部分人是在家里看不下去书，来到学校是因为他需要气氛带动一下，我就有一点儿这种意思。还有一些人，就是死心塌地只知道学习的人，他们是天生的学习机器，除了教室不知道还有什么去处，他们是老师和家长都喜欢的好苗子。我要是在家里边复习，要不了半个小时就要爬上床睡觉，人都是有惰性的，何况我这个本来睡眠就缺得无可救药的困死鬼？

上午九点整开考，在发试卷之前，有个其他班的男生从考场里屁滚尿流地跑了出去，考场里边的人大眼瞪小眼，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他可能是没带准考证。看他急成那个样子实在可怕。昨天考语文的时候，我就跟坐在我斜对面的同学MS商量好了，我要她写好了数学之后把答题卡往后面侧过来一点儿，对对答案。我明天考外语也会给她提供方便。她答应了。有些人，在考前表面上同意跟你点对点答案，可是到了考场上他们就翻脸不认人，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在还剩十五分钟就要交卷的时候，MS把身子侧了过来，我大致

看了一下她的答题卡，其中有一道题目明显是她做错了，但是我这人特别没有主见，一看到自己和别人做的不一样就慌了神，我改动了两道自己没有把握的选择题。出了考场，有些早交了试卷的人在外边对答案，我没有对，因为我就是看见正确的数学答案都不一定知道它到底正确在什么地方。数学考完了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幸好我的弱项是数学，想一想还有那么多人的英语不好，他们不是得等到考完最后一门外语才能放下心来吗？我现在就算比较踏实了，已经知足了。

下午考历史，我在临去学校之前才把历史的最后一本课本，就是中国古代史那本完全背完。我被安排在初中部的楼下一间空教室里考试，里面早就被蚊子占据了，我不得不一边考试一边挥手赶它们。一到下课时间，楼上初中二年级的小孩就蹦蹦跳跳，楼上的桌子板凳也会随着下课铃响起来而开始咚咚呛咚咚呛地敲，楼板就像快要被震塌下来了似的。还有那些初中生的尖细的嫩嗓门儿，一叫唤起来，真可谓是响彻云霄。监考老师无动于衷地站着，倚着，靠着，什么姿势都摆出来过，因为他们觉得无聊。坐在下面考试的人，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俩，意思就是请他们上去管一管，可是他俩全都在闭目养神。你能做的就是尽量忽视外界的干扰写你的试卷。天气炎热，教室里连电扇都没有，你要是稍微分散一下注意力，肯定就会这样一直崩溃下去，再也无法把注意力拉回到试卷上来。我硬着头皮把历史试卷一口气做完，三十分还不到。又检查了一遍，目的就是不要輕易地丢了三分两分，免得排名的时候因为几分之差，被那么三两个人把我的名次硬生生地挤下来。当然这三分两分并不能证明别人比你伟大到哪里去，可是这就是考试那种要命的魅力所在：一

分定乾坤。这句话你听说过没有？

明天考最后一门，英语。他们把英语当作一种可以在高考中赚取分数的科目来教授，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沟通工具和文化媒介来教授，因此我虽然向来都能考个不错的分数，但要是真的用起它来，可能就会发现，我学的这门外语其实并不是英语，而是一门除了你自己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听懂你在说些什么的符号性的干巴巴的东西。

我只不过把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就不知道自己在五分钟前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我背了政治？写了数学讲义？还是看了一会儿外语？想了好半天，才差不多确定下来我刚才是在看外语书。我若有所思地走到厨房里，拿着一个勺子，没头没脑地回了房间。我垂着头坐在床上，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想到我手里拿着勺子根本就不知道做什么用，可是我刚才去厨房那会儿是要干什么来着？这些心不在焉、记忆力衰退的状况让我不胜其烦。我只有在心里一遍遍念叨着要做的事情才能把它做完，否则总是遗忘。像我这样一个未老先衰的废人，除了考大学，我还能干些什么？我躺在床上，晚风拂开沉重的窗帘，把它凉爽的手一直伸到我的身上。一种纯净的关怀悄悄地感动着我，幸福的感觉在我的心中轻轻地荡漾着。幸福，这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体会，它不是可以追求的实物，肯定不是。

6月10日

我已经习惯早上起床上学后让爸爸给我整理房间，今天

他有事没能给我整理，中午回家看着房间里乱七八糟的，心里就烦得要命。我的脑袋里总是粘糊糊的，一直无法清醒过来，意志变得越来越薄弱，不能像以前那样，按照计划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我的事情，于是就越来越慌，可越是这样，就越是没法摆脱这种混乱状况，我几乎要崩溃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妈妈又问了我一次，高考准备考什么样的专业。我无论怎么向她解释她都没法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上什么专业是不可能事先定下来的，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在这一点上，爸爸要比她现实得多。而且，妈妈一说到这个问题就着了魔般地极力主张我考师范，当老师。她对老师尊敬得简直不像话。

今天下午的两节历史课做试卷，历史老师说，前天的高考全真模拟，历史试卷太简单了，这次考试才能算是和高考在同一个难度，于是就让我们把这套试卷“好好做一做”。第三节课上语文试卷发了下来。我根本就不再在乎和别人比起来我考得怎么样了，我对这种事情再也没有多大兴趣。那道花费了我一个小时才东拉西扯上去的阅读理解题，总共才给我五分，实在是得不偿失。对于一个高三的学生，其实是没有理由说“得不偿失”这个词儿的，要是细细地算起来，他所付出的和他得到的东西之比例，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不公平。不必说我每个白天上学到底学到些什么，就单单拿上晚学来说：我一连上了整整三年的晚自习，每年二百五十夜晚，每个晚上三个小时——只要简简单单地把时间累计起来就足够让一个人感到毛骨悚然，可是，更令人毛骨悚然的还在下面：我在这么多晚上，究竟学了些什么东西？有谁能告诉我，他用这几百个晚上、几千个小时换取的东西对他来

说很值得？连白痴都知道，一个高中生所学的东西甚至连“实用”都谈不上，全是一些出了高考考场就能扔掉的破烂。这真是荒诞。

6月13日

我坐在楼梯的台阶上背历史书。夕阳照耀着楼前的水泥地面，在我面前，有一个清澈的小水潭，那是刚刚下过的一场雷阵雨给我留下的小礼物。我甚至能观察到余热尚存的太阳正在把小水潭里可怜的一丁点儿雨水吮吸着。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水潭。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我用舌头舔了一下牙龈，发现嘴里的两处溃疡已经不疼了，又用舌头舔了一下，确实已经愈合了。

院子里的花园中，原先有一些我亲手种的植物。我在小学一年级和同学一起去植物园，那边有含羞草可以让游人移回家栽种，我的同学们移种的含羞草都死掉了，唯独我的还活着。第二年秋天，我把含羞草的种子分给同学们，这些事情我还记着。如今花园里含羞草早就不见了，自从五年级开始，我就没有工夫每天到花园里看我种的植物。我种过的不止是含羞草一种，还有茑萝、爬山虎、银杏，但是现在它们都不知道哪儿去了，花园里只是一些人工修剪得死板板的常绿灌木。植物是很奇怪的，一旦它发现你不再关心它，它就会很落寞地死去。我可以每天把十几个小时放在学习上，却没法用上三分钟的时间到花园里看看我栽种的植物，因此它们就灭绝了。生命是脆弱的，因为它们肯定都会有自己的感受。

一只蜜蜂在夕阳照耀下的花丛中摇摆不定地飞来飞去。花园旁边的泥土踩上去非常松软。树叶沙沙地响着，抖落了好些天来的沉闷，恢复了夏天的活力。太阳漫不经心地照着。只需再过一会儿，星星就会爬上整个天空，它们会在深蓝色的幕布上起劲地眨着眼睛，不过，有谁能告诉我，它们为什么要眨巴眼睛呢？

也许是为了让有兴趣看着它们的人儿心情愉快起来吧。想到这里，我会心地呵呵笑了起来。

6月20日

这段时间以来，我对时间的概念越来越模糊，我不再担心时间不够用，只是磨磨蹭蹭地把本来应该马上做完的事情往后一推再推，“反正还有时间。”我对自己说。好像这是放松的征兆，这对一个即将高考的高三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今天我的心里好像有些重要的事情，但是又没法把它具体地说出来，于是就这么一直念念不忘，不能释然，搞得自己很不愉快，没头没脑地烦躁不安。

我从床上爬起来，原先以为这种毫无来由的恐慌只不过是幻觉，可是当我从床上爬起来，愣愣地坐在床沿好久了，折磨人的感觉还是不见消退。“算了，”我安慰自己道：“还是不要想了，老是给不得不去面对的生活下结论，到底是为什么啊，傻瓜。”

我这几天每天都要拼着老命狠狠地抄上万字的政治材料，

都是新补充的时事政治材料。有时候抄的时间太久，我的心就像被猫抓似的难受；有时候因为老是在抄着这些大同小异、单调的语句和一成不变的毫无趣味可言的东西，我有一种被人抓起脖子、拿起胶皮管子插到我的嗓子里灌水的痛苦。

我像一块死板板的泥巴似的坐在教室里上数学课。我早就不再狂记笔记了，因为记了我也没时间看，而且看了也不一定看得懂，何况现在我就是不记也不会像先前那么心慌。

还差一个星期就要放假，高考前学校会留一些时间给学生自由复习。我现在要做的是，权且相信我正在做的事情的重要性和它们的意义，否则我高考铁定完蛋，但是无论如何，我永远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者，这一点无需讳言。

今天是初中的期末考试，他们平时要在上完两节课后到操场做操，今天没做，而且在我们正上着课的时候，学校专门的考试铃响了几次，我就知道他们正在期末考试了。今天的天气一点儿都不适合考试，根据我以往的经验，一到期末考试，天气就会发生反常的变化，我在小学升初中和初中升高中的两场大考时，都是雨天，中考的那几天甚至下了大暴雨。

教室里吵吵闹闹，好像根本就没人重视三个星期后的高考，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些人太过于兴奋，他们无法克制自己得意的情绪，那是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优等生，他们理所当然地很自信，或者说很自负；还有一些就是明摆着知道自己要完蛋的人，他们正在加紧破罐子破摔。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每个人都在心底深处品尝着一杯由恐慌、不安、紧张和各种不确定因素调制而成的、味道奇怪的饮料。

对我来说，高考就是一个让我把一生中的第一个十八年一笔勾销的机会。我把我的第一个十八年看成是被野狗拖去白白

吃了的东西，我不能太过于在乎这十八年，否则我将接二连三地浪费第二个十八年。我希望高考过后我能获得新生，虽然这听上去有些好笑。我是混在高考大军其中的一个不会老老实实地听话的家伙，我并不是要搞破坏，我只不过希望能越过这道关卡，到下一个生命的旅程中去发现更多的不为人知的稀奇古怪的事情，这也是挺好玩儿的，我觉得就是这样。

6月23日

算起来今天是最后一天正式上课。上午外语老师在上他的最后一课时通知，凡是想报考外语院校或专业的人，必须在7月2号之前到他那里报名做口语面试。他说：“你们尽量都要试一试，一定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抓住每一个机会——苍天，听上去好像人人都是机会主义者似的。虽然我知道外语老师说这话是为学生好，可是一想到上学也得像做生意那样“抓住每一个机会”，我心里就特别别扭，好像吞下了什么蛔虫一般。

我已经基本上打听清楚了接下来几天的放假日程：6月24号到7月2号是“自由复习”的时段（事实上，我们已经自由到了除了复习之外不能有任何自由的地步了）。6月25号到6月28号，三天时间，在家里复习；6月28号到7月2号，到学校复习；然后是考前综合考试；然后就是半天半天的考前总结，每个老师都拿出他们的绝活或者说是看家本事，来一次考前大突击；接下来就是高考。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要忘了复印两份身份证，高考存档需要这东西，还有其它各种事情，我不能在这里记流水帐，否则三天三夜都写不完。

我拎着书包走到楼道口，这是正式上课的最后一个下午，很有些严肃的意味在里面，一想到马上就能摆脱这苦命的高中生活，我就恨不得让手腕上手表的时针在一秒钟之内转上一千圈。原先我还以为，到了高三正式上课的最后一天会有一种庄严的仪式呢，事实上是，我乐得不得了，乐得忘乎所以。今天整个上午我一直在傻乐个不停，就连我的同桌都被我的样子吓坏了，我提醒他，今天是上课的最后一天，而且每个老师讲课都是他们的最后一课，结果同桌的反应比我还要严重，他突然之间就毫无来由地狂笑起来，几乎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这是我们这一代的通病：我们只知道狂笑，因为这是我们对待这种令人晕头转向的生活的惟一武器。

一只燕子在我的面前翻飞，我不担心骑车可能压着它，它的速度很快，一会儿就不见了，然后又飞来了一只，我不知道这只是不是刚才的那只，燕子的羽毛在迅速果断的飞行中看上去非常油亮。高空中还有一只看不出是什么种类的鸟儿，正在迎着风飞行。由于顶着强风，它看上去就像没有飞动，老是在原处悬停着一样。有些初中生在河边上游泳。他们在放暑假，如果我现在不上高三，就会和他们一样了，当然我不会出去游泳，我有我的计划，这段时间以来，我的脑子里老是浮动着一句话：“我被弄坏了。”我也说不上来是怎么想到这句话的，也许只是一个念头，但是它却经常在我的心里不由自主地重复着。也许我要在高考之后把这个念头好好地考虑一下，最好能写在日记里面，把它的原因挖出来。我经常在我的日记里挖出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语文老师有一次在课堂上说：“谁要是把一天一天的事情全都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就会成为毫无趣味的流水帐，不会有人看。”我在下面暗

自高兴，因为我的日记驳斥了他的说法。我这一年的日记，其实就是每天的流水帐，可它并不像语文老师说的那样没有一点作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写日记，它能让我感到活下去比较容易一些。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带着沉重的负疚感活着，我已经接近了生活的痛苦之源。

我迟钝地骑着车，往学校方向去。这是一条通往永不回归的道路，我无法回过身去把丢失的日子找回来。被挥霍的日子，终究是被挥霍了。我也许会在高考之后找到新的生活，那么它也许就是通往光明之路了。行了，我不要在这里自怜啦，该结束的都已经快要结束了，我的一生已经成为定局。

我在大半个上午把抽屉里的书包掏出来又塞进去已经不下十次，我也不知道我想从书包里找什么，只是出于一种念头的强迫，好像我要是不隔一会儿把它动一动，就会在课堂上、在这种要命的单调无聊里突然死亡似的。我强迫自己安静下来，不要瞎掏书包了，但是我发现后面的人叽叽呱呱地说话，让人心烦意乱。我对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开始无可救药地厌倦着：厌倦从抽屉里掏书包、厌倦握着笔往笔记本里记东西、厌倦看着老师的面孔，听他说着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厌倦考试、厌倦背书、厌倦做题、厌倦身边的每一张半死不活的老面孔、厌倦骑车从家里往学校去、厌倦在上学路上看到的一切东西、厌倦呼吸、厌倦眨眼、厌倦我自己、厌倦一切——是的，就是这样了：我厌倦生活。想到这一点，我的念头突然打住了。“是的，我厌倦生活。”我在心里重重地重复了一遍。一阵彻骨的寒冷透遍了全身，可今天的气温起码有35℃。我冷静了下来，我得仔细想一想，可是我还没有开始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发现我的双手不老实地再一

次塞进了抽屉。咳，真要命，我怎么又把这死尸一般的书包从抽屉里莫名其妙地拖出来了？

我今天下午没有带上书包，只是拿着书到学校，一段时间里我会觉得还好，可是要不了多久，就会像其他不带书包的人那样，气息奄奄地把课本往课桌上一扔，体会那种无论怎么样都无法消除的巨大空洞感。我放下手里的书。在上课前我经常要休息一会儿，要不然我的眼皮撑不了一节课。班里的人趴倒了一大片，全都是把胳膊圈成一圈，把头埋进去睡着觉。以前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下课后十分钟，现在连第一节上课前都能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就像一群自欺欺人的鸵鸟，只要休息一会儿，就能重新打起精神来继续学习，他们缺乏的只不过是睡眠。我可不仅仅是缺乏睡眠。我的心里蛀了一个大空洞，无法填补的空洞，我感到恐慌，就是这样。我看着教室里课桌上躺倒一大片的人，一想到在他们中间有些学习成绩好的滑头混蛋马上就能趁着高考考上所谓的重点大学全国名校，我就难受异常——这不是出于嫉妒，这是一种看到世界颠倒黑白的痛苦。确实，一个学习成绩好得不得了的滑头混蛋考上大学，而一个为人真诚不虚伪的人却没有考上——这种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但是高考对这个一点点都不在乎。

我经过隔壁班的走道时，教室里跑出来一个人，在身后叫住了我。我站定了，回头看看，走廊这儿没有灯光，要想看清是谁很困难，而且对方喊我只是一声急促的声音。我只好站在那里等着她过来。是CL。她手里什么都没拿，问我是不是回家。

“对啊，当然回家，半夜我还能往哪儿去？”

“那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今天到外公家，和你同路。”

我知道你总是第一个从你们班的教室里往外冲，我经常看到你一放学就第一个冲出来，从我们班这儿一闪而过。”

“因为我不喜欢在学校里呆得久。”

“好像你不习惯和别人走在一起？”

“没有，我不是不习惯，我是不喜欢。你除外。你等我一下，我去推自行车。”

“我也要去推车。”

在我们推车经过存车处旁边那座偏僻的花园时，婆婆的树阴里传出来两个人的争论。“你为什么不再爱我？”一个男孩的声音蛮横地说道。

“我怎么能知道？”女孩不厌其烦地嚷嚷着，那回答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DD在电话里对我的态度。

我和CL屏声静气，在快要走过花园的时候，男孩说道：“你总能说出理由来。说不爱一个人的理由总比说出爱他的理由要容易些。”

我和CL面面相觑，她的面孔在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是我能感到她听了那个男生的话之后心里有些不平静。“知道吗？刚才你在楼道口叫我的时候，我发现是你，高兴极了。可我不明白你是怎么赶上我的，我放学往楼下冲的速度很快。”

“今天我想去外公家，他家在城郊，一个人走夜路有点害怕，我知道你家也住在那边，所以就想好了要和你同路。”

“你在后边叫我的时候，我真有些吃惊。”原先我本来想再说一次“我真是高兴”，可是最后只说出了“我真是吃惊”。我说不清这是怎么搞的。

“你平时都是一个人回家吗？”

“对，一个人。”

“没有同伴回家，你在路上不害怕？”

“恰恰相反，有了同伴在路上才会让我感到害怕。”

“那是为什么？”

“我是一个人，我不是群居动物，我一个人可以解决我自己的事情，虽然我喜欢和别人谈话，并且热衷于这样，但是我讨厌牵扯进各种生活的琐事中去。”

“你应该主动和别人试一试沟通啊。”她笑着说。

这正是让我有些恼火的地方——好像是因为我不愿意和他人沟通，才导致了没有人和我同路的局面。她脸上的笑意使她的话语带上了礼貌的建议色彩，可是事实上让我感到有一种受到了曲解的侮辱。我确实愿意和别人沟通，可以这么说：所有和我很熟悉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诚——起码我是真诚的，可是又有几个人能在和他人交流的时候做到这一点呢？

“算了，”我摇了摇头：“反正也快要把手读完了，我还要和谁同路干什么？何况我一点儿都不害怕一个人，我习惯了。”

“你想考什么大学？南方的还是北方的？”

一个月里，这个问题我大概被人问了八次。我已经知道了怎么回答别人才不会觉得累，而且，我发现一个现象：那些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

“我想往北方考。”

“北方？是不是想考北京的学校？”

“也不一定，只是我喜欢北方人对生活的态度，我觉得他们对生活的态度非常值得尊敬，他们热爱生活，由衷地热爱生活，你可以从北方的方言和民俗文化中看出来，我喜欢

北方的人。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是老土。”

“那么南方呢？”

“我不喜欢，我受不了。”

“从气候上说南方比北方好得多。北方风沙大，干燥寒冷，戈壁滩一样。”

“原来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觉得只要文化背景我喜欢，就是气候有些不好我也能适应，何况我又不是要在戈壁滩上大学。”

“你刚才还说你不喜欢和别人相处，现在又说你喜欢北方人了。”

“可是我爱整个人类啊，这是不一样的。”听上去很假，但我说的是事实。

“按照我的分数，大概只能在本省的几个大学里转悠，我肯定考不出去的。”CL有些失望地说。

“你不是说你要考广播学校吗？”

“对啊。”

“什么学校？”

“还没定下来，肯定是在南方，但是不一定能考上。”

“那样一来我们上学的地方就相隔太远了。”我只是随口说说，可是CL在我说了之后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我和她在银行路口分开，她外公家就住在那边不远的地方，不是她刚才说的城郊，一个人走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也许她只是想让我陪她走一程。

6月24日-30日

“有人下午给你来了电话。”妈妈正在厨房做饭，在我进里屋之前告诉我说。我以为是DD，也许她从那边学画回来了。我查了一下来电记录，是一个我不熟悉的本地电话号码。我拿起听筒，拨了出去。我问是谁打电话找我，他问我是谁，我报了自己的名字，他说了一声，我是你大哥。我没有弄清楚，他说了他的名字，是WK。

WK是我们家原来的邻居，后来他家搬到了城西边。我们从小在一块儿玩，他比我高一个年级，去年他考上大学的那会儿我还去过他家一次，从那以后我就没和他有联系了。

“有时间吗？”他问我，上海是他上学的地方。什么学校我忘了，他学的是金融学。“我前几天就已经回家了，我们在大学里的那帮人都还没放假回来，我就是想找几个高中的朋友出来聊聊，也不知道会不会耽误你们高考。”

怎么能不耽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过我和他关系还是不错的。“我这几天出不去，我还得在家复习。刚刚放假，考前一个星期的复习假。我已经计划好了复习表，但是我们可以在电话里聊聊，多长时间都无所谓，你说吧。”

“太不好意思了，还是我把电话打过去再聊比较好。”

“别别，要是这会儿挂了电话，我还不一定在几分钟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就在这会儿说，你放心说好了。”

“说说今年你怎么样？”

“我？我能怎么样？高三，就是那样，不知道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上海那边怎么样？”事实上我对大学的认识甚至比他们那帮大学生都要深：全国的大学生们目前都是正在打自己的耳光，这是一种集体性的自虐。因为他们把大学的

自由精神都用到了在食堂里男女喂饭、男女同居、再不然就是大学生创业这些个肤浅庸俗得要命东西上了——这一切只能说明他们实在浅薄、愚蠢和胆小得可怜。

“学校没有我原先想象得那么好。”他说。好像每个人上了大学之后都会抱怨自己的学校不好。

“说说怎么个不好法？”

“空虚，我上了这一年大学只感到特别累。”

“为什么累？是不是像高三这样累？”

“那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累，因为整天没事可干，累得慌。”

我听了他的解释哑然失笑。我还真想不出来，会有人因为没事可干而觉得累。我有事可干，非常多的事情，我累，而且空虚，那是因为我在干着的是根本就看不见意义的事情，并由此导致了劳累和空虚交织在一块儿的非常可怕的感觉。

“我说的意思你真的不明白？”

“不明白。”我认真地说道。

“因为我在大学里学了这一年，却没有找到学习的目的。我散漫地学着，我确实看不见目的，这根本就不是我想上的大学。我觉得大学生生活太盲目了，大家都在混日子，我有时候非常害怕。”

“你怕什么，你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你可不需要害怕。”

“不，我就是挺害怕的，这种无所事事的感觉——”我知道大学生缺乏的是什么东西，缺乏这种东西的不仅是大学生。作为大学生，他们能感受到害怕，那已经是有些觉悟了。事实上，在这个实利主义盛行的时候，人们缺乏的是理

想主义。你说我的分析可笑也好、幼稚也罢，可是，只有理想主义才能使人们摆脱失去方向感的盲目的痛苦。我起码不会因为没有任何目的而痛苦，我缺乏的只是自我选择的机会，机会一到，我就会振作起来。我现在正在把这次高考看成是一次机会，我用一生中的十八年换来的机会，非常来之不易的机会，沾满我自己鲜血的机会。

“你准备考什么专业？”他问。

“反正不是金融学。”

“对，千万不要学这个，要不然你会厌烦，这门课实在一点意思都没有，无聊透顶。”

“我学文学，英美文学。我本来想学法语的，可是我高中学的是英语，不知道人家法语系收不收学英语的学生？”

“你最好不要学文学，现在还有谁学这个啊，饭都吃不饱。”

“经济方面的不学，文学方面的也不学，你看我学什么好呢？”

他不说话了，好长一会儿才说：“你自己看着办，反正在我看来，上大学都是一样。前几天期末考试之前，我下铺的男生在复习的时候突然大哭了起来，我们都很吃惊，然后他说了原因，他说他承受不了考试前的压力。”

我没有搭腔，心里想大学考试也那么疯狂？他顿了一会儿，说道：“听起来挺好笑的是不是？”

“不好笑，我理解，只不过我们作为高三学生已经被考试考麻木了，你们还能在考前感受到活生生的压力，起码你们正在复活。”

这个电话已经打了二十多分钟，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要复习，我和他还是不一样的，当然高考过后我肯定会去主

动找他玩儿。“好了，不打扰你了，我等你高考后再见面吧。”他提出来。

“好，高考后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昨天晚上晚饭的时候我就告诉了爸爸，我从今天开始，已经进入考前一周自由复习阶段，早晨起床不能太早，务必在七点起床，这是为了保存精力迎接高考的需要，因此早晨就不用那么早把我从床上喊起来了。当时他满口答应早晨不再催我起床，可是今天早晨他又在五点半就把我嚷嚷醒了，而且还是老一套理由：“高考还剩十来天了你怎么就不知道紧张。”他老是在催催催，不停地催，这样更加让我紧张慌乱，可他还说我不知道紧张，真可恨。我起了床，洗了脸，拿起梳子刮头发。我早就不喜欢照镜子了，因为我发现镜子里出现的人往往不是我自己：不是一个邋里邋遢的模样奇怪的人，就是像一个火车站广场上的吸毒仔，有时候又像一个困死鬼。要是我幸运的话，也许可以从镜子中辨认出里面的那个人是五十年以后我的大致模样。我情愿不看见自己的这副死样儿，免得泄气。

我先是躺在床上看书，床上的被子没叠，于是我起身把被子推成一堆堆起来，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山包。我把它枕在头下，躺着看外语讲义。这会儿太阳还没出来，外面好像是阴天。我在心里暗暗给自己许诺：当太阳出来、天空变蓝的时候，我就得果断地从床上坐起来，到外面去看书。躺在床上给自己的行为定条件，确实是有一点儿惰性因素，可我要是不这样鼓动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复习下去。

我打算把数学课本看到一百六十页，现在已经看了不少，虽然有一小会儿在走神。我有感觉：复习的时候，总觉得好像脚不着地似的悬浮在半空中。按说我这样一个名

次在班里保持前十名的学生，不应该出现不踏实的感觉，可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再怎么拼命复习都无济于事。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蒙住眼睛推向刑场枪决的犯人，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极力要看清什么东西，可就是看不见，我感到慌乱，没有一点点信心，我抖抖索索地走着。

中午睡觉睡过了头，起床之后晕晕乎乎地把西瓜抱到案板上就切。切开之后才想起来我还没有把它洗干净。于是就抱着半个西瓜拿到水龙头那边去冲洗。西瓜虽然熟透了，可是籽儿特别小，看了就让我没胃口。我喜欢吃那种大籽儿的西瓜，吐起籽儿来就跟下冰雹似的，很好玩儿。而吃无籽西瓜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是疑心重重的。要说高考复习无法让我感到充实的话，吃一些东西总能让我找到还在活着的实在感觉。而我的确是一个讲究吃喝的人，我吃了半个西瓜，不过瘾，于是又打开了冰箱。

我把政治三套试卷上的问答题归纳了一下提纲，然后拿起身份证和钱包，准备到外面复印，这是学校要求的。走出复印社，碰见一些同学结伴过来复印身份证，他们总是结伴而行，干什么都要搭个伴儿，在学校里上厕所也要和别人一块儿去，我怎么受得了这样一帮人！

不知什么时候窗户被打开了。风挑着窗帘，好像刚才有人破窗而入似的，让人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我坐到写字台前，开始写数学题。我拿不准这张试卷里面的题目是不是有点儿太偏了，于是就没有信心把它做下去。我很失望地把笔放下，窗外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声音，再过一小会儿就会有汽油的味道撒野般地冲进来了。

我在高考过后的计划多得很：我会把手头上所有的书都系统地读一遍；我要按照喜欢的程度给我的书重新排一下次序；我还要给我的朋友们列一个阅读单子，DD问过我，应该看什么书。我会在暑假里让自己逐渐充实起来，我要把已经在这要命的高中生活里被完全蛀空的大脑重新填补好，这项工作用一个夏天也许不够，也许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对付因为高考而导致的该死的后遗症，但是我肯定能对付得了。

下午三点半我才醒，我总是看看钟，再看看钟，今天好一些，我很踏实地一觉睡到三点半。就像得了昏睡病似的，带着一种无可救药的样子懒洋洋地爬了起来，没有多久，我倒下去又睡了。第二次醒的时候，我全身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疼痛，我总是这儿疼那儿酸，只不过我一般不说出来而已。今天我的脑袋好像被人打进去了一个钉子，从左边太阳穴一直穿到右边的下颚在隐隐作痛。我头晕目眩地扶着写字台站了起来，睡了这么久，我仍然是没精打采的。我得继续复习！复习！复习！唉，我真希望能睡一个好觉，一个一生中不会有恶梦侵扰、不会在醒来之后感到紧张、不会有任何杂念的好觉。

我想学着其他人的样儿到市图书馆复习。据班里的人说，在那边复习“效果很好”。怎么个“效果很好”，具体我也搞不明白。我没有戴眼镜，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外面的树木，就像在看一本因为印刷质量不好而出现了叠影的杂志似的。这几天来我的眼睛看什么都有一种失真的感觉，所有的物体都成了浮动在我的头脑中的活生生的幽灵。我爬上楼顶，站在阳台上。突然间心血来潮，拼命晃动阳台上的铁栅栏，我希望这样狠命晃动一下就能让自己清醒过来，却把一个从楼下经过的女人吓得不轻，她疑惧地抬头往上面看

了看，我被她盯得心脏砰砰直跳，可我晃的栅栏又不是她的！我再一次挑战似的把栅栏晃动了一下，但是不再看下面的行人。过了一会儿，我安静了下来。有时我有一种奇怪的念头：只要我站在楼上往下看，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带有些微强迫性的诱惑力量叫我跳下去，或者，我手边的书啊、本子啊什么的，它们时刻都可能从我的手里飞出去，掉到楼下。这真是怪念头，可是我克服不了这种念头，当然我能克制住自己的行为，可是这个念头老是冲撞着我的大脑，它会让我站在楼上往下看的时候，非常担心自己一时失控做出什么傻事来。

我把背部尽量放松地靠在椅背上，看历史课本。突然，我发现课本上有一行小字是我在以前复习时从来没有注意到的，马上就慌了神。就要高考了，可我竟然能从课本上发现还没有背到的细节！这真让人毛骨悚然。我立刻从椅子上坐起来，跳下，把几本历史课本全都找到，一本一本、一课一课、一节一节、一页一页地翻着，我唯恐漏掉什么。我真是发了慌。我很有些后怕，因为这是我在考前复习时发现的纰漏，要是在高考过后，那会怎么样呢？我不敢想象。我非常后怕，怕极了。

7月1日

上午我没吃早饭。今天是考前一周在家里复习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去学校了。我从早晨一觉醒来就一直在疑神疑鬼，总觉得错过了日子，于是我不得不放下手里的课本去看日历，最后发现我连白纸黑字的日历也不相信了。我问妈妈，她说今天是7月1号，都到了这份儿上我还是犹疑不定。

我暂且把这件事情放一放，因为我得在今天把四本数学书看完，拼着老命也要看完。看完了代数第二本就接着把立体几何拿出来。为了克服厌倦的情绪，就换着花样儿看书，我抱着书，站着看、坐着看、蹲着看、躺着看、倚着看、歪着看——我把能想到的各种姿式都用上了，可是在半个小时过后，我还是无可救药地陷入无聊之中，简直无聊透了！老实说，只要让我不再头昏脑胀地复习下去，哪怕让我把几本书给啃下肚我都愿意。我蹲在门口，一时兴起猛地站了起来，我的眼前顿时一片漆黑。我像一根竿子似的摇摇摆摆，手里的数学课本扔掉了地上。我感到我的手扶住了一样什么东西。我强迫自己静止不动，逐渐觉得好些了。真有些害怕突然昏倒，家里没有一个人，我可不能就这样“咚”地一下栽倒在地上。

我发誓在高考过后一定要把面前的这一堆一堆的复习资料一脚踢上天。

刚才徐徐飘动的浮云已经被黄昏的夕阳俘获，现出了鲜红的颜色，异常刺目，我头晕目眩，拉上了窗帘，那是同样的晚霞啊，真是可怕极了，看上去云彩就像在鲜血中浸过一样。

7月2-6日

昨天晚上我在写数学练习题时不小心趴在写字台上睡着了，半夜爸爸叫我，问我怎么还不关灯，我从写字台上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关上了灯，但是懒得去洗澡，于是就继续趴在写字台上睡。约摸到了下半夜三四点钟，我一骨碌从椅子

上摔了下来，疼醒了，我还以为早上睡过了头，就四处摸我的手表，打开夜光看了看，四点四十分。

今天本来应该到学校复习，不过班主任说了，也可以在家里，但是高考前三天必须到学校来听老师做总结。我本来想在家里，可是又担心学校里有什么事情，比如老师给在学校复习的那些人补充重要内容啊什么的，于是我决定还是去学校。

我发现班主任骑车带着女儿从马路上经过。如果要我在高三临毕业给他做一番评价，那就是我觉得他还不错。在高中三年里，一半多一点儿的老师都还不错，问题是他们当上了班主任之后能不能仍然保持不错。事实上，一个老师通常并不是以他的品质高尚来让一个学生永远记住他的，而是以他表现出来的极度的差劲让你永远不能把他忘掉，小学的老师尤其如此。上了那么多年学，我发现一个老师要是坏起来就太容易了，因为做出打、骂、罚这些事情，并不需要一个人有多高的智商，只需要一阵本能的冲动，而一个老师要是真正喜欢学生关心学生，那他倒是得耗费不少脑筋才行，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难找到不错的老师的原因。当然高中生们评价老师，更多的是看他的为人，看他做出的事情是不是通情达理，是不是能被理解。我说我的班主任还算不错，指的就是这些方面。

GR走过来给了我一拳，就在我准备还他一下的时候，他却老老实实在地站住了，问我为什么这几天都不来。我说我在家里看书。我预感到自己没有到学校来，耽误了一些什么事情。我问他是不是老师来补充什么课程了。他说没有。可他说话的态度却让我疑心顿起。我转过头来问MS，她说她也只是来了两天，好像老师没来补课，要是补了课的话她的同桌

会告诉她的。

我是第一次在学校里呆这么晚，晚上十一点半才回到家里。我被大雨淋湿了。用钥匙开了门，尽量不把父母惊动，可他们照样发觉我进来了。爸爸告诉我冰箱里有给我准备的吃的东西。我为了让他高兴就随手打开看了一下，又把它关上。进到自己的房间里。屋里很闷，房间的窗户只要一被关上我就知道爸爸来过，因为他老爱把我的窗户关上。我呢，在大冬天里都要把窗户打开，这是我的习惯。我爬上床，把窗户打开，外面的雨声突然间就变大了，清新的空气像个可爱的孩子一样向我冲过来要拥抱我。我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我在回家的路上迎着大雨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在大雨中我感到非常愉快，我无牵无挂地骑车往家里走。雨可大了，不过在坝基公路上我甚至能看见远处一片片的雨雾，真美。我觉得这场漂亮的大雨救了我一命。刚才我在学校里做数学题，一连做了两个小时，差一点点就要死了，要是没有这场大雨，我肯定在回到家后犯疯病。大雨顺着我的衣服流到了我的裤子和鞋子上，我甚至觉得有些冷，不过不完全是冷，是凉爽。我的眼睛在雨点的冲击下无法完全睁开，可我高兴得只想在雨中大喊大叫一番。虽然公路上没什么人，可我仍然没有叫出声来。

NF又过来找我说话，我开玩笑地把右手伸给他和他庄重地握手，握完，坐在我后边的那家伙已经带着怨气气冲冲地抱着一堆书出了教室，他一点儿都不掩饰对我的恼火，可是我再也不想在乎别人了，我准备扯着嗓子在教室里和NF大说一场。NF放下我的手，又把我的手翻过来，仔细地看了看手

心，问我：“你的手掌上怎么长了这么多老茧？”

“我倒没有注意过，也许是因为我经常骑自行车磨的。”

“怎么可能？”

“差不多吧，我一天六次从学校往返，几年里，骑在车上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就有一年了，怎么不可能？”我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搓了搓。刚才我坐下准备背历史的那会儿，我的心脏嘭嘭地跳着，因为厌烦，因为无处不在的厌倦。我甚至能感受到大腿内侧主动脉的跳动，就连它们也对这场漫长无边的考前复习感到烦透了。

我一屁股坐在自行车座垫上，事先忘了把上面的雨水擦掉。从上面跳下来，裤子上已经吸满了水。下午是不是还要来学校呢？我发现在学校的复习效率和在家里差不多，只是感觉上有些安全。大约还有五十公斤的复习资料没看完，可我总不能不复习，就这样干瞪着眼睛等着高考。看一点是一点，总比傻等着被一棍子砸扁要聪明些，我觉得我已经聪明了不少，但是我还应该更加聪明些。

晚上我去得很早，下午没去学校，约摸在五点半我就决定晚上去学校看看。趁着太阳还没落山，天气还是好样儿的时候，我就走了。晚上的教室里一般比白天安静，尤其是复习的这几天，因为那些装模作样的人不会勤快到在晚上还抱着复习资料跑到学校里找人聊天的地步。今天上午我和NF聊了很长时间，简直成了班里的一大公害，我们一直在说笑个不停，我完全控制不住自己。说老实话，我爱笑，那是因为我需要通过笑来减轻压力。

我把全部五本政治笔记和五本政治课本还有两本时事政治还有三本政治习题集放在凳子上，再把凳子搬到后边操场

上，我要在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把这些东西再一次往脑袋里面塞一塞，能塞多少塞多少。后操场上踢球的人真不少，大都是家住在学校附近、已经放假的其他年级的学生。夏天的天空黑得慢，今天我发现天不是逐渐变黑的：当我在看笔记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法看清笔记上面的字了，就明白过来天空已经在一刹那间变黑了。七点十分。我看了一下手表，又把它放进裤兜里去。我不想把它戴在手腕上，不是因为它的廉价，而是因为戴在手腕上容易出汗，捂得胳膊难受。操场上的人在天黑之后十分钟之内就走了一大半。还有些男生女生成双成对地绕着操场跑道散步，不过人数不多，而且看上去都是些即将分别的高三学生。“死囚的放风”。我想，“死囚的放风”。我又在嘴里咕哝了一声。我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板凳上摆好，转身出了操场。

今天开始正式进入考前综合复习阶段，那个考前大摸底考试已经取消了，说是害怕耽误时间。话又说回来了，我在学校里干什么事情不是在耽误时间？上午是语文，我发现自己的凳子不见了，于是问左右前后有没有看到我的凳子，后来我注意到右边的同桌像个没事人似的坐在我的凳子上面理都不理我。我告诉他，他得找自己的凳子坐，可他一口咬定他坐的是自己的凳子。我让他站起来，他不肯，我又不能厚着脸皮拽他起来。我气冲冲地到后面找凳子，幸好今天人没来齐，凳子有得是，要不然我只好在课堂上站在座位前竖旗杆了。今天的语文大综合复习内容全部都是老师在这几天里蹲在家中憋出来的，生硬而干巴，我今天来上课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单单是分析高考可能考到的作文他就讲了足足一个小时：关于爱国、关于人民、关于人生、关于治学、关于时

间、关于成才和环境、关于诚实、关于文明礼貌、关于见义勇为、关于青年、关于自强、关于创业、关于勤奋、以及关于高考。我总得在上课的时候找一些比听课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做一做才是，于是把一串钥匙拿出来，在课桌上面瞎划了一气，然后噼噼啪啪地剪起了指甲，一直剪到左右同桌为之侧目才停下来。

天气闷热，我下了第二节课到外面喝了一肚子水。脑袋在两节语文课上已经变成了一坨烂铁，就是拿大铁锤猛敲都不会有什么感觉。一想到接下来还有两节语文课就绝望起来，我真想现在就回家，可我拿不准语文老师会不会在紧要关头透露一些关于高考的重要消息，比如高考试题啊什么的，就因为这个我放心不下。上午只有一件事情值得记下来：第三节课下课后，历史老师抱着一大摞历史资料进了班，他说，是市教委编印的考前强化练习，明天下午之前班长把资料款收齐。下面有人嚷嚷：“是不是刚从印刷厂运出来就往学校里面拉，趁火打劫？”

“确实，都到最后两天了还发新资料，就是白送都没时间看。”

历史老师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尤其是当着语文老师的面，到后来坐在下面的人差点儿就要对他起哄了。语文老师想尽一下地主之谊，命令我们不要闹，可他终究没有咋呼出来，因为他看得出来我们已经有些情绪失控了，除非他想让自己的最后一节课变成他自己的末日。历史老师见势不妙，向语文老师马马虎虎地打了个招呼之后，灰溜溜地退出教室。那摞历史资料就一直摆在那里，谁想要谁都可以上去拿，就连历史课代表都不肯发一下。人们僵持了一会儿，最后还是陆续上去拿资料了。我也拿了一本，里面的内容完完

全全是东拼西凑的，标价十三大元。还行，不算太黑，毕竟是搞教育的，怎么可能靠着卖这些垫屁股的东西多赚学生的钱呢。

下午上了政治总结课之后要去认考场，天气不冷不热，呼吸起来没有一点感觉。我漫无目的地看着教室外面，看着外面的一片灰色，突然之间恶心透了。时间压着时间，我被时间压在最底下，我想上一趟厕所，又不想在课堂上请假。我现在还不敢把资料拿出来看，因为我的头脑正在发生暴乱，喀嚓喀嚓，喀嚓咔嚓，“理发店的老爷爷呀喀嚓咔嚓，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喀嚓咔嚓，噢，噢，就快成功啦，快快喷雾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我的脑袋里一刻不停地重复着这首小时候学的歌曲，这是我近段时间来脑部发生暴乱的新形式。脑袋里第一次重复出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有些欣喜，因为我高兴地发现自己甚至还记得小时候学的这首歌，现在不这样想了，我躲都躲不掉它，它老是在重复、重复、重复，简直成了白天的噩梦。

从今天下午起，我就不能记日记了，我得完全面对高考。我不是害怕高考，我只是必须作出这样一种姿态。高考就是我的全部生活，可我怕的不是它。我感到惊慌，感到不安和不确定，但是我不怕它，因为我看穿了。对于这样一种生活，还是那句老话：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

7月9日

高考！高考！！高考！！！！

这就是三天高考。睁着眼睛做噩梦的三天。

我圆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带着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恐惧、不安和渴望，经历了整整三天的噩梦。我很清楚：即使我最终逃脱了，我的感受也永远无法从这场噩梦中完全解脱出来。我在学校里感染上的慢性疾病会永远像魔鬼似的跟随着我、纠缠着我、折磨着我，除非我有可能把它们渐渐淡忘，否则我将被它完全蛀空，可是，有些事情啊，其实是不能忘却的呢，再怎么说明，这也是我可怜的无可救药的青春啊。

7月11日

我回到家，把房间的门关得紧紧的，只有我一个人在一间紧闭的房间里，才能确切地感到我还活着。自从高考过后我拿到了标准答案开始，在这两天里，凭着我那战战兢兢的可怜记忆，对着评分标准一连估了七次分数。虽然每一次都有看似微小的分数差值，可是这微小的差值就能让一个人有子然不同的命运，可怕极了。人本来就是经常被分数啊这些个奇怪的东西玩弄的。我尝试着用阅卷者的眼光给自己的试卷打分，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你根本就没法捉摸透他们在改你的试卷时到底有什么样的情绪波动。我这样估来估去，越来越没底。今天是到学校领志愿表的日子，我去了，领完表就回来了。两天之后要把高考填报志愿交上去。爸爸妈妈这几天的情况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我看来，他们甚至比我还要紧张。

我睡了大半个下午。自从考试结束后，我根本就没能好好地睡上一觉。傍晚醒过来时，太阳已经冲破了重重的云层，把一天中的最后一点热量挤了出来。云在渐渐地变黑，好像是被

太阳晒黑了似的。云层的缝隙中射下来一束束洁净的光线历历在目，西边天空上的庞大的乌云，就像大洋中小岛上的一座古堡。我下床，紧紧地靠近旁边的墙壁站着。我开始不习惯坐在凳子上、沙发上，我只习惯靠紧一样东西缩在一角，自从考完试就这样。我极力想着“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样一个念头，并且努力让自己相信我还是原来的样子，可是我非常清楚：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我这么想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只有蠢货才相信高考之后自己就获得了解脱。

电话突然尖叫起来。我不再急着去接电话。高考过后，我至少接到了十个电话，有找我的，或者是找爸爸妈妈的，只是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的高考。我已经害怕接电话了。我走过去把电话线拔掉，电话像是被人突然打晕了似的沉寂了下来。

今天晚上爸爸妈妈会和我谈谈填志愿的事情，我肯定会顺着他们的意思填，我懒得和他们争辩。真是奇怪啊，我摇摇头：我已经在这几天里睡了不少时间，可仍然累得要命，好像这种累不是因为睡眠不足，这种每时每刻都很疲乏的感觉，已经成了我的一个新习惯。我不能再睡了，我得把我的分数再估一遍。这种悬人的游戏我很没把握，可是我不得不玩到底。就像一个赌徒，明明已经输得底儿掉了，他还是不得不在牌桌旁硬着头皮奉陪到底。我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只要等着最后的结果出来就行了，可是我免不了要再受一番折磨：我得在这等待结果的几天里备受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折磨。就是分数出来了，还得等着下一个未知的结局：我报考的学校分数线是多少？能不能被这所学校录取？我需要结果，而存在只给我不含任何确定因素的一个又一个叫人担惊受怕的过程，这就是我感到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走出门，站在树阴里，斑驳的阳光和树叶的碎影落满了我的全身。我若有所思地愣了一会儿，继续向水潭遍布的院子里走去。太阳温热，风把我的短袖衫吹动，衣衫不住地轻拍着我。我小心地在松软的泥土上走着。水潭，水潭中蓝色的和白色的……我像是突然受到了启示，抬起头来。看见大朵的浮云在蓝天上高高地悠然飘动着，树叶在风中哗哗地鼓掌。一场雨过后，大树、白云、天空、阳光和我脚边的水潭，全都清晰无比，倒显得有几分令人目眩起来，不那么像是真的了。这个7月中旬雨过天晴的下午，对我来说，却只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日子，但又深含着一些不那么确定的变故。知了在管自叫着。唉，我真到了该干些什么事情的年龄了。雨后暖湿的微风掠过花园里，盈溢四处的藤萝叶子像绿色的水波在轻轻地荡漾。我呆立了一会儿，不知如何是好。

这美丽的一天，和我生命中的任何一天相比，又有什么两样呢？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自主地给自己做出决断呢？

我顺着花园的小路走到青灰色的砖墙边儿上。长满青苔的潮湿的墙根砖屑剥落。我在一片干燥点儿的地方坐了下来，背靠着凉丝丝的墙砖。我觉得我的双臂已经把自己紧紧地抱住了，好像感到很冷似的，这才发现我在不停地颤抖着，简直没法让自己停下来。我咬着嘴唇。这该死的，这该死的。我为什么总是担心，我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折磨了！我把眼睛、额头、脑袋，我真想把我的一切，都深深地埋进双臂之中。蜷缩着的双腿把我垂下的脑袋紧紧地夹住，我呼呼地喘息着。行了，这样也不会让我更好受些。我叹了一口气，重又抬起眼睛。面前那可怜的小水潭中，犹疑地晃动着一片蓝天。我泪眼模糊。水潭中游移不定的碧蓝的天空，也因此而蒙上了一层云翳，失去了它锐利的色彩，现出一副漠

beihuihuoderen

然的样子。我扭过头去，远处一个人也没有，四下里静悄悄的……